

大战略研究丛书
Studies in Grand Strategy


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

大战略的国内基础

[美]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 (Richard Rosecrance) 主编
阿瑟·斯坦 (Arthur A. Stein)
刘东国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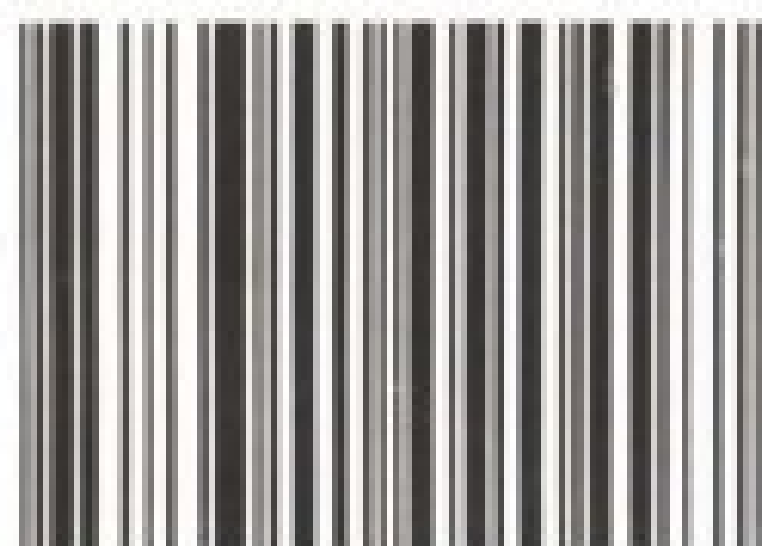


大战略的国内基础

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

本书反映了西方国家关系理论中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在大战略理论问题上的争论。书中的观点反映在两个维度。一是将大战略的目标锁定在“国家安全”层面，从而否定了单纯追求军事胜利的大战略目标。它对“大战略”一词的理解是：调整国内和国际资源以实现国家的安全。为此目的，国家不仅要考虑军事资源，而且还要考虑可以支配的全部资源，并有效地安排这些资源来实现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安全。二是将影响大战略决策的制约因素从外部转向内部。以沃尔兹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结构的无政府特征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和行为，它要求国家必须按照自助原则追求自己的实力。而本书通过对一系列重大历史案例的考察得出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结论，认为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观念因素同样是决定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变量。这种着眼点的不同，对于国家大战略的制定有着不同的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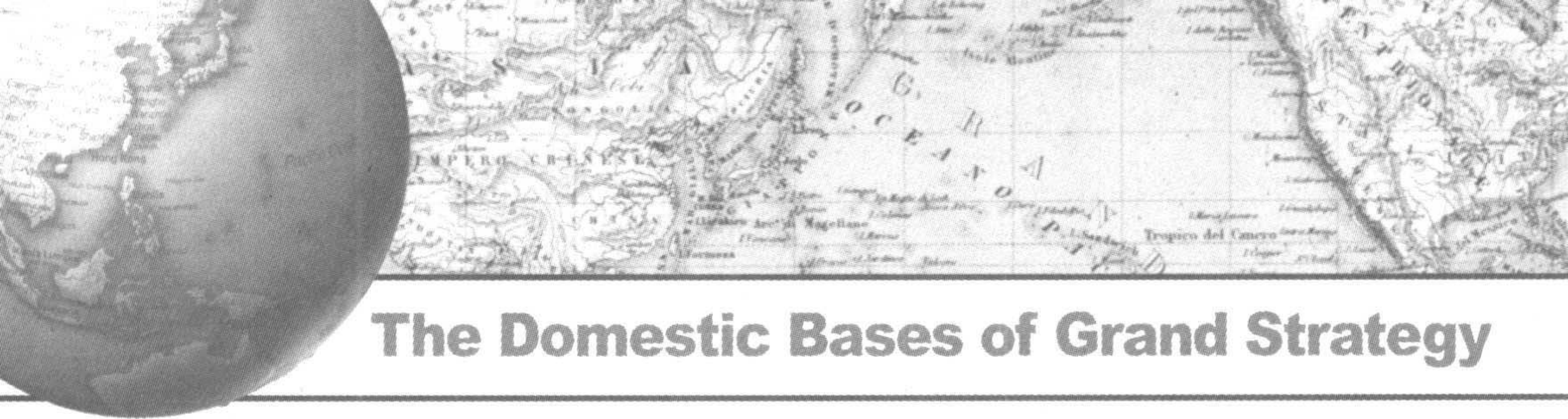
ISBN 7-301-09049-8



9 787301 090497 >

ISBN 7-301-09049-8/D · 1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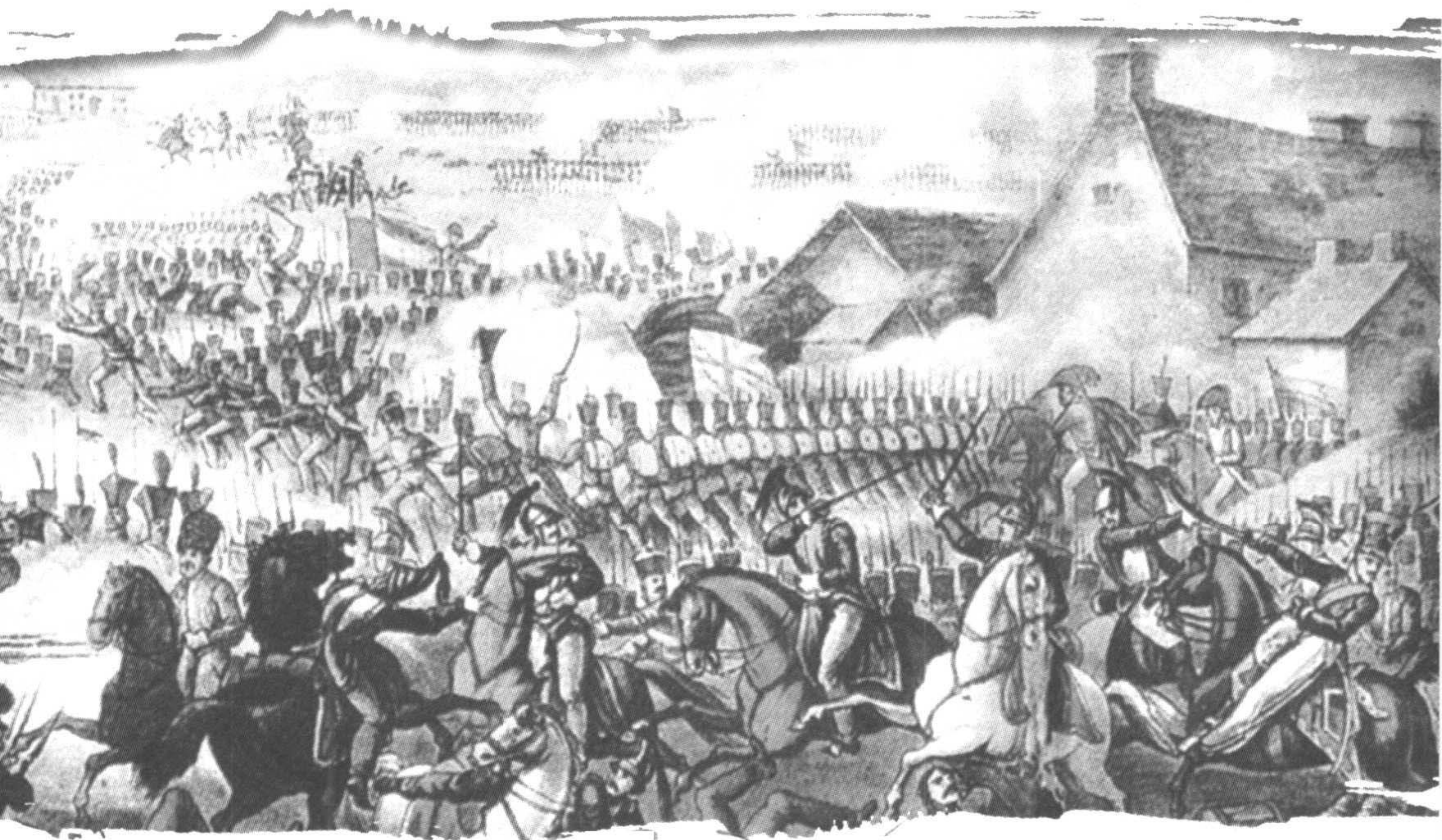
定价：24.00元



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

大战略的国内基础

[美]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 (Richard Rosecrance) 主编
阿瑟·斯坦 (Arthur A. Stein)
刘东国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4-136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战略的国内基础/(美)罗斯克兰斯,斯坦主编;刘东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

(大战略研究丛书)

ISBN 7-301-09049-8

I. 大… II. ①罗… ②斯… ③刘… III. 战略学 IV. C9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2233 号

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 edited by Richard Rosecrance & Arthur Stei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1993 by Cornell University

This edition is a translation authorized by the original publisher.

书 名:大战略的国内基础

著作责任者:[美]理查德·罗斯克兰斯 阿瑟·斯坦 主编 刘东国 译

责任编辑:徐晓杰

标准书号:ISBN 7-301-09049-8/D·1183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ss@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排 版 者: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82350640

印 刷 者: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5.75 印张 246 千字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总序

跨入 21 世纪,我们迎来一个战略构想的时代。

回首以往,人类历经磨难与碰撞,大战略研究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产生、起步、发展;展望未来,人类进步面临着巨大不确定性和机遇,理想与现实交织构成一幅饱含想像与塑造空间的宏大画卷,未雨绸缪事关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的未来,大战略研究即将迎来黄金时代。

—

大战略是对历史的总结、当前的把握、未来的选择。对大国或潜在大国的未来而言,战略谋划至为关键,而大战略研究可为国家战略谋划奠定理论基础、历史纵深、世界眼光、全球视野,对其战略目标的确定、战略路径的选择、战略步骤的安排至关重要。作为国家实力与世界地位之间的桥梁,大战略研究与大国的前景休戚相关。极言之,它事关一个大国的贫富、兴衰、存亡。

对战略重要性的推崇,历代战略家从来不惜笔墨,真知灼见更是俯拾皆是,如“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夫权谋方略,兵家之大经,邦国系以存亡,政令因之而强弱”。安德烈·博富尔(Andre Beaufre)的总结恰当其实:“当历史之风吹起时,虽能压倒人类的意志,但预知风暴的来临,设法加以驾驭,并使其终能服务于人类,则还在人力范围内。战略研究的意义即在于此。”大战略研究发端于 20 世纪早期,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全球化的日趋加深和各国战略手段的多样化,其重要性逐渐凸现出来。但正如利德尔·哈特(B. Liddell Hart)所言,“大战略研究的极大部分领域尚属于有待探勘和了解的未知地带”。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进入大战略谋划的新时代,促进大战略研究的现实条件已经具备,而大战略研究不仅需要现实的磨砺,更需要学者的推动。

大战略研究强调战略学者的重要性,将他们的深谋远虑视为国家保持长治久安的基础条件,如欧阳修指出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

非人事哉”(《伶官传序》)。孟子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孙丑上》)。即使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伟大的战略家依旧可以建功立业。鉴于大战略研究的全局性、宏观性、前瞻性等特征,战略学者必须具有专业性的战略素养。简言之,大战略学者应是饱学的史学家、远见的哲学家、深刻的思想家、敏锐的战略家,具有丰富的学识、弹性的心灵、高度的智慧、进取的精神。

大战略研究强调把握时代的脉搏,体现时代的特征,满足时代的需求。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①只有把握住时代的脉搏,预知、掌握并引导时代的潮流,大战略研究才能更好地以国家战略利益为依归。

二

21世纪初,世界迎来了中国崛起的曙光。这场历史性巨变肇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加速于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其高潮却刚刚来临。我们尚未把握这场巨变的最终结果,但是全世界却从中感知到了中国崛起带来的震撼。

对中国而言,20世纪是一个真正的大时代,一个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折年代,20世纪前半叶,中国尚处于不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底层,所求者首先是恢复19世纪失去的独立与主权;20世纪下半叶,中国迎来历史性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现实的期望;尤其是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主动开启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并逐步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塑造者。概言之,20世纪,中国由弱国向强国发展,从封闭走向开放;世纪之交,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面临空前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国改革开放步入关键阶段;进入21世纪,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的未来走向更是举世瞩目,中国崛起成为全世界关注和研究的全球性议程。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似乎相约而行,这种历史性重合既给人类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也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中国崛起为我们的大战略研究提供了时代机遇和理论诉求。中国崛起在全球化和复合相互依赖加深的背景之下,而它们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的战略议程。对于面临重大契机的中国而言,如何确立适宜的大战略至为关键。只有确立了大战略,中国才能据此开发、动员和运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精神资源实现国家的根本战略目标,而不至于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失。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我们遗憾地发现,大战略思维储备不足、目标不甚清晰、框架不够宏观、途径不具操作性、手段不够多元化、心态不甚客观等构成了当前中国战略研究的种种缺憾。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相关大战略研究往往以西方历史经验比附中国的战略思想与战略选择,忽视中国五千年的战略思想积淀,这无疑构成制约中国大战略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障碍。

从全球层次着眼,这是一个诸大国进行战略谋划的时代;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呼唤大战略的时代,更是一个构建大战略的时代。战略学者生逢其时、躬逢其盛,中国崛起为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提供了历史机遇。

三

有鉴于此,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与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合作,编辑、出版《大战略研究丛书》。两家机构的决定可谓慧眼独具,既体现出以国家需求为使命的现实高度,亦展现出致力于学术追求的理想气魄。

本套丛书以中国崛起为经,以大战略理论探索为纬,以史为镜、评估当今、展望未来,致力于推动中国大战略研究的民族化、国际化和专业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等方面逐步确立中国大战略研究的基础,搭建大战略研究的中国平台,并推进中国大战略研究基地的创建。

本套丛书由两部分组成:即西方学者的经典旧作和最新力作、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而大战略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大战略国际比较、中国大战略等构成本套丛书的重点。简言之,我们不仅要推窗鉴月,还寄希望于推陈出新。具体地说,引进是促进中国大战略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和纽带。相比而言,西方学者的大战略研究起步较早,基础雄厚,精品璀璨。一些经典著述所蕴藏的思想财富、战略意义和

学术价值,为学界同仁所允可,乃获推崇。翻译引进这些著作将是促进中国大战略研究的积极因素。在中国丰富的传统战略思想基础上推陈出新更将体现我们的学术追求。中华文明有着几千年生存发展的战略智慧,其现代化将使人类文明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国学者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寻战略研究之道,融合东西方文化之长,从而撰写出既体现中国传统战略思想底蕴又包含西方文化精髓、既立足于当前现实又着眼于未来谋划的战略著作。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将延请国内一流的战略学者撰写学术精品,以飨海内外学者与读者。

本套丛书组织得到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外办副主任裘援平博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教授的鼎力支持。他们的学术指导是本套丛书在理论建构和现实价值等方面质量的保证。美国波士顿学院陆伯彬(Robert S. Ross)教授积极引荐西方大战略著作,居功厥伟。

本套丛书的组织体现了国内学术新锐联袂推进中国战略研究的努力。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共中央党校等学术机构的青年学者为了共同的学术目标走到了一起,为中国大战略研究各尽心力。

期盼中国各界支持我们的学术追求,让我们一同畅想大战略研究的未来。

是为序。

《大战略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4年12月14日

译序*

自英国著名军事思想家利德尔·哈特于上世纪20年代末提出“大战略”的概念以来,西方有关大战略的理论争论主要是围绕着三个维度展开的。一是对大战略目标的争论。传统的战略思想认为战略规划的目标就是赢得战争的胜利,而哈特提出大战略概念的目的则是将战略目标扩展到国家安全,既包括赢得战争的胜利,也包括如何更有效地维护和平,防止战争的爆发。后来又有学者将大战略目标进一步扩展到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筹划与实施。^①二是对大战略目标与手段之间关系的争论。哈特和保罗·肯尼迪等大战略学者都强调大战略规划要实现目标和手段的平衡,包括国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外交能力、道义力量运用能力、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和政治派别之间的利益协调和行动统筹能力等与战略目标相一致。^②人们还探讨了适用于不同能力的不同战略模式,如霸权战略、均势战略、搭便车战略、孤立战略、超越战略等。三是对大战略规划需要考虑哪些变量的争论,如国际体系的结构,国家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传统,观念与道德,自然和地理等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和支配着一个国家的对外决策。

虽然本书对第一个问题也做出了明确的界定,认为“大战略的含义就是调整国内和国际资源以实现国家的安全”,^③但其争论的重点主要是在后两个维度上,即大战略需要考虑哪些制约因素,如何才能实现目标与手段的平衡。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有着不同的看法。因此,要想全面准确地把握本书的内容和争论实质,还需要对新现实主义的大战略观察视角和引起的争论有一个总体的

* 感谢门洪华博士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

① 有关大战略目标和含义的争论,见门洪华:《建构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2页。

② 参见 Basil Henry Liddel Hart, *Strategy: The Indirect Approach*, 2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Meridian, 1974), p. 322; [美] 保罗·肯尼迪著,时殷弘、李庆四译:《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③ 见本书第一章。

了解。

一、新现实主义的大战略视角及引发的争论

虽然本书的批判对象是结构现实主义,但在结构现实主义产生之前,有关国内因素和国际体系结构因素在决定一个国家的外交行为方面孰轻孰重的争论就已经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展开了。

1948年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一书的发表标志着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走向成熟。在其提出的现实主义六原则当中,突出强调了国际政治受到源于人性的所谓客观规律的支配,这一规律要求要以权势来界定国家利益,并按照理性算计的原则始终如一地根据国际情势的特征和内外权势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和战略,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国家利益的途径是提高自己的权势,在实力的基础上兼用外交和战争手段。^④ 在此不难看出,所谓国际政治的客观规律就是各个国家对权势的追逐,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必然要受到这一规律的支配。

尽管现实主义在与理想主义的论战中取得了胜利,成为战后初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导学派,但对这一流派的批评从来没有间断过。

本书的主要编辑者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就是较早向现实主义理论发起挑战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63年,他发表了《世界政治中的行动与反应:国际体系透视》一书,直接对现实主义理论命题提出了质疑。在该书中,他将1740年至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历史划分为九个历史体系,并提出每一体系的稳定取决于四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中三个变量属于构成体系的国家所采取的行动,包括精英集团制定的外交政策方向、精英控制外交政策的程度以及能够用于支持外交政策的各种资源,如说服技巧,可动员的资源量和动员速度等。在这三个国内层次的变量中,第二个变量至关重要。在他考察的九个体系中有四个体系的变化是由于国内精英分子地位变化所引发的。他们试图通过采取对外侵略来维护自己在国内的地

^④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5th ed., rev. (New York: Knopf, 1978).

位,从而造成了国际体系的不稳定。然而,体系的稳定最终取决于第四个变量,即国际环境吸收或满足国家目标的能力。从这些历史案例的分析中他得出了与现实主义截然相反的结论:在评估国际体系的稳定时,不可能排除国内因素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系统范围的行动只有与成员国内部的政策创意产生互动才能发挥作用。系统的崩溃源自于它无法适应和解决国内原因造成的动荡。^⑤

这一观点遭到了现实主义者的反驳,批评他将国内因素的作用过于绝对化。为此,罗斯克兰斯在1973年又写作了《国际关系:战争还是和平?》一书。在该书中,他除了对自己先前的观点做了总结归纳之外,也向批评者做出了有限的让步,但总体上仍然坚持了第一本书的基本观点:尽管国内的不稳定并不必然导致国际体系的变革,但前者趋于促发后者。^⑥

1979年,肯尼思·沃尔兹发表了《国际政治理论》一书,对现实主义理论进行了更加系统的完善和发展,标志着结构现实主义(又称新现实主义)的诞生。这一理论更加突出了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外交行为的决定性支配作用。他认为结构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国际体系的根本组织原则(即无政府状态),二是构成体系的单位(即国家)之间的功能差异,三是国家之间的权势分布状况。但他更加强调第一和第三因素的作用,而对单位层次的因素采取了忽略的态度。在这一体系中,各个国家本质上相同,没有差别,它们都追求权势和国家利益。因此,国家行为从根本上不取决于内部属性,而取决于国际体系结构中的位置。按照这一假设,国家只能按照国际结构的无政府特征而根据自助原则来制定自己的大战略,那就是建立均势以求得生存,国内因素无需考虑。^⑦

这一观点与罗斯克兰斯的观点发生了直接冲突,由此引发了两人之间(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之间)的新一轮论战。1981年,罗斯克兰斯在《国际组织》杂志秋季号上发表

^⑤ Richard Rosecrance, *Action and Reaction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Perspective* (Boston, Little, Brown, 1963), pp. 79—93; 236—239.

^⑥ Richard Rosecr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ace or War?* (New York, McGraw-Hill, 1973), pp. 33—36.

^⑦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9), pp. 60—67.

了《重访国际理论》一文,对沃尔兹忽视单位层次的影响作用提出了批评。^⑧ 沃尔兹则在同一刊物 1982 年夏季号上发表了《与理查德·罗斯克兰斯的交流》一文,强调结构现实主义并没有认为单位层次的现象一点也不重要,而是认为它们在体系理论中没有其立足之地。^⑨

此后,罗斯克兰斯进一步拓展了同结构现实主义的论战范围。1986 年,他出版了《贸易国家的兴起:现代世界中的商业与征服》一书。在该书中,他对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进行了新的描述,用“二元”体系框架取代了新现实主义的“一元”体系框架。认为现在的国际体系存在着两个世界:“军事-政治世界”和“贸易世界”。国际体系的这一新特征标志着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来所确立的以领土和军事力量为特征的地缘政治已经接近过时,贸易竞争取代了领土扩张和军事实力追求,贸易平衡取代了权力平衡。在跨国贸易和投资急速增长这样一个国际结构中,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这使得领土扩张变得不再有意义,而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却越来越激烈。这决定了将来的国际体系特征必将是从小军事竞争的逻辑转向贸易和相互依存的逻辑。原因很简单,这一趋势首先来自于决策者的理性选择。因为核战争时代领土征服的代价过于沉重,收益甚小。其次也源自于国内民众的选择和压力。面对成本-收益明显而巨大的反差,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率会大大下降。^⑩

当然,罗斯克兰斯只是对结构现实主义提出批评的众多理论家之一。除他之外,包括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各种学派在内的众多思想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结构现实主义提出了批判。其中 1986 年由罗伯特·基欧汉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一书较集中地收录了不同学者的有关文章。在该书中,沃尔兹通过对各种批评观点进行回应而进一步澄清了结构现实主义与其他理论流派的不同。在谈到体系结构和国内因素何者更重要时,沃尔兹再次重申,体现为国家间能力分配差异的国际体系结构是影响

^⑧ Richard Rosecrance, "International Theory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utumn 1981) 35(4): pp. 691—713.

^⑨ Kenneth Waltz, "Exchange with Richard Rosecr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ummer 1982) 36(3): pp. 679—681.

^⑩ 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国家对外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国家行为因权力的差别而出现差异，其程度要超过意识形态、财产关系的内部结构或者政府形式的差别所造成的差异。在自助体系中，与意识形态偏好或者来自内部的政治压力相比，竞争的压力所占分量要重得多。”^①

在以后的论战中，体系结构因素和国内因素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争论的焦点之一。其中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基欧汉、米尔纳（Helen Milner）、马斯坦杜诺（Michael Mastanduno）、阿瑟·斯坦（Arthur Stein）等人在同新现实主义的论战中都强调了国内因素对于一个国家外交决策的作用。^②

此外，建构主义的某些代表人物还对新现实主义的体系结构观进行了批判。布赞、琼斯和利特尔在《无政府逻辑：新现实主义到结构现实主义》一书中提出，沃尔兹对“结构”的概念定义得过于狭窄，认为体系的结构不能仅限于国家之间的权势分配，还应当包含一系列其他变量。其中“规则、机制以及国际组织也应包括在国际政治结构的定义之中”。他们还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深层结构”的概念，认为系统的结构不仅包含了所谓的国际政治体系，也包含强调文化、法律和规范的国际社会体系。所谓国际体系，是包括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战略策划在内的综合性体系。作为体系单位的国家也不一定就是单一的按照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的理性行为体，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因素以及国民的态度也是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变量。因此，要将国家的实力与国家如何运用实力区分开来。国家实力的性质会影响国际体系结构。这种国家性质不仅包括技术手段（如经济发展程度和武器装备程度），而且还包括共同的准则和组织。总之，他们的结论是，国内结构影响了构成国际体系的单位。单位之间的互动类型及它们的外交政策总的来说是由国内制约因素来决定

^① 肯尼思·沃尔兹：《反思〈国际政治理论〉——对我的批评者们的答复》，载于罗伯特·基欧汉编，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300页。

^② 其中有代表性的争论被收集到1993年出版的论文集当中。详见大卫·鲍德温编，肖欢容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对国内因素的讨论可参见第一章的归纳以及第四章、第六章和第十章。另见Arthur Stein, *Why Nations Cooperate: Circumstance and Cho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Cornell Univ. Press, 1990)。

的。^⑬

到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引发了美国学术界对世界格局演变方向和国内大战略制定等问题的新一轮讨论。为防止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范式对美国大战略制定的一统天下,罗斯克兰斯等人感到有必要将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注入到大战略的探讨当中。本书的出版,标志着部分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与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论战扩展到大战略研究领域。这一争论是新自由制度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两种理论范式之间长期论战的继续。

二、本书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本书是由多位作者共同完成的一部文集,全书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理论部分包括前3章,勾画出了本书所要讨论的命题范围,其余6章实践部分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得出了与结构现实主义不同的大战略观点。

罗斯克兰斯和斯坦在第一章指出,二战后以来,美国政治家和决策者们受现实主义理论思维的影响,对大战略概念的理解过于狭隘,只强调在国际体系结构上保持军事平衡,而忽略了其他方面。一些学者对此已经提出了批评和修正。本书的目的就是在吸收这些批判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大战略概念的关注范围,探讨那些超越现实主义而揭示出大战略的国内基础的种种因素,用具体的历史案例来说明国内不同的集团,社会观念、宪法特征、经济制约因素、历史上的社会趋势、以及国内政治压力在大战略选择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之所以要探讨这些因素,是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际冲突与合作的前景。

本书探讨的核心命题是一国大战略的制定应考虑国内因素的制约,而不能像结构现实主义所说的那样,仅仅考虑国际体系结构的制约。这些国内因素包括政治、经济和观念三个方面。

本书提出,国内政治是对国家大战略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这一

^⑬ 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7.

命题否定了现实主义提出的“国家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的假设。第二章以一章的篇幅专门从理论上探讨了国内政治与国家大战略决策的关系。在接下来的各章当中,也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这一命题。

第二章作者多伊尔指出,由于现实主义理论在美国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所以政治因素在美国大战略讨论中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这严重妨碍了有效战略的制定。而历史经验表明,国内政治因素对国家大战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至少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

首先,多伊尔指出,代表国家做出决策的政治家并不总是将国家利益最大化,有时是将个人利益最大化。这种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1879年至1892年埃及总督杜霏克勾结英国军队镇压本国民族起义的行为只能代表他个人的利益,而不能代表国家利益。马基雅维利描述的中世纪欧洲诸侯之间的对外扩张除了为求得生存安全之外,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观念上的所谓“帝王的美德”。15世纪末,西班牙的斐迪南所发动的一系列对外扩张早已超出了国家生存安全的需要,完全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观念愿望。在这些政治家的心目中,国家只是自己观念中的一个“艺术作品”,想把它塑造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而完全不受什么国际结构的制约。

其次,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宪法特征差异也会对该国的对外战略及能力产生不同的影响。多伊尔列举了康德的自由主义国家联盟来说明自由主义共和国的对外行为是受个人自由的价值驱动的,不是由现实主义所说的权势和物质利益驱动的。共同的自由价值使自由主义国家之间能够形成联盟,从而减少战争。战争只会发生于自由国家与非自由国家之间。与自由主义国家的和平主义对外行为相反,第九章通过对日本的历史考察揭示出,日本战前的武士卡特尔联盟和战后以隐蔽形式存在的集权主义精英群体(作者称之为“软集权主义”)使日本一直遵奉着重商主义的对外战略。二战前,它是以武力为手段向外扩张,二战后改由经济手段扩张。宪法特征的差异还决定了追求大战略目标手段的差异。在20世纪初英国和德国展开海军军备竞赛时,英国的宪制使国家能够征收足额的税收维持军备竞赛,而德国的联邦制则使德国中央政府无法征收足够的经费。这就预先决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

再次,国家内部在政治上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为不同的利益群体,他们在国家外交政策上并不总是采取一致立场。国内政治力量

的分化表现为多种形式。首先是不同的政党有不同的对外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社会党人纷纷投票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拨款,现实主义用此案例来证明国家对外政策不受党派利益的影响,本书的考察结果则相反,认为社会党人并不是按照所谓的国家利益投票,而是按社会党人的价值追求做出的选择。其次是在西方民主体制中,民众和舆论的压力也能对国家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美国和英国战前和战后的某些对外政策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国内民众压力的影响。第三,即使是在前苏联这样所谓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其最高决策层也存在着“强硬派”和“温和派”之争。至于哪一派能占据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外部竞争对手对其采取互应式的策略,支持其温和派的改革,压制强硬派。过去美国对苏联没有做这样的区分,错失了分化瓦解苏联的机会。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适时采取相应措施,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孤立发动政变的强硬派分子,最终促成了冷战的结束。

经济因素是制约大战略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变量,也是很多大战略理论家不可回避的一个争论主题。本书各章几乎都涉及到这一主题。

按照结构现实主义的说法,国家的行为就是追求权势,而权势的主要体现是能够保证国家生存安全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之间是可以互相转换的。本书则从两个方面对这一假设进行了否定:一是否定了经济实力可以自动转化成军事实力,并根据自己的实力界定国家利益,对外做出反应的观点。二是探讨了全球化过程中经济相互依存度增加对大战略决策的影响。

本书作者提出,国家的经济实力并不总是能转化成军事实力,并依此对外做出反应。第五章对美国历史的考察表明,二战前,美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支持对希特勒采取遏制政策,但政府鉴于国会对它的财政制约,不敢做出应有的对外承诺,出现了“扩展不足”,致使国家威慑力不足而助长了希特勒和日本发动进攻。二战后初期,美国出于在全球范围内遏制共产主义蔓延的需要而做出了大量的对外军事承诺,但国内民众要求部队复员的压力和国会对军事拨款的大幅度削减使美国出现了“扩展过度”,也就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和人力履行它所做出的承诺。这些案例说明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并不能自动转化成军事实力,国家的对外行为也并不总是与自己的实力相一致。经济实力虽然提高了一个国家的对外能力,但“问题的关键不是国家能做什

么,而是要选择做什么”。^⑭ 这种选择往往是由国内政治因素和观念因素决定的。

战后德国和日本受战败国地位的制约,在一段时间内都放弃了对军事实力的追求,但它们又同样成了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大国。这一现象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能力构成了挑战。第9章对战后日本成为“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这一现象进行了理论探讨。现存的三种理论解释强调了不同的因素。第一种解释(即滞后性民主发展理论)似乎强调了体现为军事实力差异的体系结构因素,认为日本同其他国家一样,都是受国际结构的支配而追求着同样的东西,它之所以放弃了对军事实力的追求,并不是出于自己的主观选择,而是美国军事占领的安排。按照这一解释,战后的日本实际上是没有自己独立的大战略,只是服从于美国的战略需要。

第二种解释也强调了结构因素,但不是结构现实主义所说的军事实力结构,而是经济相互依存结构。按照罗斯克兰斯的解释,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深,这使得依靠军事手段的领土扩张失去了意义,而经济征服成了谋求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战后的日本正是心照不宣地奉行着这样一种大战略,将东南亚和美国等地作为它的金融和产业殖民地而大肆投资开垦。

第三种解释强调了国家内部的历史因素,认为德国和日本属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后发展国家,它的发展规律不同于先发展的其他西方国家。后发展国家更侧重于经济发展在国家大战略中的首要地位。为了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重要利益集团的精英们往往形成政治联盟,不惜采用极权主义手段压制民主,结果造成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民主政治体制的不完善。这种由少数人操控的体制容易使国家走向对外扩张。但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外部环境下,扩张的手段有所不同。1945年之后日本政策的惟一重大变化是手段的变化,从军事手段转变成经济手段。

这三种解释尽管着眼点不同,但共同之处是都突出了经济目标在日本大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按照第一种解释,日本突出经济目标是被动和无奈的选择,而后两种都把这种选择看成是主动的,是一种精心的大战略设计。

^⑭ 见本书第五章。

对大战略决策产生影响的第三个国内变量是观念因素。第三章用一章的篇幅讨论了这一问题。作者约翰·米勒观察到,对冷战的起源和结束存在着两种解释:一是经典的看法,将其看成是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二是结构现实主义的看法,认为它是受美苏之间经济、军事、政治实力的分配方式决定的。米勒通过对比考察得出结论认为,冷战的兴起是因为苏联领导人信奉一种世界革命的信念,要在全球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苏联的建立为这一世界革命战略提供了一个桥头堡。针对苏联的这一战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遏制战略,形成冷战。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军事、经济实力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主要是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他抛弃了世界革命的观念,呼吁东西方停止对抗,因此导致了冷战的结束。

第八章在对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进行解释时,作者施奈德通过考察发现,除了军事威胁和经济竞争的因素外,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观念建构(如民族神话的编造)和仇外煽动也是造成民族主义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这些结论出发,第三章作者米勒进一步提出,既然观念的变化能对世界秩序造成如此大的影响,那就应当对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观念进行认真的反思,他具体提出了需要反思的4个概念:系统的稳定、系统的转换、权势和无政府状态。

按照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解,系统的稳定表现在构成系统的单位数量不发生大的变化。而实际上,大国领导人内心世界的变化(即观念的转变)也能够导致系统的转变。现实主义强调系统的转换往往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战争的结果是对权力进行重新分配,进而建立起新的秩序。而冷战的结束不是由战争而是由观念变革实现的。权势的概念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就是军事实力,但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和德国虽然不能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其强劲的经济竞争能力决定了它们同样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这也应当被理解为是一种权势。依靠这种影响力同样解决了很多重大分歧,如德国实现了和平统一。就连现实主义强调的所谓国际无政府状态也纯粹是一种观念的产物。

关于国际关系的这些观念在国家对外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各国都能抛弃旧有的观念而竖立起新的观念,就能对国际关系行

为产生重大影响。

总之,该书超越现实主义“国际体系结构决定论”的单一视角,向读者提供了大战略决策的多维视角,尤其是补充说明了国内政治、经济和观念因素对于国家大战略决策的重要影响。本书与结构现实主义的论战不是要彻底否定“体系结构”的作用,而是把它当作诸多决定因子其中的一个。本书得出的总体结论是,国家之间的“均衡”既是由其国内方针决定的,也是由国际权势决定的。某一特定国家大战略的成功既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考虑本国内部和敌国内部相应的国内条件,又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对权势结构做出准确判断。^⑮

三、本书带给我们的启示

中国的崛起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不同的国家对此做出了不同的解读,有的将其视为新的机遇,有的视其为威胁和挑战,因而千方百计要遏制中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如何规划本国的对外行为,如何消除其他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这是我国大战略规划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政府已经明确提出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但是如何创造实现和平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们的谋划和运作,而要成功地把握这一过程则需要尽可能多地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和变量。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呼唤大战略的时代。国内学子们不负时代之重托,正在这一研究领域进行着辛勤的耕耘,并取得了颇具价值的可观成果。这些成果既包括对国外大战略理论著作的翻译和介绍,也包括国内学者对大战略理论和不同国家大战略走向的思考。其中胡鞍钢先生主编的《中国战略构想》、《中国大战略》,叶自成教授著《中国大战略: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主要问题及战略选择》,门洪华博士著《建构中国大战略的框架》等著作更是集中体现了国内学者对中国大战略问题的观察视角。^⑯

但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对大战略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⑮ 见本书第一章。

^⑯ 详见胡鞍钢主编:《中国战略构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胡鞍钢主编:《中国大战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叶自成著:《中国大战略: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主要问题及战略选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门洪华著:《建构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多集中于对大战略概念的界定,大战略目标的确定和方案的选择,较少对目标和选择方案的可行性及实施策略进行具体论证,尤其是对怎样才能实现大战略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平衡,在制定和实施大战略方案过程中需要考虑哪些因素等问题还缺乏系统的探讨。^① 这种状况与时代的要求是不相称的。

正如国内学者所一致承认的那样,中国的大战略研究还有很多领域和问题尚待开发和深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则有助于加速我们的研究步伐。在这方面,本书的争论无疑会带给我们某些不可多得的启示。

本书最主要的告诫是不要将制定大战略的立足点单单放在国际结构上,而要充分考虑各国内部因素对国家对外行为的影响。即便是我们需要考虑国际体系结构的特征,也不一定就必须按照现实主义的理解,将其视为是互为对立,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无政府状态。精明的决策者完全可以通过把握己方和对方的国内变量来使双方的关系朝着一种双赢的方向发展,亦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被“无政府状态”的悲哀陷阱所困惑。

至于考虑双方国内的哪些因素,本书对一国内部政治、经济和观念因素对外交政策影响的探讨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的思考线索。

从政治因素来看,国家领导人的政策选择理性、国内不同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的斗争、民众的情绪以及舆论压力都会造成国家对外决策的不确定性。作为决策者应当尽量减少国家内部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同时积极影响对方的政策走向,使之符合自己的利益取向。

从本书的讨论中我们看到,领导者个人的意志不管其是否真正体现了国家利益,都能对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除了杜霏克和斐迪南两个案例之外,现实社会中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更多的是反映了他个人的野心,而与当时西方列强的实力对比结构没有必然的联系。尽管列宁提出帝国主义的特性之一是具有对外侵略性和好战性,但他同时还提出各国无产阶级的联合斗争可以制止战争。希特勒的上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与德国

^① 有关国内大战略问题的研究现状可参见门洪华著《建构中国大战略的框架》第48—55页的总结归纳。

左翼政党的决策失误有着很大的关系。如果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能够捐弃前嫌,采取联盟策略共同对付法西斯主义的挑战,就有可能阻止希特勒上台,并扭转历史的发展进程。

除了领导者个人的因素外,己方和对方的政治体制、决策程序和不同集团的态度及力量对比也是需要加以考虑的重要因素。本书的探讨告诉我们,不要把竞争对手看成是铁板一块的单一行为体,而要看到对方内部存在着的各种矛盾和制约,并充分利用这些制约达到自己的目的。对于同一问题,一国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会有不同的看法和立场。即使是同一领导人或同一集团,在不同的时期或面对不同的环境也会有不同的立场,决策者应当看到对方内部的这种分歧和可变性,与之形成互应式的战略,扶植、培育对本国利益有利的力量,孤立、打击对方的强硬派。上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若不是及时转变对苏联的敌视战略,代之以拉拢、扶持改革派,孤立强硬派的策略,就不会有后来的结果。

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的目标也同样离不开对己方和对方各种内部政治因素的把握。对己方来说,我们要想办法将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明确化和固定化,最大限度地减少因个人和不同政治派别对国家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扭曲而导致错误的对外政策,同时也尽量减少因自己对外行为的不确定性而造成对方对己方的误判,进而损害本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对于竞争对手来说,即使是像日本、美国这样对中国的崛起抱有疑虑并采取遏制政策的国家,我们也绝不能将其视为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单一整体,而要充分估计到对方内部的政治分歧和政治体制结构对其对外行为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我们要从最坏的结局着眼,充分考虑其国内各种偶然因素将两国关系引向战争的可能性,做好应付挑战和打赢战争的准备,否则,面对突如其来的侵略和干涉就有可能束手无策。如果实力准备不足,形不成应有的均势威慑,还会鼓励对方进行讹诈或发动战争。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争取和平共处,进行互利互惠往来的可能性。利用各种手段影响对方的民意,扶植有利于己方利益的势力,减少发生不测的可能性。同时利用国际组织、国际合作机制等手段将双方的行为方式固定下来,减少国内政治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书对国内经济因素的解读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尽管利德尔·哈特和保罗·肯尼迪等大战略理论家都强调大战略目标和手段

的一致,但在现实社会中,国家的战略决策者们并不总是遵循这一点,往往出现国家经济实力与对外战略目标的不平衡。这种目标与手段的失衡表现为两种形式:战略目标与整体经济实力的不相匹配;整体经济实力与经济资源动员能力的不一致。

国家对外行为与经济实力相脱节的现象时有发生。有时是领导者不顾经济承受能力和技术水平差异而贸然发动战争,结果造成失败。有时是民众的舆论压力迫使决策者做出与经济实力不相一致的对外政策。二战前英国经济实力不足使其无法单独应对德国的挑战。希特勒进攻波兰后,英国政府迫于国内民众的压力而被迫对德宣战。若不是后来美国和苏联的参战并对其提供援助,英国单独无法获得战争的胜利。这一案例提醒我们,专心致力于经济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根本前提,只有经济强大了,我们才有应付一切外部挑战的能力。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要奉行“韬光养晦”的对外政策,永远不称霸。这实际上就体现了战略目标与手段相一致的原则。如果我们超越经济能力而过多地承担国际义务,就会损害国家根本利益。但是我们还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经济实力强大了,并不就一定就必然意味着维护和平能力的提高。

本书的分析揭示出,拥有经济实力和动员经济资源服务于国家对外战略的能力并不是一回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和德国因宪法体制不同对两国经济资源动员手段的制约提前决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二战爆发前美国虽然有着较强的经济实力,但由于国会对政府的财政制约,也没能将经济实力转化成捍卫国家安全的有效手段,从而未能遏制德国和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这些案例告诉我们,决策者在制定国家对外战略时不能只看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经济总量和世界排名,还要考虑政府对经济资源的动员使用能力以及经济实力向军事能力和外交能力的转化能力。战略目标一旦确定,还需要对经济资源的动员手段进行调整,使之适应国家战略的需求。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目标与手段的平衡。

观念因素也是影响国家大战略决策的重要变量。本书的考察至少告诉我们两点:冷战的兴起和结束与观念有着密切关系;对国际体系结构特征的不同理解也会导致不同的对外政策和行为。了解观念对于外交政策的这些影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今天,冷战虽然结束了,但意识形态斗争的阴影依然存在。一些

国家仍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耿耿于怀,并以人权斗争的形态表现出来。除了旧有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外,美国又发明出种种新的意识形态斗争战线,其中文明冲突论就是危害较大的一种观念。美国正在利用这一观念进行着新的“十字军东征”,在以反恐战争为名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后,又将矛头指向伊朗。与此同时,又于2004年推出了所谓的“大中东创意”,目的就是伊斯兰世界进行观念和制度改造,使之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需求。面对这一形势,我们应当倡导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处,设法避免因新的意识形态对抗而引发冲突。

此外,对国际关系结构特征的不同理解对于各国的外交政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按照现实主义的原则将国际关系理解成是纯粹的无政府状态,那只能导致“安全困境”的结局,并引起新的冲突。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在看到传统的军事—领土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的同时,还揭示出一个经济相互依存的“虚拟国家”(virtual states)。它不再是有着各自不同利益的传统国家,而是有着共同经济、环境和安全利益的新的实体。^⑧大量的跨国投资和国际贸易,人类共同面临的生态危机、跨国犯罪和传染病迅速蔓延已使得传统的国界和军事实力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这些都要求各国决策者对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有一个新的思维,用合作来取代遏制和战争。

鉴于观念对国际关系的这种影响,我们不但应当加强观念的沟通,增进理解,而且还要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观念建构,使多元主义和相互依存的和谐观念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我国政府倡导的国际交往“和而不同”的观念正是这种观念建构的体现,它既反对搞意识形态对抗,也是对“无政府”国际秩序观念的修正。^⑨

其实,我们在评价此书的价值时,不能将目光只集中于书中现有的案例、观点和结论,它更重要的意义是给我们指引了一个看问题的多重视角。决定一国大战略的因素有很多,既要考虑国际结构的特征,也不能忽视国内变量。在一本书中,作者不可能将所有变量囊括进来进行穷尽一切的考察。威廉森·默里、麦格雷戈·诺克斯和阿尔

^⑧ 有关虚拟国家的论述,详见 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Virtual State”, *Foreign Affairs* 75 (July/August 1996), pp. 45—61。

^⑨ 参见刘东国:《全球治理中的观念建构》,《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4期。

文·伯恩斯坦在1994年出版的《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一书至少列举了影响大战略决策的六方面因素：地理，历史，政权的性质，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经济因素，政府和军事体制组织方式。^②这些考察进一步拓展了大战略应当考虑的变量。此外，包括本书在内的现有著作考察的是历史案例，它们不能完全代表未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国际行为主体的构成和国际政治的主题都发生着变化。除了政府之外，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公民社会以及新闻媒体都对国家的外交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未来的国家对外政策也不能仅仅考虑各自的国家利益，而且还要考虑全球公共问题和公共利益。这些都要求决策者不能只拘泥于本书关注的具体问题和现成结论，而且要有更广泛的，面向未来的眼光。

刘东国

2005年5月于中国人民大学

^② [美]威廉森·默里、[英]麦格雷戈·诺克斯和、[美]阿尔文·伯恩斯坦编，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一章。

撰稿人简介

戴维·德乌戈(David D'Lugo):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国际关系中心研究员,政治学在读博士生。

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W. Doyle):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

马修·伊万杰里斯塔(Matthew Evangelista):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罗尔(Rohr)太平洋国际关系教授。

约翰·米勒(John Mueller):罗彻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

罗纳德·罗戈夫斯基(Ronald Rogowski):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教授。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教授、国际关系中心主任。

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

阿瑟·斯坦(Arthur A. Stei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教授。

扎拉·斯坦纳(Zara Steiner):剑桥大学 New Hall 研究员。

鸣谢

本书开始于我们关于国际政治领域的几次讨论。我们每个人都不满足于新现实主义的大战略观点和发言。我们自己的作品(罗斯克兰斯所著《贸易国家的兴起》和斯坦所著《国家为什么合作》)都明显背离了现实主义的核心假设。在最近的研究中,我们将大战略置于国内政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当中。这些观点反映在美国政治学协会1989年年会和1990年3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两次会议的论文当中。除了本书的撰稿人之外,参加会议的学者还有约瑟夫·奈(Joseph Nye, Jr.)和戴维·莱克(David Lake)。

我们感谢对我们的思想形成做出贡献的研究生,包括马克·布劳利(Mark Brawley)、鲁彭·切廷扬(Rupen Cetinyan)、戴维·德乌戈(David D' Lugo)、劳瑞·克罗尼赫(Lori Gronich)、弗吉尼亚·豪夫勒(Virginia Haufler)、约翰·克罗尔(John Kroll)、杰弗里·勒格罗(Jeffrey Legro)、彼得·李(Peter Li)、罗伯特·帕雷(Robert Pahre)、保罗·帕帕约安努(Paul Papayoanou)、T. 保罗(T. V. Paul)、拉斯·斯卡尼斯(Lars Skålnes)、埃泰尔·佐林根(Etel Solingen)、谢里耶·斯蒂尔(Cherie Steele)、卡蒂亚·韦伯(Katya Weber)。我们还感谢伊丽莎白·贝利(Elizabeth Bailey)、凯利·蔡斯(Kerry Chase)、艾伦·凯斯勒(Alan Kessler)、柯里斯蒂·克拉劳文斯基(Christy Kralovansky)、玛丽亚·桑帕尼斯(Maria Sampanis)、克里斯滕·威廉姆斯(Kristen Williams)所提供的研究助理工作。

我们感谢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对我们的研究提供的支持,包括学术评议会、前国际与战略事务中心以及国际研究和海外项目机构提供的资助。我们还得到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的帮助。我们诚挚地感谢皮尤慈善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和休利特基金会(Hewlett Foundation),尤其是感谢凯文·吉格里(Kevin Quigley)和柯林特·史密斯(Clint Smith)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得益于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罗杰·海登(Roger Haydon)、乔安妮·欣德曼(Joanne Hindman)和凯·朔伊尔(Kay Scheuer)提供的编辑工作帮

助。系列丛书编辑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做了大量工作。如果没有芭芭拉·罗斯克兰斯(Barbara Rosecrance)和艾米·戴维斯(Amy Davis)提供的帮助以及亚历山德拉·泰利(Alexandra Tali)、乔斯林·阿利埃拉(Joscelyn Ariella)和J. M. D. 斯坦(Jacob Michael Davis Stein)的专心投入,本书就不会迅速地完成。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

阿瑟·斯坦

目 录

译 序	(1)
撰稿人简介	(17)
鸣 谢	(19)

第一部分 理 论

第一章 超越现实主义:大战略研究	
.....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阿瑟·斯坦	(3)
现实主义的要旨	(6)
本书的观点	(11)
第二章 政治与大战略	迈克尔·多伊尔(21)
作为艺术作品的国家	(24)
和平联盟	(30)
大背叛	(34)
驳斥新现实主义	(45)
第三章 观念对大战略的影响	约翰·米勒(47)
冷战:两种解释模式	(47)
模式的检验	(50)
核心建构要素的再检验	(54)

第二部分 实 践

第四章 英德海军竞赛与宪法“适应性”比较	
..... 戴维·德乌戈、罗纳德·罗戈夫斯基	(63)
经济基础:英国对德国	(70)
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和社会构成	(72)

英国的比较:保守党险遭失败	(81)
自由党与英国在海军竞赛中的胜利	(85)
宪法适应性比较	(91)
第五章 国内制约、扩大威慑与大战略的不协调:	
1938年至1950年的美国	阿瑟·斯坦(93)
对照现实主义观点	(94)
扩展过度和不足的问题	(96)
第六章 英国大战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扎拉·斯坦纳	(119)
英国的经济:未能决定政策的现实主义制约因素	(129)
英国政府和政治体制:切实决定政策的制约因素	(132)
政治与大战略	(143)
第七章 对大战略的内外制约:苏联案例	
..... 马修·伊万杰里斯塔	(147)
现实主义的阐释	(150)
后现实主义的分析	(159)
后现实主义视角的政策方案	(167)
第八章 新的民族主义:现实主义的阐释及其超越	
..... 杰克·斯奈德	(170)
要解释什么? 民族主义与超民族主义	(173)
民族主义和超民族主义理论	(175)
互动效应和分析层次	(188)
第九章 国家和日本大战略	查默斯·约翰逊(191)
日本与现实主义理论	(192)
日本的学术挑战	(197)
滞后性民主发展理论	(199)
贸易国家理论	(204)
明治—俾斯麦发展模式	(206)
索引	(213)

第一部分

理

论

第一章

超越现实主义：大战略研究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阿瑟·斯坦

“战略”传统上指为取得对敌重大战役的胜利或赢得整个战争的胜利而对军事资源的规划和运用^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教训的强烈影响下，英国战略家巴兹尔·利德尔·哈特(Basil Liddell Hart)扩展了这一概念，认为仅有军事胜利是不够的，如果国家遭到削弱并容易遭受新的冲突的打击，战争的胜利也不可能实现有效“战略”的所有要求^②。他写道：“重要的是，要时刻着眼于你所渴望的和平来指挥战争，这才是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关于战争定义的真实含义，即战争是‘政策以另外一种手段的继续’。必须时刻牢记，政策是通过战争而延续到随后的和平当中。”^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核战略家们将这一见解推广到“威慑”或战争预防理论。^④在他们看来，在和平时期装备一支常规待命和无懈可击的核力量甚至对最强大的敌国发动攻击都能够产生威慑作用。^⑤然而，“大战略”代表着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它不仅是在战时的指挥才干和和平时期的威慑，而是包括控制(使用武力)的政策以及与其他(经济的、政治的、心理的)武器的合并运用^⑥。

3

① 详见 K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ed. Michea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Edward Eead Earle,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3); and B. H. Liddel Hart, *Strategy*, 2d rev. ed. (New York: Praeger, 1972)。

② 详见 B. H. Liddel Hart, *The British Way in Warfare* (New York: Penguin, 1942), chap. 1。

③ B. H. Liddel Hart, *Strategy*, p. 366.

④ 这里的代表作可见 Bernard Brodie, *The Absolute Weap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46), and Brodie, *Strategy in the Missile 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⑤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简单而直接的进程。Albert Wohlstetter's "The Delicate Balance of Terror," *Foreign Affairs* 37 (January 1959): pp. 211—234; and Thomas Schelling's "The Reciprocal Fear of Surprise Attack," In his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对此说得非常清楚。

⑥ B. H. Liddel Hart, *Strategy*, p. 31.

用现代的话语说,大战略的含义就是调整国内和国际资源以实现国家的安全。^⑦ 为此,大战略要考虑国家可以支配的全部资源(而不仅仅是军事资源),并有效地安排这些资源来实现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安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政治家和决策者们受到苏联威胁的困扰,这一包含内容更加宽泛的定义在以美国为首的战略家们的眼中变得模糊了。他们对大战略的理解只是狭猛地集中于与对手保持军事平衡^⑧,而根本不问一个大国是否有能力承受维持核威慑。他们要求国家这样去做,而完全不顾大战略方程式中的其他重要变量。随后,一些大学中又有一批现实主义思想家加入到具有这一狭猛概念的核战略家当中。这批学者和持相同观点的人除了赞成威慑之外,还主张将传统的均势理论应用于国家间的关系。现实主义者强调,国家始终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当中,如果国家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与其对手保持“均势”。在这一过程当中,国家应当按照国际体系和国际威胁模式的要求行事。国家在最初是通过动员来实现国内均衡,与各种政治制约因素毫无关系。^⑨ 在这方面,无论是核战略家还是现实主义者都容易忽视各种各样的国内支持力量和经济力量对威慑、遏制或均势战略产生的长期影响。

最近有三种批评意见向大战略领域的这种狭猛认知聚焦提出了质疑。首先,一些分析家和历史学家试图说明,取得战争的胜利或在和平时期成功维持一个触角远伸的帝国取决于一个不会被繁重的军备拖垮的强大的经济和工业基础,国家应当采纳一种富有经济效率而又不造成“过度延伸”(overstretch)的战略。^⑩ 另外一些人提出,治

⑦ 详见 Micheal Howard, August 1941—September 1943, vol. 4 of James Ramsay Montagu, ed., *Grand Strategy* (London: HMSO, 1956—1976); Edward Luttwak,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the First Century AD to the Thir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Paul Kennedy, ed.,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⑧ 战后时期研究核战略最著名的机构之一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y Studies—IISS)将其年度报告命名为《军事平衡》,这或许表达了某些含义。

⑨ 大国尤其是以这种方式做出反应。只有当内部动员不足以发挥作用时,国家才通过联盟来寻求外部均势。

⑩ “过度延伸”一词源自于 Liddell Hart,但却被 Paul Kennedy 大量使用,见 Paul 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45* (London: Fontana, 1984), chap. 8,另见他的著作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以及所编著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国之本或大战略的成功取决于一个国家从本国人民当中“榨取”资源的能力。如果不能让政治反对派闭嘴,或者国内各集团都要求获得一大块资源蛋糕,领袖们就会试图采取有风险的外交政策以图在短期内获取廉价和轻而易举的胜利。这样,他们就会加速外交政策灾难的到来。^① 第三种观点认为,参与政治和经济“相互捧场”(Logrolling)的国内政治模式有助于解释领土“过度扩展”(overextension)和国际关系中的“过度承诺”(overcommitment)。^② 这些观点都强调有必要将国内政治和经济因素纳入更加宽泛的大战略算计当中。

本书的目的是重申这一宽泛的大战略概念,并指明在具体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它是如何运作的。所有各章都揭示出,只集中于狭隘的现实主义构成要素——物质实力、其分配的变化及外部的威胁——的大战略算计是根本不全面的。它不能解释国家所实际做出的行动。相反,国内各集团,社会观念、宪法的特征、(有时是通过国际相互依存表现出来的)经济制约因素、历史上的社会趋势以及国内政治压力在大战略选择中起着重要的,实际上是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它们也是决定国际冲突与合作前景的重要因素。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这种国内力量的范围和重要性实际上是正在增加。

与现实主义非常强调国际政治的“第三意象”(third image)(即国际体系层次)相反^③,我们想要突出“第二意象”(second image)(即国内层次)。日本、美国、英国、德意志帝国、东欧,甚至是苏联国内体制

5

的特定性质决定了其关键性的决策和国家对外部世界的政策。本书下面各章的核心结论是,大国当中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对称性的国内条件是大战略可行性的主要决定因素。面对不同国内制约

^① 这里最重要的作品是 Alan Lamborn's *The Price of Power: Risk and Foreign Policy in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y* (Boston: Unwin Hyman, 1991), particularly chap. 12.

^②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③ 对“第一意象”(人性)、“第二意象”(国家和国内社会的性质)和“第三意象”(国际体系的性质)的最初区分见 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沃尔兹的三个意象与 David Singer 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所做的层次分析是一样的。见 J. David Singer, “International Conflict: Three Levels of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12 (April 1960): pp. 453—461。进一步的讨论见 J. David Singer, “The Levels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14 (October 1961): pp. 77—92; and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chap. 1.

因素和压力的各个国家不可能在国际上相互威慑。比如,致力于长期经济最大化者并不总是能威慑致力于短期军事最大化者。再比如,有着大量国内支持的国家需要动员的经济财富可以少于对公众情感控制不稳的军政权所需动员的经济财富。正如我们马上将要看到的,现实主义模式假定,大战略选择不受国内制约因素的妨碍。由于现实主义代表着当今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方法,并且其关于国内政治作用的观点是与现实主义理论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需要首先来讨论现实主义的要旨。

现实主义的要旨

6 在历史上,尤其是在过去 10 年间,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大战略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方法是结构现实主义。^④ 结构现实主义方法争论说,

④ 现实主义传统实际上与有记录的历史一样久远,最初可追溯到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鉴于其源远流长的世系,现实主义的信奉者们在个别观点上并不总是完全一致,但总体上都认为国际冲突趋势是这一领域的突出特征,然而可以通过联盟和均势来约束这一趋势。现实主义最近的标志性的作品是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and his sections in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ed. Robert Keoha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其他重要作品有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Stephen Krasner, *Defending the Natural Interest: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and Krasner, *Structural Conflict: The Third World against Global Liber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Stephen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and Joseph Grieco,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Europe, America, and Non-Tariff Barriers to Trad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大战略领域的见 Barry 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France, Britain, and Germany between the World Wa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John Mearsheimer 在其“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 (Summer 1990): pp. 5—56 中将现实主义思维应于当前国际政治的诸多问题当中。Arthur Stein 在其 *Why Nations Cooperate: Circumstance and Cho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当中讨论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

植根于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必须致力于“自救”^⑤来求得生存。系统制约个体国家,形成它们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并进而决定系统的稳定。然而它不决定每一个国家的政策。^⑥

在一个无政府的体系中,各个国家知道不存在能够保护它们的超国家机构或统治权威,并依此采取行动来确保它们的生存。一个国家也不能指望其他国家的支持,即使它们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形式。同样缺乏保障的各个国家有只考虑其自身利益的自由。

结构现实主义的关键预言是能够形成均势。个体国家或许会企图改善它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地位,但其他国家将做出反应来重建均势。这样,现实主义就提出一种均衡理论,它描述的是为了恢复系统的均衡而对各种力量的运用。至于这一体系是如何形成的^⑦以及是什么力量破坏了任一特定的权力分配,这已超出了这一理论的范围。技术的变革、一场工业革命、移民、人口增长都有可能打乱现行的均势。该理论没有表达这些问题,但它却预言了均势变化所带来的后果。

现实主义对世界的看法是,国家之间不存在劳动分工。即使存在劳动分工,一个国家也不应当依赖它来捍卫自己的财富或安全。既然每个政治单位的目标都是独立和自主,那么任何一个国家都不

^⑤ 接受以下观点也并非就成为“现实主义者”,即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或国家植根于当中的矩阵)决定着国家的政策。那些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冲突与合作的人,比如 Michael Taylor、Robert Axelrod、Russell Hardin 和 Anatol Rapoport 不能被看做是现实主义者,因为行为者面对的收益会常常刺激合作以及冲突。在合作博弈或混合动机博弈中,合作有可能是由于反复博弈而出现。在囚徒困境博弈下,这取决于对未来获益的贴现率以及反复博弈的不确定性。此外,这些收益并不只是由系统决定的。理性选择分析家们如 George Downs、Duncan Snidal 和 Chris Achen 也不能被看做是“现实主义者”。因为合作结果或冲突结果取决于为不同的行动进程而设定的特定的成本与收益模式,这些成本和收益要考虑各种各样的国家的、国际的、个人的以及感性的因素。总之,尽管所有的现实主义者都是明确无误的理性选择论者,但反之则不然。

并不是所有的现实主义者都承认无政府状态是国际关系中的支配条件。像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和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这样的霸权稳定论者注意到,一个霸权稳定者实际上是以自己的统治取代了盛行的无政府状态。然而一旦稳定者衰落,系统就会回归到先前的无政府状态。

^⑥ 看来,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并不包含外交政策选择理论。但这种理论必须取决于特定的大国对国际权势分配变化做出的反应。比如在两极世界中,当一个大国采取步骤增加自己的权势时,另一个大国必须做出反应以恢复均势。从这个意义上说,该理论在大国数量少的体制中预示着系统上的稳定行动。因此,它也包含了那些大国个体外交政策的理论。

^⑦ 对这一观点的讨论见 John Gerard Ruggie in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 Toward a Neorealist Synthesis,” *World Politics* 35 (January 1983): pp. 261—285。

会愿意接受一个使自己依赖于别人的关系。在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地方,就容易引发国家间的冲突,因为每个国家都努力减少依赖并重申自己的自主。

国内因素或压力也被看做是妨碍系统的和现实主义的决定因素运行的摩擦力量。一个国家如果允许其国内政治制约来左右其大战略的制定,那么不久就会发现其国际地位受到了伤害。一个国家如果在国际关系中追求道德事业,就会浪费其国家资源。如果一个国家将钱花在国内福利上,并因此而忽略了对其国际地位的根本挑战,那它就不会持续长久。结构现实主义学派所推荐的大战略是保持均势。那些忽视这一关键任务的国家会被淘汰出大国的行列,或彻底被消灭。^⑮

8 现实主义者总体上承认国际(无政府)秩序是静止的——它没有而且也不大可能发生变化。但这并不是说冲突爆发的程度或武装暴力的规模是恒定不变的。某些均衡方法比其他方法更有效。两极体系比多极体系更加稳定^⑯,因为冲突直接集中于两个集团之间,双方通过维持二者间的严格平衡而加强各自的地位。在多极系统中,冲突更加分散,真正的敌对结构或许被掩盖起来。结果是各个国家针对威胁的“抗衡”更少,一个国家集团在其侵略意图充分暴露之前可能会获取更多的收益。核能力的扩展即使在呈现多极体制时也能威慑冲突。^⑰ 各个国家将不会挑战其他拥有核武器国家的致命利益。

最后,现实主义很有可能会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权势是沿着一个

^⑮ 一些理论家承认,“第二意象”因素,比如攻防平衡和安全困境也会强烈地影响系统的结果。Robert Jervis 和 Stephen Van Evera 都坚持这一观点。感性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详见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⑯ 在一些现实主义看来,霸权体制只要延续,它就是最稳定的。见 Gilpin 和 Krasner 的作品。主张均势理论的人当中,有些人认为多极体制更加稳定。见 Karl W. Deutsch and J. David Singer, “Multipolar Power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World Politics* 15 (April 1964): pp. 390—406。不同的观点见 Richard Rosecrance, “Bipolarity, Multipolarity, and the Futur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0 (September 1966): pp. 314—327。最近的选集见 Alan Ned Sabrosky, ed., *Polarity and War: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5)。一种正式的论述认为,推定的分歧取决于对危险倾向的假设。见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 Analysis and an Appraisal,”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nflict: Theory and Research*, ed. Ted Robert Gurr (New York: Free Press, 1980), pp. 361—398。

^⑰ 见 Waltz,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More May be Better,” Adelphi Paper no. 171, IISS, 1981; and Waltz, “Nuclear Myths and Political Real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 (September 1990): pp. 731—745。

单一向度分布的,是“可相互转换的”。也就是说,一种形式的权势能够很容易地改造成另外一种,军事实力改造成经济实力等等。多向度和不可替换的权势意味着将存在着有着巨大的军事实力却很小的经济实力,或者反之,有着巨大的经济实力却很小的军事实力的“杂种国家”^①。现实主义者拒绝这样的看法,尽管他们承认,在一种权势转换成另一种权势时会存在滞后。^②现实主义者争辩说,至少对于强国来说,权势是完全可以转换的。这些国家拥有色彩斑斓的多种力量,如果它们在某一特定问题领域不占优势,那不是因为缺少可以替换的实力,而是它们认为这个问题并不至关重要。^③

实质上,现代现实主义观点归结起来是“权势和数量”,也就是个体国家拥有的权势量和差异以及强国的数量。如果一个国家的权势增加,这将增加它同其他强国,也许同系统整个成员的竞争。如果一个国家的权势衰落,它就会减少竞争性,与其他国家的冲突就会减少。处于规整均势的各大国间有限的合作(至少是避免战争)是可能的。当均势不存在时,这种合作是不大可能的。权势的显著差异总是对侵略行动的一种诱惑。

对现实主义的这一总体概括尽管在原则上可以驳倒,但证实它的几率更大。似乎只有非常特别的系统改造事件才有可能提供证伪案例。如果各个国家在一个均势体系内通常而且持久性地无法起到平衡作用,或者是在两极体系下无法起到威慑和抗衡作用,现实主义将会受到质疑。即使在这里,现实主义者也会反驳说,个体国家完全可以采纳这些政策而不去质疑整体系统的强制性。简言之,即便是这样的结果,现实主义者也可以将其重新解释为是对这一理论的确认。如果各个国家按照现实主义的处方行事,这一理论就得到了支持。如果它们不按其行事,预计就会遭到痛苦,即使现在没有,将来

^① 见 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② 沃尔兹争论说,比如日本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军事大国,而不仅仅只是一个“贸易国家”,因为它自然而然地会将其经济实力改造成军事实力。Waltz, UCLA talk, November 30, 1989。

^③ 沃尔兹在《对〈国际政治理论〉的反思:对批评者们的回应》一文中写道:“关于权势的转换……基欧汉和我存在着分歧。显然权势不像钱那样可以随意转换。尽管不容易,但权势比基欧汉所允许的范围要容易转换得多。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区分依然很重要。国家越强大,其能力的转换形式就越多。对于弱国来说,权势仅可以勉强转换;但对于强国来说,转换程度就非常高。”见 *Neorealism*, ed. Keohane, p. 333。

也会有。那些接受国际经济强加给它们的相互依存的国家将会在制定和执行国家政策,不受外部影响和控制方面付出代价。^{②④} 那些希望继续成为经济或贸易大国^{②⑤}而又不希望坚持其经济权势似乎要赋予它们的特权的国家将会发现,在将来与其他国家的冲突中其国家的优先地位将不复存在。^{②⑥} 那些对意识形态或道德刺激做出反应而支持或反对其他国家的国家将会浪费国家财富。^{②⑦} 但是这些案例并不完全是证伪性的。

10

在一个构成适当的国际体系中,国家将根据体现权势差异和寻找国家间平衡需要的系统性决定因素来制定其路线。然而单位层次上的因素如武器的进化和核武器的开发也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②⑧} 有些单元层次的因素能够强烈影响系统的因素,存在着系统力量和国内层次力量之间经常性的互动。^{②⑨}

结果是,尽管现实主义在原则上仍然是可以证伪的,但在国际政治的实际中很难甄别出哪种事件能够证明这一理论无效:如果各个国家没能形成制衡,它们应当这样去做。如果它们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经济制约和刺激而忽略军事制约因素,它们将遭受损失。^{③①} 如果对威胁做出过度反应,或对友好和民主的盟友给予过多的支持,它们就会浪费资源。如果它们单个地或集体地放弃其国家主权而形成—一个世界政府,冲突仅仅是转换到一个新的层次——现在它在性质上成了垂直性的和内部性的,而不再是水平性的和国际性的。此外,不能制衡并不能证明该理论无效,因为该理论只是期待“均势的反复

^{②④} 决策独立完全可以与战略上的相互依存共处。决策自主并不意味着这些决策不受其他国家选择的影响。见 Stein, *Why Nations Cooperate* 的讨论。

^{②⑤} 见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②⑥} Kenneth Walt, Berkeley Talk, April 26, 1991.

^{②⑦} 对这一观点还可见 Hans J. Morgenthau, *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2)。

^{②⑧} 尽管沃尔兹明显认为核武器是“单位层次”上的发明,但人们还可以提出,核武的效力取决于核扩散的模式和程度。换句话说,核武的出现和效力如同实力差异一样,性质上是属于系统的。

^{②⑨} 沃尔兹写道:“结构并不独立于各个部分,亦即作为行为者的各个国家之外,而是与它们经常性地互动。起决定作用的既不是结构,也不是各个单元……”见“Reflections,” in *Neorealism*, ed. Keohane, p. 338。

^{③①} 比如沃尔兹写道:“在一种自救的体制下,那些不能够自救,或自救效率不如其他国家者,将不会实现繁荣,将会置己于公开危险之中,将会遭受损失。”in *ibid.*, p. 117.

形成”^①。它并没有具体规定均衡在所有时间和所有地点都发挥作用。

在一个两极体制下,如果一方在抗衡另一方时不坚持自己的目标而造成巨大的变化,那也不会否定这一理论。如1989年及其后来所发生的,俄罗斯解除了全部或大部分针对西方大国的进攻性军事威胁,解放了卫星国,向西方影响和民主压力开放了它的经济和社会,企图使自己接近欧共体并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仍然不能证伪现实主义的核心观点。苏联或者是其遗产继承者俄罗斯仅仅是在重组,以便使其经济重新运作起来,也就是需要一个重新获得能量的喘息空间。^② 根据现实主义的这一观点,只要俄罗斯力量壮大,它对西方核心大国的反对就会增强。

本书的观点

本书的各位作者在形式上仍然接受现实主义理论,但他们还承认,近些年的事件并不是朝着现实主义典型的预言方向发展,而是相反,背离了它们。回顾过去,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在许多场合下看上去并不是严格的“现实主义”决定因素影响甚至是决定了国家政策。他们共同认为,作为大战略决定因素的国内因素遭到了忽视,观念、规制或相互依存在大战略形成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③

11

探讨是什么影响和决定着国家做出战争与和平决策选择的大战略研究是检验“现实主义”方法的一个理想舞台,它毕竟是国家最有可能遵循现实主义规则,忽视国内压力,克服经济限制,抑制意识形态倾向的领域。在冲突熔炉中锻造出来的国家很有可能把防务准备

^① Waltz, “Anarchic Orders and Balances of Power,” in *ibid.*, p. 118.

^② Waltz seminar, UCLA, November 30, 1989.

^③ 详见 Joseph Nye and Robert Keohan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and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作为最核心的活动。^④ 在自我保护上作为不足将是蛮干,做得过分将是缺乏效率。然而,本书的发现表明,对安全刺激所做出的这种平静的最低限度的反应并不总是发生,甚或也不经常发生。

从现实主义的预期出发对于理解和平与战争的动力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均势很容易恢复,我们就会期待世界对小的权势紊乱做出经常性的调整,而同时保持总体上的和平。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期待关注自己生存而又具有远见的国家不要过度扩张和威胁他国,因为这将造成对自己的合围和衰落。^⑤ 国际政治中的均势摆幅如同经济学中的市场摆幅一样发挥作用,价格总是围绕供需变化而经常变动,国际关系中的战争有如经济学中的非自愿性失业一样,是人们不希望发生的。然而我们知道,失业是要发生的。所以战争也会发生。各个学科中的这种规则模式什么也解释不了。^⑥

12

本书的题目恰恰表明了我们要遵循的方向,我们的兴趣是要探讨那些超越现实主义而揭示出大战略国内基础的因素和事件。本书并不是要驳倒传统理论,而是要强调过去和目前国家决策中那些反映不同视角的进展。实际上,处于一般境况下的各个国家其行为举止比结构现实主义所描述的那样要更具合作性,大部分情况下的结果也是没有遭受痛苦。^⑦ 偶尔,它们也会表现得更具侵略性,或者是抗衡超过必要限度而表现得过于强大。贸易国家塑造出的一种国际政治战略是以接受相互依存来应对无政府状态。这一反应是现实主义者所没有预见到的。

^④ 见 Charles Tilly, "Reflection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 i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ed. Charles Til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3—83; Richard Bean, "War and the Birth of the Nation Stat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3 (March 1973): pp. 203—221. 另见 Elman R. Service, "Classical and Modern Theories of the Origins of Government," in *Origins of the State: The Anthropology of Political Evolution*, ed. Ronald Cohen and Elman R. Service (Philadelphi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 1978), pp. 21—34; and Frederic C. Lan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Organized Viol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8 (December 1958): pp. 401—417.

^⑤ 相反, John Arquilla 表明,在大国战争中,发动战争的国家常常遭到失败。见 Arquilla, *Dubious Battles: Aggression, Defeat,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ashington, D. C.: Crane Russak, 1992)。

^⑥ 经济学中提出的与国际关系学中相对应的解决方案是“粘性”(stickiness) 延缓摆幅的回归。然而这并不能解释问题,而仅仅是对问题重新加以界定。

^⑦ 比如加拿大的政策。一百多年来,加拿大没有得到过英国的支持,但它也没有反对美国,富有远见的政策使其走向了繁荣。

国内因素有助于解释对系统均势的偏离,这毕竟是一个基本的观察。大战略是公共政策,反映着一个国家做出社会选择的各种机制。此外,这样的大战略还要求对社会资源的承诺、榨取和动员。国内的、制度上的、政治上的以及经济上的制约因素应当发挥作用,这一点不足为奇。现实主义者强调理性的领导人做出的单一决策会最大限度地确保安全,至少是企图增进安全。但大战略是在不考虑单一决策者的前提下形成的,比如关注的问题不是国家安全,而是某个特定政权的生存;再比如做出影响国家利益重要决策的集团不是国家领导人,而是各个政党(次国家集团)。

第二意象(second image)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国内的规制和经济走向,而且还因为国内占统治地位的观念。约翰·M.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其著名的陈述中强调了这一点: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所持的观念无论是对还是错,都比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更具影响力。实际上,统治世界的不是其他东西。注意实际的人确信自己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但通常是某些早已过时了的经济学家们的奴隶。即使是听不进去任何声音的疯子当政,他们仍然在从一些多年前的学术描述者那里吸取其疯狂的念头。我确信,相比于观念渐渐侵蚀的力量,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势被大大地夸大了。^⑧

13

在大战略的发展中,尤其是在军事学说的发展中,观念起着重要的作用。最近几年,专家们开始承认植根于军事学说中的观念对于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作用,尽管从现实主义的立场上看它们并不一定完全站得住脚。^⑨ 尽管各国的军事学说经常反映技术和武器的现

^⑧ J. M.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1936), p. 383.

^⑨ 一篇学术讨论会论文见 Robert Jervis'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 (January 1978): pp. 167—214。其他一些重要的研究著作包括: Stephen Van Evera,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 (Summer 1984): pp. 58—107; John Mearsheimer,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Jack Snyder,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and 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早期的评论见 Jack Levy, "The Offensive/Defensive Balance of Military Technology: 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8 (June 1984): pp. 219—238。

实变革,但它们也会背离这一现实,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不久,当时欧洲列强认为“进攻”强于“防御”,但战争的结果却是变成一场防御性的僵持。

实际上,国家在做出决策时往往会趋附于当时的思潮。比如,如果不考虑阿尔弗雷德·T.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的影响,就不可能理解威廉二世皇帝(Kaiser Wilhelm II)为什么会毫无道理地认为有必要建立一支强大的远洋舰队。^④如果不是因为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倾向,就很难理解美国为什么会花那么多宝贵的经济资源同并不像它那样强大的苏联和中国展开竞争,是意识形态的争论决定了一个竞争对手,而远非是基于权势的现实。

14

国内的社会性质也影响着一个国家说服他国接受自己观点的能力。强国有时候很少引发针对自己的权势抗衡活动,而稍弱但却更富侵略性的国家则引来相当多的敌意。保持现状或者是处于衰落的国家如果其国内规制能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或敬仰,有时同样能对国际体系产生与其自身权势不相称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软实力”会优先于强制性的“硬权力”。^⑤

在其他方面,国内社会在影响大战略政策时也会发挥一种核心的作用。某一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需要一种类似的政治发展水平。处理当代日本问题的困难之一是日本崛起于一种“明治—俾斯麦式”的历史背景。在这种社会当中,“软集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ism)能够在一种正式的法制和民众主权体系中隐蔽地发挥作用,从而确保了重商主义政策的保留。

在德国,国内因素不仅制约着大战略的选择,也制约着执行战略的手段。20世纪第一个十年德国对英国海军的挑战出现后,英国灵

^④ 对国内政治机构和观念的侧重还可能会导致对大国首席执行官作用的强调。有关海湾战争还远没有形成定论,但最初的一些解释强调了布什总统个人对于美国做出军事反应所发挥的作用,它并不是布什高级顾问们讨论一致的结果。见 Bob Woodward, *The Commander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1)。其他一些人认为,1940年法国沦陷后,丘吉尔在防止英国崩溃方面也发挥了类似的决定性作用。详见 David Reynolds, “Churchill and the British ‘Decision’ to Fight on in 1940: Right Policy, Wrong Reasons,” in *Diplomacy and Intelligenc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ed. Richard Langhor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47—167; and Eliot Cohen, “Churchill and Coalition Strategy in World War II,” in Kennedy, *Grand Strategies*, pp. 43—67。

^⑤ 见 Joseph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chap. 6。

活的宪法体制为海军竞赛开支提供了便利。相反,德国则缺少这样的一种体制。英国的宪制实践包含了征税和借债权力,而德国则没有这种权力。从某些方面看,德国的决策根本没有理性:政府发起了对英国的海军挑战,但由于宪法的限制,又无法完全实施。

在民主政治体制下,国内制约因素影响并常常决定着国家对外部世界做出的反应。1937—1940年,美国没有理会德国对欧洲大陆的挑战,这并不是因为它没有经济资源做出强硬的反应,而是因为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1938—1939年,英国最终对德国的威胁做出了反应,即使经济因素让它犹豫不决。即便在1939年,让内阁做出在某些条件下抵制德国的决策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国际压力的突然变化(自1938年慕尼黑之后这种压力一直很大),而是国内和官方舆论的变化。

1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得出结论认为,苏联共产主义是一种必须加以阻止的意识形态宿敌。但在做出这一决策后,杜鲁门政府在实施它时却是含含糊糊。然而,与20世纪30年代末弗兰克林·D.罗斯福所面对的形势不同的是,战后的问题不是孤立主义或缺少民众支持,而是美国经济能承受何等水平的防务开支这样一种错误的看法。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国内制约因素或规则(而非系统性的因素)支配着结果。

尽管像前苏联那样单一的政治体制并不包含与民主国家中同样的制约因素,但政治精英内部(比如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的分歧也是极其重要的。实际上,一些苏联学专家认为,精英成员们的外交政策立场是受其国内政策倾向支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相对权势的观点看,苏联要与美国保持均衡的愿望也许要大于美国遏制苏联的愿望。但意识形态因素对于形成俄罗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态度起到了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经济感受到衰退时,当局显然是采取了行动。但在80年代,它本应当选择先发制人的战争来对付西方(即做出“困熊”反应),而不是接下来实际发生的与西方的“和解”^②。1985年及其以后苏联做出的反应不是简单地由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压力决定的,而是国内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意见分歧的

^② Mearsheimer 在《传统震慑》一书中正确地提出,闪电战战略是无法承受“消耗战”带来的成本和伤亡的国家所使用的工具。

结果。

16 在东欧,复杂的各种国内力量也起着重要的历史作用。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素有“欧洲斗鸡场”之称,桀骜难驯的巴尔干民族证明它们能够点燃大国之间的战争。这表明,1993年之后系统性的稳定需要熄灭南斯拉夫继承国和其他地区的极端民族主义,以防止再次点燃新的战火。然而,处理其他国家国内社会力量的现实主义战略还不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其专注于建立相对的军事力量均衡,不如综合使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扩展自由主义政治经济观念,西方国家拒绝承认极端民族主义政权等战略会更加有效。决策者们会再次发现,重新塑造国内秩序是国际和平的必要前提。单元层次的影响决定系统的影响。

随后各章得出的核心结论是,国内制约足以防止或延缓出于国际压力而需要做出的政策反应。当国内政治经济因素有利时,国际因素才能刺激出反应。反之,国内情势所迫有时能生成外部环境条件本应排除的侵略性政策。

勾画我们研究结果的方法之一是对造成大战略政策变化的国际影响因素和国内影响因素加以比较。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维护均势优先于国内因素或制约,情势所迫也应当压倒经济上的局限性。然而惊人的结果却是,甚至某一单一的制约因素就能足以防止为应对国际安全压力而带来的政策变化。这里,我们对国际刺激因素和国际制约因素做了区分,前者是提供激励,或者是要求国家有所作为;后者是禁止或防止国家的作为。

17 表1.1描述了随后各章将要讨论的案例。从该表中我们看到了国际压力或刺激因素本应引起国家做出强烈反应的五个案例,但其中三个国家并没有做出这样的反应。在其中的一个案例中,一个单一的国内制约因素就足以挡住了做出这种反应的道路。1938年的英国^③,1985年的苏联和1940年的美国这三个案例似乎表明,强有力的国际挑战并不总是生成强有力的回应。在两个案例中,国际压力引发了反应。但在其中至少一个案例中国内因素也是有利于或者是批准了改善国家国际地位的行动。在1939年的英国,国内政治要求行

^③ 详见 Williamson Murray, *The Change in the European Balance of Power, 1938—1939: The Path to Rui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动。在更早的 1910 年,英国发现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都有利于迎接德国的挑战。

表 1.1 大战略结果

		国际因素	
		国际刺激因素	国际制约因素
国内因素	政治制约因素 经济制约因素	英国(1938)无行动 苏联(1985)无行动	
	政治制约因素 经济能力	美国(1940)无行动	德国(1897)行动
	政治刺激因素 经济制约因素	英国(1939)行动 美国(1947)参半	日本(1940—1941)行动
	政治刺激因素 经济能力	英国(1910)行动	

有两个案例正相反,国际体系并没有迫使其做出反应,甚至是禁止这样的反应,但国家却采取了果断的行动。德意志帝国并没有紧迫的国际原因要挑战英国和英国海军的地位,但它却这样做了,并且打破了国内政治的僵局。更加异乎寻常的是,日本在 1940 年至 1941 年间面临着强大的经济制约和国际制约,但却走向了战争。1947 年至 1950 年间的美国案例更加复杂。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在朝鲜战争之前,美国加入了北约,做出了广泛的军事承诺,甚至在苏联自身的权势投射能力尚不足时,美国就对它采取了遏制战略。然而美国从未为自己做出的承诺提供资金。意识形态因素构成了大战略和军事规划的基础。朝鲜战争只是略微增加了对美国的国际威胁。它是发生在世界的边缘地区,美国的财政压力本应当迫使其撤出这一地区。即使战争并不能证明美国正在从事的大规模常规军备重整是合理的,但战争一旦爆发,又使得美国对军备的重整成为可能。

国内条件不仅发挥作用,实际上,本书各章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大国当中存在还是不存在对称性的国内条件是大战略成功与否的关键性决定因素。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模式认为,国家只是对国际局势的变化做出反应,并假定大国内部存在着可自行处置或者是激励性的国内条件。也就是说,现实主义假定,大战略的选择不受国

18

内制约因素的妨碍。表 1.2 归纳了一个潜在的修正大国与受其威胁的维持现状大国之间相互作用的各种可能性。一种情况代表了现实主义的模式：两个大国在其制定大战略时都不受国内因素的制约。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国家可以自由地挑战其他国家，挑战引起抗衡性反应。

表 1.2 对称性和非对称性国内条件

		修正大国的国内条件	
		制约性的	可自行处置或激励性的
维持现状国家的国内条件	制约性的	相互制约带来和平	战争/震慑失败
	可自行处置或激励性的	自我震慑带来和平/ 不必要的震慑	现实主义的世界均势

第二种情况是，一个修正大国不受限制，而维持现状国家发现其选择手段受到限制。这导致震慑的失败和战争。尽管维持现状国家应当抗衡，但其国内的制约因素又很可能使其产生绥靖政策，结果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简言之，震慑失败的根源在于政治经济和战略的不对称。这就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教训。在这样的背景下，绥靖所能提供的仅仅是时间。

第三种情况是，挑战者受到限制，而维持现状国家不受限制，这种不对称的条件也能引导一个和平的世界。在这样的情况下，修正性的挑战者受到的是自我震慑，维持现状的各大国不需要卷入大规模的军事准备。在这样的条件下，绥靖政策可以作为一种选择手段而起作用。一种阐释说，冷战早期年代的情况就是这样。

最后，和平与稳定能够源自于相互的制约。但造成这种制约的不是震慑和威胁，而是存在着对称性的国内制约条件。在这里，怀柔与和解政策将是相互性的。这一案例代表了当前世界的特征：俄罗斯和美国各自都面临着巨大的国内制约因素，没有能力奉行扩展性和昂贵的大战略。国内条件逼迫出的相互退让帮助埋葬了冷战。

本书各章还评估了一个大国内部不同类型的国内制约因素的含义。表 1.3 表明了能够产生结果的范围。在这里，现实主义的世界印证的是这样的形势，即大国的政治经济条件既是可以自行处置的，又是激励性的。如果我们再加上现实主义的假设，推定这一形势适用于所有国家，那么就会得出现实主义的结论：大战略是由国际因素驱

19

动的,不受国内因素的制约。

表 1.3 国内政治经济条件的对称性

		政治条件	
		制约性的	可自行处置或激励性的
经济条件	制约性的	国家不能做出回应/对维护现状 国家有危险,除非修正国家受到 类似的制约	没有必要的经济资力国家 也能做出回应/对两个大 国都有危险
	可自行处置 或激励性的	不存在挑战或回应,尽管存在着 经济能力	双方都回应/现实主义的 世界

但是,正如下面各章所揭示的那样,存在着政治经济条件的不对称性。如果双方都受到制约,要求改变现状国家不采取行动,维护现状国家也不做出回应。如果仅仅是维护现状国家受到制约,要求改变现状国家将会推进。如果经济因素允许承担义务而政治上的制约因素不允许这样做,一方面,维护现状国家将拥有残留能力来对付不受限制的要求改变现状国家;另一方面,如果修正国家面临着同样的制约,它们将不会采取行动。如果国内因素既允许又要求采取行动,而经济能力又不足以支撑这种行动,那当然会出现最危险的形势。1939年英国的形势就是如此。英国不是一个要求改变现状的国家,但在国内的压力下,它大胆地采取了对德强硬立场,而此时它的经济状况往好里说也是极不稳定的。回头看,德国在1914年和1939年的经济规模也很小,不足以面对其领导人所面对敌人。在这些案例中,国家的行为并不是像现实主义学说的原则所预想的那样。国家即便没有能力扩张或发起先发制人的挑战,它们也还是这样做了。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大战略指引着一个国家如何对无政府世界的不确定性做出反应。它既要考虑国际体制的挑战,也要考虑国内社会的制约因素和压力。我们已经看到,现实主义理论也好,论述国家安全政策的很多其他作品也好,对大战略的分析似乎都只是认为它仅代表对国际军事压力做出最佳的回应,而不受国内制约因素的限制。我们对现实主义只侧重强调外部环境的缺陷做了更正。在本书中,我们提出了国内的和经济的因素对于大战略原因和结果这一实证性理论的含义。

总之,国家之间的“均衡”既是由其国内方针决定的,也是由国际权势决定的。国家并不总是对国际威胁做出对称性的调整,有时是

抗衡不足,有时是抗衡过度。因此,某一特定国家大战略的成功既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考虑本国内部和敌国内部相应的国内条件,又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对权势做出准确判断。既然战争常常(当然并不总是)代表着国家战略的失败,那么敌对国家中非对称性的国内和经济状况的存在有时便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战争会爆发。

第二章

政治与大战略*

迈克尔·多伊尔

当前美国对大战略的讨论当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全球政治经济问题。尽管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提出了战略应当被看做是追求“政治目标”的工具这样的至理名言^①,尽管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对战略研究中“被遗忘的维度”进行了经典的讨论,但我们的目标似乎清一色是经济上的,不同政治价值和政治规制的重要意义仍然被遗忘着。^②

忽略大战略政治学的主要原因似乎相当简单,当前对大战略经济学生动而富有争议的研究排挤了政治学研究。^③ 根据这一研究,政治学似乎是美国经济衰落和东亚崛起这一广泛感受到的深层事实的衍生物。^④ 目前对经济基础的聚焦使得被看做是对决策权和决策目标进行争夺的政治学看上去有些上层建筑的味道和肤浅,是这些深层力量的虚假关联。

* 1990年3月15—17日在UCLA召开了“大战略政治经济”第一次学术会议,1990年10月3日在普林斯顿大学举办了国际研究中心教员—研究员—研究生讨论小组学术研讨会。这些会议所提供的建议使我受惠。此外,我还受益于同 Art Stein、Matt Evangelista、Arie Kacowicz、John Garofano 和 Keisuke Iida 的交流。

① K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vol. 1 (1832; rp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11.

② Michael Howard, “The Forgotten Dimensions of Strategy,” in his *The Causes of Wa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霍华德提出的四个战略维度是:军事行动维度、后勤维度、社会维度和技术维度。当前很多大战略研究都集中在后勤方面。在本章中,我探讨了社会维度与军事行动维度之间的关系。另见 Bernard Brodie, *War and Politics* (New York: Macmillan, 1973) 中的讨论。

③ 见 Paul Kennedy、Robert Gilpin、David Calleo 的作品;见 Samuel Huntington、Joseph Nye、Aaron Friedberg 和 Charles Kupchan 的评论;见 Samuel Huntington 在 “The U. S. — Decline or Renewal,” *Foreign Affairs* 67 (Spring 1988): pp. 76—96 中有价值的调查研究。

④ 见 *New York Times*, March 4, 1990, “Week in Review” 对美国经济衰退统计数据 and 态度的调查。

除了可能缺少要求和欣赏之外,在美国对大战略进行具体的政治阐释还存在着系统性的供给不足。作为大战略的天然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军方受到法律和职业传统的限制而远离政治。在它看来战略就是如何进行规划来促进“国家利益”,而什么是国家利益则任凭政治家们随便怎么说。^⑤ 但进一步来看,政治家们(尤其是在像我们这样的总统制民主国家当中)并没有完全填补这一空白,并没有对“国家利益”做出具有任何操作意义的界定。合作各党派倾向于回避对战略进行连贯和关键性的讨论。(1986年,民主党在其中期外交政策报告中排除了美国对尼加拉瓜政策的讨论,因为它争议太大。)目光短浅对于执政党也有同样的作用。由于缺乏两党共识,政府很少能够做出规划,并确保它的实施。相反,我们看到的却是对各类学说如“国家不适论”(national malaise)、“高瞻远瞩论”(standing tall)、“幻象论”(that vision thing)和“历史终结论”(end of history)形成对其根源的探讨。^⑥ 我们似乎正在探索某种东西来替换冷战遏制的简单公式。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共识:政治上反对极权主义,经济上反对社会主义,战略上保持均势。所有这些都指向了反苏这个方向。现在我们似乎不再习惯于国际政治选择。

任务错误地落到了知识分子(包括国际政治学家和国际历史学家)的头上。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是另外一种考虑。既有人们不愿意将学科政治化的职业性习惯,也有科学上倾向于理论过度吝啬的动机。此外,二者都是在战后对战前理想主义与和平主义哲学抱怀疑态度的现实主义传统背景下运作的,它们一道建立起一种强有力的结构主义或新现实主义范式,在将专业圈和官僚圈的讨论引向结构主义大战略和均势的同时,系统地将国际政治学的主题去政治化,“结构化”。

由于国家的数量和权势决定着国际体系的特征,并因此使我们倾向于采纳均势战略,因此我们需要接受下列结构现实主义的基本

^⑤ Samuel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84—85; Richard Betts, *Soldiers, Statesmen, and Cold War Cris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chap. 3.

^⑥ 这里所指的当然是卡特、里根和布什几位总统以及国务院官员福山。

假设。^⑦

如同所有国际理论一样,新现实主义假定国际体系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它缺少一个世界政府,缺少对合法性暴力的垄断。新现实主义还假定,国际体系的构成单元,即世界政治中的行为者想要生存下去。但某些版本的新现实主义增加了三个附属性假设:

(1) 分析的单元是“相似的”单元,民族或“国家……是关键的行为单元”。国家是等级制的规制,拥有对合法暴力的垄断权。

(2) “它们追求权势,或者作为一种目标,或者作为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亦即说目标存在着等级,其中安全居于首要地位;权势是国际无政府条件下实现安全的主要(或关键性的)独立手段。

(3) 各个单元“总体是按照理性的方式行事”,意味着它们拥有单一的、自私的、福利的功能,并采纳将这种福利功能结果最大化的政策。

新现实主义从这些假设中推论出,国际条件是一种“战争状态”,在这段时间内,所有参与者都假设存在着战争的可能性。新现实主义从这一推论中得出结论认为,国家应当以权势平衡权势,而不是追随更强有力的大国。很简单,因为国家不这样做就会在竞争中丧失生存权,而其他政治家们则因此而学到了均势战略的优势。^⑧

纯正版本的新现实主义把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这一总体假设和生存的本能看做是足以引发“战争状态”和奉行均势战略的决定性因素,而后三个假设则是辅助性的,被认为或者是不必要的,或者是国际无政府状态(通过竞争选择和社会化而产生)的衍生品。而并非原汁原味的因发性结构现实主义版本把所有四个假设都看做是产生战争状态和均势战略的必要条件。^⑨

尽管结构主义取得了科学上的成功,然而作为社会科学家的我们观察到还有大量的国际行为尚得不到解释。结构现实主义成功地主导着政治上的讨论,但无法对其本身做出解释,对其自身含蓄不明

^⑦ 这里我稍微修改了罗伯特·基欧汉的定义,见“Realism, Neorealism,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ed. Robert Keoha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7。

^⑧ Kenneth Waltz, “Political Structures,” in *Neorealism*, ed. Keohane, chap. 5.

^⑨ 见作者“霍布斯和均势”一文为要求所有四个假设条件的条件性结构现实主义所作的辩护。它是提交到美国政治学协会 1989 年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召开的年会上的论文;另见 *Political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forthcoming), chap. 4。

的政治学也还没有探讨。实际上,结构主义的极大成功使我们失去了关注竞争性政治价值和不同规制的政治洞察力。借用古生物学的比喻,我们或许已陷入了进化死胡同的危险当中。缺少一种恰当代替性大战略概念意识会使我们的想像僵化,并妨碍找到有效的政策方案来应对戏剧性变化着的局势。^⑩

为了扩大我们的知识和政策范围,我将从相互竞争的各种国际关系政治哲学当中汲取营养,把不同的政治价值和各种规制重新引入到大战略基础的形成当中。把这些哲学作为指南应用于如何驳倒新现实主义的辅助性假设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如果我们驳倒了这些辅助性的假设(打破了单一性的国家,改变了算计的逻辑,使我们的目标多样化而不再仅仅是国家安全),那么战略分析会是什么样?新现实主义会有多“强健”——或者说重新政治化是否会产生不同?这样做,我们便能够对现实世界在单元和选择偏好上的差异会强加给理想的结构主义均势模式一种怎样的制约性作用有一个间接的了解。

25

作为艺术作品的国家

让我们从两种简单的情况开始。首先,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民族国家行动但却保留安全利益驱动目标和理性的决策会是怎样?其次,如果我们保留国家行动和理性的决策,却并不考虑安全的首要性会是怎样?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保留单元的理性算计。这样,焦点就落到了单元算计者的头上——作为个人的政治家会将个人利益最

^⑩ 约翰·鲁杰和罗伯特·考克斯对结构主义模式的历史狭隘性和社会学上的薄弱性进行了有价值的批判。见 John Gerard Ruggie,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 Toward a Neorealist Synthesis," and 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th in Keohane, *Neorealism*。对均势模式的广泛历史批判见 R. Rosecrance, A. Alexandroff, B. Healy, and A. Stein, *Power, Balance of Power, and Status in Nineteen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verly Hills: Sage, 1974), and the articles by Paul Schroeder and Peter Gellman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5 (April 1989): pp. 135—154, 155—182。从多种视角对均衡的阐释进行辩护的,见 William Wohlforth, "The Perception of Power: Russia in the Pre-1914 Balance," *World Politics* 39 (April 1987): pp. 353—381。

大化,这与国家的利益或许一致,或许不一致;它可以把安全目标置于首位,也可以不这样做。

马基雅弗利的个体现实主义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套阐明这些局势的相关预期。马基雅弗利的现实主义从根本上说(也就是因果性地和直接地)是建立在他的个体观点之上的。他以当时欧洲诸侯(Princes)和古罗马帝制共和国为例阐明了个人政治的成功和不成功。他通过提供两类证据来证实了这些教训。他用当时欧洲的经验,也就是西班牙斐迪南(Ferdinand)、切萨雷·博尔基亚(Cesare Borgia)和路易十二(Louis XII)的成功和失败作为支持或反驳的例证;用罗马的光荣经历作为综合、确切和融会贯通的实证经验。正如波里比阿(Polybius)或利维(Livy)所阐释的,这些例证的成功使用能够证实任何过程。^①

个体需要将其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由于“战争状态”是一种普遍现象,所以安全是首要的利益。不仅是国与国之间需要安全,在国家内部也需要安全。像费拉拉(Ferrara)大公这样的世袭诸侯们可以依赖习惯来确保臣民对他们的爱戴。这种爱戴是征服者们的雄心壮志所难以逾越的可怕障碍。他们发现这些大公国不但难以征服,而且更难以驯服,因为那里的人更愿意回到古代的统治家族当中。^② 像威尼斯和斯巴达这样保守的贵族共和国试图通过限制自己的野心来减少自身的不安全。斯巴达选择了封闭和自给自足,从而造成了国民的贫困和国力软弱。斯巴达各个国王统治下的国民生活水平虽说卑微却也舒适,因而很少刺激更大的胃口,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政治上的,国内的还是国外的。^③

但是,世袭诸侯和保守的共和国都未能完全摆脱不安全问题,因为它们无法完全摆脱新兴诸侯国和奉行扩张政策的共和国。新兴诸侯们既造成了周边地区的暴力威胁,也对其做出了回应。新兴诸侯国也好,“杂混的”诸侯国(企图占领新的领地的老的诸侯国)也好,他们在征服过程中将所有那些失去家园的人们变成自己的敌人,从其

^① Quentin Skinner, *Machiavelli*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1), chap. 2.

^② Niccolò Machiavelli, *The Prince* (1513), trans. Harvey Mansfield, J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p. 6—7.

^③ Niccolò Machiavelli, *The Prince and the Discourses* (1513), trans. Luigi Ricci and E. R. Vincent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50), pp. 122, 126.

追随者的支持中也得不到什么安全。只有进一步疏远被征服的居民,才能使其追随者得到完全的回报。^⑭

那么,一个诸侯国为什么会加入这一暴力竞争?诸侯国仅仅是“单独追求权势”吗?马基雅弗利说,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危险,但诸侯国出于两个原因而寻求战争和军事征服:首先,为了展示和得到幸运赐给美德(勇敢的雄心)的那种回报——帝王般的伟大;其次,为了保护国家免遭劫掠。^⑮

通过雄师一般的军事领导,侯王就能将不确定性转化为信心,化失望为勇气。百姓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他的臣服。侯王可以通过战略上的才华出众来提供一种成功的诺言。^⑯

通过狐狸一般的外交活动,侯王可以有节制地使用暴力。中立(除非不得已)、勾结(这是我们现在说法)或“搭便车”(bandwagoning)、屈从于其他更强大的诸侯或与其结盟都是不可取的。^⑰积极的“均势”既能得到更高的威望,又更加保险。虽说结盟能够带来胜利所需的优势,不与弱者结盟就得不到弱者的支持,就会使你沦为胜利者设计方案的牺牲品,但更好的方式是对新的诸侯进行帝国主义征服。

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能取代均势的另外两种方案,即勾结和帝国主义扩张方案的形成环境。马基雅弗利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关于成功地进行帝国扩张的重要思考。他提供了很多错误政策的实例,但他没有探讨出现什么样迫不得已的情况(或是美德的失败)才迫使人们

^⑭ Machiavelli, *The Prince*, p. 8.

^⑮ “获取的愿望是非常自然和平常的事,当人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时,应当总是受到褒奖而不是责备。”Machiavelli, *The Prince*, p. 14. 另见 Sebastian de Grazia, *Machiavelli in Hel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chap. 7.

^⑯ 莎士比亚很好地抓住了英王亨利五世的这一“美德”:当惊恐万状的英吉利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在亨利的率领下于圣克里斯宾节(St. Crispin's Day)的早晨集结于法国北部阿金库尔村(Agincourt)时,年轻的亨利以他们的光荣感来鼓舞他们,以他展示出的胜利信念赋予他们以信心。

^⑰ Machiavelli, *The Prince*, pp. 89—90;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 126.

勾结或搭便车。^⑮然而在近代论述帝国史的作品当中却存在着经典的理性安全算计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统治者将个人的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

1879年至1892年埃及名义上的统治者杜霏克总督(Khedive Tewfik)在1882年迫于无奈而选择与英国远征军勾结(Collaboration),共同对付控制了埃及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多年的债务增加和财政腐败,农村阶层的普遍不满,越来越多的(通过一个以英国和法国财政顾问为代表的外国证券持有人委员会实施的)外国控制,以及随后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这些因素促使埃及军队中的艾哈迈德·阿拉比上校(Colonel Ahmed Arabi)领导了反对总督腐败的起义。在1881年至1882年的危机时期,杜霏克曾试图与民族主义者合作,但最终却选择英国作为捍卫其王位的更可靠的靠山。

杜霏克显然缺少美德,他的父亲,也就是老总督这样描述杜霏克说:“没头脑,没心肺,没勇气。”^⑯但是,他和很多其他埃及贵族(他们有些人最初是反对英国的)选择勾结的一个同样重要原因是缺少一个明确的替代方案。“埃及”过去在政治上是马穆鲁克的一个采邑,现在当地埃及人与之展开了争夺;在商业和财政上,它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殖民地;在法律和形式上,仅仅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在国际上,仅仅是在比杜霏克早两代人之前由穆罕默德·阿里所建立的一个准独立的国家;而实际上,上面提到的任何一点都足以说明问题。^⑰“埃及”民族国家还有待于界定,有待于政治创建。但杜霏克不是创建它的统治者。在1882年夏天阿拉比上校的起义使局势失去控制之际,他为了最好地保护自己而将自己置于英国陆战队的保护之下,并在他们的包办下在其首都恢复了一个傀儡政权。杜霏克与英国的勾结不是出于“埃及”抗衡英国对其独立的威胁,而是为了保护

^⑮ 比如,迫不得已和没有好运——生病和没有预见到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II)对他可能怀有的忌恨——导致了切萨雷·博而基亚(Cesare Borgia)的失败。否则,他会是一个最有德行的君主(《君主论》第七章);讨论“勾结”的有关作品见 Doyle, *Empir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对并不一定追求权势而对“威胁”采取“搭便车”的讨论作品见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在最近的均势讨论中,提出独立的(非帝国化的)国家可以采取搭便车来适应均势的作品见 Steven David, “Explaining Third World Alignment,” *World Politics* 43 (January 1991): pp. 233—256。

^⑯ A. M. Broadley, *How We Defended Arabi and His Friends* (London, 1984), p. 16.

^⑰ Alexander Scholch, *Egypt for the Egyptians!* (London: Ithaca Press, 1981, chap. 1).

其个人的安全。

马基雅弗利看到,世界政治的激烈竞争或者取决于具有美德的领袖,或者取决于组织良好的国家,或者取决于二者兼备。不幸的杜霏克两者皆不具备,而阿拉贡(Aragon)的斐迪南二者兼备。

身为阿拉贡侯王、卡斯蒂利亚地区伊莎贝拉(Isabella)的丈夫、西班牙联合王国的国王、那不勒斯·纳瓦尔和北美洲的征服者、美洲诸国的最高权力者,斐迪南是当时能够以其美德的头脑将马基雅弗利非常崇拜的伟大的古代王国的创建者(如摩西、赛勒斯和罗穆卢斯)踩在脚下的基督教侯王。与可怜的杜霏克不同,斐迪南抓住了马基雅弗利的精髓(stato),既拥有了领土(dominio,对领土的有效控制),又有了行使命令的权力(imperio)。^①

然而,要想理解斐迪南,还需要我们放下结构现实主义的各种假设。他是一位无与伦比的理性算计者和西班牙国家的创建者。但他的野心已远远超出了安全的首要考虑。

以征服格拉纳达为开端的西班牙征服者斐迪南使自己成为“基督教世界中的第一位国王”。^② 斐迪南以牺牲其他竞争对手的版图为代价成功地扩大了自己的王国,更重要的是,成功地保证了自己在国内的安全。他使其国内的竞争对手卡斯蒂利亚的贵族们忙于对外战争。他拥有了大量的人民和神职人员来创建自己的军队。他以“虔诚的残忍”行动获得了伟大的声望和财富,而他的牺牲品成了可怜的马拉诺人(Marranos)。^③

尽管在1452年出生于阿拉贡国王约翰二世之家,但斐迪南知道,要想成为一位伟大的国王,必须像一位新侯王那样来思考问题。他正是这样做的。他通过第一次婚姻而帮助他的父亲挫败了他的哥哥维亚纳(Viana)侯王(他在阿拉贡领导了一个民族主义派别)。在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犹太大商人的资助下,他通过贿赂而在卡斯蒂利亚赢得了与伊莎贝拉的婚姻。^④ 在尝试了一次针对其妻子的政变之

^① De Grazia, *Machiavelli in Hell*, p. 158.

^② Machiavelli, *The Prince*, chap. 21. 尽管马基雅弗利在他的信中对斐迪南的评论是“狡猾加幸运,而不是智慧超群”(引自 Niccolò Machiavelli, *The Letters of Machiavelli*, trans. Allan Gilber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p. 111),但他在《君主论》第21章中还是以相当长的篇幅赞扬了斐迪南。

^③ Machiavelli, *The Prince*, p. 88.

^④ John Elliott, *Imperial Spain* (New York: Mentor, 1963), p. 21.

后,他知道了如何珍惜她的才华,并和她一道治理国家,镇压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权贵势力的复古独立,加强国家官僚机构的纪律,然后准备伟大的征服。^⑤

他在国际上的首次成功是在1492年重新从穆斯林手中收复西班牙和格拉纳达。征服格拉纳达的战争使“卡斯蒂利亚贵族们的心中充满了希望”,他们温顺地服从着他的指挥。^⑥权力的增加又使他反过来对付先前的盟友,并报答新的盟友。为了报答他的新盟友传教牧师、士兵与那些伟大的贵族,他驱逐了犹太人和摩尔人(但他看来知道,这在经济上是一个愚蠢的政策,这样会破坏财政和农业。所以他拒绝在他个人的阿拉贡王国中驱逐摩尔人)。在新建起的国内权威的基础上,他随后又转向了更多的对外征服。在征服了那不勒斯(阿拉贡对外扩张的一个传统地区)之后,他又开始三心二意地征服北非,并在伊莎贝拉的促使下出资支持向美洲的探险。他对内重建国家取得的成功反映在公共税收的增加上,从1474年不到90万里亚尔增加到1504年的2600万里亚尔。^⑦

斐迪南创建了一个有效的外交机构,但却反复地滥用其外交人员,要求他们公开撒谎,但却成功地隐藏了他的意图(正如马基雅弗利所注意到的)。^⑧他还创建了一支由贡萨尔沃·德·科尔多瓦(Gonsalvo de Cordova)领导的伟大的军队。这支军队包含了现代的步兵力量:戟、剑和火绳枪。

他的结局并不如愿。他为建立一个统治整个西部地中海的伟大而独立的西班牙奋战了一生,到头来却无奈地被迫承认他的疯女儿胡安娜(Juana the Mad)和她敌对的丈夫哈布斯堡大公腓力(Philip)

^⑤ W. H. 普雷斯科特在其经典的西班牙史中对斐迪南的美德做了这样的描述:“在法律管理上不偏不倚地公正;时时关注弱者免遭强者的压迫;他明智的经济政策使其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又没有对其人民增加沉重的赋税负担;他冷静而温和;他正派,尊重其臣民所信奉的宗教;他通过全面的立法和自身的榜样来鼓励勤奋;他有着至善至美的睿智,这使他的全部事业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使他成为他那个时代各个诸侯当中的大智者。” W. H. Prescott,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Ferdinand and Isabella* (1837; rpt.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1904), vol. 4, p. 255. 但普雷斯科特还注意到,他“邪恶淫荡”的嗜好既令伊莎贝拉不安,也破坏了王国的稳定。Ibid, p. 251.

^⑥ Machiavelli, *The Prince*, p. 88.

^⑦ Elliott, *Imperial Spain*, p. 90.

^⑧ Machiavelli, *The Letters*, pp. 115—116. 他使得他们以背信弃义而著称。

为他的惟一继承人。^②

在斐迪南看来,均势不是一种目的或政策,而是帝国征服战略中“分化与统治”的策略。他的美德在于愿意冒更大的风险,远远超出了那些企图将个人或国家安全利益最大化的人所愿意承担的风险。国家是一种尚未制度化和尚未规定出目标的实体。用雅各布·伯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话来说,国家是由那些诸如斐迪南和杜霏克之类的好也好,坏也好的“艺术家们”所尚待勾画的“艺术作品”^③。在一个案例中,国内的制约因素迫使杜霏克邀请来英国人。在另外一个案例中,国内的动力使得斐迪南企图发挥西班牙的资源所无法完全承受的更大作用。

和平联盟

第三个案例有些复杂,但也更加熟悉。声称“自由国家”(free states)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自由国际主义者(liberal internationalists)同时否认了结构现实主义的两个假定。自由主义者保留了国家是实质性的、稳定的和制度化的决策单位这一假定,但他们否认国家是单一的、理性的和自私的算计者的假定,主张把国家看做是复合性的代议制机构——自由主义共和国。同时,他们否认国家是受到以权势、物质利益和声望界定的安全利益驱动假设,主张自由共和国是由个人的自由值驱动的假设。

在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自由国际主义哲学中,这两项创新共同发挥作用,对国际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永久的和平》^④当中,康德展示了自由共和国是如何导致了二分法的国际政治的:相似的自由国家之间的“和平联盟”形成的和平关系和自由国家

^② Machiavelli, *The Letters*, p. 133.

^③ 雅各布·伯克哈特注意到:“费拉雷塞(Ferrarese)对统治家族的感觉是一种奇妙的复杂心情,既有沉默的畏惧,又有意大利人对利益精于算计的想法,还有现代臣民的忠诚:将个人的崇敬变成一种新的责任感。”Burckhardt,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1878), trans. S. G. Middlemore (London: Phaidon Press, 1965), p. 32.

^④ Immanuel Kant, *Perpetual Peace* (1795), in Kant's *Political Writings*, trans. H. Rei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93—130.

与非自由国家之间的“战争状态”。

他提出,首先,共和政府排斥绝对君主制的侵略性利益,使尊重个人权利的习惯根深蒂固。战争似乎是对他和其他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人民福利的直接危害。然而,这些国内的共和主义制约因素并不能阻止战争。如果这些因素真能阻止战争,那么自由国家就不会好战,而实际上远不是这样。不过,在君主制可以任意胡为的地方,这些共和因素的确能带来慎重(即康德所说的“犹豫”)。自由主义者只为捍卫人民和自由的目的而战。自由主义的历史遗产中充满了促进自由、保护私有财产或支持自由主义联盟反对非自由主义敌人的人民战争。^②

其次,为了看清和平联盟是如何在自由国家当中而不是在自由国家与非自由国家之间消除战争的,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宪法转向国际法,也就是康德的第二个源泉。作为对用宪法保障慎重的补充,国际法增加了第二个源泉——对尊重的保障。民族之间的分化因语言和宗教的分化发展而得到强化。这些分化造成了一个国家分化的世界——这是避免“全球性残暴专制制度”的实质性条件。然而同时,它们却整合了自由国家的道德。因为随着文化的增长,人们逐步对其原则形成了更大的共识,这导致了相互的理解和平。^③随着共和国的出现(第一源泉)和文化的进步,对所有公民和所有共和国合法权利的理解开始发挥作用;既然慎重构成了政策的特征,这就为自由主义的和平奠定了道德基础。这样,国际法就突出了康德所说的声望(publicity)的重要性。在国内,声望有助于确保共和国官员们按照他们所认为的正义的原则行事,按照他们所代表的选民的利益行事。在国际上,外交人员政治生涯中对各种精确概念的自由表达和有效沟通对于建立和维护理解是至关重要的。而尊重正是建立在理解基础之上的。

国内存在正义的共和国(这种正义是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会认定其他共和国也存在着共识和正义,因此值得与其和平相处。当国家政策的结果不明确但却存在着(潜在性的)互利时,合作的经历有

^② 康德认为这些战争是非正义的,并警告自由主义者不要受它们的影响(ibid., p. 106)。与此同时,他认为每个民族“能够而且应当”要求其邻邦加入自由国家联盟(ibid., p. 102)。

^③ Ibid., p. 114.

助于产生进一步的合作行为。与此同时,自由国家假定非自由国家是不公正的,因为它们不是建立在自由认同基础上的。由于非自由政府处于对其自身的人民的侵犯状态,所以自由政府对它们的对外关系也是抱着深深的怀疑态度。简言之,自由伙伴之间受益于和善的假定,非自由国家之间受害于敌对的假定。两种假定或许都准确无误,然而每一假定又都是自我实现的。

民主自由主义者无需假定是公共舆论支配外交政策,还是整个政府精英都信奉自由主义。可以假定精英按典型方式管理公共事务,但还可以假定潜在性的非自由主义精英成员有理由怀疑反自由的政策在选举上是否能够持续,是否能够得到大多数民主公众的认可。

最后,世界性的法律为道德承诺增添了物质刺激。普世性的友好(hospitality)权利使得“商业精神”(spirit of commerce)迟早会占领每个国家,因此刺激国家促进和平并努力避免战争。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这些普世性的纽带源自于根据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合作性的国际劳动分工和自由贸易。据说每一国经济都比自给自足状态下要好。这样,每一国都获得了一种激励,要避免会导致他国打破这些经济纽带的政策。既然保持开放性的市场取决于下次交易仍将由价格而不是强制来决定这一假设,那么相互安全的意识对于避免为了安全而寻求经济自给自足就成了至关重要的。这样,避免对另一自由国家的安全构成挑战,甚或是通过联盟的方式相互促进安全就会随着经济相互依存而自然地出现。

另一普世性的自由和平源泉是国际市场消除了直接决策层面中生产和分配的决策困难。外国因此看上去并不直接为这些结果负责;各个国家可以对这些激烈的市场竞争袖手旁观,在某种程度上还可超脱其外,并随时做好介入的准备以解决危机。商业的相互依存和国家官员之间的国际交往有利于形成相互交叉的跨国纽带,这些纽带能够起到促进相互包容的作用。根据现代自由主义学者的理论,国际金融家和跨国、跨政府组织创造了有利于相互包容的利益。此外,这些利益的多样性确保了任一单一的冲突都不会引发螺旋上升式的相互报复,因而不会损害整体关系。反之,不信任感(如自由政府与非自由政府之间关系的典型特征)能够限制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范围。这样,也就增加了单一冲突决定整个关系的可能性。

单一的宪法源泉、国际源泉或普世性源泉都是不够的。康德的理论既不纯粹是制度性的,也不纯粹是意识形态性的和经济性的。

但是,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观念以及伴随而来的跨国纽带这三个具体的色彩合到一起(也只有合到一起)就能够将自由主义政体和经济的种种特征与持久的自由和平合乎情理地连接起来。^④但是在与非自由国家的关系中,自由国家没能逃脱国际政治体制整体上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不安全。^⑤此外,在自由国家之间奠定了和平基础的宪法制约,对个体人权的国际性尊重以及共同的商业利益又为自由社会与非自由社会之间的关系奠定了进一步冲突的基础。

^④ 有关和平联盟存在的证据和意义的讨论,见 Michael W. Doyle,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t. I,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2 (Summer 1983): pp. 205—235. Larence Streit 似乎是第一个指出了当代外交关系中民主国家之间维护自身和平的实证趋势。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他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成立(非康德式的)十五个主要民主国家联邦的建议。见 Streit, *Union Now, a Proposal for a Federal Union of the Democracies of the North Atlantic* (New York: Harper, 1938), pp. 88, 90—92. Dean Babst 对这一“民主和平”现象进行了定量研究,见 Babst, "A Force for Peace," *Industrial Research* 14 (April 1972): pp. 55—58. Rudolph Pummel 对战后时期的“自由意志论”做了类似的研究,见 Rummel, "Libertarianism and International Violenc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7 (March 1983): pp. 27—71. 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一文中,我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是从更广泛的(康德主义)意义上使用自由主义一词的。在该篇论文中,我对 1790 年到现在的历史时期进行了考察,没有发现在自由国家之间暴发战争。Babst 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联盟伙伴的分布意义做了初步研究。他发现,联盟伙伴的实际分布靠机遇产生的可能性不到 1% (p. 56)。但这要假定,任何两个民族存在着同样的交战可能性。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假设。Rummel 在将这一假设应用于他的自由意志论主题时对它的意义做了进一步讨论。

^⑤ 有关证据见 Michael W. Doyle,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t. II,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2 (Fall 1983): pp. 323—353. 尽管有严肃的研究显示马克思主义政权的人均军事开支高于非马克思主义政权(见 Thomas R. Dye and Harmon Ziegler, "Socialism and Militarism,"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December 1989]: pp. 800—813),但不能将此解释为权威性 or 集权性政府天生具有侵略性,也不能(甚至是以更大的热情)将其解释为自由主义政权具有天生的和全球性的和平。比如 Stanislav Andreski 提出,(纯粹的)军事独裁政府由于其内部的脆弱性,很少有动机从事对外军事冒险。Andreski, "On the Peaceful Disposition of Military Dictatorships," in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Special Issue on Strate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d. Amos Perlmutter and John Gooch, 3 (December 1980): pp. 3—10. 根据 Walter C. Clemens, Jr. 的研究,美国在 1946—1976 年间对第三世界的干预是苏联在 1946—1979 年期间对外干预的两倍多。Clemens, *National Security and U. S. -Soviet Relations* (Muscatine, Iowa: Stanley Foundation, 1982), pp. 117—118.

Barry R. Posen 和 Stephen W. Van Evera 再次发现,美国和苏联用于干预第三世界的军事开支(对那里的所谓威胁做出反应据认为并不具有纯粹防御的特征)占各自国防预算的比例分别是四分之一和十分之一。见 Posen and Van Evera, "Overarming and Underwhelming," *Foreign Policy* 40 (Fall 1980): p. 105; and Posen and Van Evera, "Defense Policy and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Departure from Contain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8 (Summer 1983): pp. 86—89.

康德的自由国际主义将新现实主义的种种假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让我们能够看到负责的政治家们完全可以拒绝将新现实主义均势思想当作一种普遍的理想或当作国际政治的一个决定因素。一方面,均势贬低了和平联盟的作用,这样,自由主义国家在其相互关系上就用不着和平联盟了。另一方面,自由国家对非自由国家的疑虑能够防止具有战争倾向的关系中最乐于奉行的均势战略。无论哪种情况,国内的自由主义都改变了现实主义理论描绘的图景。

大 背 叛

最后,在最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完全不考虑三个假定,而考虑一种目的在于促进价值而不是增进国家安全的非单一性亚国家(subnational)层次的决策。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为我们提供进入这种形式的战略分析入场券。1914年8月欧洲各社会党就支持还是不支持本国政府的宣战而做出的著名(有些人认为是臭名昭著)的决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案例。

很多这些社会党支持本国政府和捍卫其国家主权的决定通常被解释为是对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直接背叛”。列宁第一个对其进行谴责。^⑥ 按照传统的解释,社会党人在选择战争而不是平时,他

^⑥ 列宁宣称:“第二国际(1889—191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投票赞成战争拨款,他们重复着普鲁士容克和资产阶级的沙文资产阶级词句,他们的言行是对社会主义的直接背叛。”这是列宁于1914年9月6日或7日在波恩对一些流亡的布尔什维克追随者发表的反对战争的七篇论文中的第二篇(这些论文转引自 Bertram D. Wolfe, *Three Who Made a Revolution* [New York: Dell, 1964], pp. 635—636)。注意第二国际的兴亡日期。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列宁与第二国际关系的全面论述见 George Haupt, *Socialism and Great War* (Oxford: Clarendon, 1986), chap. 5, and R. Craig Nation, *War on War: Lenin, the Zimmerwald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们就是选择了国家和民族,而不是选择了阶级。^⑦

然而,这一观点过于简单。它并不符合社会党做出的实际选择记录。更重要的是,它未能正确评价社会党所面临的那种特别的战略选择。

(1) 这一决定不是民族或国家决定,当时社会党都没有掌权。

(2) 这些政党都不是自私的和理性的单一主体。它们虽然把自己看做是国际工人阶级的集体代表,然而实际上很多党内都分裂为竞争性的派别。

(3) 它们企图促进的价值不是国家安全、财富和声望,也不是和平自身,而是实现迈向世界社会主义的国际性进步所需的更加复杂的算计。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理论遗产包括了关于民族发展、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核心观念。大多数社会党人对此了如指掌。这一观念如此宽泛,以至于足以包含其内部的分歧,尽管还存在着很多其他分歧和争论。它还公开表达了战前欧洲社会党各主流派别的观点特征。

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强调,资产阶级的国家民主是为发展进步而斗争的最高阶段。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进步具有科学的含义。它意味着从封建主义经过专制的商业资本主义,到民主国家资本主义向全球的蔓延,最终不可避免地到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解放进程。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理论认为,帝国主义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阶段(同时也是残暴的阶段),尽管它在政治上对工业社会的影响是反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提出,尽管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民主包含了抗衡军国主义的趋势,从而给了寻求反对战争的社会党人

^⑦ 比如 Leszek Kolakowski 把社会党人看做是满脑子灌满了民族爱国主义,他们的言行揭示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这是它的意识形态基础)是一句空话”。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ume 2: The Golden 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29. Julius Braunthal 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精神,国际声称自己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可调和的反对者……但在 8 月 4 日,几乎所有交战国的社会党都发誓自己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的捍卫者。而在此之前,它们的目标一直是要摧毁这样的国家。Braunthal,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Volume 2: 1914—1943* (New York: Praeger, 1967), p. 1. 肯尼思·沃尔兹在“社会党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章中详细论述到,尽管他的概述浓缩了马克思对世界政治的很多模棱两可的有趣观点,并支持这一概述,但同时也识别出社会党人对待战争的政策和社会党人对战争责任之间的有价值的区分。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 125—126, 129.

以某种效验的许诺,但各个资产阶级派别都危险地倾向于战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确保无产阶级的解放与和平。

对于社会党领袖们来说,恰当的国际主义政策要求一种双向的判断。它必须努力在全球范围内将进步发展的前景最大化,尤其是要将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最大化。与此同时,还要分别将各个国家的革命前景最大化。当促进殖民地的民族独立会削弱相对于较反动的国家来说而更加进步的资本主义国家时,这两种责任就陷入了冲突。

国际主义政策还必须考虑很多非洲和亚洲国家的前资本主义条件以及当代欧洲特定的资本主义条件。1870年之后,所有列强都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之内运作(俄罗斯是在最近),但只有法国、英国和美国才有最完全的资产阶级民主。德国尽管被赋予了比任何其他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更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但却深受普鲁士容克主义的专制余毒之害。^⑧ 俄罗斯仍然是压迫性最强的国家,尤其是在1905年民主革命流产后,它对新生的社会主义运动采取了尤为严厉的镇压措施。^⑨

37 到1914年8月4日,马克思主义成了一种充满各式各样立场的政治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哪个国家的运动都不缺少派别。每个派别都声称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那个时代的真正含义。有些人(如德国的埃德华·伯恩斯坦)声称,工会和社会党影响的增强表明了选举社会民主制的效力;另外一些人(如俄国的列宁)则声称,资产阶级已经用强制性的国家军事机器和官僚机器将自己保护起来,只有通过暴力性的革命战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还有些人(如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确信,金融资本的发展构成了一个新的资本主义阶段:侵略的、垄断的和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也有一些人(如卡尔·考茨基)认为金融资本构成了一种超帝国主义的国际合作力量。除了这

^⑧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Marx-Engels Reader*, ed. Robert C. Tucker (New York: Norton, 1978), p. 562. 战前的社会党人非常清楚资产阶级政权当中的宪法差异。尽管德国社会党是欧洲最大的,但帝国政府并不完全向帝国议会负责。公民自由也相当有限。1907年斯图加特大会之所以在斯图加特而不是在柏林举行,就是为避免激怒德皇。尽管如此,来自英国的一位代表 Quelch 先生仅仅是因为把“海牙大国会议”的会晤描绘成是“强盗的盛会”而被驱逐出德国。

^⑨ J. P. Nettl, *The Soviet Achievement*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67), pp. 29—31.

些战略上的差异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策略上的差异(改良主义、大灾变主义等)。^⑩

但是,欧洲社会党的领袖们的确享有超越那些派别争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遗产。他们也都是第二国际的成员。^⑪然而这两种遗产都未能平息争论。实际上,两者都分别促进了争论。正如批评者们如此针对性地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想遗产包含了很多模糊的领域。争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领袖的竞争引发了激烈的争论。^⑫

38

随之而来的对社会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无法反驳那些注意到民族主义压力的“现实主义者”(因为这些压力的确存在),也无法完全取代那些强调各党之间分歧及这些分歧在各派特定政治利益中的根源的历史学家(因为这些分歧的确存在)。但回头看一下今天的

^⑩ 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国际主义思想相连接的特别有用的非原创性作品有: Demetrio Boersner, *The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and Colonial Question (1917—1928)* (Geneva: E. Droz, 1957); Solomon F. Bloom, *The World of N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1); G.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s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John Elster, *Making Sense of Mar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and Alan Gilbert, "Marx on Internationalism and War,"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7 (Summer 1978): pp. 346—369. 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更全面的讨论和参考书目见我的文章 "Beyond Betrayal: Marxism, the Socialists, and World War One," in *Political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forthcoming)。

^⑪ Merle Fainsod,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World W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pp. 8—15; G. D. G. Cole,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Volume II: Marxism and Anarchism, 1850—1890* (London: Macmillan, 1954); George Lichtheim, *Marxis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4), pt. 5, chaps. 5—7; Franz Borkenau, *World Communism* (1939; rp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and Micheal Lowy, "Marxist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New Left Review* 96 (March—April 1976): pp. 81—100. 这些作品对1914年之前西欧和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的种类繁多的学说派别进行了尤为深入的探讨。Fainsod将战前社会党人分成右、中、左三派。它们在哲学上反映着对历史唯物主义含义的争论以及在很多问题上的策略分歧,包括应对战争爆发的政策(见第15—17页)。然而根据Lichtheim(第323—324页)的看法,德国马克思主义在战争爆发之前仍然是最有影响的学说。更重要的是,与Fainsod不同,我认为他们之间的哲学分歧能够被共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核心所遏制。这种共同的内核为社会党所奉行的政策差异性提供了足够的解释。Kolakowski(第4—5页)对“黄金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共同内核做了描述。这一共同内核产生出对它如此牢固的忠贞,甚至在战争后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现严重派别分裂之后,罗莎·卢森堡仍拒绝她领导的斯巴达克团与党分裂,即便她认为社会民主党的当政者已经是“腐臭的僵尸”(列宁的注释: *Collected Works*, vol. 30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p. 345)。

^⑫ 对这些竞争及其形成的不同意识形态影响范围所做的广泛论述见Borkenau, *World Communism*, chap. 40。

社会党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学说承诺和政党利益放到一起可以提供一个可信的代替性解释。这一解释比1914年8月危机时每一个社会党单独采取的立场要略胜一筹。

不足为奇,欧洲社会党就什么是恰当的殖民地政策发生了分裂。1907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大会如同早先各次大会一样,原则上对帝国主义进行了谴责,强调它会挑起战争,^④但在帝国主义国家统治亚洲和非洲前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上,社会党人的观点出现了分裂。肖伯纳(Bernard Shaw)和其他费边主义分子走出如此之远,他们甚至支持布尔战争。他们认为,在英国的统治下,大多数南非人将比在保罗·克鲁格(Paul Kruger)昏暗的种族压迫下获得更多的进步。^⑤在一些冲突不太大的案例中,欧洲社会党人经常而响亮地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其中包括本国政府的政策,如1898年的法绍达(Fashoda)危机,1905年和1911年的摩洛哥危机以及巴尔干危机。^⑥

同样不足为怪的是,社会党人在谴责战争,决心尽一切可能防止战争爆发,或者是尽快以公正的条件结束战争这一点上是团结一致的,尽管反对军事黩武的具体措施“在不同的国家理所当然地不同”(斯图加特决议)。^⑦但这些决议都没有“否定”民主国家抵制侵略的权利,或抵制帝国主义,促进国际社会主义进步的更加普遍的义务。

鉴于对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这些责难,欧洲各个社会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14年8月的国际主义危机问题上应当站在怎样的立场上?

39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认为针对塞尔维亚的帝国主义战争是走向社会主义进步的步骤。生命的代价、军国主义的复活以及塞尔维亚致力于自身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发展的事实,这些因素足以驳倒任何把这场战争说成是进步的辩护。

重要的是,侵略国联盟内部各个社会党或与之对立的帝国主义

^③ James Joll,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1889—1914*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55), pp. 196—198.

^④ Bernard Semmel, *Imperialism and Social Reform: English Social-Imperial Thought 1895—1914*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60).

^⑤ Carl Schorsk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1917*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72), pp. 69, 201; and William Walling, *The Socialists and the Great War* (New York: Holt and Company, 1915), pp. 99—113.

^⑥ 引自 Joll, *Second International*, p. 197.

国家的社会党都没有为巴尔干的帝国主义战争辩护。奥地利社会党人尽管为大公的恐怖暗杀而哀叹,他们对奥地利的帝国主义进行了谴责。不久之后,他们的发行物就遭到奥地利国家的查封。^⑦德国社会民主党发起了反对奥地利帝国主义的示威活动。^⑧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前进报》于1914年7月25日发表编者按文章:《绝不让一个德国士兵为渴望战争的奥地利独裁者们的利益或帝国主义的商业利益而流一滴血》。该文激励地呐喊道:“国际团结万岁”。俄国社会党早在1913年写给奥地利社会党人的一封信中就同样谴责了沙皇的干预政策和对巴尔干的帝国主义干涉。^⑨

马克思主义者已然发现,世界战争的迅速升级已经成为一个比帝国主义问题更能造成(国际和有时的国内)立场分裂的问题。马克思反对军国主义,承认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民族独立起着进步作用,致力于鼓励全面的国际进步。这些思想相互冲突。竞争性的变量可以排列为下列四个维度的政策矩阵。(1)社会党越强大和(2)资本主义(即工业发展和民主国家)越发达;(3)国家越明显地会遭到攻击,而不是攻击他国;(4)国家最直接的反对者越具有镇压性(马克思和恩格斯会认为),社会党越应当支持民族自卫战争和(或)国际进步战争。反之,社会党越应当拒绝帝国主义或反动的军国主义战争。

这些含义似乎在总体上得以实现。表2.1显示了社会党的力量,表2.2反映了1914年7月和8月社会党面临的决策矩阵。

在战争的第一受害者塞尔维亚,166席中的2名社会党议员与国内和国外的社会党同事保持一致。^⑩对于所有其他议员来说,支持战争的决策显然是出于塞尔维亚国家自卫:奥匈帝国进攻塞尔维亚。但对于代表着一个弱小社会党的社会党议员来说,塞尔维亚工人阶级如同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工人阶级一样,是压迫性的塞尔维亚国家(一个依赖沙皇和巴黎财政支持,并主动容忍针对奥地利的恐怖组织的半殖民地政权)的牺牲品。奥地利社会党曾谴责对塞尔维亚的进攻。塞尔维亚社会党人回应说:“奥匈人民与塞尔维亚人民之间

⑦ Walling, *Socialists*, pp. 146—147.

⑧ Chorsk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p. 286.

⑨ Walling, *Socialists*, p. 111.

⑩ 下面引注的有关塞尔维亚和其他国家的议会统计数据源自 *Statesman's Yearbook* 1915。

决不能发生战争”。结果,有 164 票赞成战争,2 票反对。^①

表 2.1 1914 年的社会主义

	成员	选票	社会党议员	议员总数
塞尔维亚		25 000	2	166
比利时		600 000	39	185
法国	90 700	1 397 337	102	595
英国	1 559 082	370 802	42	670
意大利			77	508
奥地利	145 500	1 041 000	82	516
德国	1 085 905	4 250 329	110	397
俄罗斯		800 000	14	442

资料来源: Julius Braunthal,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Volume 2: 1914—1943* (New York: Praeger, 1967), p. 351;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Labour Movement*, ed. Julius Braunthal (London: Lincolns Praeger International Yearbook Publishing Co., 1956); *The Socialist Yearbook 1913*, ed. J. Bruce Glasier (Manchester: National Labour Press, 1913); and *Statesman's Yearbook* (London: Macmillan, 1915)。

党员、大选选票、社会党议员、议会总人数是 1914 年 8 月之前最后大选时的数字。

表 2.2 社会党决策矩阵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党 1914 年 8 月决策产生影响的因素概览)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防卫/侵略	威胁	净得分
塞尔维尔	0	0	-1	-1	-2
比利时	1	2	2	1	6
法国	2	2	1	1	6
英国	1	2	0	1	4
意大利	1	1	0	0	2
奥地利	2	1	-1	1	3
德国*	2	1	0/-2	1/-1	4/0
俄国	1	0	0	-2	-1

注:此表只是示意性的。1914 年各国社会党所面临的困难判断都无法对其进行可靠的量化分析。

“社会主义”指地方社会党力量的相对强弱,用 0—2 表示弱强程度;

“资本主义”指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民主发展的程度,用 0—2 表示弱强程度;

“防御/侵略”指国家明显遭到攻击的程度:防御 2,混合 0,侵略 -2;

“威胁”指是否会被击败:不可能失败 2,可能失败 -2。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社会党在 1914 年 8 月支持本国政府加入战争的理由越多,“净得分”越多。3 分或 3 分以上的所有社会党都投票支持了战争;意大利(社会党)弃权,得 2 分;在 0 分或以下的都投票反对战争。

*1914 年德国的形势与 1915—1916 年及其以后的形势相比较而言。

① Braunthal,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p. 34.

比利时是塞尔维亚马克思主义者的镜像反映。在同样遭到进攻的比利时,社会党人也同样一致地加入到战争当中。比利时是一个选举民主国家,在185个下院议席中社会党占39席。这样一个中立国家却遭到德国的侵略。8月3日,社会党停止了反战示威,宣布“为了捍卫中立,甚至捍卫我们的国家免遭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我们应当主动加入到欧洲的民主和政治自由事业当中。”^②

41

法国社会党人也一致地加入了战争。在选举产生的595个议会席中,他们占有102席。起初,他们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对法国卷入巴尔干危机的示威,支持法国的斡旋努力。^③德国入侵法国后,他们来了一个180°的大转弯,号召社会党爱国者牢记1793年和1870年在反对德国“军事帝国主义”和争取民主“文明”的新斗争中所发挥的“历史性作用”^④。

英国社会党人对于参战莫衷一是。^⑤39名工党议员中只有7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党人。尽管如此,所有的社会党分子和工党成员都反对卷入巴尔干。国家防务不是紧迫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大国竞争对手(无论是奥地利还是俄罗斯)都不值得英国社会主义者的帮助。^⑥但入侵比利时使独立的工党社会主义者出现了分裂,改变了工党大多数人的立场,他们开始主动或被动地支持战争。对比利时的贪婪入侵向他们证明,这场战争现在已变成了一场捍卫民主,反对军事独裁的战争。他们认为,如果普鲁士征服了西欧民主国家,整个欧洲将受到威胁。^⑦

42

在意大利,下院508席中的77名社会党议员保持了中立。意大利社会党产生于反对政府的大罢工,对官方政策自然不满,对意大利盟国奥地利在巴尔干的帝国主义政策也持批评态度。他们谴责奥地

^② Walling, *Socialists*, pp. 181—182; Braunthal,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p. 25.

^③ 除了102个有组织的社会党议员之外,1914年5月的选举又增加了30名以独立候选人竞选的社会党议员。

^④ Walling, *Socialists*, pp. 177—179.

^⑤ Douglas J. Newton, *British Labour, European Soci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Peace, 1889—191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5), pp. 343—351. 作者在此书中以同情的心情评价了英国社会党人在1914年所犯的 error 和面临的困难。他发现,英国工会领导层与更富有学说色彩的英国及大陆社会党人之间缺少联系。此外,战前的秘密外交和1914年8月危机的发展速度使得有效的反对战争极其不可能。

^⑥ Fainsod,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p. 32.

^⑦ Walling, *Socialists*, pp. 164—165; Braunthal,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pp. 27—29.

利和德国的侵略,拒绝站在奥地利一边而参与战争。当资产阶级也转向反对奥地利和德国时,与本国政府有着冲突,尚且没有号召捍卫国家免遭外部进攻的社会党人也拒绝参与反对奥地利。后来当奥地利侵犯意大利时,社会党人表示了他们对奥地利胜利者的敌视^⑧,采取了“既不支持,也不破坏”的政策。

在奥地利,下院 516 席中社会党占有 82 席;在德国,社会党占有 397 席中的 110 席。^⑨ 奥地利社会党起初反对在巴尔干的帝国主义战争。但在战败而沦入他们认为更加反动的俄罗斯之手的阴影笼罩下,他们又改变了立场。在匈牙利,社会党虽然面对着国家的严厉镇压,但还是支持了反对“俄罗斯……这一奴隶制土地”的战争。^⑩

有很多东西都依赖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关键性决策。尽管社民党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成功,德国劳工的力量也很强大,但他们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相当有限。德皇和军事机构基本上不受议会的控制(正如德皇的各项计划中所提出的,如果社会党人反对战争就逮捕他们)。但德国如同其他地方一样,强大的社会党在 8 月 4 日都屈服了。他们担心,协约国的胜利会导致俄罗斯的胜利。^⑪ 他们因此将资产阶级的法国和英国也看作是受到了反动的俄国威胁的范围之内。两个月之后,比利时的共产国际主席埃米尔·王德威尔得(Emil Vandevelde)在写信中抓住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两难境地:“如果他们投票反对战争拨款,他们就会出卖自己的国家任凭哥萨克人的侵略。如果投票支持拨款,他们就会为德皇提供武器用于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整个西欧的民主制度。在这两个恶魔之间,他们只能选择自

43

^⑧ Walling, *Socialists*, pp. 198—199.

^⑨ 奥地利的 82 名社会党议员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波兰社会民主党成员和波希米亚社会民主党成员。在奥—匈帝国统治下,奥地利和匈牙利虽然具有各自的议会,但在外交事务和国防上却保持着统一。

^⑩ Walling, *Socialists*, p. 149.

^⑪ Peter Gay, *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Eduard Bernstein's Challenge to Marx* (New York: Collier, 1962), p. 277.

己认为罪恶较少的一个。”^②

社会党人后来改变了看法,这也显示出他们面临的两难的严重性。到1915年和1916年,由于德国战争目的的侵略性和吞并性特征越来越明显,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渐渐开始分裂。包括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和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在内的新的议员们用帝国议会每一张新选票来反对现在看来与其说是针对俄国的威胁不如说是针对西欧民主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其中的社会党)的战争。^③

在中欧恐惧的目标俄国,社会党人在442席的杜马当中占有147席,工党占有10席。1905年革命之前和之后,社会党人和其他工人阶级组织都遭到了警察的严厉镇压。在8月8日,工党和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都谴责战争,宣布它们“与西欧无产阶级团结一致”。它们双双退出了杜马。但随着实际敌意的爆发以及感到街头爱国主义示威的压力,工党领袖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号召其成员“誓死保卫国家免遭侵略”^④。一些孟什维克分子早在其派别分裂之前就表示支持国家防务。但在国内的社会民主党主要派别——社会革命派、左派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以及流亡国外的一些领袖(尤利乌斯·马尔托夫和列昂·托洛茨基)仍继续煽动。国内领导人遭到逮捕之后,党开始号召士兵们“为和平而斗争”^⑤。来自海外的一个孤独的声音又加强了这一口号。列宁号召无产阶级的士兵以及俄罗斯人要起义反抗他们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压迫。

44

^② 引自 Braunthal,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p. 15。然而,王德威尔得没有看到,同样的马克思主义逻辑却让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决定反对战争,而不是支持俄国,正像王德威尔得所希望的那样,以此来援助西方民主制度。实际上,支持这一立场的部分原因是源自于与纯粹民族主义相对立的国际主义,因为俄国败于德国将会导致俄罗斯的西方盟友——有着进步社会的法国和英国的失败。至少这似乎是普列汉诺夫(G. V. Plekhanov)在战争之前所做的绕来绕去的分析。孟什维克领导人尤·拉林(Iu Larin)反驳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必须与“其他的更加危险的工人阶级的敌人,即俄国专制主义”做斗争。引自 Braunthal,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p. 26 中的信件。

^③ Gay,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pp. 284—288.

^④ Walling, *Socialists*, p. 192.

^⑤ Braunthal,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p. 32。但是,被捕的一些左派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其审讯调查的压力下,后来宣布他们没有支持列宁提出的为国家失败而工作的指令。另见 Edward 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 1 (London: Macmillan, 1950), p. 67。

很多社会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意义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战略问题上发生了分裂。他们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和期间很多其他党的领袖一样,对本国的沙文主义、机会主义和其他错误而确定无疑地感到自责。他们力量太弱,无法压倒右翼军国主义力量。然而他们却有足够的力量对法国和英国抵制德国扩张计划的决心产生怀疑。在德国,他们有足够的影响力对威胁其他欧洲列强的军备竞赛产生怀疑。在欧洲各处,他们对本国政府为外国好战分子的宣传推波助澜的好战行为都进行了足够猛烈的攻击。^⑥

然而,如果我们认为8月4日的“背叛”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思想的背离则过于草率。马克思主义并未排除民族自卫,也没有要求要反对资产阶级政府所采纳的每一项政策。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决不等同于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掌握任何政权,无法防止战争。当其政府采纳了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的政策时,就和政府站到一起;当两者发生冲突时,马克思主义就应当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行事。

对于比利时、法国和英国这些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的社会党人来说,危机似乎很清楚。德奥的胜利意味着丧失民族自由,遭受更加反动和好战的容克资本主义的奴役。但对于德、奥、匈三国社会党人来说,被俄国打败同样意味着丧失民族自由,并遭受更加反动的沙皇压迫奴役。为此,他们都投票支持战争。

45

但马克思主义战略并不因此等同于新现实主义战略;民族主义也不因此压倒马克思主义。二者仅仅是相互关联。当二者发生冲突时,马克思主义者遵循马克思主义战略。1913年和1914年,俄、奥、德、匈各国社会党人都谴责了各自国家在巴尔干的帝国主义行径。1914年,塞尔维亚和俄国社会党人投票反对战争。对于这些遭受反动和侵略性国家压迫的社会党人来说,国家战败或许意味着社会主义解放。最终,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5年意识到俄国不可能取得胜利,本国政府误导了他们,在1914年采取的行动并非是防御性的之后,它开始转而反对战争,反对德国战争政策和战争拨款的票数越来越多。在这里,对社会党人的行为做社会主义的解释比做新现实主

^⑥ R. J. Crampton, "August Bebel and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History* 58 (June 1973): pp. 218—232.

义的解释更好。

驳斥新现实主义

正如这四个例子所揭示的,驳斥新现实主义的一个明显代价是无法节俭篇幅,或者说是增加了复杂性。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获得的不是一种总的理论,而是数种竞争性的总的理论;我们还认识到,结构现实主义并非根基强健,或可以节省篇幅,其合理性或许完全取决于其四个基本假定是否能站得住脚。但一套更加复杂的大战略政治决定因素所带来的价值绝非仅仅只是抵消了多增加的科学代价。

首先,在最低限度上,它为新现实主义的均势立论提供了背景。承认存在着没有采纳的多种选择道路突出了现实主义作为出发点的各种假定(即国家行动、单一理性决策、由安全和实力驱动的偏好)的意义。当我们采纳一种均势战略时,它为我们界定出我们做出某些选择或排除某些选择的性质。

其次,一个更加复杂的国际政治学模式有助于我们理解很多行为体所表达的价值和他们对如何做出决策的看法。我们对国际政治实践获得了更加丰富的描述性认知。

第三,意义更加重大的是,复杂的模式有助于我们解释国家行为所实际涉及的变量。一旦我们引进了更加复杂的政治取向意象所涉及的多种制约因素和理想—理性结构主义模式的多种单元体,我们便能够开启一种更接近于我们实际观察到的世界模式。我们需要复

46

杂性来解释杜霏克、斐迪南、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们是如何在国际战略中进行博弈的。

第四,最重要的是,如果说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复杂的国际政治学来理解世界政治的实际复杂性的话,那么我们还将需要一个在政治上更加复杂的大战略来取得世界政治的成功。如果我们假定杜霏克想要均势,那么那些理解他需要勾结的人将会失去他们本可以得到的机会;如果我们假定斐迪南会满足于均势,那些企图维护自身独立而免遭其帝国控制的人就会被误导;如果我们假定自由主义伙伴之间会受到均势的制约,那么投入国内福利或国际调节的资源就会浪

费；如果我们假定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是普通的民族主义者，合作的机会就会错过，或者，就会低估他们的团结。更丰富的大战略范围模式为那些想要增进自由和平或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它揭示了励精图治的国家形成战略的潜力和派别主义以及勾结行为的危险。

承认了政治选择的多样性，我们还有义务阐释清楚这样的问题：我们应当探讨关于谁是行为者的不同概念，它们持有怎样的价值，它们通过什么手段决策。我们可以通过弄清差异性所引起的不同来改善战略。

第三章

观念对大战略的影响

约翰·米勒

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观察道：“由于大部分社会科学家只关注于精确严谨，不满意于历史描述、归纳和解释的‘软性’，所以他们对观念的历史运动不屑一顾。结果是他们自己的理论无论多么‘严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并常常导致无知的缩减。”正如达尔所注意到的，既然信念和观念常常是“一个主要的独立变量”，那么要忽略观念、意识形态和态度的变革，就是置某些重要的东西于不顾。^①

本章追溯观念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安全问题的影响。首先，我要考虑对冷战后期做出的种种解释以及偶尔为它发出的悲叹。我坚信，主要竞争者的大战略和这一冲突的实质性形态及历史主要是由源自于国内政治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差异决定的，而不是由国际层次上的能力分配呈现出的结构性差异决定的。

然后，我提出，由于最近的历史经验，由于主要国家对应当如何在世界上表现自己发生了观念上的转变，所以现在该是对很多国际关系政策和理论讨论将其作为核心建构因素的诸如“稳定”、“系统改造”、“权势”和“无政府状态”进行重新检验的时候了。

48

冷战：两种解释模式



最近美国与苏联关系的变化使得我们能够对世界政治中的这一

^① Robert 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82—182, 188.

非凡事件做出的两种主要解释模式加以检验。其一是经典的冷战模式,它强调观念。它认为,冷战、主要竞争者的大战略以及战后国际政治的两极结构都源自于观念的竞争,源自于意识形态的冲突。另一种模式,即肯尼思·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模式,企图最大限度地贬低观念作为决定变量的影响。它认为,竞争、战略和结构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军事、经济和政治能力的分配方式。

经典的冷战模式

当一批布尔什维克分子在1917年革命之后建立起苏联时,他们确立了这样一种关键性的信念,即国际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是一种充满了罪恶的制度,必须用暴力将其从地球上清除。接受这一观念对国家大战略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用斯大林的话说,(苏联)国家为“在所有国家推翻帝国主义奠定了基础”,或者说“是为帝国主义的进一步瓦解提供了一个杠杆”。在这类问题上,斯大林常常引用列宁的话:“苏维埃共和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长期并存是无法想像的,最终总是要一个征服另一个。”与此同时,官方党史声称,它“确信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党的伟大事业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即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②。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1961年还兴致勃勃地确信:“历史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他将所说的“和平共处”界定为是“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侵略力量之间在世界舞台上激烈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一种形式。”^③

49

被苏联贴上“帝国主义”标签的任何国家自然会认为这种声明带有威胁性(尤其是当它们被喊出或许不止成千上万次之后),自然会在其大战略中注入这样一种观念:只要苏联人的头脑中仍然浸满了

^② Historicus (George Allen Morgan), “Stalin on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 27 (January 1949): pp. 198, 200, 203—204.

^③ G. R. Hudson, Richard Lowenthal, and Roderick MacFarguhar, eds., *The Sino-Soviet Dispute* (New York: Praeger, 1961), p. 214.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这样说道:“历史和未来都将站在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一边……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加速这一进程……世界上正在发生着一场决定谁将战胜谁的战斗……谈论意识形态妥协将是对我们党的首要原则的背叛。”(Strobe Talbott, ed.,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pp. 530—531) 赫鲁晓夫还说道,“不同政府体制之间的和平共处是可能的,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Edward Crankshaw and Strobe Talbott, eds., *Khrushchev Remember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0], p. 512.)

这样的看法,反对苏联就是至关重要的。按照经典的解释,正是从这一竞争中产生出了战后东西方之间的冷战。赞成经典冷战模式的人会同约翰·L.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的看法:“莫斯科承诺要在全世界推翻资本主义是自俄国革命后它与西方关系不稳定的主要因素。”^④

由于有着前所未有的军事能力的支持,苏联的威胁对西方人来说尤其感到不安。然而,尽管这种能力浓缩了帝国主义理念,但它并不能决定竞争的实质形态。一个在军事上能力不强的苏联应当不会惹起忧虑。但是,就像20世纪80年代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领导下的伊朗一样,它仍然被看做是一个对手。

按照这一理论,加剧冷战的苏联国内体制也不那么令人厌恶了。典型的“冷战勇士”约翰·F.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曾说道:“我们需要期待的基本变化并不一定是从共产主义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政府。问题是你们是让共产主义停留在一个国家还是让它传遍世界。如果苏联仅仅奉行民族共产主义,我们可以跟你们的政府做生意。”^⑤实际上,西方民主国家是能够与那些它们认为其国内体制令人发指,但对外却没有威胁性的国家达成协议,甚至是结成盟友的,如西班牙和葡萄牙。

50

结构现实主义模式

沃尔兹在形成其影响深远并受到广泛讨论的国际政治理论(通常被称为“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时,在很大程度上故意贬低了“意识形态、政府形式、和平性、好战性等等”属性。

^④ John Lewis Gaddis, “Was the Truman Doctrine a Real Turning Point?” *Foreign Affairs* 52 (January 1974): p. 388. 另一位分析家这样说道:“俄罗斯人和美国人及其盟友之间产生冲突的主要原因是苏联领导人的意识形态以及他们随后的无能,而不是他们不愿意与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做长期性的安排。1946年6月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Maxim Litvinov)就以其奇特而坦诚的方式指出:“麻烦的根本原因是这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理论,它认为共产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当问道如果西方对俄罗斯所有的外交政策目标都做出让步该会怎样时,利特维诺夫回答道:“那将导致西方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面临一系列新的要求。”见 Hugh Thomas, *Armed Truce: The Beginnings of the Cold War, 1945—1946* (New York: Atheneum, 1987), p. 548. 另见 John Lewis Gaddis,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ap. 2.

^⑤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43.

按照沃尔兹的观点,构成系统标志的主要是“能力分配”。国家的能力有所不同,从这些不同当中产生结构。^⑥

在沃尔兹看来,一个国家的能力包括“人口和领土规模、资源天赋、经济能力、军事实力、政治稳定和竞争力”^⑦。按照这些或多或少的所谓客观标准,战后时期两个国家的能力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强。沃尔兹从这一条件中引申出实质性的冲突:“美国是令苏联烦恼的危险,苏联是令美国烦恼的危险。因为每一方都能以其他国家无与伦比的方式摧毁另一方。”^⑧因此,它们之间的冷战“稳固地植根于战后国际政治结构当中,只要结构持续下去,冷战就永无休止”^⑨。

模式的检验

这两种模式都把战后世界的特征看做是“两极格局”。沃尔兹把它看做是能力分配的结果;而经典的冷理论者则认为,两极格局是受国内意识形态决定的结果,不是能力分配的结果:美国把苏联看做是“令人烦恼的危险”,这不仅只是因为苏联政权挥舞着大规模的武器,或因为它在地球表面占有广阔的空间,而是因为苏联奉行的意识形态对美国人民构成了威胁。

51

20世纪80年代冷战的变化对这些模式做出了最大的检验。但是结构现实主义方法存在的问题在此之前就已突显出来。比如让我们考虑一下下面这个朴素的思想实验。假如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政权在1945年被推翻,代之以一个由有着完全不同观念的人(或许由一个与温斯顿·丘吉尔、托马斯·杰斐逊、甘地、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或者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有着同样观念的人)统治的政权;此外,假如这个假定的国家像斯大林的国家一样有能力,即同样大,天赋资源充足,军事强大,政治稳定和具有竞争力,那么尽管它有能力

^⑥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 98.

^⑦ Ibid., p. 131.

^⑧ Ibid., p. 170.

^⑨ Kenneth Waltz, “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8 (Spring 1988): p. 628.

像斯大林的苏联一样有效地摧毁西方,但似乎很难想像这个臆想中的国家会构成这种令人烦恼的危险,或战后国际政治会呈现出类似于实际发生的那种对立的两极形态。^⑩实际上,美国和一个自由的莫斯科政权完全有可能采取这样一种大战略:它把英国和其他重要的民主国家联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共同应付世界问题,尤其是涉及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合作联盟(Consortium)。换句话说,联合国宪章中体现的设计理念就会或多或少地按照其理想主义的缔造者们所希望的方式很好地发挥作用。

在冷战时期的另一对重要抗争,即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美国和中国之间出现的相互敌视和畏惧当中,能力似乎也很难说是其形成的主要因素。在这段时间内,中国摧毁美国的能力远不如准备了核武器的英国。然而英国是美国的盟友,而中国却是敌人。反之,假如英国在1965年变成了共产主义国家,那么它突然间对美国就构成了令人烦恼的危险,这种危险丝毫不亚于甚至会超过中国带来的危险。造成冲突的主要根源似乎是国内政治中所阐明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而不是能力。^⑪

52

然而,对这两种模式的真正检验是20世纪80年代末。沃尔兹所列举的能力范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苏联没有变小;其天赋资源依旧;其经济规模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之一;其巨大的军事和核力量丝毫未减;尽管不像过去那样稳定,但其政治依然稳固并具有竞争力。尽管在经济领域有日本和西欧国家急赶直追,但美国和苏联在沃尔兹所定的能力标准方面远远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强。如果像沃尔兹所坚持的那样,认为冷战“稳固地植根于”由能力分配决定的结构之中,那么各方都应当继续“集中各种恐惧于对方,怀疑它的动机,

^⑩ 实际上,正如 Carl Kaysen 所分析的,由于军备竞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意识形态冲突驱动的,所以美国和苏联如果有着和谐的意识形态,其军事能力有可能就不会超出其他国家如此之悬殊。总是来看,军事能力似乎是关系紧张的手段,而不是原因。另见 John Mueller, "Taking Peace Seriously: Two Proposals," in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ed. Robert Jervis and Seweryn Bailer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62—275。

^⑪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苏联与中国之间发生的分裂似乎主要也是由观念和意识形态争论决定的,而不是由能力差异或其他权力政治考虑决定的。从经济和军事角度看,这种分裂没有客观意义。尤其是对中国来说,它失去了经济援助、贸易和军事保护。对此问题的讨论见 Mueller, *Retreat from Doomsday: 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 pp. 133—151, 163—165。

把进攻的意图说成是防御措施。”^⑫

53

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苏联放弃了它的威胁性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使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它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爆发革命的强烈爱好受挫了数十年之后,在意识形态上终于再也站不住脚了。它对革命和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战争”所怀有的令人肃然起敬和发自肺腑的深厚感情甚至在嘴皮子上也不再那么令人鼓舞了。正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观察的那样:“意识形态在界定苏联外交政策目标和为扩张提供政治工具中的作用在战后时期逐渐衰退”,戈尔巴乔夫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衰退。^⑬到1988年苏联承认,“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这一命题是不恰当的”,开始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或“社会主义民族共同体”来取代“社会主义阵营”^⑭。克里姆林宫的主要理论家明确抛弃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正在展开一场世界性的斗争这一概念。^⑮在1988年12月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戈尔巴乔夫特别号召“国家之间的联系应当非意识形态化”。尽管依旧把俄罗斯的共产主义革命说成是“最珍贵的精神遗产”,但却宣称“今天我们面对着一个不同的世界,我们必须寻求走向未来的不同道路”。最令人难忘的是,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2月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话,履行了从阿富汗撤出苏联军队的诺言。^⑯

随着这些变化(在东欧的苏联帝国解体以前,以及苏联自身分裂之前,这些变化就早已发生了),世界政治结构发生了深远的变革:冷战和两极体制消失,双方都开始改变自己的大战略。《纽约时报》在1989年4月2日宣称,冷战已经结束。此年早些时候,甚至连坚定的

^⑫ Waltz, “Origins of War,” p. 628.

^⑬ Francis Fukuyama, “Patterns of Soviet Third World Policy,” *Problems of Communism* 36 September—October, 1987, p. 12.

^⑭ David Binder, “Soviet and Allies Shift on Doctrine,” *New York Times*, May 25, 1988, p. A13.

^⑮ Dill Keller, “New Soviet Ideologist Rejects Idea of World Struggle against Wes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 1988, p. A1.

^⑯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8, 1988, p. A16; also December 9, 1988, p. A18. 探讨苏联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热情走向衰退和提出这一衰退“将最终导致冷战的结束”,“我们或许已经走到了我们所知道的世界的尽头”的有关分析,见 John Mueller “Containment and the Decline of the Soviet Empire: Some Tentative Reflections on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aheim, California, March 25—29, 1986. 另见 Mueller, *Retreat from Doomsday*, chaps. 5—9; and Mueller, “Enough Rope: The Cold War Was Lost, Not Won,” *New Republic*, July 3, 1989, pp. 14—16.

反共评论家们也最终认可：冷战确实“即将结束……苏联领导人出于各种动机和意图而放弃了意识形态斗争……（他们）不再坚持国际阶级斗争的基本学说，这一学说是引起冷战的罪魁祸首。”^{①⑦}

苏联不再强调两极格局，不再继续担心美国，而是开始调整大战略。早在1987年苏联就提议，美国和苏联应当沿着半个世纪之前联合国宪章所设想的路线携手进行国际合作。^{①⑧} 美国和苏联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再次成为盟友的可能性似乎也是存在的。1988年，罗纳德·里根在其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早在东欧变革之前）上被特意问到了这一问题，他实质上是以肯定的口吻做了回答，并强调了竞争的意识形态性质：“如果确实能断定他们不再奉行贯穿于共产主义革命当中的扩张性政策，不再坚持必须建立单一共产主义世界的目标，（那么），他们或许会希望加入民族大家庭，希望带来或者是建立和平。”^{①⑨} 六个月之后（仍在东欧变革之前），他的继任者乔治·布什已经没有了里根的那种踌躇性，督促西方应当改变大战略，“超越遏制”而“将苏联融入国际社会当中”，不再把它看做“邪恶帝国”^{②⑩}。

因此，冷战解体的关键因素在于观念的变化。物质因素或许助长了这些变革：苏联经济管理体制的失败显然激励了戈尔巴乔夫和其他一些人对其基本的意识形态做出反思。^{②⑪} 但物质变化并不能持续性地推动观念、意识形态或大战略的变革。面对同样的经济压力，除了戈尔巴乔夫之外的其他苏联领导人或许不会愿意放弃基本的意

^{①⑦} Owen Harries, "Is the Cold War Really Over?" *National Review*, November 10, 1989, pp. 40—45.

^{①⑧} Paul Lewis, "New Soviet Interest in U. N. Broaden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5, 1987, p. A8; Lewis, "Greater U. N. Role Urged by Sovie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5, 1989, p. A20; Bill Keller, "Russians Urging U. N. Be Greater Power,"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 1987, p. A1.

^{①⑨}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9, 1988, p. A18. 显然，里根将这一发展与苏联扩张性的威胁联系到一起，而不是与苏联国内体制的改革联系到一起。也就是说，合作甚至是联盟并不取决于苏联国内改革的进展。如同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或1949年之后的南斯拉夫一样，只要苏联继续放弃其扩张性和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它就能够被西方所接受。没有自由但却不对外扩张的葡萄牙毕竟是北约的创始国。关于东西方联盟的可能性，见 Mueller, "A New Concert of Europe," and Mueller, "Taking Peace Seriously: Two Proposals."

^{②⑩} *New York Times*, May 25, 1989, p. A8. 对此加以检验的另一种方式是假设苏联的能力大幅度衰落，而推翻国际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追求依然不变，换句话说，假定苏联呈现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的特征，那将会出现怎样的结果？西方或许会不再过于担心竞争引起大战，但其敌视态度仍将不减。冷战将继续。

^{②⑪} Mueller, "Containment and the Decline of the Soviet Empire"; Mueller, *Retreat from Doomsday*; Mueller, "Enough Rope"; Mueller, "Taking Peace Seriously."

识形态。在这方面,回顾一下曾流行一时的“富饶共产主义”理论(fat Communist)或许有用。这一理论煞有介事地提出,当苏联在物质上丰饶之后,它的外交政策也将柔和起来。赞成这一理论的人担心,经济上陷入困境的苏联会像1941年日本一样,在绝望中开始发作。经济决定论对此安然地确信无疑。经济因素被看做是关键的影响变量,而不管财富带来的是满足还是傲慢的扩张,也不管贫穷带来的是投降还是绝望的冒险。

55

另外两个思想实验或许会清楚表明,对冷战结束和随后的大战略变革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意识形态变化,而不是经济的变化。首先,一方面,假定是持续性的物质失败导致了苏联像奥斯曼帝国那样的渐渐衰落,但其推翻国际资本主义的追求依然不减;换句话说,假定苏联呈现出20世纪50和60年代中国那样的特征,或者是苏联在20世纪40或30年代的特征(如果1991年8月强硬派推翻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政变取得成功,这样的状况是有可能出现的),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或许不再过于担心竞争引起大战,但其敌视态度仍将持续。也就是说,美国仍将会把苏联看做是“令人烦恼的危险”,冷战仍将盛行。其次,在另一方面,假定苏联没有陷入物质停滞或衰落,但其领导人的意识形态转向了民主自由主义,或者是转向了缅甸式的(Burma-style)孤立和仇外,那样的话,冷战将会消退。

核心建构要素的再检验

冷战的兴起是因为受国内因素决定的观念冲突。它的解体主要也是源自于这些观念的重要变革,而不是源自于国际能力分配的重大变化。这一非凡的转变反过来又有助于国家重新塑造其国际事务观念,并深远地改变其大战略。为此,现在或许该是考虑彻底改造(甚或是放弃)很多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学派作为核心内容的一些建构要素——稳定、系统改造、权势和无政府状态——的时候了。

冷战的解体表明,沃尔兹的稳定概念应当重新受到检验。按照沃尔兹的观点,决定系统稳定的不是因为避免了战争,而是因为“构

成系统的各方主要的数量没有发生能够影响结果的变化”。他认为，两极格局比多极格局更加稳定，因为主要参与者之间的不确定性较小，还因为对核武器的担心更加强了这种稳定。^②（这一比较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正如他所注意到的，多极格局持续了数个世纪。因此，按照这一定义也是稳定的。）

然而，如果意识形态是决定战后国际政治两极结构的主导力量，那么按照沃尔兹的定义，该系统就是相当不稳定的。尽管能力分配和受此决定的国家在沃尔兹的国际体系中的位置不可能很快发生变化，但是当新的领导人上台或旧的领导人内心世界发生变化时，其意识形态便能迅速改变。这便能导致两极格局让位于其他结构形式。

现实主义学派的另外一个建构因素是战争和系统转换。在肯尼思·奥干斯基(Kenneth Organski)和亚采克·库格勒(Jacek Kugler)看来，系统转换或霸权战争是由那些企图“重新制定国家间关系运作规则”的国家发起的。^③在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看来，这样的战争在历史上是“世界政治系统变革的基本机制”^④。它们重新调整了“系统基本单元”的秩序，“重新确立了清晰的声望排序”，决定了“谁将主导国际体系，新的国际秩序将主要服务于谁的利益”。它们导致了“领土在系统内国家之间的重新分配，确立了一套新的系统规则，重新调整了国际劳动分工等等”。其结果是，“在新国际权力分配现实基础上创建了一个相对更加稳定的国际秩序和更加有效的国际治理体系”^⑤。

布鲁斯·布埃诺·德梅斯基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认为，甚至连小规模战争，如1866年的普奥战争，有时也能产生这样的效果。^⑥然而，1989年至1991年的经历表明，实际上根本不需要战争。系统能

^②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 8; Waltz, “Origins of War”; Waltz, “Nuclear Myths and Political Real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 (September 1990): pp. 731—745.

^③ A. F.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 23.

^④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09.

^⑤ Ibid., p. 198. 在沃尔兹看来，系统似乎是通过大战来改变的。或者在两极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如果能够成功地建立起霸权，或成功地“通过促进中等国家的联合来扩大大国的范围”（比如像西欧），也能够使系统改变。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99. 另见 Gilpin, *War and Change*, pp. 242—244.

^⑥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Pride of Place: The Origins of German Hegemony,” *World Politics* 43 (October 1990): pp. 28—52.

够通过国内变革造成的观念变化发生转换。也就是说,1989年至1991年间的世界经历发挥了系统转换或霸权战争相同的功能。^②

苏联放弃其威胁性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之后,国际关系的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完全符合吉尔平关于系统的基本构成单位被重新排序的分析。例如,领土做了重要调整(尤其在欧洲);联盟分裂;声望和地位排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一套新的规则和惯例;调整了劳动分工;出现了国际体系管理的新程序;军备竞赛减弱。^③

所谓转换,是指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所说的从一个“松散的两极体制”转向一个“全球性的国际体制”。根据卡普兰的规则,在前一个体制中,两个集团都企图“消灭对方集团”,“增强自己相对于对方集团的能力”,阻挠“而不是允许对方集团获得优势力量”,并“努力扩大本集团的成员”。在后一个体制中,主要国家“使用和平手段达到其目的”,“不诉诸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努力增加国际体系的资源和生产基础”。^④

从实质上看,这是一个主要国家间从零和局势向正和局势的转变。正如一位重要的苏联官员在1987年所表白的:“先前我们考虑,对手越糟,对我们越好……但现在不是这样了……欧洲世界的经济发展情况越好,稳定程度就越高,我们的发展前景就越好。”^⑤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转换,它的到来是因为观念发生了变化。正如实际发生的那样,不需要战争。

权势的概念一直是很多国际事务和大战略理论中的核心,尤其是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在1948年庄严地宣布“国际政治如同所有政治一样,就是为权势而斗争”^⑥之后。

^② 另见 John Mueller, “Quiet Cataclysm: Some Afterthoughts about World War III,” in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ts Meaning and Implications*, ed. Michael J. Hog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62—275.

^③ 关于最后一个现象,见 Mueller, “A New Concert of Europe,” and “Taking Peace Seriously.”

^④ Morton A.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Wiley, 1957), pp. 38, 47.

^⑤ Jack Snyder, “The Gorbachev Revolution: The Waning of Soviet Expansion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 (Summer 1987/1988): p. 115.

^⑥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1948), p. 13.

摩根索将“权势”定义为“人对其他人心理和行动的控制”^②，而沃尔兹提供的是“一个行为者影响其他人的能力大于其他人影响他自己的能力这一古老而简单的概念”^③。在英语中，有些词汇能够以更加贴切和少一些含混不清的方式表达出这些定义的含义：影响、控制、地位、声望、重要性。既然这些词汇更加精确，应当首选它们：“权势”一词根本不需要。^④更重要的是“权势”一词在国际背景中不得不让人理解为军事实力。摩根索和沃尔兹将二者非常明确地联系起来。摩根索不惜口沫地宣称：“国家权势对军备的依赖再明显不过了，无需做太多的解释。”^⑤沃尔兹观察道：由于美国“能力”的“分量”，“美国的行动有着巨大的影响。”^⑥根据这些思想模式，一个解除武装的国家能够拥有强大的“权势”是完全无法想像的。^⑦ 罗伯特·阿

②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1948), p. 13.

③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92.

④ 另见 William H. Riker, "Some Ambiguities in the Notion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s Science Review* 58 (June 1964): pp. 341—349.

⑤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p. 183.

⑥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92.

⑦ 对权势和军事考虑的强调还能导致这样一种结论：“战争是正常的”（Waltz, "Origins of War," p. 62）。如果人们仅仅集中于某些大国，然后开始将大国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为是一个趋于经常卷入战争的国家，那很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战争参与是“强大”含义的一个重要界定成分，这一概念清楚地表现在一个世纪之前的美国案例中。尽管当时美国在经济上的发达程度超过英国之外的任何其他大国，并在其最近的内战中显示出它很容易就能建立起一支超过 100 万人的军队，但是直到 20 世纪它卷入了欧洲的几场战争之后，分析家们才承认美国已属于大国的行列之中。在这个世纪，日本理所当然地被看做是大国，直到 1945 年它战败，被占领和解除武装，从此也就不再属于大国行列。（见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62 中的表格）。将强大与战争相联系得到了沃尔兹的认可。但他认为，国家不是部分地因为它们参与了战争才被分析家们看做是强大，而是因为他们强大才必须加入战争。他提出，大国会“寻找各种方式使用武力”。此外，“它们卷入战争是源自于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不是源自于其国家的特征。当它们处于顶端时，它们打仗。当它们衰落时，就变得和平”。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187.

当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美国和苏联设法避免爆发相互间的战争时，将战争与强大轻巧地连接就会令人迷惑不解。沃尔兹对这一奇特条件的解释是，由于核武器的存在才“排除了战争在国际政治中的核心地位”。Waltz, "Origins of War," p. 627. 他发现，单独的两极格局不足以解释“长久和平”，还需要有“其他维护和平的伟大力量：核武器”。Ibid., p. 624；另见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p. 176. 不考虑这样的可能性，即两个典型的大国或许会从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非核）经历中得出结论认为，这种冒险过于痛苦。因为这将表明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改变了自己“国家的特征”。沃尔兹特意排除了这种现象。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87n. 依此预料，美国和苏联在正常的大国本能驱使下到现在该早已打起来了，尽管最令它们担心的是不要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规模。大国显然长于本能，而短于头脑。关于这一问题，见 John Mueller, "The Essential Irrelevance of Nuclear Weap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3 (Fall 1988): pp. 55—79.

特(Robert Art)和沃尔兹得出结论说,“一个国家根本意图的严肃性从根本上来说体现为它拥有一个可靠的军事态势,没有它,一个国家的外交通常缺少效率。”^③

但是,当我们说一个国家具有权势,而实质上是指影响和地位时,那么日本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碰巧日本目前有相当多数量的自卫队。但并不是出于对自卫队的敬畏才使日本在世界事务中变得重要,或者是用沃尔兹的话说,使它能够“搭建起其他国家行动的舞台”。如果以微弱的军事能力或准备程度就能获得影响、控制、地位、声望或重要性这类意义上的权势,那么不可回避地附着着军事含义的“权势”一词充其量也就成了误导性的。

此外,将“权势”概念(无论其如何界定)置于处理国际事务建构要素的核心是否明智,这一点越来越受到质疑。这一见解总是存在着问题。如果全部政治就是“为权势而斗争”,或者说国家为“追求权势”而消耗,那么美国历史中其很多国际行为就无法描述了。如果权势仅仅意味着贪得无厌地争夺在大国社会中(the councils of the big people)的影响的话,那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及其之后二十年的很多时间内,美国似乎很难说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权势追求大国。按照那样的理解,美国常常采取的战略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厌恶权势。

在最近的后冷战时期,我们的前进方向似乎表明,关于权势的经典观念越来越成为一种时代错误。利奥·托尔斯泰(Leo Tolstoy)在1869年的《战争与和平》中观察道:“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国家和民族在战争当中表达了它们相互冲突中的外部活动。战争胜败的直接结果是国家和民族的力量得到增强或遭到削弱。”^④一百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上次战争的战败大国日本和德国仍然享有着强大的“政治力量”。正如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所指出的,“不仅条件可以变化,集体理念也可以变化。”^④

^③ Robert J. Art and Kenneth N. Waltz, “Technology, Strategy, and the Uses of Force,” in *The Use of Forc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ed. Robert J. Art and Kenneth N. Waltz, 2d ed.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3), p. 7.

^④ Leo Tolstoy, *War and Peace* (New York: Norton, 1966), p. 1145.

^④ Paul W. Schroeder, “The Neo-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 Historian’s View,” presented at AAAS/University of Rochester Conference, Rochester, New York, October 19–20, 1990. 另见 Evan Luard, *War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这并不意味着冲突将会消失,而是说重要的发达国家不再用战争和军事力量来解决它们的冲突。比如,美国和日本曾经就谁来管理冲绳领土而产生分歧。这正是过去常常引起战争的争议。该问题没有通过战争或威胁使用武力就得到了解决,双方达成了交易。目前,关于北方四岛的类似讨论正在进行当中。日本认为,1945年苏联将其不公正地占为已有。为了收回这些岛屿,日本正在使用其经济实力而不是军事威胁来操纵人们所说的权势游戏。最为壮观的是,1989年和1990年世界大国未放一枪就解决了最为紧迫的国际分歧,其中包括德国的分裂问题。

不妨将这一观点极端化。实际上,如果说我们正进入一个经济动机已成为大战略的首要考虑,军事力量不再被看做是追逐财富的手段的时代的话,那么不仅是有着军事含义的“权势”已经过时,而且表现为影响或地位含义的“权势”也已过时。原则上说,纯粹的经济行为体并不在乎影响或声望。他们关注的是致富。(应当承认,正如日本所发现的那样,影响、地位和声望往往随着财富的积累而增长,但这只是一个附属性的效果。)假如一家公司的总裁要从两个故事中选出一个告诉股民:一个说,“我们在本产业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声望和影响,当我们讲话时,每个人都会听。但我们的利润是零”;另一个说,“本产业中没人会关注我们丝毫,或征询我们的建议。实际上我们在商业上是被人取笑的对象,我们只是在大把地赚钱。”毫无疑问,谁都知道哪个故事更能打动股民的心。^①

另外一个值得重新思考的概念是无政府状态。如果主要国家现在接受经济发展是一个主要的大战略目标这一思想,或者如果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战争是它们之间解决问题的明智手段的观念,那么世界各国生活在一个“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见解就成了高度误导性的,它会鼓励决策朝着人们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

当然,从技术角度看,该词是准确的:不存在能有效管理世界各国行为的国际性政府。正如沃尔兹所表述的,它是一种“自助”的条件。“无政府”一词的问题在于它无法摆脱的内涵:它包含着混乱、无法无天、没有秩序、迷惑或滥施暴力。如果将国际局势的特征归纳为

^① 关于这类问题,还可见 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无调节”(unregulated)将同样精确。该词的内涵大为不同,或许更加有益。^②

沃尔兹提出,“那些关系没有得到调节的相互依存的国家必定经历冲突,偶尔还会陷入暴力”^③。现实主义理论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提出,在无政府条件下,“国家间很少有信任的空间”,“安全常常稀缺”^④。就算这一观点是看待国际政治的一种有用方式,但它也仅仅是认为只有在普遍接受了这种看法的条件下暴力才是打交道的一种合适的和有用的方式。如果这种看法不再流行,那么调节就不再需要,无政府就将成为一种合乎需要的状态。这也表明,导致政治观念变化的国内变革对国际行为的影响远比国际军事能力分配的变化更加重要。

62

^② 关于这一问题,还可见 Helen Milner, “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qu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7 (1991): pp. 67—85; 但可以比较 Richard Rosecrance, “A new Concert of powers,” *Foreign Affairs* 71 (Spring 1992): pp. 64—82。

^③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38. Or: “With many sovereign states, with no system of law enforceable among them, with each state judging its grievances and ambitions according to the dictates of its own reason or desire—conflict, sometimes leading to war, is bound to occur,”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p. 159.

^④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 (Summer 1990): pp. 12, 45; 另见 Art and Waltz, *The Use of Force*, pp. 3—6。

第二部分

实

践

第四章

英德海军竞赛与宪法“适应性”比较

戴维·德乌戈、罗纳德·罗戈夫斯基

对大战略的大部分讨论都集中于经济与军事力量之间的联系。我们这里查阅的案例则表明,我们称之为的“宪法适应性”(constitutional fitness,这里借用了生物学的用语,即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构成对一种最理想的军事实力投射的支持程度)具有同样的或者是更高的重要意义。尽管新现实主义让我们调查“第三意象”(third image),或者说国际体制来解释大战略政策,但在这里,我们却在国内状况性质的“第二意象”(second image)中发现了它。简言之,我们将探讨下列反论: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至1914年间的经济增长远比英国更令人瞩目,其1914年的钢产量几乎等同于欧洲的其他国家的总和,它的军事组织和计划被公认为是世界之最,然而,在两个至关紧要的方面——形成合理的大战略和挖掘社会资源用于军事目的——德国被证明无法与英国进行有效的竞争。简单说,德国规划得不良,征税太少。一方面,它发动了大战;另一方面,它武装得太差,无法打赢这场战争。^①两次失败都不是源于经济或军事组织薄弱,而是源于过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英国更成功地进行了现代化。尽管其经济上贫血,但在战略上更胜一筹。

我们探讨这一论点的具体领域是得到广泛研究的1897年(德国通过第一部海军法)至1914年间的英德海军竞赛。在先前学者讨论的这一时期的诸多问题当中,我们将把我们自己的讨论限定在两个方面:(1)概括地说,造成德国战略发生戏剧性变化,并引起英国做出反应,从而激发了海军竞赛的原因是什么;(2)德国方面出现了怎样的财政制约因素,最终削减了海军开支,并决定了竞赛的结局。

在1892年至1907年间,德意志帝国发生了近代欧洲最具戏剧性

65

^① 必须强调的是,威廉时期的德国在行使军事权势时不仅仅只是受到国内的“制约”,更要紧的是,德国各个机构不明智地主张过度武装和愚蠢的外交政策。我们将就此做出探讨。

的大战略变化：从陆地强国转向海洋强国，尽管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在其执政后期对帝国主义只是抱着浅尝辄止的态度，但他却将第二帝国坚定地定位在了陆地大国的方向上。德国海军战舰全部有效编制在1874年至1883年间只是略有增加。直到1892年，几乎仍旧停留在不到9万吨排水量的超低水平，少于意大利或俄罗斯，约是法国水平的三分之一，英国的六分之一（见图4.1）。从1893年开始，德国海军力量开始缓慢增长。到1897年阿乐费雷德·冯·蒂尔皮茨将军（Admiral Alfred von Tirpitz）的第一部海军法的实施，总排水吨位达到了18万吨，使德国处在了与意大利、俄罗斯和美国同样的水平点，但其能力仍不足法国的一半和英国的五分之一。

1897年之后，德国的海军吨位稳步加速，1905年增加两倍，1909年增加三倍，1913年底增加4倍，达到90万吨排水量。德国在1900年超过意大利，1904年超过俄罗斯，1909年超过法国，1912年超过仍在快速增长的美国，在1914年成为世界上第二大海军强国，尽管总吨位只相当于英国的七分之三（见图4.2）。^②

如果人们只是考察新战舰的建造，德国的记录更令人瞩目（见图4.3）。^③ 在初期的1897年，每年只预算6艘战舰，到了后期的1914年，帝国每年签订的战舰合同不少于45艘。年增长率接近12%。让那些主张德国海军赶上英国的人感到不安的是，德国建造新战舰的速度仅略微超过英国的一半（每年85艘）。以这一速度，德国在不定的将来不但远远赶不上英国，而且注定只能达到英国海军力量的一半。大概这也是英国“双倍标准”（two-power standard）政策的意图所在。

诚然，在至关重要的无畏战舰（Dreadnoughts，英国于1905年生产出的一种新的高性能级别战舰）方面，德国利用其格申克龙（Gerschenkron）所说的“后发优势”进行了有效的竞争。德国在1909年建成下水了第一艘无畏战舰，而此时英国已经有了5艘。德国在1911年达到了英国力量的一半，即7艘战舰对英国的13艘。到1914年达到了英国水平的三分之二，即19艘对30艘（见图4.4）。^④

② Jürgen Rohwer, "Kriegsschiffbau und Flottengesetze um die Jahrhundertwende," in *Marine und Marinepolitik im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871—1914*, ed. Herbert Schottelius and Wilhelm Deist (Düsseldorf: Droste Verlag, 1972), pp. 216, 219.

③ Ibid., p. 224.

④ Ibid., p. 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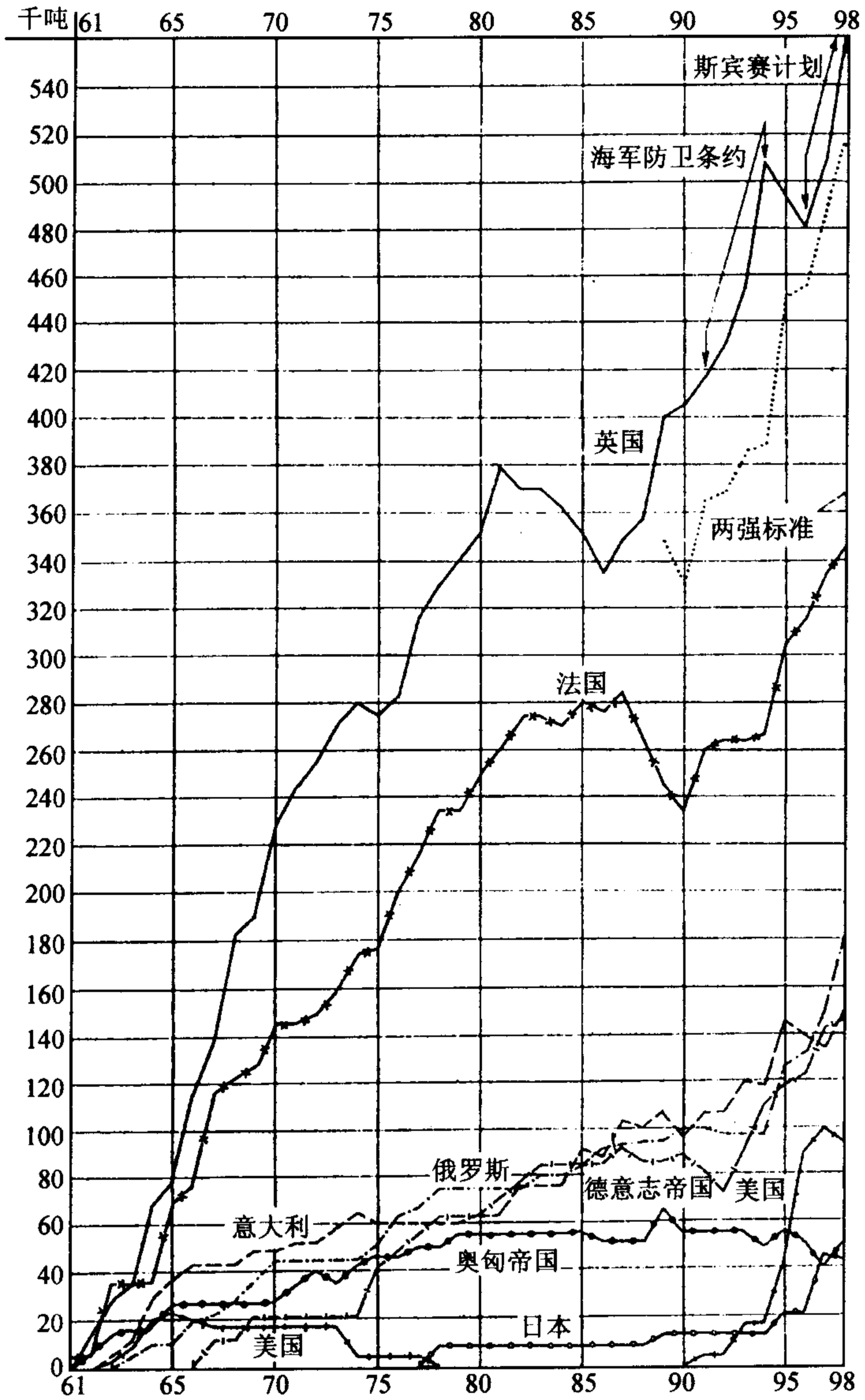


图 4.1 1861 年至 1898 年大国舰队战舰吨位

(2000 吨位以上下水不超过 25 年的武装舰只和巡洋舰)

资料来源: From Jürgen Rohwer, "Kriegsschiffbau und Flottengesetze um die Jahrhundertwende," in *Marine und Marinepolitik im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871—1914*, ed. Herbert Schottelius and Wilhelm Deist (Düsseldorf: Droste Verlag, 1972)。经出版商同意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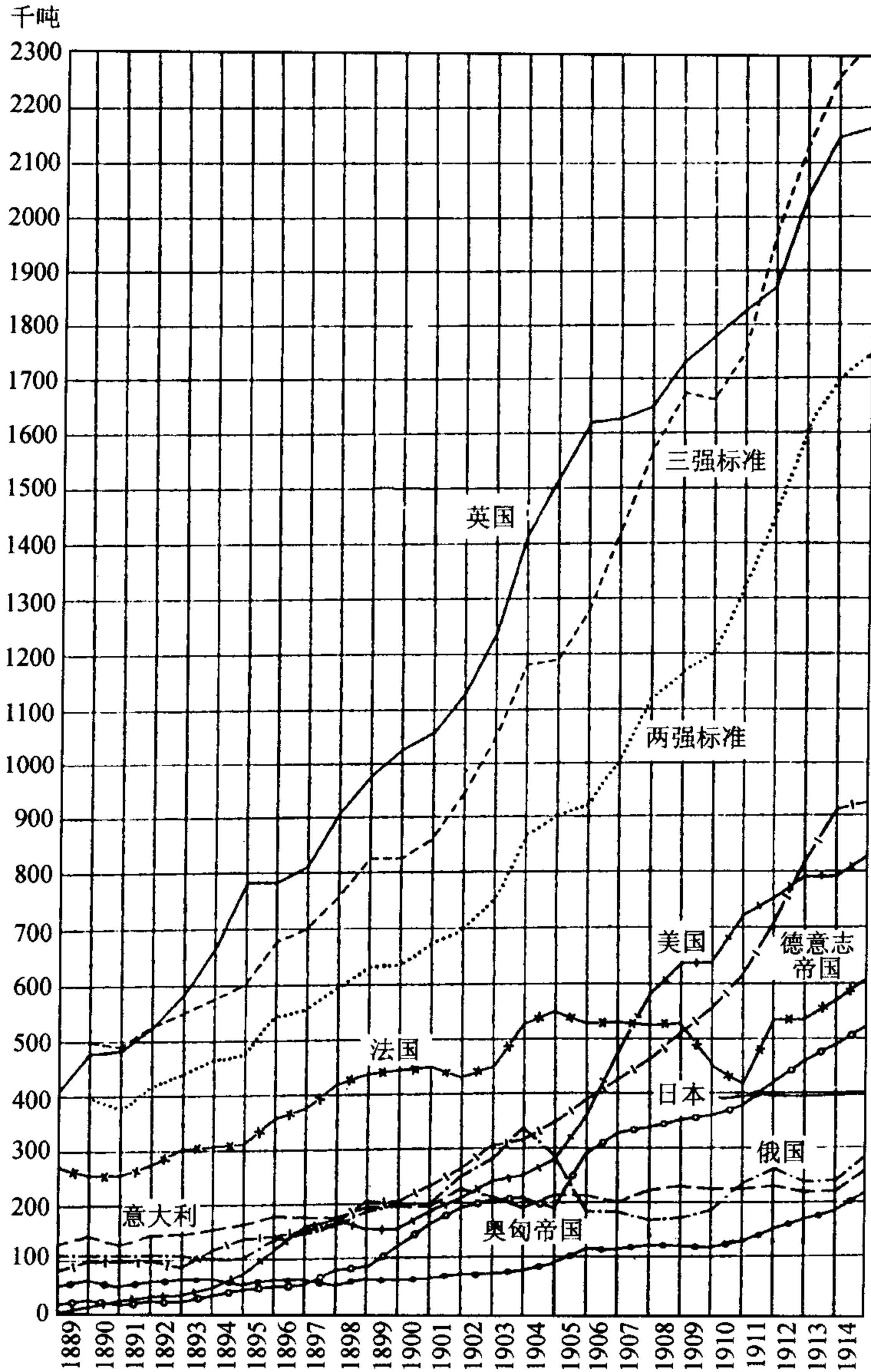


图 4.2 大国战舰吨位, 1889 年 1 月 1 日至 1914 年 8 月 1 日

(下水不超过 25 年的战舰和装甲舰, 下水不到 20 年的装甲巡洋舰和护卫舰)

资料来源: From Jürgen Rohwer, "Kriegsschiffbau und Flottengesetze um die Jahrhundertwende," in *Marine und Marinepolitik im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871—1914*, ed. Herbert Schottelius and Wilhelm Deist (Düsseldorf: Droste Verlag, 1972)。经出版商同意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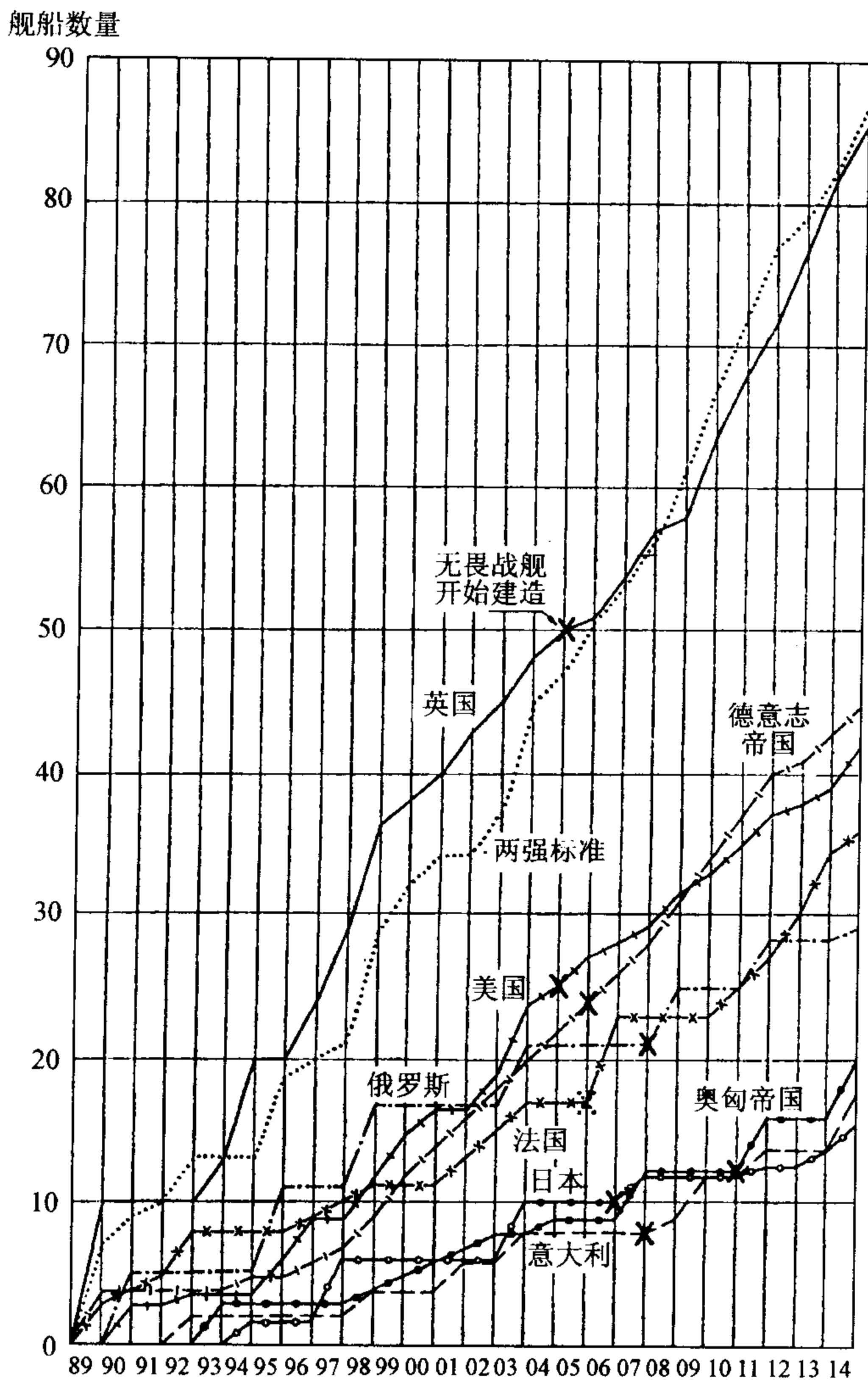


图 4.3 大国战舰建造, 1889—1914 年 (预算)

资料来源: From Jürgen Rohwer, "Kriegsschiffbau und Flottengesetze um die Jahrhundertwende," in *Marine und Marinepolitik im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871—1914*, ed. Herbert Schottelius and Wilhelm Deist (Düsseldorf: Droste Verlag, 1972)。经出版商同意使用。

舰船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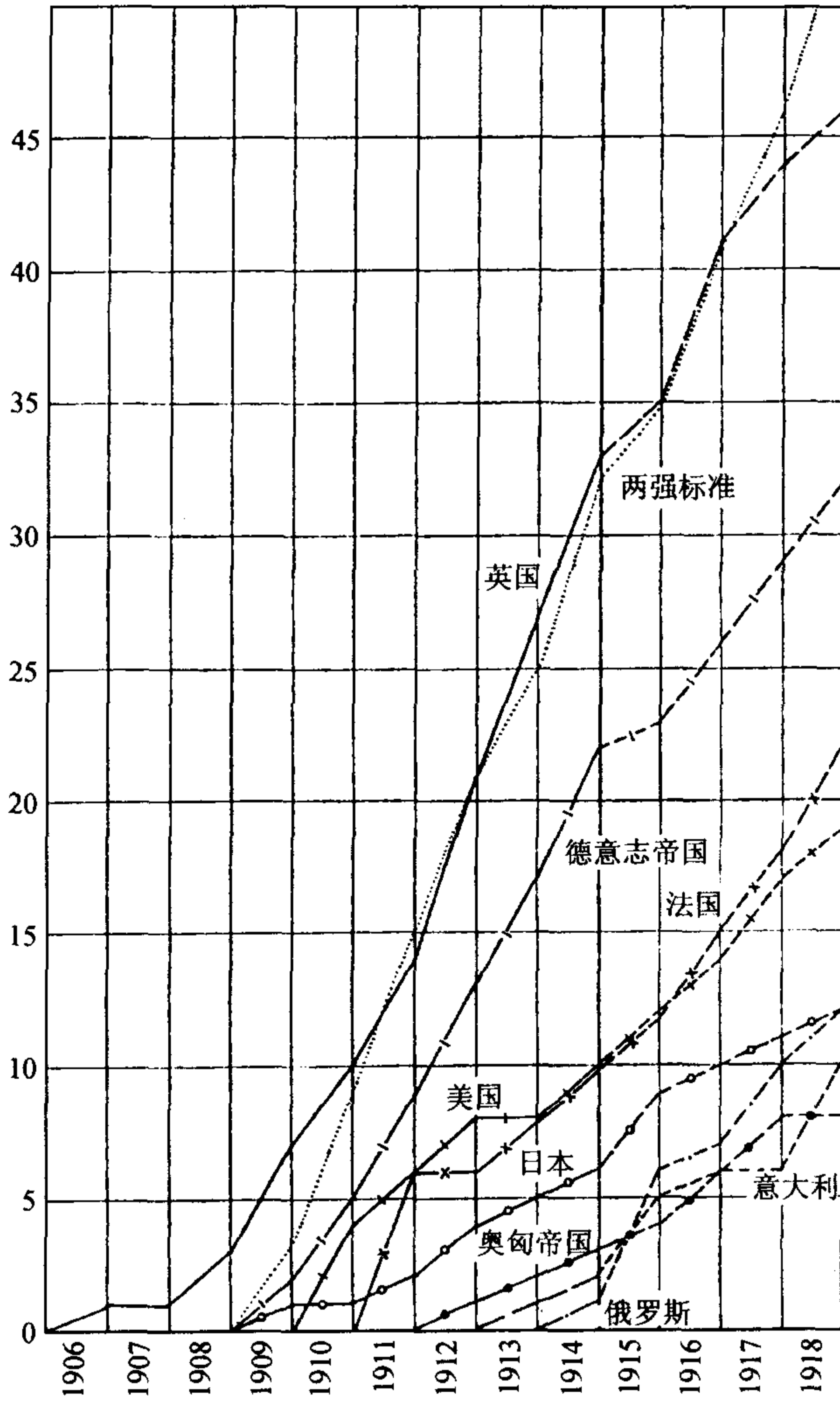


图 4.4 大国无畏战艦

资料来源：From Jürgen Rohwer, "Kriegsschiffbau und Flottengesetze um die Jahrhundertwende," in *Marine und Marinepolitik im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871—1914*, ed. Herbert Schottelius and Wilhelm Deist (Düsseldorf: Droste Verlag, 1972)。经出版商同意使用。

然而,从某种重要意义上来说,德国实际上已经输掉了争夺海军主导权的竞赛。早在1914年8月战争爆发的头两年之前,它就已经投降了。在英国继续慷慨地拨款用于海军建设时(1913年英国的海军支出是5100万英镑,而德国是2400万英镑),德国大量的政府赤字和日益增加的重大土地冲突危险迫使甚至像德国皇帝这样无与伦比的海军热衷者也于1911年12月大幅度削减了海军支出。^⑤ 海军占军队支出的比例曾从1907年之前的不到20%逐步增加到1911年的55%,而现在,1912年降到49%,1913年降到33%。^⑥ 即便如此,在很多德国领导人看来,在国际环境日益紧张的情况下,由于财政紧缺而未能进一步扩军似乎是鲁莽的。^⑦

这一财政失败在起初很难理解。1911年德国中央政府的税收相当于净国民产值(NNP)的3.5%。1898年是2.75%。而在英国,1911年中央政府的税收几乎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GNP)的7.5%,1898年是约6.5%。^⑧ 应当承认,英国是统一的国家,德国是联邦制国家,因此前者的中央政府能够有更多作为。然而,对全部政府开支的最佳估计表明,1898年英国强加的总负担比德国要重40%,1911年比德国重30%。^⑨ 从表4.1中可见,战前七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开支都超过德国,只是到了1913年,德国的开支才赶上英国的开支。^⑩

^⑤ 数字引自 Paul 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Atlantic Highlands, N. J.: Ashfield Press, 1987), pp. 356—357。另见 Hans Harzfeld, *Die Deutsche Rüstungspolitik vor Weltkriege* (Bonn: Kurt Schroeder, 1923), p. 12。

^⑥ Peter-Christian Witt, “Reichsfinanzen und Rüstungspolitik 1898—1914,” in *Marine und Marinepolitik im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871—1914*, ed. Schottelius and Deist, p. 171n。

^⑦ Harzfeld, *Deutsche Rüstungspolitik*, p. 13。伊曼纽尔·盖斯(Immanuel Geiss)甚至更尖锐地指出:“用于建造海军并使之现代化的资金投入如此之高,以至于使本应当构成纯粹防御基础的陆军扩展实际上在1912年之前就陷入了停滞。随后,它又迟迟没有增加足够资金,也就无法成功地发动一场进攻战。”Geiss, *German Foreign Policy, 1871—1914*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6), p. 79。

^⑧ 两个国家的数字来源于 B[rian] R. Mitchell, *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 1750—1970*, abridged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Tables G3 and J1。这一时期的德国只有 NNP 数据,GNP 当然大于 NNP,这样就进一步减少了德国的比例。

^⑨ Kennedy 估计,英国中央政府承担国家总支出的 55%,而德国中央政府只承担国家总支出的三分之一。见 Kennedy,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pp. 326—327。

^⑩ 这些数字仅指中央政府的支出。英国的数字源自 B. R. Mitchell,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德国的数字源自 *The Statesman's Year-Book* (London: Macmillan, various years)。1901年和1905年的数字是按照 20 马克 = 1 英镑的比例换算的。

表 4.1 全部总开支(百万英镑)

	1901 年	1905 年	1910 年	1913 年
英国	193.3	149.5	156.9	184.0
德国	116.2	110.4	142.7	185.0

尽管如此,德意志帝国仍常年处于巨大的赤字当中。而英国除了布尔战争的几年之外,都处于相当程度的盈余状态。^① 1905 年,德国政府的赤字达到了全部支出的 21%,相当于净国民产值的 0.9%; 1909 年,它又攀升到全部支出的 28% 和净国民产值的 1.5%。^② 在某种程度上,德国承受它所挑起的军备竞赛负担的能力不如英国。

经济基础:英国对德国

72 德国的财政问题并不意味着经济薄弱。相反,德国经济正在迅速地超过英国,以至于在英国企业家和政治家当中产生出一种普遍的自疑的和自责。^③ 1890 年至 1913 年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56%,年均增长约 2%。而同期德国净国民产值增长了 90%,年均增长约 2.8%。^④ 在英国,作为未来经济增长主要构成因素的净国内资本构成(NDCF)从 1860 年约占净国民产值的 12% 逐步下降到 1890 年至 1914 年间的约占 6%—8%。而在德国,净国内资本构成占净国民产值的比例从 19 世纪 50 年代的 8% 稳步增加到 1890 年至 1914 年整个时期的 16%。^⑤ 早在 1906 年至 1910 年间,德国制造业能力占世界的份额就超过了英国(15.9% 对 14.7%)。^⑥ 1890 年,德国生产出 210 万公吨原钢,而英国的产量是 360 万公吨。1893 年德国超过英

① Kennedy,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p. 357.

② Ibid., p. 358, and Mitchell, *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 Tables J1. (英镑对马克的转换率为 1:20.)

③ David S. 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327—328.

④ Mitchell, *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 Tables J1.

⑤ 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p. 329.

⑥ Kennedy,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p. 292.

国。到1913年,德国的产量是1760万吨,而英国是780万吨。^①同在1913年,德国生产出170万公吨硫酸,英国是110万公吨;德国的发电量是8吉瓦时(gigawatt-hours),英国是2.5吉瓦时。^②尽管英国仍然是较富的国家(1913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27.2亿英镑,人均约60英镑;而德国的净国民产值是524亿马克,相当于26.2亿英镑,人均40英镑),但德国已经较为强大,而且在最现代和最有军事意义的部门如钢铁、化工和电力部门正迅速地增长。

尽管德国以保护主义著称,英国以商业著称,但到了1913年,德国已占世界出口量的13%,英国占14%;德国占世界贸易量的13%,而英国占17%。^③在德国,1913年的出口量占净国民产值的19.3%(1890年为14.1%);在英国,出口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4%(1890年为21.2%)。^④此外,这一类似的出口导向掩盖了德国在化工、电力设备、光学,机械及机械工具这样的先进部门中在世界市场上所处的重要的和越来越明显的优势。^⑤到1907年,德国占到了世界电力设备出口的一半,世界工业染料生产的90%。^⑥

73

与德国在制造业中的出口进展相对应的是它在农业和原材料物质方面越来越依赖于进口(尽管关税越来越高)。到1910年至1913年间,15%的各类谷物、40%的小麦、38%的鸡蛋和7%的肉类都靠进口。^⑦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实行了痛苦的封锁,德国已无法自足,特别是在食物方面。

^① Mitchell, *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 Tables D8.

^② 一个国家的硫酸产量代表着该国化学工业的总体发展水平。但兰德斯(Landes, *Unbound Prometheus*, p. 109)却把硫酸描述为“是一种用途极广的物质……对该物质的使用可以作为工业发展的粗略指数”。见 Mitchell, *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 Tables D18 and D22.

^③ Kennedy,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p. 292.

^④ 根据 Mitchell, *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 Tables E1 and J1 中的数据计算。

^⑤ 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p. 328; Kennedy,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p. 293.

^⑥ David Calleo, *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 Germany and the World Order, 187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63.

^⑦ Ibid., p. 66; Alexander Gerschenkron, *Bread and Democracy on German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3), p. 121; Kennedy,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pp. 294—295.

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和社会构成

俾斯麦的帝国在哪一方面都是一种折衷妥协：中央政府与先前存在的各州之间，普鲁士与较小的各州之间，容克贵族与产业家之间，新教与天主教之间，民主制与集权制之间。^④ 直接税收（从早期的观点看包括收入税）属于各州的权限，帝国只征收关税、邮政费、特别许可税（如盐、烟草、白兰地酒、啤酒税）。^⑤ 尽管 1871 年宪法用含混的词句预先规定可以征收直接的“帝国税收”（第 70 条），但同时又说，帝国财政收入的任何短缺要“通过个体联邦州依据其人口的多少做出贡献”来加以解决（即所谓的注册人数贡献）。然而，帝国却不能迫使各州征税。因此，这最后一条规定实际上就等于乞求权。

然而，只有当帝国两个立法院，即帝国议会（Reichstag）和联邦参议院（Bundesrat）以有利的票数通过时，才能征收关税或征收直接税（第 5 条）。帝国议会是欧洲第三大国民议会，仅次于法国国民议会和瑞士国民议会（这两个议会在 1848 年都得到了扩大）。由男性普选产生，最初是按人口平均划分选区，但由于 1871 年之后没有重新调整过选区，所以后来越来越由倾向于乡村地区的人出任。到 19 世纪 90 年代初，帝国议会由 6 个主要政党所把持，各自代表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集团：保守党代表大地主，自由保守党代表重工业企业主，国家自由党代表其他大企业主和大农场主，左派自由党代表自由贸易产业主、小农场主和大部分小生意主，中间党代表所有经济阶层的天主教分子，社会党代表工人。

联邦参议院（Bundesrat）是帝国重要的执行机构，也是第二立法院（它宣战、解散帝国议会、通过行政法令、初审所有政府议案）。它是由 25 个州的“大使”组成的议会。它们依据各自州政府的指示投

^④ 关于这一时期的一部标准著作是 Hans-Ulrich Wehl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8*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1973); 麦克·施蒂默尔 (Michael Stürmer) 编辑的 *Bismarck und die preußisch-deutsche Politik* (Munich: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70) 也提供了一部有用的原始文件选集。

^⑤ 1871 年 4 月 16 日宪法第 35、38 和 49 条。引自 Rudolf Schuster, ed., *Deutsche Verfassungen*, 10th ed. (Munich: Wilhelm Goldmann Verlag, 1978)。

集团票：普鲁士 17 票，巴伐利亚 6 票，萨克森和符腾堡各 4 票，如此等等，共计 58 席。14 个反对票就足以击败任何修宪提议。因此，普鲁士在这方面享有绝对的否决权。更明确地说，对任何改变军事和税收制度的提案它都有绝对否决权（第 5 条）。^⑥ 然而各州在其管辖范围内享有完全的自治权：南部和西部各州主要遵循逐步自由化的通用欧洲模式，而普鲁士和不少北方小州是赋予了富人，尤其是那些大地主以太多的选票。^⑦ 这些选举不平等只有通过修订州或联邦宪法才能改变。但修订州（即普鲁士）宪法需要现存不平等选举产生的代表机构的同意。而修订联邦宪法总是受到保守的普鲁士的否决。

总理是名义上的帝国首席执政官，由皇帝任命，无需正式的议会信任投票。然而在实际上，只有获得帝国议会和联邦众议院的多数支持，他才能成功地进行统治。经验表明，只有当帝国总理同时出任普鲁士首相（这一职务决定了他可获得极端保守的普鲁士议会两院的多数支持）时，他才能控制联邦参议院。^⑧ 75

在这些背景下，建构执政联盟的游戏很复杂，只有一条实践规则是确定的，那就是社会党从来不能参与。在其他三大集团（保守党、天主教党、自由党）中，通常至少需要两个才能形成执政联盟，保守党

^⑥ 第 5 条的语言有些绕嘴，但基本上还是清楚的：“关于第 35 条中所规定的有关军事设施、海军或财政收入（关税、盐和烟草税等）的议案，当联邦参议院产生意见分歧时，主席（即普鲁士）的投票起决定作用，如果它的投票是有利于延续现存安排的话。”

^⑦ 在普鲁士，选民是按财富多寡（也就是按照财产价值的评估）排列等级的。先从最富有者开始，将个人纳税相加，累计到该选区应纳税总额的三分之一。这一最富有的选民集团（在某些地区或许只是一个大地主）被归类为“第一阶层选民”。然后继续从该地区累计出另外三分之一的纳税额的选民，这些财产所有者构成“第二阶层选民”。所有其余的选民（在一些地区，这部分人占到了全部选民的 90%）属于“第三阶层”。每一阶层单独投票，各选出本地区相同人数的“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由选举人团实际选出本地区参加普鲁士众议院的代表。这样，就实际投票权而言，最富有的 10% 的选民有时竟控制了三分之二的选票。此外，几乎是完全世袭的上议院与众议院有着同样的权力（1850 年 1 月 31 日颁布，1854 年 10 月 12 日修订的普鲁士宪法第 65 条和 71 条。）见 Schuster, ed., *Deutsche Verfassungen*, chap. 2.

^⑧ 肯尼迪注意到，总理绝非是直接向君主报告的惟一官员。不仅部长和军队领导人个人，而且级别低得多的个人（如海军各部门领导人，各舰队司令员，甚至海军专员（naval attaches）和范围广泛的关系密切的个人都可以直接与皇帝联系，向他“出售主意”，甚至影响总理的任命和解职。肯尼迪正确地将全部结果描述为是“德国政府制度的混乱。” Kennedy,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p. 404.

在普鲁士的支配地位使得他们在整个国家都是不可缺少的。^②只是在俾斯麦的第一个继任者莱奥·冯·卡普里维(Leo von Caprivi)的“新路线”下,才有了一次由中间党、左翼自由党和国家自由党组成的反保守党联盟企图,但最终还是遭到失败。

保守党的权势注定了—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对进口谷物的高(毋宁说是禁止性)关税。该问题关乎容克贵族的生死存亡。自由保守党人,不少国家自由党人,甚至从事农业的中间党人能够接受这一结果的条件是对工业产品也实行高关税(俾斯麦臭名昭著的“钢与黑麦联姻”的产物)。1890年之后,出口导向的产业界越来越抵制这一政策,然而却从未找到合适的方法削弱保守党人的霸权。^③

76

联合阵线的变化不定,宪法关键条文的含混不清,占支配地位的保守党人根深蒂固的君主制倾向,这一切都可以使皇帝成为一个野心勃勃的人——没有哪位当代立宪君主所能享有的一种个人的权势和个人的不负责任。1888至1918年的威廉二世当然就是这样一位皇帝。正如保罗·肯尼迪所精确总结的那样,“威廉的权势比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更接近于乔治三世(George III),可能比他的权势更大。”^④

追求海军实力

德国为什么要以如此快的速度建造如此强大的海军,这依然是

^② 这一模式很早就确立了。在建立民族国家的第一阶段,俾斯麦得到了全国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支持。他们因反对天主教的政教冲突而走到了一起。1879年向高关税的转变排挤出自由党,与天主教党取得了和解,取缔了社会党的合法地位。从此,保守党和中间派组成的“蓝黑”联盟占据了统治地位。卡普里维(Caprivi)倒台后,霍恩洛厄(Hohenlohe)、密克尔(Miquel)和比洛(Bülow)都不断地致力于“聚拢力量”(Sammlung),要将所有非社会党人力量聚集到一起。见 Dirk Stegmann, *Die Erben Bismarcks: Parteien und Verbände in der Spätphase des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s: Sammlungspolitik 1897—1918* (Cologne and Berlin: Kiepenheuer und Witsch, 1970)。

^③ Ibid., especially chaps. 4 and 5.

^④ Kennedy,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p. 404.

欧洲现代史学界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② 我们并不是要重述这一争论,更不想做出裁决,而只是注意到相对没有争议的下述结论:

(1) 德国海军计划与先前描述的经济改造是紧密而有意相联的,在1895年2月8日对皇家军事科学院所做的一次重要的讲话中,威廉二世提出,一个民族的海军应当与它的海上商业相匹配,而德国没能做到这一点。法国和俄罗斯的海军合起来(用伊沃·尼古拉·兰比对威廉话语的解释)“就能够封锁德国的海岸线,摧毁德国的贸易……尤其是切断至关重要的食品进口”^③。威廉在1896年1月18日对帝国议会所做的“世界帝国”(Weltreich)演讲中指出,有必要保护“德国在海上运输的成千上万的价值。”^④该演讲引发了海军运动。在1897年3月2日的一次由克洛德维希·霍恩洛厄王子(Prince Chlodwig Hohenlohe)现场记录的私人谈话中皇帝观察道,“我们必须拥有一支武装舰队来保护我们的贸易和运送我们自己……我们的舰队必须强大到足以防止法国舰队切断必要的食物供给。”^⑤德国的重商主义精英们从内心拥护这一主张。实际上,甚至在威廉和蒂尔皮茨开始他们的煽动之前,先前汉堡主张和平和亲英国的领导层就已经开始推动海军的扩张(正如埃克哈德·伯姆在其卓越的研究中所表明的那样)。^⑥ 美国不断朝着极端保护主义(1890年的麦金利关税、1897年的丁利关税)和形成泛美自由贸易区的方向努力,用高关税歧

77

^② 论战开始于 Echart Kehr's *Schlachtfloppenbau und Parteipolitik 1894—1901: Versuch eines Querschnitts durch die innenpolitischen, Sozialen und ideologischen Voraussetzungen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Berlin: Verlag Emil Ebering, 1930). Feiedrich Forstmeier, “Der Tirpitzsche Flottenbau im Urteil der Historiker,” in Schottelius and Deist, *Marine und Marinepolitik im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871—1914* 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概述; Calleo, *German Problem*, chap. 4 对 Kehr 进行了富有见地的评论;更多的辩论见 Geoff Eley, *From Unification to Nazism: Reinterpreting the German Past* (Boston: Allen and Unwin, 1986), chap. 5 and Eley, *Reshaping the German Right: Radical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after Bismarc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chap. 1。阅读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第三章手稿使我们受益匪浅。

^③ Ivo Nokolai Lambi, *The Navy and German Power Politics, 1862—1914* (Boston: Allen and Unwin, 1984), p. 34.

^④ Ekkehard Böhm, *Überseehandel und Floppenbau: Hanseatische Kaufmannschaft und deutsche Seerüstung 1879—1902* (Düsseldorf: Bertelsmann Universitätsverlag, 1972), p. 81.

^⑤ Lambi, *Navy and German Power politics*, p. 34. 着重号为后加。

^⑥ Böhm, *Überseehandel und Floppenbau*. 伯姆的研究实质上是纠正了凯尔(*Schlachtfloppenbau und Parteipolitik 1894—1901*, pp. 228—244)对商人支持舰队(尤其是在汉堡)所持的某种轻蔑的看法。详见 *ibid.*, p. 239.

视局外者。这引起了以美国为特别定向目标的这个港口城市的警觉。^⑦ 如 1891 年智利所发生的那样,当英国领导的海军干预足以挫败美国要通过“炮舰政策”赢得关税的努力时,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汉堡主要的商人和报纸公开讨论如何以一个强大的德国海军相抗衡,既针对拉丁美洲国家,也直接针对美国。^⑧ 当英国于 1897 年 7 月允许其自治领实行关税自主(开始于加拿大),并在这一进程中谴责 1865 年与旧的关税同盟签署的条约是确保了德国在所有英国殖民地中的最惠国地位时,警觉变成了恐慌。当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在英国产业界的大力支持下于 1902 年提出了他的“帝国优惠”(Imperial Preference)计划时,恐慌进一步加剧。首先是最富有的英国殖民地,现在是英国本身也有可能关闭对德国的贸易。^⑨ 尽管汉堡的领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恐英症和战争叫嚣,但皇帝却毫不犹豫地于 1897 年 8 月 1 日向霍恩洛厄传达了下面与加拿大事件有关的一段话:“如果我们拥有一支能够赢得尊重的强大海军,那个条约就不会受到谴责。作为回答,必须考虑迅速地,大规模地扩大我们的(海军)建设。”^⑩

凯尔(Eckart Kehr)注意到,出口导向的德国产业精英们——其人物有如埃米尔·拉特瑙(Emil Rathenau)和格奥尔格·冯·西门子(Georg von Siemens)——加入到商业精英的行列当中,他们热情地支持自由贸易和海军计划。^⑪

78

从本质上来说德意志虽然继承了普鲁士人“北方斯巴达”的头衔,但它却正朝着“雅典人”那种出口定向的制造业,进口食物,以强大的海军保卫重要的贸易路线的政策方向发展。^⑫ 可以预见,德意志的“斯巴达式”精英(拥有土地的武士容克)本能地反对变革,尤其是

^⑦ 汉堡 13% 的出口和 20% 的进口都是与美国的贸易。Böhm, *Überseehandel und Floppenbau*, p. 148.

^⑧ *Ibid.*, pp. 56—64, 148—153.

^⑨ *Ibid.*, pp. 166—172.

^⑩ *Ibid.*, p. 33.

^⑪ Kehr, *Schlachtfloppenbau und Parteipolitik 1894—1901*, p. 306.

^⑫ 这一政策的海军方面即使在出口导向的集团中也不是没有争议的。像 Eugen Richter 和 Robert Drill 这样的自由主义人物对是否能够成功地对德国实行封锁这样的观点也是持嘲讽态度的(*ibid.*, p. 255n); 社会党领导层(出于对英国早先允许其避难的感激,他们在政治倾向上是亲英的)坚持认为,英国为了其自身的利益将会保持市场的开放。Kennedy,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pp. 328—329.

反对它的海军计划。^④ 关税,尤其是农业品关税,将维护自给自足,消除发展舰队的必要性。由容克支配的军队将会在国家和社会上保持其适当的支配地位。^⑤ 相反,正如盖斯(Geiss)所强调指出的,“战舰是德国中产阶级卓越的工具。对于帝国和德国中产阶级成员来说,海军官员既是一种象征,也是集体和个人权势与声望的载体。因此,舰队并不是固执的皇帝突发奇想,而是代表了德国社会中最繁荣和最富有活力的成员的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志向。”^⑥

(2) 海军建造计划的最终危险来自于德意志帝国特殊的社会和政治构成。威廉时期的德国越来越显著的特征是农业精英与工商业精英之间心照不宣但却是你死我活的争夺主导权的冲突。但共同的社会党人威胁向双方强加了克制妥协和对国内问题的回避。恰恰是因为海军毫无疑问地象征着和保障着中产阶级的发展,所以其支持者们比明智的战略所带来的动力更能有力地推动它的发展。

凯尔极其清楚地看到,海军和持久性的高关税代表了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一种妥协。^⑦ 但还不只如此。如伯姆所揭示的,早在1896年,汉堡的商业精英们就开始把海军支出看做是帝国奉行工业和贸易政策的一种方式。^⑧ 这一集团确信,一旦帝国把大量的钱投入到舰队,它就不敢再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如果这样,舰队就将成为毫无用途的摆设。^⑨ 蒂尔皮茨也持有并鼓励这一看法。他曾于1897年8月8日向麦克斯·冯·蒂尔曼(Max von Thielmann)表明(表达上带着典型的笨拙):“如果说开始一种目的在于大幅度削弱我们的贸易和我们的出口型工业的贸易政策真是我们负责的各部的意图所在的话,那么目前的海军法案,以及实际上的任何海军法案都意味着与这

79

^④ Kehr, *Schlachtfloppenbau und Parteipolitik 1894—1901*, pp. 172—177 and 259—260; Böhm, *Überseehandel und Floppenbau*, p. 77; 另见 Calleo, *German Problem*, pp. 74—84。与凯尔之后的某些学者随意夸大不同, Eley 难得地再次强调了土地精英与商业精英之间在海军计划问题上的分歧程度。详见 *From Unification to Nazism*, chap. 5, especially pp. 115ff。

^⑤ Böhm, *Überseehandel und Floppenbau*, p. 78.

^⑥ Geiss, *German Foreign Policy, 1871—1914*, p. 79.

^⑦ Kehr, *Schlachtfloppenbau und Parteipolitik 1894—1901*.

^⑧ Böhm, *Überseehandel und Floppenbau*, p. 77; 另见 Stegmann, *Die Erben Bismarcks*, p. 78n.

^⑨ 汉堡之外的集团也持这一看法。伯姆(Böhm, *Überseehandel und Floppenbau*, pp. 192, 194, 199, 200.)特别提到了斯图加特、托伦(Thorn)和威斯巴登商务部。另见 Emil Rathenau, Friedrich Naumann, Lujo Brentano, Gustav Schmoller, and Gerhard von Schulze-Gaevernitz。

一意图的冲突。在我看来,(海军的)任何成功似乎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准确地说,舰队代表着我们的海洋利益。”^④

这些盘算让商业和工业精英们开始支持蒂尔皮茨建造战舰。而起初,他们仅仅是希望建造能在不稳定地区捍卫贸易的轻型武装巡洋舰。^⑤ 不仅如此,正如汉堡领导人阿尔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汉堡—美国航运公司主席,皇帝的挚友,舰队早期富有影响的支持者)在1908年改变自己主意之后很久所承认的那样,在很长时期内他们都无法做出准确判断,甚至连像他自己这样的亲英分子都投身于因舰队而引起的英德关系紧张,投身于战略上毫无希望的德国海军挑战。^⑥

如果说海军的支持者们要求太多的话,那么它的反对者又让步得太容易。在反复举行的微妙的聚拢力量谈判中,农业部门竟然对一个更大规模舰队的谈判做出了最容易的让步。^⑦ 惟一的假设是,只有当他们得到了想要的高谷物关税时,他们才会愿意(如果说不是渴望的话)投票支持更高的海军拨款。甚至是海军吞噬了本来应当拨给容克主导的陆军的款项他们也没有做出反对。因为(如战争部主要官员们所公开看到的那样)陆军的迅速扩张会造成非贵族成员向军官团的渗透。在他们看来,这样的结果是不受欢迎的,在政治上也是危险的。^⑧

最后,重要的是,在第二帝国奇特的社会结构中皇帝竟保留了如此大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而且这个特别的皇帝又热心地支持一

80

^④ 引自 Böhm, *Überseehandel und Floppenbau*, p. 196.

^⑤ Kehr, *Schlachtfloppenbau und Parteipolitik 1894—1901*, pp. 230—242; and Böhm, *Überseehandel und Floppenbau*, pp. 200—201.

^⑥ Lamar Cecil, *Albert Ballin: Business and Politics in Imperial Germany, 1888—191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152—158, 159—162.

^⑦ Kehr, *Schlachtfloppenbau und Parteipolitik 1894—1901*, especially pp. 172—177, 201—207; 另见 Calleo, *German Problem*, especially pp. 82—83. Eley 不同意这一观点(见 *From Unification to Nazism*, chap. 5),而是把容克的反对描绘成是如此偏激,以至于让人们无法理解海军法案实际上怎样会执行得下去,更不用说让以保守党为核心支持力量的政府去执行它。

^⑧ Peter-Christian Witt, “Reichsfinanzen und Rüstungspolitik 1898—1914,” in *marine und Marinepolitik im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871—1914*, ed. Schottelius and Deist, pp. 153—154.

个强大的海军。^⑤ 1894年,威廉二世自豪地对一位亲信说,他“不仅是在阅读,而且是着迷于马汉船长(Captain Mahan)的书(《海洋权势对1660年至1783年历史的影响》)。我正试图用心地去学习它。”^⑥ 在1897年,是威廉个人决定(不顾总理霍恩洛厄的反对)任命蒂尔皮茨为帝国海洋部(Reichsmarineamt)的头目,并支持他的扩张性的海军建设计划。^⑦ 在当时的德国国内政治条件下,精英们本来是相互倾轧,但在建造一支大规模的海军问题上却能够达成共识。

德国财政的失败

既然要建造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那么现在帝国就不得不找出办法为其付款。但它却从未做到这一点。仅在1898年至1903年间,政府负债就增加了6.72亿马克,主要是用于海军支出。在1897年至1914年整个期间,帝国未偿还的债务从21亿马克上升到52亿马克。在增加的31亿债务中,有整整10亿是用于海军花销。^⑧ 政府声望因不良金融而大为败坏,以至于政府债券所需要的“风险费”也比英国和法国的要大。它对国内信贷市场造成的负担如此之重,以至于柏林的平均利率比欧洲其他市场要高一到两个点。^⑨

实质上,宪法赋予帝国的间接税不足以满足不断增多的军事开支。^⑩ 提高这些高度递减性的税收税率的种种努力遭到了社会党人,左派自由党人,国家自由党人,通常还有中间党人的抵制,他们在帝国议会构成了明显的多数。所有这些集团都主张直接税:最低限度是继承税或财产税;最高限度(只有社会党全面接受)是帝国收入税。然而对于强大的保守党人来说,每一项这样的建议都是该受到诅咒的东西。即使是最温和地看,他们也认为这是打进来的社会主义楔子和剥夺。^⑪ 他们准备利用其对普鲁士政府的控制扳倒任何敢于提

^⑤ 见 Lambi, *Navy and German Power politics*, chap. 3。

^⑥ Ibid., p. 34.

^⑦ Ibid., p. 138.

^⑧ Witt, “Reichsfinanzen,” in *marine und Marinepolitik im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871—1914*, ed. Schottelius and Deist, p. 151n.

^⑨ Kennedy,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p. 303; Landes, *Unbound Prometheus*, p. 334.

^⑩ 下面的论述主要依据 Witt 的详细分析,见 Witt, “Reichsfinanzen,” in *marine und Marinepolitik im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871—1914*, ed. Schottelius and Deist。

^⑪ Ibid., p. 158.

出重要的直接税的总理(这种勇气的一个例证是1909年的伯恩哈德·冯·比洛公爵——Prince Bernhard von Bülow)。^①此外,自由党人和天主教党人即便是要求可憎的社会党人投票这样做,但他们自己却从不采取这样的措施。

只剩下两种可能性:要求增加各个州的“花名册特别税”(matricular contributions),以及有意隐瞒而不做任何原则性讨论的“增税”(Abgaben)。然而各州只是简单地以2400万马克的特别税总额划线(应当承认,这是不符合宪法的)^②,帝国没有办法迫使它们拿出更多的钱。以“原罪税”和印花税为代表“增税”无法满足缺口。结果是盘旋上升的赤字,最终只得无奈地要求财政大臣减少公共(主要是军事)开支。^③尽管起初遭到了军队首领阿道夫·韦穆特大臣(Secretary Adolf Wermuth)的极大抵制,但却得到了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赫尔维希(Theobald von Bethmann-Houweg)总理的全力支持,并且于1912年初成功地将五年军事开支计划从10亿马克削减到6.12亿马克。^④然而随着这一决定,德国要赢得海军竞赛的希望全都成了泡影。威廉皇帝曾断定,在增加海军支出的压力下,被压垮的是英国,而不是德国。这一断言证明是幻想。^⑤

1914年战争爆发时,英国有24艘服役的无畏战舰,战舰总数达60艘;而德国有16艘无畏战舰,大型战舰总数为38艘。协约国总计有91艘主力舰,其中26艘是无畏战舰;而轴心国总计有59艘主力舰,其中17艘是无畏战舰。^⑥包括杰出的海军将军马汉(Alfred Mahan)在内的所有严肃的海军战略家都认为,德国需要有相当大的优势力量才能取胜。德国的军舰不顾蒂尔皮茨的反对,只采取了纯粹防

^① Ibid., p. 164; 另见 Kennedy,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p. 358; and Stegmann, *Die Erben Bismarcks*, pp. 176—180.

^② Witt, “Reichsfinanzen,” in *Marine und Marinepolitik im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871—1914*, ed. Schottelius and Deist, p. 152.

^③ 甚至在1900年之后,军事开支通常也占到了中央政府全部开支90%。见 *ibid.*, p. 146n.

^④ Ibid., pp. 170—171.

^⑤ Cecil, *Albert Ballin*, p. 160.

^⑥ Lambi, *Navy and German Power Politics*, p. 426. 主力舰包括所有主要的海军战船,如战舰、战斗巡洋舰等。今天的机载舰和大型潜艇也被视为是主力舰。

御的立场，“呆在港口里……毫无用途。”^⑦

英国的比较：保守党险遭失败

关于英国的动机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作为一个岛国，英国主要依赖于海上的力量来实现其国家的安全。对于英国人而言，海军实力是他们自身生存的手段。而对于大多数其他国家来说，它只是一种边缘性的关注。英国官员趋于认为，海军建设（特别是那些陆地大国的海军建设）至少是潜在性地针对他们的。温斯顿·丘吉尔于1912年在格拉斯哥的一次讲话中简洁地表达了这一态度：“德国海军对他们来说性质上就是一种奢侈”^⑧。鉴于他们自己的这一看法和其主要对手的安全需要，所以毫不奇怪，英国感到必须参加与德国的海军军备竞赛。令人惊讶的是，英国竟险些失败。

1889年皇家海军开始扩建，主要是回应法国海军加强建设以及英国越来越有可能不得不面对法国和俄罗斯舰队的联合。尽管扩建需要相当多的钱，但在19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里，它并没有给英国政府的财政带来多大的紧张。^⑨经济增长自然增加了税收收入，使得政府能够在不增加税种的情况下，支付海军扩建的大部分花销。然而在1895年，财政部常任大臣爱德华·汉密尔顿（Edward Hamilton）却向新的保守党政府提出了警告，说削减（甚至是放慢）政府开支的前景看起来渺茫，政府开支不久就会超过财政收入。汉密尔顿为这一隐约可见的危机提出的惟一解决方案是增加一些新的，但并不具体的间接税。随着19世纪90年代末期经济增长开始放慢，税收

83

^⑦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7), p. 259.

^⑧ Holger H. Herwig, *“Luxury” Fleet: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1888—1918* (Atlantic Highlands, N. J.: Ashfield Press, 1987), p. 77.

^⑨ 1889年的《海军防御条例》征集了2250万英镑用于海军建设，比先前1884年的海军法案增加了4倍。接下来的1894年斯宾塞计划是2130万英镑。见Arthur J. Marder, *The Anatomy of British Sea Power: A History of British Naval Policy in the Pre-Dreadnought Era 1880—1905* (New York: Knopf, 1940), p. 204。在相同期间内，议会投票通过的服役海军人数从65400人增加到93750人，工资支出从837万英镑上升到1189万英镑，增加42%。见Jon Tetsuro Sumida, *In Defense of Naval Supremacy: Finance, Technology, and British Naval Policy, 1889—1914*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p. 21。

收入开始下降,政府的关注也在增加。早在1899年1月,政府就很有可能面临着400万英镑的赤字。财政大臣迈克尔·希克斯·比奇(Michael Hicks Beach)采取的对策是号召增加更多的税。不足为奇,首相劳德·索尔兹伯里(Lord Salisbury)对此采取了抵制态度,而更倾向于采取临时性借款。^⑦

在采纳这两个方案之前,保守党又面临着由于发动布尔战争而带来的更大的财政问题。主要是由于战争,开支从1898/1899年的1.176亿英镑上升到1901/1902年的2.952亿英镑。而财政收入只从1.178亿英镑增加到1902/1903年的1.613亿英镑。^⑧政府对这相当程度的短缺所采取的对策是增加收入所得税和茶叶、烟草税,临时中止了偿债基金,另外就是借款。^⑨各种各样的贷款被大量使用(在政治上,这是最容易的对策手段),以至于国债增加了近四分之一。^⑩1899至1902年间通过战争特别税征集的3400万英镑几乎完全被增加的3000万英镑的日常支出(即排除一次性的战争耗费)所抵消。^⑪这让希克斯·比奇提出警告说,政府的财政问题将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停止。

汉密尔顿再次呼吁要增加税收,这次希克斯·比奇做出了回应。1901—1902年预算宣布,再次增加收入所得税和新增糖、煤税。^⑫然而,新的收入远不能满足越来越多的资金需求。希克斯·比奇于是呼吁削减支出,特别是海军支出,认为这是缓解英国财政危机的惟一可行方案。1901年10月,他告诉内阁说,无节制的海军支出增长将“直接导致财政崩溃”。^⑬海洋大臣劳德·塞尔伯恩(Lord Selborne)认为,来自法国和俄罗斯的威胁依然很大,这无法考虑对海军支出做任何削减。他不但不同意比奇的观点,而且还宣称英国不仅必须

^⑦ Aaron L.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04—105.

^⑧ Bruce K. Murry, *The People's Budget 1909/10: Lloyd George and Liber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1—22.

^⑨ Friedberg, *Weary Titan*, pp. 106—107.

^⑩ Sumida, *In Defense*, pp. 22—23.

^⑪ Keith M. Wilson, *The Policy of the Entente: Essays on the Determinants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04—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1.

^⑫ Friedberg, *Weary Titan*, p. 109.

^⑬ Sumida, *In Defense*, p. 23.

赶上,而且要超过法俄海军力量。塞尔伯恩还具体提出,从1903/1904到1906/1907年间,每个财政年度都要额外建造3艘战舰和4艘武装巡洋舰,这需要初步增加250万至300万英镑的海军预算。^⑦内阁批准了塞尔伯恩的计划,但却没有说明这笔钱应当从哪儿出。1903年新增加的建造支出实际上达到了400万英镑。^⑧

到1903年,海军扩建所造成的财政紧张甚至使最强烈的舰队支持者们都感到了忧虑。塞尔伯恩警告海军部说,他们已“十分接近了其可能的最大极限”,采取某种方式的节省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早在1902年德国就开始迅速取代法国和俄国而成为英国海军的主要挑战者。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新的竞争者有大陆欧洲最强大的经济的支撑。此外,舰船设计和武器装备技术的变化,以及需要向新的战舰提供更多的人员,都极大地提高了主要战舰的单位成本。^⑨

后布尔战争时期,越来越关心如何为海军部要求的很多舰船付款的保守党政府决定减少国家的战略性需求。1902年与日本的结盟使得英国能够大幅度削减它在远东地区的海军部署,从而有效地结束了它长期奉行的“光荣孤立”政策。1904年与法国的和解,1907年与俄罗斯的协议(在此之前已有了明显的和解),以及与美国解决了悬而未决的争议,这些都使得海军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除它对法国、俄国、日本以及美国海军的算计。不幸的是,单单德国的海军建设就足以迫使英国拨出款项来以惊人的速度扩军。^⑩

然而与此同时,新任财政大臣查尔斯·里奇(Charles Ritchie)主

^⑦ Sumida, *In Defense*, p. 23.

^⑧ *Ibid.*, p. 24.

^⑨ 从1889/1890到1896/1897年,英国花费1680万英镑建造了25艘战舰;在1897/1898至1904/1905年间,它花费2960万英镑建造了27艘战舰。支出增加了近一倍,但却只增加2艘船。1904—1905年订购的一级巡洋舰比按照1889年《海军防卫条例》要求建造的要贵三倍。同时,建造的数量也从1889/1890到1896/1897年间的19艘增加到1897/1898到1904/1905年间的35艘。总体上,海军支出从第一时期的1.373亿英镑增加到第二时期的2.45亿英镑,增加了78%强(*ibid.*, pp. 20, 22)。

^⑩ 英国不断做出努力要从其自治领中获取财政支持,但收效甚微。主要是由于政府不希望在海军战略的形成中让他们参与进来(Friedberg, *Weary Titan*, pp. 116—117)。最终,英国从这一渠道中每年可收到约200万英镑。这已是个不小的数字,但远不足以减轻英国政府的财政压力。

财政保守主义者,又是一个自由贸易的强烈支持者。1903年,里奇利用约瑟夫·张伯伦在南非的临时缺席而赢得了内阁对削减收入所得税和废除新近加征的进口谷物税的批准。保守党当中关说改革的倡导者张伯伦对此怒不可遏,他一回来就分裂了内阁。^①只是到了1903年9月两个人都辞职后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里奇在财政部的位置被约瑟夫·张伯伦的儿子奥斯汀(Austen)所替代。

奥斯汀·张伯伦发现,里奇的税收削减不可能持续下去。1903年12月他告诉内阁说,1904年至1905年的预算不可避免地要求增加税收。为了使增税保持在一定的界限之内,他再次呼吁削减陆军和海军预算。他争辩说,英国的安全既取决于它的军事资源,也同样取决于它的财政。张伯伦得到了财政部汉密尔顿的支持。他在1904年2月再次督促政府要增加税收。^②

能够增加哪个税种?汉密尔顿指出,里奇削减的更多的是直接税,而不是间接税。尽管汉密尔顿也提议增加新近开征的蔗糖税税额,但他认为,只要政府征收收入所得税,它就应当避免不公正的征收。不足为奇,保守党政府没有理会汉密尔顿的建议,因为他们知道,增加任何直接税都将主要落到富人头上。1904年4月,张伯伦宣布了一个新的预算,呼吁加征相当程度的间接税。

张伯伦的预算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自由党人非常愤怒地说,只有当里奇削减了直接税一年之后才能增加间接税。这一攻击使得包括汉密尔顿在内的财政部一些人再三考虑是否有必要加征新税。张伯伦竭力推进,但却得出结论说这个国家已无力承受更多的征税。保守党在扩大政府的财政基础方面已经达到了其政治能力的极限。政府已经反复多次拒绝了汉密尔顿要扩大直接税,特别是所得税的呼吁。既然间接税的选择也正在关闭,那么除了削减政府开支之外已别无选择。

塞尔伯恩在1904年3月就已经承认,海军除了它已经在接收的之外,不可能再要到钱。陆军大臣阿诺德·福斯特(H. O. Arnold-Foster)承诺陆军将减少要求。这对张伯伦来说还不够。他争论说,

^① 按照当时的说法,关税改革就意味着增加关税,并给予英国的殖民地和自治领以某种未加具体化的特惠。

^② Friedberg, *Weary Titan*, p. 123.

只有冻结行政开支和削减防卫预算才能解决政府的财政问题。张伯伦最终认识到,英国的财政资源简直是“不足以”做政府为帝国防卫所要做的全部事情。^③持这种观点的并不是一个人。阿龙·弗里德贝格(Aaron Friedberg)指出,“到1904年已经再想不出什么替代方案,面对这种形势,政府内部普遍认为,不管帝国的防卫需求如何,军备开支已经是不得不需要切实地削减了。”^④塞尔伯恩最终为1904/1905年的海军预算赢得了100万英镑的增加额,但在1905/1906年的海军预算中又被迫吞下了大的削减(尽管没有规定具体数额)。^⑤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无视德国的威胁,表明保守党已经几近承认海军军备竞赛的失败。

保守党政府无力征收间接税所留下的悬念被1906年的大选所解决。这次大选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对政府税收政策的一次全民公决。之所以如此,这要归因于约瑟夫·张伯伦。1903年离开内阁后,张伯伦把他的关税改革鼓动推广到了整个保守党。到1905年,他赢得了足够的支持迫使并不情愿的阿瑟·詹姆斯·鲍尔弗(Arthur James Balfour)将有限的关税改革变成了该党选举纲领的核心内容。自由党抓住保守党给他们提供的机会,将竞选变成了自由贸易与关税保护之间的竞争。自由党为保守党的建议贴上了“胃口税”(Stomach tax)的标签,取得最大的选举胜利,在众议院取得了明显的多数。选举被看做是对关税改革的有说服力的否决。这样也就没有任何机会再通过间接税来为进一步的海军扩张提供资助。^⑥

自由党与英国在海军竞赛中的胜利

自由党的获胜最终为英国赢得了与德国海军军备竞赛的胜利。然而在当时没有任何迹象能表明这一结果。保守党支持帝国政策和国防开支,而自由党极力主张削减军事开支。新政府在初期实际上

^③ Friedberg, *Weary Titan*, p. 126.

^④ *Ibid.*, p. 107.

^⑤ Sumida, *In defense*, p. 25.

^⑥ 一个有价值的叙述见 A. K. Russell, *Liberal Landslide: The General Election of 1906* (Hamden, Conn.: Archon Books, 1973)。

实现了削减,但这要归功于下台的保守党内阁所采取的行动。1904年,约翰·菲舍尔将军(Admiral John Fisher)接替塞尔伯恩出任海军部长。菲舍尔长期主张海军改革,他承诺说他将大规模减少财政开支。通过各种各样的激进措施,包括关闭军港,让不需要的战舰退役,对皇家海军人员编制进行重大改组,菲舍尔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的承诺。海军预算从1904/1905年的3690万英镑下降到1907/1908年的3140万英镑,大量节减都发生在政府变更之后。^⑦

至少在短期内,自由党削减国防预算的能力因菲舍尔的其他重要创新而得到了加强,即引进第一个现代化的战舰HMS无畏战舰。在菲舍尔的各项改革中,这当然是最具争议的。反对者指责说,引进一种技术无比优越的战舰将使所有现存的舰只过时。菲舍尔使英国在旧式战舰上的巨大数量优势失去了作用。现在,它将不得不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一轮新的建造无畏战舰的竞赛。这将给它的对手提供一个赶上或超过它的机会。菲舍尔回答说,建造无畏战舰是不可避免的。其他国家已在引进类似的设计,英国应当先下手为强。^⑧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至少短期内无畏战舰对英国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恩惠。模仿英国创新的需要打乱了所有其他国家的海军建造计划,使得英国能够在几年之内放慢自己的建造。德国特意终止了大部分舰船建设,其海军设计者们急匆匆地跟着英国走。

由此给英国带来的喘息只持续了几年。到1907年底,德国的船坞已做好了大规模生产无畏战舰的准备。1908年修改了1900年的《海军法》,规定无畏战舰型号的主力舰每20年更新换代一次,而不是先前规定的25年。主力舰的建造速度从每年3艘增加到4艘。1900年法规定的20艘“大型巡洋舰”被具体化无畏战舰型战斗巡洋舰。^⑨

大部分英国人保持了冷静。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思(Herbert Asquith)在自由主义报纸和内阁同僚的压力下信守选举誓言,继续减

^⑦ Arthur J. Marder, *From the Dreadnought to Scapa Flow: The Royal Navy in the Fisher Era, 1904—1919*, vol. 1, *The Road to War, 1904—1914*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25. 另外两个因素也有助于自由党削减国防开支:与法国和俄罗斯持续性的和睦相处(这也是在保守党政府时发起的);日俄战争后俄罗斯海军的削弱。Sumida, *In defense*, pp. 186—187.

^⑧ 无畏战舰计划在欧洲可以公开得到。

^⑨ Marder, *From the Dreadnought*, p. 136.

少军事开支。大部分自由党人认为,德国的威胁不足让英国增加建设,也不足以让他们牺牲自己所热衷的花在社会立法方面的钱。甚至连海军部也坚信,德国需要多年才能赶上英国,因此没有提议增加英国的海军建造。

1909年海军部对德国海军的建设速度进行了重新评估,这使得过去那种自鸣得意顷刻间变成了海军大恐慌。初步估计表明,到1912年,英国对德国的无畏战舰比例将是18:13,少于所需的保持严格的两强标准,但仍可容忍。然而在整个1908年,新的情报表明,德国能够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生产炮塔座。这被看做是无畏战舰建设中的决定因素。此外,德国主要的造船厂克虏伯造船厂秘密堆集了镍,它主要用于生产枪炮、装甲和炮塔座。海军部得出的结论是,到1912年,德国将拥有至少17艘无畏战舰,有可能达到21艘。^⑧基于这一新的情报,海军大臣于1909年1月提出建议,1909年的目标是8艘无畏战舰,而不是原来的4艘。

自由党内阁内部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海军大臣雷金纳德·麦克纳(Reginald McKenna)想要8艘,但只提出6艘的要求。这是他和菲舍尔认为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也是他认为最有可能从内阁中得到了数字。激进的部长们强烈地与他们抗争。这些人认为没有必要额外增加战舰,并且担心这些花费将会延误计划中的社会立法。戴维·劳埃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和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分别是财政大臣和内务大臣)拒绝考虑多于原先所同意的4艘。阿斯奎思通过一种使任何内阁成员都不失面子的相当迂回的妥协而最终挽救了形势:立即建造4艘战舰,另外4艘待观察显示有必要时再建造。正如阿斯奎思从一开始就期待的,另外4艘战舰于7月份得到了内阁的批准。^⑨

这笔开销给自由党人带来了严重的财政问题。自他们上台以来,海军预算首次增加。与此同时,他们还面临着由社会立法而产生的大量新的财政负担。仅在第一年,自由党人就将老年人退休金的

^⑧ Marder, *From the Dreadnought*, p. 152.

^⑨ Roy Jenkins, *Asquith: Portrait of a Man and an Era* (New York: E. P. Dutton, 1966), p. 197. 丘吉尔后来写到:“最后,达成了一项奇特而富有特点的方案。海军部要求6艘,经济学家们(即主张经济的人)认为应提供4艘,而我们最终达成的妥协是8艘。” Marder, *From the Dreadnought*, p. 151.

费用低估了 200 万英镑。到 1908 年底,已经很清楚,劳埃德·乔治将不得不提高税收。这当然是他强烈反对海军部额外请求的一个因素。^②

包括一些自由党人在内的很多人认为将不得不增加关税,但劳埃德·乔治仍然坚持奉行自由贸易。^③为此,他决定增加直接税。这样就应验了劳德·霍尔丹(Lord Haldane)的预测。他早先曾向阿斯奎思建议说,自由党将从社会改革付费计划和国防开支计划中通过向富人征税而获益。^④正像劳埃德·乔治所承认的那样,精明之处在于,他们既征收了直接税,又没有疏远绝大多数选民。

阿斯奎思和劳埃德·乔治实行的是一套累进税制度,主要是增加了最富有者的负担。在他称之为“人民的预算”的 1909/1910 年度预算中,劳埃德·乔治企图提供政府长期的财政需求,尤其是提供自由党的社会立法需求;与此同时,又确保党的自由贸易政策。^⑤该预算的核心包括了大量增加所得税、丧葬税、所有买卖活动和股票交易的印花税,还增加了酒、烟草、汽车、房地产资本获益税。^⑥除了增加的酒和烟草税之外,所有税收都是直接针对富人的。劳埃德·乔治在 1909 年 4 月 29 日向众议院介绍了他的预算方案,遭到了保守党反对派的强烈抗议。自由党在众议院的稳定多数决定了反对该预算的斗争将集中在保守党占多数的上议院。11 月,上议院否决了该预算,从而使这一问题变成了宪法冲突。自由党赢得了 1910 年 1 月的新选举,并威胁要让上议院塞满他们的支持者。面对这种形势,保守党退缩了,预算最终于 1910 年 4 月开始实施。

90

作为社会立法,该预算的成就或许会受到质疑,但作为新的财政收入来源,它却是一个彻底的胜利。政府收入迅速增加。尽管开支持续不断地激增,但在 1914 年之前并没有加征新税。^⑦如图 4.5 所示,1908 年/1909 年至 1913 年度期间,社会福利支出和海军支出持续剧增,而陆军支出大体上保持稳定。^⑧即便如此,劳埃德·乔治还能

② Murry, *People's Budget*, p. 92.

③ Ibid.

④ Jenkins, *Asquith*, p. 188; Murry, *People's Budget*, p. 93.

⑤ Murry, *People's Budget*, p. 119.

⑥ Sumida, *In defense*, p. 188.

⑦ Murry, *People's Budget*, p. 292.

⑧ Sumida, *In defense*, p. 194.

够在 1910 至 1917 年间实现年年盈余。从 1909/1910 年度预算开始,各种税收总是源源不断地带来比预期更多的收入。⁹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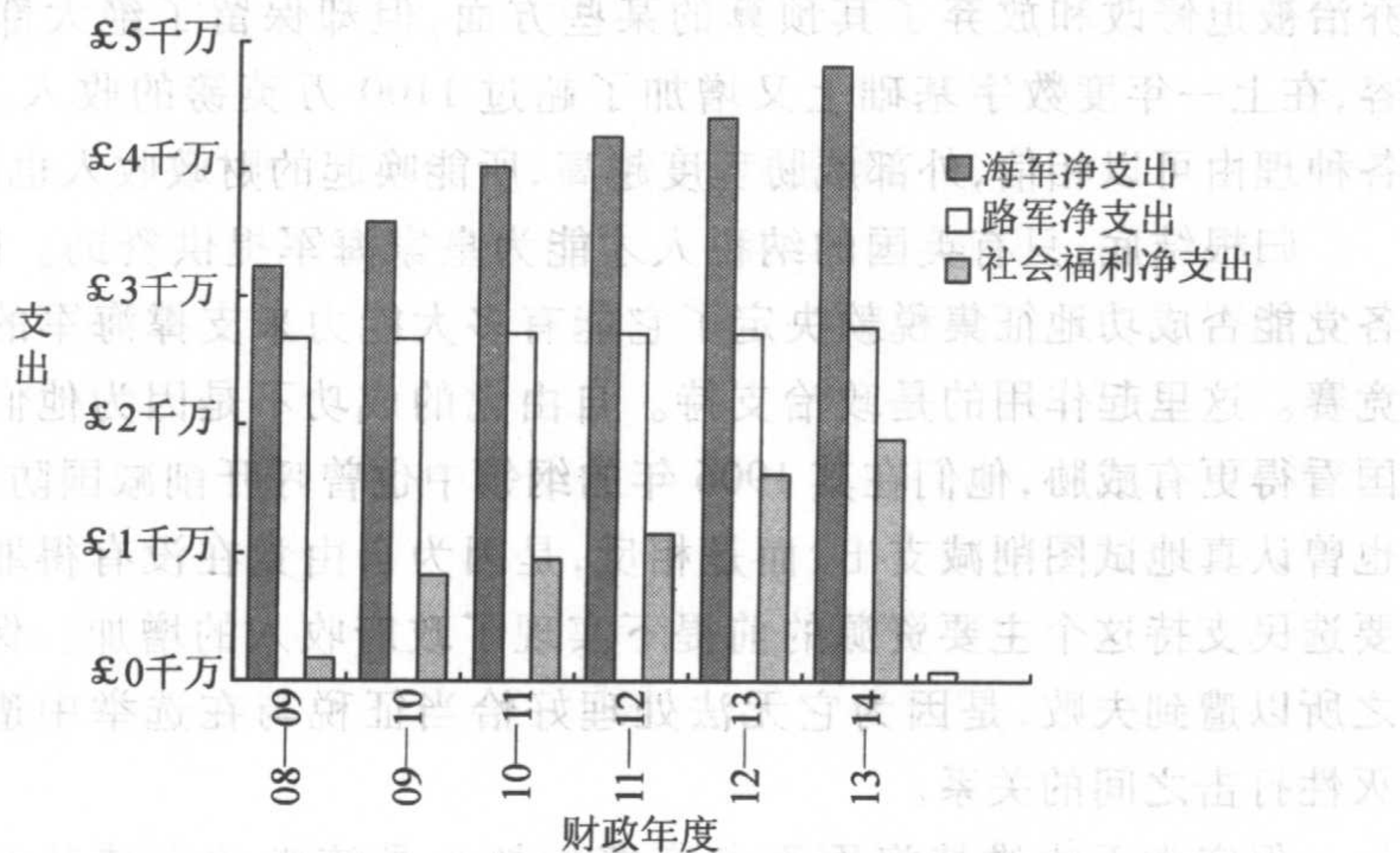


图 4.5 1908 年至 1913 年国防和社会福利净支出

资料来源:引自 Jon Tetsuro Sumida, *In Defence of Naval Supremacy: Finance, Technology, and British Naval Policy, 1889—1914* (Boston: Unwin Hyman, 1989)。经发行商和劳特利奇(Routledge)同意后使用。

只要将自由党政府的海军支出与前任保守党政府的相应支出加以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1909/1910 年度预算对于英国维持海军竞赛的能力是何等的重要。保守党政府在 1904/1905 年度预算中费了很大的劲才达到了 3690 万英镑的峰值。¹⁰⁰ 到 1914/1915 年度,也就是战前最后一个预算年度,自由党政府的海军预算达到了 5160 万英镑。这一数字远远超出了保守党的任何想像。保守党认为,他们在 1904/1905 年度的预算峰值在政治上是无法持续的;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自由党认为他们在 1914/1915 年度所达到的数量接近了他们所能做到的最高值。考虑到这一点,两党之间的差异就更加令人难忘。

不可否认,到 1914 年已经有了反对进一步增税的微弱迹象。劳埃德·乔治的 1914/1915 年度预算包括了多项增税,用以支付日益增多的海军预算和进一步的社会立法。税收的大部分再次对准了富

⁹⁹ Murry, *People's Budget*, p. 292.

¹⁰⁰ Marder, *Rrom the Dreadnought*, p. 23.

人,因此,再次遭到了保守党的强烈反对。然而这次保守党得到了一部分自由党后座议员(他们大部分是富有的地主)的支持。劳埃德·乔治被迫修改和放弃了其预算的某些方面,但却保留了绝大部分内容,在上一年度数字基础上又增加了超过1100万英镑的收入。^⑩ 有各种理由可以相信,外部威胁程度越高,所能唤起的财政收入也越多。

归根结底,只有英国的纳税人才能为皇家海军提供资助。因此,各党能否成功地征集税款决定了它能有多大能力来支撑海军的军备竞赛。这里起作用的是政治支持。自由党的成功不是因为他们把德国看得更有威胁,他们在其1906年的纲领中也曾呼吁削减国防预算,也曾认真地试图削减支出,而是相反,是因为自由党在没有得罪其主要选民支持这个主要资源的前提下实现了政府收入的增加。保守党之所以遭到失败,是因为它无法处理好恰当征税与在选举中遭受毁灭性打击之间的关系。

保守党无法维持海军军备竞赛的核心是该党的支持基础不稳定。同德国一样,英国保守党在传统上是富人和军事力量的党。这反映在除了在布尔战争时期的压力下之外,他们一直反复拒绝增加直接税。然而工人阶级选举力量的日益增强使得保守党越来越难以扩大间接税。^⑪ 奥斯汀·张伯伦从其所提出的1904/1905年度预算增税方案退却,这明显表明了对工人阶级选票支持的需求。然而保守党退却之后,又没有财政手段来支撑海军竞赛。1906年的选举灾难简直是再次印证了保守党财政收入政策的破产。

但仅有选民支持是不够的。如果英国没有一部使得新的中左联合政府从其选举胜利到执行1909/1910年度预算能够始终遵循的宪法,那么自由党的压倒性胜利将毫无意义。如同在德国一样,英国保守党试图防止增加任何直接税,甚至在有必要维持军事开支时也是如此。但与德国不同的是,英国保守党没有宪法条文来支持他们,因此被扫地出门。1909/1910年度宪法危机中上议院的失败同时也是20世纪英国制造战争能力的胜利。

^⑩ Sumida, *In defense*, p. 194.

^⑪ 1884年《第三次改革条例》之后,工人阶级构成了选民的75%至80%。Russell, *Liberal Landslide*, p. 21.

宪法适应性比较

尽管德国发展迅速,但它要与富裕的英国展开竞争,就必须将更大的国民生产份额投入到军备当中。在迅速现代化的条件下,德国保守党对政权的牢固控制注定了帝国实际上所能动员的资源要少。在英国,如同在德国一样,保守党强烈地反对直接税;在英国,如同在德国一样,工人阶级选民有足够的数量,足够的力量,能够起而阻止任何单纯依赖间接税来扩大财政收入;在德国,保守党能够依赖宪法来抵挡工人阶级的否决,导致几近完全的财政僵局,不断攀升的赤字,以及最终的军事削减。但在英国却无法这样做。让人不解的是,英国更加民主的宪法既是其军事上受到制约的秘密所在,又是在遇到挑战时其军事上取得成功的秘密所在。^⑨

同样,政治机构也起着深远的作用。要想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英国保守党缺少否决权,或为什么德国保守党却拥有它,这就要冒风险开始一个折衷的,最终可能毫无结果的旅程来对历史加以比较:英国是议会制,普鲁士是专制制度;英国是成功的1640年革命,德国是失败的1848年革命;英国是岛国的安全,德国是大陆的脆弱性;英国更加开放,德国是“资产阶级”的寡头政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我们如此广泛地涉足之前,我们应当考虑,两个国家实际差异并不太。而且,也许我们应当把目光相应地限制在直接的比较上。

英国的上议院就像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一样,只有败了之后看上去才像个软蛋。在同时代人当中,很少有人能事先明显看出阿斯奎思和他的同僚们会最终取胜。换句话说,英国保守党比我们现在愿意想像的更接近于拥有否决能力(实际上,据称他们的确拥有这种能力)。最终击败他们的是团结和执政的自由党的强大,是国王不可能组成一个代替性的内阁,是行政权力(甚至是军事力量)的软弱。正如1906年选举所表明的那样,这些因素使得保守党要抵制民众的愿望是不可想像的。

^⑨ 德意志帝国知道自己是建立在军事维持基础上的。人们考虑到这一点,讽刺性就更大了。1871年宪法78条中不少于12条是关于“帝国战争设施”的。实现了绝对统一的一个领域就是在其他州的军队中直接引用普鲁士军事条例(第61条),以及将这些分队合并到“一个统一的军队中,其指挥权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都属于皇帝”(第63条)。

反之,我们很容易把俾斯麦帝国重要的民主方面抛在脑后。^⑭ 假如在德国人民和帝国议会中拥有多数的反对派联合起来,坚持要形成一个政府,并且以拒绝拨款为要挟来支持这一要求,或者是走得更远,假如这样一个政府倾尽全力支持普鲁士的改革和帝国普选权,那么皇帝和他的保守派联盟就会发现自己难以抵挡。即使他们做这样的尝试,征募而来的军队其忠诚性也无法肯定。让德国保守派保持强大,并使帝国保留了特定的统治结构的主要是他们的反对者不团结。天主教党人看不起自由党人;反宗教的社会党人支持俾斯麦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从而暴露了他们的本色;社会党还把天主教徒和自由党人都说成是阶级敌人;自由党人对天主教和社会党人一视同仁,把他们都看成是外国势力(梵蒂冈、革命国际)的代理人。最为重要的,天主教党和自由党人同保守党人一道,以1848年之后欧洲领袖们对待共产党人所特有的那种恐怖和憎恶态度看待社会党人。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赤色分子”是不折不扣的革命分子,与他们永远都是“不可能合作的”(Koalitionsunfähig)。

94

这种不团结本身是德国迅速发展的产物。保守派对官僚机构的控制,以及官员队伍的组成给予改革者的激励程度不如英国,不足以让他们做出妥协和携手联合,这些又强化了这种不团结。保守党似乎永久掌握着政权和官员任免权,这种丰富的资源使得他们能够经常引诱联盟伙伴,最低限度也能分裂和瓦解反对派的努力。德国的扩张政策让其反对者处于劣势。

95

威廉统治时期社会的分裂既为保守党独揽大权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又为其提供了力量源泉。植根于复杂宪法结构中的这种分裂,反过来又主要源自于德国后起的和迅速的现代化:无论是古代的偏见还是最近的不公正,它们都还没来得及向类似于互利和相互理解的“熔炉”之类的东西低头。从这个更深层的意义上说,德国迟到的商业和工业现代性决定了它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败。^⑮

^⑭ 仅就一件事而言,它的国民公民权是非常宽泛的。每个德国成年男性都可以投票;而英国甚至在1884年改革之后,财产限制仍排除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男性。见 R. C. K. Ensor, *England: 1870—191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6), p. 88。

^⑮ 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德国社会的返祖因素推动他们走向了战争进程。见 Joseph Schumpeter, *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 (New York: A. M. Kelly, 1951)。

第五章

国内制约、扩大威慑与大战略的不协调： 1938年至1950年的美国*

阿基·斯坦

国际体系中的大国行使着超越其自身边界的权力和影响。它们觉得有必要对那些它们认为其生存至关重要的其他国家做出承诺，确保其军事能力不仅能捍卫自己，而且还能胜任它们做出的任何国际承诺。对于美国来说，国内政治对军事开支和扩大海外承诺的制约延迟了它从一个潜在大国向一个羽翼丰满的大国的转变。承认这些国际关系理论当中鲜见讨论的制约条件是，理解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美国大战略莫名其妙地缺乏协调的重要先决条件。

一般而言，成功的威慑既需要承诺，也需要能力。能力对于可靠的报复性威胁是至关重要的。但必须有可信的承诺和清楚的愿望及意图信号与之相匹配。如果对手不知道行为预期，不相信报复威胁，威慑战略就不会获得成功。尤其是当一个国家希望扩展威慑，在防止针对本国攻击的同时还防止针对他国的攻击时，就更是如此。^①

20世纪美国大战略的目标是维持海外均势，对其他国家提供延展威慑。为了这些目标，美国卷入了两次世界大战。自1945年以来，它维持海外军事基地和驻军，对其他国家做出了广泛的安全承诺。

* 本文初稿提交于1990年3月15—17日由UCLA组织的“大战略政治经济学研讨会”。感谢与会者、匿名评阅人、Amy Davis和Robert Jervis对本文所做的评论。我还感谢Elizabeth Bailey、Alan Kessler和Cherie Steele所做的研究助理工作，感谢皮尤纪念信托基金会(Pew Memorial Trust)资助的国际关系中心经济与安全项目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学术评议会。

① 有关对成功威慑的前提条件所做的实证性评估评论，见Jack Levy，“Quantitative Studies of Deterrence Success and Failure,” in *Perspectives on Deterrence*, ed. Paul Stern, Robert Axelrod, Robert Jervis, and Roy Radn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98—133。

然而,在一个不习惯于在和平时期维持大规模军队或加入联盟的国度里,确保能力和做出向海外延展威慑的承诺激起了国内的反对。美国分裂的政府体制又在制度上加重了这种谨慎。该体制将能力和承诺的责任分置于不同的部门:执行部门的职责是设法获取能力,运用能力,将能力整合到行动计划当中;国会则负责为其提供资金。总统可以不经国会批准而做出国家承诺,而确实也做出过这样的承诺。但国会保留有批准条约和制约承诺的宪法权力。此外,尽管总统可以扩展承诺的范围,但要由军方制定计划和组建实施承诺的军队。这一程序无法确保一个承诺与能力相互匹配的有协调性的大战略。

在本章中,我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朝鲜战争之前的美国大战略做了比较,并提出直到国际危机扭转了国内政治局势之后,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和杜鲁门总统(Harry S. Truman)方能够在政治上确保扩大威慑所需的必要条件。罗斯福及其很多政府成员清楚地知道德国(和日本)构成的安全挑战,并且扩充国家军事力量以应付威胁。然而国内的政治反对使得政府既无法做出能够阻止战争的军事承诺,也无法在欧洲爆发交恶之后而成为交战国,直至美国遭到攻击。相比之下,杜鲁门政府能够在和平时期向一系列国家扩展其安全承诺,但在南朝鲜遭到侵略之前政府却发现它无法获得履行其承诺义务的军事能力。在这两个案例中,国内政治都造成了美国大战略的不协调,只有通过战争才使其得到解决。

对照现实主义观点

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的核心假设是认为国家首要关注的是其自身的生存。国家生存于一个无政府的国际环境当中,它们采纳外交和防务政策(甚至是与之相关的国内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在充满敌意和威胁的外部环境中确保自身的安全。它们必须注重国家权势,尤其要注重相对于他国的权势。它们要通过增强自身的动员能力和寻找盟友来应对不利于自己的均势变化。这种自利性和自发

性的反应带来的结果是出现一种国际均势。^② 均势能够重复发生,这种重复发生确保了稳定与和平。这些是国际关系研究主流学派的核心命题。^③

这一国际关系观点假定,国家奉行的安全政策不受任何国内复杂因素的制约,国家通过结盟或内部动员来维持均势,而其对国际环境变化做出何种反应则不受国内因素制约。如果出现任何均势不平衡,就会产生各种压力迫使国际体制回归均衡,而与国家内部的制度结构或政治毫无关系。

然而,均势有时不会重复发生,或不会现成地出现。也就是说,国家并不总是对不利的均势变化做出反应。大国对国际均势变化做出不恰当的反应有两种情况:它们或者无法改变其国际承诺,或者无法改变其能力。正是由于国家无法对其他国家的侵略扩张马上做出反应,才使得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家似乎自相矛盾地认为,国家有时必须为恢复均势而发动战争。然而,这些理论家却未能阐明均衡程序为什么会失败而导致战争。他们没有分析国家为什么没能马上而充分地对抗权势分配的不利变化做出反应,自私性的民族国家为什么不能总是部署足够的力量来威慑攻击。均势重复出现的失败至少表明,该体系的内在逻辑(imperatives)不能完全决定国家行动的性质。

98

对于现实主义理论来说,战争以及无法迅速重建均势平衡这个问题就如同经济学中非情愿性失业问题一样。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当中,据认为价格经常调整,并因此而实现供需平衡。同样地,作为劳动力价格的工资也应当调整,以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确保不出现任何非情愿性失业。但是,由于确实存在着持续性的非情愿性失业,所以平衡机制充其量也是不完善的。在国际关系当中,长期地偏离于均势平衡也必须通过平衡程序中存在着的某种形式的棘手性

^② 这相当于经济学中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即个体的自我利益能够确保集体福利的最大化这一命题。

^③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stickiness)来加以解释。^④

扩展过度和不足的问题

国内政治制约因素和内在逻辑对支撑一个大国大战略的两个关键维度都能产生影响：国际承诺的扩展和收缩以及为履行国际承诺和确保扩展威慑成功而必须部署的足够军事能力的变化。既然政治制约因素能够在这些维度中以不同的方式运作，那么如果承诺和能力不能完全同步，就会造成一个国家大战略的不协调。

99

一个大国如果因为能力不足而无法支撑其所做出的扩展承诺，就属于扩展过度。^⑤ 当政治精英们在政治上可以无拘无束地做出扩大威慑的承诺，甚或是出于迫不得已而做出承诺，但同时在经济上或政治上又受到制约，无法获得必要的能力来履行这些承诺时，就会出现扩展过度。

承诺和能力不对称的可能性将导致表 5.1 中所描述的四种可能局势。现实主义描述的扩展威慑和对国际均势变化做出的平稳反应假定承诺和能力都不受政治因素的制约(第 4 栏)。如果存在着对能力的制约但对承诺没有制约就会出现过度扩展(第 2 栏)。这种局势对修正国和维持现状国都是危险的。它所界定的利益超出了它们能够捍卫的能力。相反，如果承诺受到限制，并且无法反映能力和利益，就会出现扩展不足(第 3 栏)。修正国如果受到制约就不会构成挑战；维持现状国如果受到制约就无法扩展威慑。当维持现状国的

^④ 我在本章中提出，这种棘手性是国内因素对核心决策者构成制约的一个功能。对持续性偏离和均衡失败的另一种解释是强调由不确定性和误解造成的问题。将最近的微观经济学成果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从而揭示出不确定性在解释无法获得现实主义者所预期的均衡中的作用，见 Paul Papayoanou,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The Strategy of Commitment and Great Power Politics"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92), chap. 2.

^⑤ 甚至当承诺与能力同步时，也会出现扩展过度。因为当国家扩展时，在扩展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很多敌人，从而造成自身的孤立。这是国际关系理论中讨论的经典例证：由于扩张会产生相反的均衡反应，所以会造成自我失败。过度扩展的第二个范例是国家做出了它所无法履行的承诺。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是出于地缘政治和技术上的原因，因为国家在军事上无力履行这些义务。比如在 1939 年，英国如果不征得苏联的同意，就不存在履行其对波兰所做承诺的物质条件。同样地，在 1990 年至 1991 年美国如果得不到沙特阿拉伯的认可和支特，就不可能履行从伊拉克人手中解放科威特的承诺。

承诺和能力都受到国内制约时,它就会面临最大的危险(第1栏),除非修正国也面临同样的制约。

表 5.1 对承诺和能力的国内制约

		受到制约		承 诺 不受制约	
能 力	受到制约	对国际事件无反应 (1)	过度扩展 (2)		
	不受制约	扩展不足 (3)	现实主义的扩展威慑 (4)		

一方面,大国(尤其是首次获得大国地位的国家)会出现扩展不足。相对于它们的权势和利益而言,没有做出足够的承诺。批评美国在两战之间时期的外交政策的人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另一方面,成熟的大国更容易过度扩展。政治因素将承诺和能力相互脱节的可能性产生了这样一种前景:国家在想像中以为它能够履行其所做出的善意承诺,但由于国内政治的制约,它实际上无力履行其承诺。认为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战略是过度扩展的评估就呈现出这样的特征。很多人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做出的承诺超出了其军事能力和财政能力,因此它应当减少承诺。然而,并没有足够的分析表明美国无力履行其义务。相反,国内的政治制约只是表明没有提供足够的力量来履行国家所做出的全部国际承诺。那些认为扩展过度的人将制约看做是固定不变的,认为承诺遭到剪裁是理所当然的。而对此持批判观点的人则认为,国家能够承受这些承诺,需要做的只是改变其支出的先后顺序,使财政部门符合要求。他们提出,国家实际上不是承诺过度,而是动员不足。^⑥

本文下面提出的观点认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是扩展

^⑥ 1988年,随着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间的经济变革和军事冲突》(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一书的出版而引发了这一讨论。批判性的评估见 Aaron L. Riedber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and Strategy," *World Politics* 41 (April 1989): pp. 381—406; and Charles A. Kupchan, "Empire, Military Power, and Economic Declin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3 (Spring 1989): pp. 36—53。其他评估(主要是对肯尼迪的批判)包括: Henry R. Nau, *The Myth of America's Decline: Leading the World Economy into the 199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Joseph S.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and Richard N. Rosecrance, *America's Economic Resurgence: A Bold New Strateg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90)。

不足,在冷战初期年代中是扩展过度。在前一时期,国内的政治制约妨碍了做出与能力和利益相匹配的承诺。而在后一时期,国内的政治制约妨碍了获得足够的军事能力来确保军事承诺的实施。在这两个时期,国内的政治制约都使美国决策者们无法使承诺和能力相一致。

美国的扩展不足:在交战世界中的中立和准备程度

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决策者们对德国和日本向现存国际秩序挑战所做出的政策回应是企图遏制这些国家的野心而同时避免战争。^⑦ 尽管罗斯福总统使军队的能力得到了巨大的扩张,但国会立法和公众情绪使他无法做出遏制侵略所需的那种程度的承诺,罗斯福的直接反应只是口头上和经济上的,对德国和日本实施制裁。^⑧ 甚至是战争临近时,国会仍通过一系列中立法律,要求美国在其他国家爆发战争时实行一种强制性和非歧视性的武器禁运。

罗斯福无法有更多的作为,只能小心翼翼地发出美国有可能卷入的信号,希望藉此既能威慑希特勒,又能坚定英国和法国的信心。在1938年捷克危机期间,甚至像罗斯福这样的人物也只能向英国大使林赛(Sir Ronald Lindsay)保证说,如果爆发战争,美国将向英国提供有限的支持。他还告诉林赛说,泄露他们之间谈话的内容将会招致对他的弹劾。^⑨ 但正如林赛对其上司所解释的那样,总统个人愿意向英国提供一切援助,但部队和贷款实际上无法落实。英国能够得

^⑦ 这一讨论主要吸收了下列作品的观点:Wayne S. Cole, *Roosevelt and the Isolationists*, 1932—1945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3); Robert Dallek,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William L. Langer and S. Everett Gleason, *The Challenge to Isolation, 1937—1940*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52); William L. Langer and S. Everett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1940—1941*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53); C. A. MacDonal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Appeasement, 1936—1939*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1); David Reynolds, *The Creation of the Anglo-American Alliance 1937—1941: A Study in Competitive Co-opera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2); Donald Cameron Watt, *How War Came: The Immediat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8—1939* (New York: Pantheon, 1989).

^⑧ 我发现用“无承诺”和“反对干预”来概括此时的特征比“孤立主义”这个标准的历史标签更好。正如一些人所指出的,使用“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这类的标签本身就等于已经接受了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的讨论框架,这已经代表了一种政治判断。见 David Green, *Shaping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America from McKinley to Reag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⑨ Dallek, *FD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 164—165.

到什么样的实际援助将取决于美国的公众舆论和国内政治。^⑩

罗斯福还试图让德国对美国的中立态度产生怀疑,甚至暗示美国有可能进行干预。在1938年年中,海军的年度舰队演习选在了大西洋,而不是通常的太平洋基地。9月,美国组建了一个大西洋海军中队,派遣了两艘战舰到英国港口。然而,罗斯福仍然摆出姿态向美国人保证国家不会卷入战争。比如在决定向英国派出战舰之后,又否认美国正致力于“阻止希特勒运动”^⑪。

整个这一时期,罗斯福传递的是各种混杂的信号,因为他有着多重的观众。他想利用美国卷入欧洲战争的可能性来遏制德国的进一步侵略;他希望让英国和法国确信美国的支持;与此同时,他还需让美国人和国会相信,他不会将他们领入冲突当中。

102

罗斯福既担心美国不能做出承诺,又忧虑能力不足,无法威慑希特勒。1938年捷克危机之后,他抱怨说,“我必须拥有某些东西来履行我的话。假如今年夏天我们有5000架飞机,并拥有每年生产10000架飞机的能力,即便我不得不请求国会批准才能将其卖给或借给欧洲国家,希特勒也不至于胆敢像这样胡作非为。”^⑫尽管采取了中立立场,但他认为,如果他拥有了所需的能力,他同样能够遏止希特勒。

1938年初,美国开始增加军费开支,并且在年末这种增加得以加速。秋末,罗斯福开始竭尽全力要重建美国防卫力量。^⑬总统看到了欧洲战争幽灵,想在交恶开始之前建设一支适合需要的海空军力量。

罗斯福通过兜售纯粹防御计划而确保了能力的增加,然而各种制约使他仍然无法做出任何使用这些能力的承诺,尽管那些支持中立的立法人员在增加防务开支和重新武装问题上出现了分裂,但他

^⑩ Reynolds, *Creation of the Anglo-American Alliance*, pp. 34—35. Reynolds 提出,英国对战争援助怀抱希望的同时,还存在着对美国可靠性的忧虑和对美国是否能成为盟友的担心。另见 John Charmley, *Chamberlain and the Lost Peace* (Chicago: Ivan R. Dee, 1989)。

^⑪ MacDonald, U. S., *Britain, and Appeasement*, pp. 95, 97. 经济制裁总是传递美国政治不满信号的最简易的方式。简要汇编见 Frederick W. Marks III, *Wind Over Sand: The Diplomacy of Franklin Roosevelt*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8), p. 131。

^⑫ 亨利·摩根索引自罗斯福。John Morton Blum, *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 Years of Urgency, 1938—1941*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65), p. 49。

^⑬ 麦克唐纳在《美国、英国与绥靖政策》中提出,美国在1938年10月开始从对德国的绥靖政策转向遏制政策,早于英国的政策转变。1939年初英国继续奉行绥靖政策让美国感到恼火。

们却一致地反对美国卷入海外战争,并希望国家避免做出更多的承诺。一些人支持增加防务开支为的是提高国家的安全。而另一些人反对新增拨款是担心这会增加国家卷入战争的机会。尽管军事开支的请求总是能得到批准,但它们又总是引起国会对美国的意图和承诺产生疑问。

然而总统既想扩大承诺,也想扩大重新武装。所以在其1939年1月的工会讲话声明中,修改中立法和重新武装成了他发言的孪生焦点。他提出,撤销中立法对于美国向盟国提供保障和阻止阿道夫·希特勒的进一步侵略是至关重要的。

103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甚至在国际局势日益恶化之际,罗斯福在国内政治中却不断遭到削弱,无力改变国家的中立法。在他认为很可能遭到落选的第二任期的后半部分,他面临着巨大的国内问题和不断的政治挑战。继1937年至1938年新一轮经济衰退和他计划解散最高法院造成的危机之后,罗斯福遇到了国会毫不妥协的反对,而1938年选举又强化了这一阻力。中立改革在国会遭到失败。

罗斯福对德国挑战的关注还反映在美国战争规划的演变上。在20世纪30年代末,规划的关注焦点仍然是太平洋战争。然而随着德国侵略意图越来越明显,美国的规划者们开始提出两洋战争蓝皮书。到1939年春季,他们建议将主要目标放在大西洋。^⑭

1939年9月欧洲战争的爆发改变了美国大战略问题的性质。罗斯福无法再指望防止欧洲战争,剩下的惟一悬念是美国最终将以怎样的特征卷入战争。尽管国内情绪明显同情盟国,但人们仍然倾向于不卷入战争。所以,当罗斯福决定再次请求国会修改国家中立法时,所用的词句仍然是如何不使国家卷入战争。尽管国会撤销了对交战国的武器禁运,但却强加了现金和运输条款,不允许向外国买主赊销,并要求他们用自己的船只运输所购武器。尽管国会同意不再严守中立,但并不承诺为盟国提供资金用来购买美国军火供应。它之所以坚持让外国船只运送这些货物,就是为了确保不为向美国船只开火提供借口,以保证美国免于卷入战争。国家改变了中立性的

^⑭ James R. Leutze, *Bargaining for Supremacy: Anglo-American Naval Collaboration, 1937—1941*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7), p. 37. 但反映假设变化的具体步骤仍然保密。比如1939年初与英国海军恢复对话就是秘密进行的,以免冒修正中立法之危险。

不承诺政策,代之以不交战政策。

1940年春夏德国的进攻加速了美国的重新武装。德国于4月入侵丹麦、挪威,5月入侵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和法国,8月开始轰炸英国。进攻法国之后,罗斯福提出了12亿美元的特别防务拨款请求。不到两周时间,他又请求追加13亿美元。到年中,国会提供了50亿美元拨款。

虽说美国以扩大军备作为回应,但它仍拒绝做出军事承诺。在20世纪的整个40年代,法国和英国不仅乞求总统提供军事装备,而且还提供军事承诺。法国遭到攻击后,法国总理告诉美国大使,他请求美国总统或者对德宣战,或者宣布“美国为了维护其至关重要的利益不会让法国和英国遭到失败”。罗斯福的回答是,他将尽力提供一切必要的物质援助,但不会做出军事承诺。有一次,他要求英国和法国对他就美国会提供什么样的援助所进行的沟通严守秘密。他还经常强调,他所做出的声明和表达的信息“绝不包含军事承诺的含义”,那是国会的特权。^⑤

104

尽管国会阻碍,但罗斯福在设法摆脱美国的中立法问题上变得越来越大胆。在1940年和1941年的整整两年当中,他都在设法找出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方式来支援盟国。为了向现金不足的英国提供非常急需的驱逐舰,他利用行政协议(executive agreement)来处理了此事。^⑥既然美国法律禁止向交战国提供贷款,总统条例就用驻军权(basing rights)代替了现金。

1940年大选揭示出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做好开战的准备。与过去历次选举中外交政策无足轻重不同,在本次选举中美国与欧洲战争的关系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竞选迫使罗斯福保证不再进一步卷入盟国事务当中。^⑦

尽管两党都采纳了不干涉主义纲领,但竞选使两位国际主义候选人相互争斗,外交政策成了竞选的主题。共和党候选人温德尔·威

^⑤ Dallek, *FD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 222, 230.

^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重新武装、对自身防务的关注以及对军事的需求竟与对盟友的援助发生了冲突。支持重新武装的孤立主义者们声称,美国在军事上无力承受向那些生存能否持续尚不明朗的其他国家出售急需的装备供应(他们得到了某些军事部门的支持)。结果是,政府不得不经常向国会保证说,向盟友售出的装备是过时的,或是多余的。

^⑦ 有关竞选纲领的讨论见 Cole, *Roosevelt and the Isolationists*, pp. 391—394.

尔基(Wendell Willkie)开始强调孤立主义主题。出于竞选失败的担心,他开始争论说,罗斯福的再次当选将把美国拖入战争。这一战略似乎奏效。他的民意测验得分开始攀升,与罗斯福相差不到4个百分点。

105

威尔基的战略迫使罗斯福的口头立场发生了转变。总统同时强调他要加强国家防务,决心不使国家卷入战争,他憎恨侵略者,他同情遭到攻击的国家,他绝不奉行绥靖政策。但迫于党内其他领导人要求对威尔基做出回应的压力,罗斯福宣布,“自1935年以来的整个期间都没有卷入,将来也不会卷入。”就战争的可能性他保证说:“我以前说过,但我还将一次再一次地说:你们的孩子不会被送往国外作战。”^⑮

1941年,总统在公开场合仍继续限制美国做出承诺,而背地里却千方百计要援助盟国,并与英国秘密进行联合军事规划。1月,他提出了租借法案。通过这一安排美国就能够向英国租借装备,待战争结束之后再归还或偿还。这样做就用不着改变美国禁止扩大贷款和要求现金支付的法律。在国会讨论和实施(租借法)之际,政府尽管一再否认向海外派军的计划,但实际上已与英国和加拿大秘密商讨发动战争的军事战略。尽管美国不便做出参战的公开承诺,但盟国已首先就联合对德作战达成了协议。

1941年8月,罗斯福会晤丘吉尔商讨联合作战的目的,丘吉尔非常希望美国做出参战的承诺。罗斯福拒绝了这一请求,说国会将成为他的绊脚石。丘吉尔在对其内阁做报告时指出,罗斯福“在与国会的关系上是如履薄冰”,“如果他要将在战争与和平问题提交到国会,他们将会就这一问题讨论三个月”。丘吉尔注意到,总统所要采取的行动进程正相反,“总统……说他将会发动战争,但不是宣战。他将会越来越具有挑衅性。如果德国人不喜欢这种挑衅,他们就会攻击美国军队……要采取各种办法酿成一场‘事件’……总统……清楚地表明,他将寻找一个‘事件’为他公开交恶提供合法的借口”^⑯。

106

^⑮ Cole, *Roosevelt and the Isolationists*, pp. 399—400. 在竞选时期把自己说成是和平的使者,当选后又把国家拖入战争,在这方面罗斯福既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后一位总统。威尔基明白其中的含义。他发怒地说道:“婊子养的伪君子!”“这是想打败我”。引自 Walter LaRever, *The American Ag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t Home and Abroad since 1750* (New York: W. W. Norton, 1989), p. 376.

^⑯ Reynolds, *The Creation of the Anglo-American Alliance*, pp. 214—215. 总统在早些时候甚至告诉他的很多内阁成员说,他确信美国最终将参战,但他希望是被迫参战。有关罗斯福希望被迫参战的证据汇编见该书第347页,第38项。

总统的政策选择是援助而不是战争。甚至当欧洲局势恶化时这一政策仍未变化。他从不认为他会宣战,使美国卷入战争。1941年10月,尽管很多美国人主张完全取消中立法,但罗斯福向立法机构提交的请求只是做不大的变动,即批准武装美国的商船。修正案只以18票的微弱多数在国会通过。

尽管所发生的事件把美国推向了欧洲战争,但美国也没有马上这样做。日本袭击珍珠港引起了白宫关于是否同时向德国和日本宣战还是仅向日本宣战的讨论。在袭击珍珠港的次日,罗斯福总统驳回了一些顾问们的主张,请求国会仅向日本宣战。美国将等待,直到德国对美国宣战后美国才会对德宣战。德国感谢并解决了罗斯福的问题。^②

希特勒并没有受到美国行动的震慑,也许他不可能被震慑。他对美国理解当然不可能老练熟谙,但他完全了解美国的国内政治以及公共舆论和中立法带来的制约。因此,他对美国的警告和行动不屑一顾,将其视为是“吓唬人的政治游戏”(bluffpolitik)。^③

此外,希特勒看到了对罗斯福构成种种制约的性质,并按自己的理解行事。1940年和1941年整整两年间,美国向英国运送的装备越来越多,美国海军还扩大了在北大西洋的防卫行动。德国海军完全有理由把美国当作敌对的交战国来对待,但希特勒却始终命令德国舰船避免与美国正面冲突。^④ 他对美国越来越多的卷入做出的反应

107

^② Reynolds, *The Creation of the Anglo-American Alliance*, pp. 220—221. 有大量作品研究了德国的决策。见 Saul Friedlaender, *Prelude to Downfall: Hitler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39—1941* (New York: Knopf, 1967), pp. 306—309; H. L. Trefousse, *Germany and American Neutrality, 1939—1941* (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es, 1951), pp. 137—151; Holger H. Herwig, "Prelude to Weltblitzkrieg: German's Naval Policy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1939—1941,"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3 (December 1971); pp. 649—668; Gerhard L. Weinberg, "Hitler's Im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9 (July 1964): pp. 1006—1021; Milan Hauner, "Did Hitler Want a World Domin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3 (January 1978): pp. 15—32; Gerhard L. Weinberg, "Germany's Declaration of War on the United States: A New Look," in *World in the Balance: Behind the Scenes of World War II*, ed. Weinberg (Hanover, N. 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1), pp. 75—95; and Herwig, "Miscalculated Risks: The German Declaration of War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1917 and 1941,"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39 (Autumn 1986): pp. 88—100.

^③ MacDonald, *U. S., Britain, and Appeasement*, p. 181. 另见 James V. Compton, *The Swastika and the Eagle: Hitl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The Bodley Head, 1968), p. 31.

^④ Compton, *Swastika and the Eagle*, chap. 10; Trefousse, *Germany and American Neutrality*; Herwig, *Politics of Frust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German Naval Planning, 1889—1941* (Boston: Little, Brown, 1976).

也比较温和。对国会通过《租借法》德国没提出任何抗议,也从未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

尽管国会限制美国卷入欧洲战争,但它却支持罗斯福建造国家军事能力的努力。军事开支从1934年的低水平上逐年急剧增加,^②在整个30年代的增加幅度都不低于两位数百分比。在1938财政年度,政府的整个开支出现下滑,但国家防务预算仍增长10%以上。国家防务开支占政府全部开支的比重从1934年的不足7%增加到1939财政年度的13%以上;1940年上升到17%;1941财政年度几乎达到50%(见表5.2)。

表 5.2 美国国防开支 1934—1941(百万美元)

财政年度 ^a	全部开支	国防开支 ^b	国防开支占全部开支的百分比	国防开支年增长百分比
1934	7105	480	6.8	—
1935	7376	534	7.2	11.2
1936	8880	764	8.6	43.3
1937	8001	844	10.5	10.4
1938	7409	934	12.6	10.6
1939	8707	1140	13.1	22.1
1940	8998	1580	17.6	38.6
1941	12711	6301	49.6	298.8

资料来源:美国预算局:《美国政府预算》1935/1936—1942/1943年卷。数字源于总预算摘要和支持安排2。1938年数字是根据1938/1939年度估计的。

^a 财政年度6月30日。比如,1939年数字指1938年7月1日至1939年6月30日期间的开支。

^b 国防开支数字中不包括海军和陆军部开支中的非军事支出。比如,陆军部也开展河流和港口建设以及防洪工作,但这些都不包括在国防开支当中。因此,在1935—1940年间,陆军和海军的实际开支超过了上面提供的数字。国防开支数字还包括除陆军部和海军之外的其他各相关部的开支以及诸如《租借法》这样的防务援助开支。1941年,国防开支的比例超过了陆军部和海军部的开支。

实际上,国会不仅仅只是默认总统的愿望,而且常常超出他的渴望。1934年,用于军事目的的开支很少,总统又将划归给陆军部的拨款扣留了16%,于是国会准备在总统的请求之外批准更多的开支。

^② 以1789年到1970年陆、海、空军支出占联邦总预算的百分比为基准。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1976), data Series Y457, Y459, Y460.

从 1936 财政年度开始,国会不仅同意总统的请求,而且还常常进一步增加拨款(见表 5.3)。

表 5.3 总统请求与国会安排,陆军部 1934—1941

财政年度 ^a	A 栏	B 栏	C 栏	变化百分比 ^c A 栏到 B 栏	变化百分比 A 栏到 C 栏
	总统预算估计	拨款 ^b	拨款和动用紧急基金款项		
1934	281	281	378 ^d	0.2	34.6
1935	289	284	293	-1.8	1.3
1936	320	359	369	12.0	15.0
1937	391	402	420	2.8	7.4
1938	429	439	514	2.4	19.9
1939	619	617	648	-0.3	4.8
1940	869	861	880	-0.9	1.2
1941	11 208	13 469 ^e	13 469	20.2	20.2

资料来源: *Congressional Record*, June 23, 1942, pp. 5493—5494.

^a 财政年度截止于 6 月 30 日。数字四舍五入到百万美元。

^b 包括陆军部年度拨款,合同批准和补充拨款。

^c 百分比变化是按四舍五入前的实际数字计算的。数字仅包括陆军部,不包括海军部。

^d 总统留用了其中的 6260 万美元,其余 3.15 亿美元拨出。

^e 由于各种各样的补充拨款和不同的财会定义,1941 年的拨款数字远高于该年的支出数字。

国防开支的大幅度增加为美国建造大国权势提供了必要的财力,很快就超过了未来敌国在这方面的努力。比如,它对不断增长的日本海军实力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到 1939 年 6 月,美国的相对海军吨位已不再继续下滑,对日本的海军优势开始再度增加(见表 5.4)。

表 5.4 主要大国海军战舰总吨位

年 ^a	美国	大英帝国	日本	日本/美国
1935	1 084 910	1 188 284	748 997	0.69
1936	1 080 715	1 224 329	772 797	0.72
1937	1 083 330	1 216 398	745 594	0.69
1938	1 100 890	1 295 303	918 499	0.83
1939	1 240 040	1 381 373	985 394	0.79
1940	1 310 260	1 308 019	1 016 574	0.78

资料来源: *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 1935—1940。不幸的是,接下来的报告没有继续提供这些比较。

^a 为各年 6 月 30 日的数据。

注:战舰的种类包括那些华盛顿与伦敦海军协定中受到协商限制的舰种,包括主力舰、航空母舰、巡洋舰、驱逐舰和潜水艇。

美国空军力量的增长更惊人。1935年,美国生产的军用飞机不足日本的一半和德国的六分之一(见表5.5)。但是到1941年底交战之前,美国的军用飞机生产已经超过这两个国家,同时还保留着大量的商用飞机生产能力,它很容易转换成战时所用。

表 5.5 飞机生产:美国、德国和日本,1935—1942

年	日本	德国	美国军用	美国合计 (民用和军用)
1935	952	3183	459	1710
1936	1181	5112	1141	3010
1937	1511	5606	949	3773
1938	3201	5235	1800	3623
1939	4467	8295	2195	5856
1940	4768	10 247	6019	12 804
1941	5088	11 766	19 433	26 277
1942	8861	15 409	47 836	47 836

资料来源:

德国: Richard J. Overy, *The Air War, 1939—1945* (New York: Europa Publications, 1980), pp. 21, 150。对战略轰炸调查机构所提供资料中某些年份的数据进行了少许修正,应当慎重使用 Overy 的表格数据。该书两个表格中提供的不同国家飞机生产数据使用了不同的美国数据。在 1932—1939 年表格中,使用的是美国军用飞机生产数字。在 1939—1945 年的第二个表格中,使用的是美国民用和军用飞机的合计数字。因此,毫不奇怪,两个表格中关于 1939 年美国飞机的生产数字有很大的差异。Paul Kennedy 对 Overy 书中的这两个表格进行了改造,见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p. 324, 354。

美国: Rudolf Modley and 'Thomas J. Cawley', eds. *Aviation Facts and Figures: 1953* (Washington, D. C.: Lincoln Press, for the Aircraft Industries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53), p. 24。

日本: The Japanese Aircraft Industry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Aircraft Division, May 1947), p. 155. 另见 p. 1。该数据似乎是全部飞机的生产数字,尽管这并不清楚。给人的印象是,1941 年和 1942 年的数据是纯粹军用飞机的生产。该数据包括了滑翔机的生产。另一个资料来源显示,1939—1942 年德国和日本的数字是军用飞机。见 Irving Brinton Holley, Jr., *Buying Aircraft: Materiel Procurement for the Army Air Forces,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 Special Studies* (Washington, D. C.: Department of the Army,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1964), p. 555。

注:1935—1938 年德国和日本的数字可能包括了一些民用飞机的生产。资料来源中在这一点上并不清楚。

到1941年,甚至没有开始战争动员美国的军事生产能力就超过了德国和日本之和。就动员的军事能力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珍珠港袭击之前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

国会中的孤立主义分子并未能阻碍国家自身的军备动员,但他们却防止了美国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前做出承诺。后来,又制约了美国卷入战争的性质。直到宣战为止,美国一直扮演的是事实上的参战友国的角色,与盟友有着协调的战略和战争目标,但又没有军事介入。

在战前,美国政策运作的特殊制约造成了罗斯福总统的两难困境。重新武装和做战争准备得到了国内的政治支持,但让美国承诺支持和援助则得不到支持。欧洲战争爆发后,制约放松,重新武装的速度加快,除战争之外的援助成为可能。对于每一个落入独裁统治下的国家,美国都能够而且确实做得更多,直到对德国在实质上不宣而战。但更加直接的卷入,甚或是公开承认实际合作的程度在政治上仍是不可能的。

110

实际上,欧洲战争爆发之后所采取的准备措施也只有出于使国家免于卷入战争的考虑,在政治上才被看做是可行的。1940年秋,国会通过了《选征服役法》,批准了征兵。但该法规定,应征者不能到西半球之外的非美国领土去服役。1941年年中,行政部门请求国会将服役期从12个月延长到18个月。众议院只以一票多数通过。尽管它有心解除不允许到西半球之外地区服役的禁令,但行政部门从未提议就此改变付诸表决。反对解除这一禁令的力量过于强大。简言之,战争的准备进程要受到制约,必须确保美国不被拖入战争。

111

结果是,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孤立主义代表的是不做承诺的卷入。国家常常采取清晰的立场,提出各种外交倡议,使用经济手段进行奖惩。作为一种政策描述,“孤立主义”一词是用词不当。人们所说的“孤立主义”其核心是长期不愿意扩展安全承诺来捍卫海外的重要利益,并震慑对这些利益的威胁。美国确保有能力迎接20世纪30年代末的国际挑战,但却从未做出震慑承诺。当震慑失败之后,也没

有公开卷入。^④

为应付国际均势的变化,国内进行了越来越多的军事动员,但却并未扩展军事承诺。美国的大战略之所以无条理,美国之所以扩展不足,只能通过大战略制定过程中的国内政治制约来加以解释。罗斯福总统反对独裁,想以美国的实力做出捍卫先前盟友的承诺,以便震慑德国。但由于国会的政治制约,美国又不可能做出承诺。美国形成了向海外投射权势的军事能力,但却不能做出可靠的承诺。甚至当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援助的性质和条件也是由国会制约形成的,而不是靠行政部门的判断和军事评估形成的。只有当美国遭到直接攻击和其他国家向美国宣战之后,美国才做出了与其能力和利益相一致的承诺。

战后的过度扩展:遣散军队与冷战承诺

112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大战略与20世纪30年代有着很大的不同。国家已经在政治上做好了发挥全球性作用的准备,其中包括做出广泛的国际承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承诺的讨论并不像对获得新的能力的讨论那样广泛。即使美国接受了大国角色,但它仍不愿意花钱建构能够履行其不断增多的义务所需的军事能力。在冷战初期的年代中,政治制约使国家无法获得与其日益增加的全球承诺相匹配的军事能力,并且导致了美国大战略的过度扩展。^⑤

^④ 不仅孤立主义是用词不当,学者的讨论也是不恰当的。声称罗斯福受到国内政治制约的那些学者是正确的,但只是相对于美国的承诺而言。声称罗斯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有可能做得更多的学者也是正确的,但只是相对于美国的能力而言。在美国的备战程度和重新武装方面,总统的领导作用非凡卓著。但在承诺方面显然是遭到失败,并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

^⑤ 这一讨论主要来自下列作品: James F. Schnabel,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1: 1945—1947 (Wilmington, Del.: Micheal Glazier, 1979); Kenneth W. Condit,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2: 1947—1949 (Wilmington, Del.: Micheal Glazier, 1979); Walter S. Poole, *Th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4: 1950—1952 (Wilmington, Del.: Micheal Glazier, 1979); Steven L. Rensden, *The Formative Years, 1947—1950*, vol. 1, *History of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Washington, D. C.: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Historical Office, 1984); and Warner R. Schilling, Paul Y. Hammond, and Glenn H. Snyder, *Strategy, Politics, and Defense Budge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另见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早在二战期间就已明显地显示出,美国在战后世界中将会有广泛的军事责任,这需要有足够的力量。^⑥ 在最低限度上,战争结束后美国将有向战败国派驻军队的义务。因此,它要在世界各地驻军。^⑦

与苏联关系的日益紧张造成了军事承诺的升级,它要求必须建立强大的军事能力。遏制政策尽管常常被描述为是一项政治和经济政策,但实际上它却是一个反映国务院、白宫和军方不同观点的共识性政策。甚至在1946年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关于苏联扩张主义性质的电报流传开之前,军事战略家们就已开始对可能发生的与苏联之间的战争进行规划。^⑧ 到1946年年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坎南报告做出了反应,将苏联描绘成是要“最终统治世界”。其结果,他们主张建立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即不需要动员时间的部队)来“震慑”苏联的侵略。^⑨ 国务院同意国家必须重振军事,以便充分展示出应对苏联扩张的坚定与果敢。

113

同样塑造美国大战略的新技术挑战也强化了海外承诺和扩充军事力量的必要性。国家无法再依赖于相对的地理隔绝和其盟友来为战争动员提供时间。相反,新式武器(导弹和原子弹)的性质要求必须有海外基地和一种前位的军事部署。因为导弹不会在短时间有很远的射程,国家需要有发射这些导弹的基地。与此同时,美国必须设法使潜在敌人的武器尽可能远离美国海岸。出于这种双重需要,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45年秋宣布,要将“部队和装备部署到外层基地”,对外政策不能再建立在“长期的潜在能力上”,那样的动员会耗时太长,无法使国家“在另一场战争中规避灾难”。^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甚至在二战后军队迅速遣散结束之前,人们

^⑥ 在军事方面,见 Michael S. Sherry, *Preparing for the Next War: American Plans for Postwar Defense, 1941—194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尤其见 Melvyn P. Leffler, “The American Concep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Cold War, 1945—1948,”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9 (April 1984): pp. 346—381。

^⑦ 这将需要在世界各地获得穿越领空权和驻军权。

^⑧ 这一时期美国战争规划的进展情况详见 Steven T. Ross, *American War Plans, 1945—1950* (New York: Garland, 1988)。

^⑨ Schnabel,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1945—1947*, pp. 103—108, 163—164。对苏联目标的这一评估是出于白宫的请求而做的。Clark Clifford 和 George Elsey 扩展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应当保留足够强大的军队来遏制苏联,并将苏联的影响控制在目前的区域内。Clifford-Elsey 的报告见 Arthur Krock, *Memoirs: Sixty Years on the Firing Line* (New York: Funk and Wagnalls, 1968), pp. 417—482。

^⑩ Schnabel,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1945—1947*, pp. 138, 148, 90—92。

就开始意识到有必要保持一支相当规模的军事力量。尽管国家的决策者们预见到美国应在战后发挥更加广泛的作用,尽管他们看到了不共戴天的对手要控制世界,但他们还是屈从于公众要求让孩子们回家的压力。1945年6月底,美国军队人数略超过1200万,一年之后,减少到不足300万。国会允许《义务兵役法》延长至1947年3月底作废,到6月30日服役人数已不到160万。

毫不奇怪,防务预算也相应减少,从1946财政年度的420亿美元降至1947财政年度的140亿美元。与此同时,不但美元数量减少了,购买力也下降了。政府试图通过进一步削减开支来克服战后巨大的通货膨胀。在1944财政年度,军事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37.4%,到1948财政年度,这一比例下降到4.4%,甚至低于1941财政年度5.4%的比例。^①

114

总之,国内的政治压力大大加快了军队遣散的速度,而军方则认为,这样做是不明智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James Byrnes)抱怨说,那些主张迅速遣散军队的人有很多又要求对苏联采取强硬路线。与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训谕截然相反,他抱怨说,批评他的人是想让他“拿着根小木棍去大声吓唬别人”。^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美国的能力萎缩,但世界上发生的事件以及美国对这些事件做出的反应又产生出新的安全承诺。1947年3月,英国宣布从希腊撤军。杜鲁门总统随后请求国会同时支援希腊和土耳其。此年晚些时候,杜鲁门批准了一份美国官方政策声明,宣称“东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的安全对于美国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③

但整个1947年和1948年年初,军方一直坚持认为,它无法捍卫这些新界定的美国利益。国家对自身利益的扩展已经过度,如果不增加拨款就不可能做出新的承诺。如果有必要补充部队,就需要局部动员,或实行义务兵役制。^④1948年,参谋长联席会议对美国能否与加入到相互防卫的《布鲁塞尔条约》中的各欧洲国家(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结成联盟的讲座做出了类似的反应。参谋长们认为,既然国家没有维护现行目标的能力,就应避免做出新的军事

① Rearden, *Formative Years, 1947—1950*, p. 310.

② Schnabel,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1945—1947*, pp. 220.

③ Condit,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1947—1949*, p. 26.

④ Ibid., pp. 18, 26, 43—44, 48.

承诺,直到武装力量得到加强。

但是国会的行动削弱了国家的军事能力。国会将总统提出的1948 财政年度防务预算削减几乎 10%。随着征兵的结束,军事人员数量甚至降到了批准水平以下。行政部门响应国会的要求,提出的1949 财政年度预算中进一步削减了防务开支。行政部门还呼吁将上一年的军事人员数字削减 13%。

与苏联的关系日益恶化,美国武装力量的不足越来越明显。1948 年 3 月,一次险些发生的战争让杜鲁门也只是向国会请求补充防务开支 30 亿美元,没能达到军方所要求的 88 亿美元。之所以只提出这一数字,是为了确保 1950 和 1951 两个财政年度的预算平衡。^⑤ 甚至在危机当中,政治制约也妨碍了国家军事承诺的实施。 115

对苏联威胁日益增多的忧虑使人们对战略做出了一系列的重新评估。每一次评估都再次确认了早先的结论。比如,1948 年初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关于美国利益和苏联政策的报告(NSC7)将苏联的“最终目标”描绘成是“主宰世界”。报告认为,作为回应,美国应当加强其武装力量,如果友好国家面临侵略,就应对其提供军事援助。稍后一些的一份文件(NSC20/3)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它的判断是,“在可预见到的将来”,对美国的“最大单一危险”是“苏联领导人有多大的愿望和能力奉行威胁美国安全的政策”。尽管该文件并不认为战争已迫在眉睫,但分析强调苏联有能力控制西欧和中东。鉴于这一现实,美国的目标应当是形成适当的军事力量,以遏制苏联的侵略和履行军事承诺。^⑥

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些一般性声明和一系列更加具体的立场报告做出的反应是重申国家做出的承诺已经过多,没有能力“迅速而有效地”履行其军事义务。因此,它强调有必要使能力与承诺相匹配。

在这样的背景下,军方继续强调避免进一步承诺的重要性。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受集体防务的逻辑,但对尽快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计划反应冷淡,认为“它的规模不应过大,以免造成我们的能力与我们目前和未来的力量不相称”。尽管军方存在顾虑,但国家还是

^⑤ 政府内部对补充预算规模和构成的讨论详见 Rearden, *Formative Years*, 1947—1950, chap. 11。

^⑥ Condit,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1947—1949, pp. 216, 222, 224—225.

历史上头一次在和平时期加入了一个非西半球 (nonhemispheric) 联盟。

116 1949年初,美国加入了这个新组织,并决心保持能够抵御军事进攻的能力,向任何遭受进攻的盟友提供武力援助。^⑤

尽管国家领导人接受了苏联正在奉行扩张政策这一基本看法,尽管他们对美国安全结果的评估并不乐观,尽管国家为此而增加了海外防务承诺,但1948年重新武装的努力昙花一现之后马上又让位于新一轮的经济努力。杜鲁门总统指示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 (James Forrestal) 说,1950财政年度的国防计划开支不得高于145亿美元。但在如何分配该笔拨款时,参谋长联席会议无法取得一致。他们认为,这一拨款数额太少,无法保证国家安全。“仅军事考虑”就需要290亿美元。“最低必要限度的准备”需要236亿美元。维持1949财政年度水平需要186亿美元。在巨大的压力下,参谋长联席会议能够接受的最低额度是169亿美元。^⑥然而,国防部在财政拨款上的全部努力都毫不见效,政府向国会提交的预算维护了总统原来提出的数字。

实际上,削减国防开支的政治压力在国会很明显,这反映在白宫的行动当中。总统任命更富有预算头脑的路易斯·约翰逊 (Louis Johnson) 取代福雷斯特尔的国防部长职务,并指示国防部各部门不得使1951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超过130亿美元。^⑦

鉴于国家的承诺和战争计划,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总统做出的1950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数字无法满足需要,但即便是对这一数字,国会又做了进一步削减。总统则更胜一筹,宣布他不会花光国会批准的全部拨款。1951年预算提交后不久,国防部长约翰逊告诉军方说,1952年的国防预算将基于同样的130亿美元的水平。国会削减开支的压力得到了认可,然后被白宫内化到政府行动当中。这些压力使

^⑤ Condit,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1947—1949*, pp. 377, 381. 加入北约导致了美国战争计划的转变。早先的计划假定欧洲无法防卫,但盟军可以重新夺回欧洲大陆,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然而北约形成之后,美国的战争规划者们力图创造一切条件在欧洲建立一个前位的防御体系。但鉴于财政的制约,如果不重新武装西德,要建立这样一个防务体系是不可能的。为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开始考虑重新武装西德。见 Ross, *American War Plans, 1945—1950*, chap. 6。

^⑥ Rearden, *Formative Years, 1947—1950*, pp. 343—351.

^⑦ 约翰逊野心极大,希望利用财政紧缩把自己弹射到总统位置上去。见 David Callahan, *Dangerous Capabilities: Paul Nitze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0), p. 102。

军方提交的预算请求不得不考虑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最高限额。结果是,1950年6月的军事力量只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7年军事遣散任务完成时的最低点。

然而,在防务开支缩减的同时,世界上发生的事件却对这一有限的预算造成了新的压力。1949年秋季,苏联成功地爆炸了核装置,从而结束了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取得了胜利。这些事件更加突出了美国受到威胁和必须设法保护自己及其盟友的程度,同时也显示出美国有必要增加国防预算。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决策者们重新评估了美国的政策和战略。其结果是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成了冷战开始的标志。然而该文件的大部分内容只是再次展现了早先对苏联目标的评估以及美国可能做出的反应。实际上,该文件包括了先前的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第20/4号文件(NSC20/4)中的各部分内容,并意图对其修改。但是,除了少有的强烈语气之外,该文件与早先的分析不同之处只是发现苏联的威胁“比过去估计的更加直接”。^④

117

除了评估苏联政策之外,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第68号文件还讨论了美国的能力,并提供了一个方案。在这一方面,与先前的分析同样存在着类似和不同。一方面,该文件重申了对“我们实际的军事力量与我们的军事承诺之间巨大缺口”的关注。另一方面,68号文件与过去文件的主要不同是呼吁进行“协调的建造”。它耗资巨大,“需要对国内财政和经济进行重大调整”,包括削减非防务支出和增加税收。文件明确表达了军方主张将军事考虑置于相对重要地位的立场。它认为,必须使预算考虑服从于这样的严酷事实:我们国家的独立或许正存亡悠关。^⑤

^④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1*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p. 287.

^⑤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 S., 1950, pp. 261, 290, 285.* 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第68号文件出现于第234至292页。当该文件传阅征求意见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利用这个机会重新提出了他们在1948年的要求。见 Rearden, *Formative Years, 1947—1950*, pp. 534—535。该文件故意没提供任何具体数字。Dean Acheson 指出,这“并不是一个疏忽”。见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New York: Norton, 1969), p. 374。估计的数字范围从170—180亿美元至350—500亿美元之间。这些数字来源于 Schilling, Hammond, and Snyder, *Strategy, Politics, and Defense Budgets*, p. 321。而 Paul Nitze 估计的数字是350亿到400亿美元之间,见“The Development of NSC 68,”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 (Spring 1980): pp. 170—176。

杜鲁门推迟了就68号文件采取行动,以便对该文件提出的要求对预算和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加以分析。预算局和经济顾问委员会及其他一些部门要求对文件进行评估,总统也说,他不会“乱花钱”。^②68号文件的出笼未能幸免于遭到责难。总统对文件提出的种种建议置若罔闻。直至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总统才于1950年9月批准了这一文件。

实际上,正如68号文件所预见的那样,朝鲜战争导致了美国国防开支的急剧增加。同时,也使美国致力于能力与承诺的统一。在半年时间内,杜鲁门总统三次向国会请求补充国防开支,另加一次请求军事援助。国防开支从1950财政年度的142.58亿美元增加到1951财政年度的532.08亿美元,再增加到1952财政年度的659.92亿美元。^③

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第68号文件如同其前面的几个文件一样,单凭它不足以导致美国国防开支的增加。战后的各种危机使国防预算略有增加,但不足以满足支出水平,更达不到美国各种承诺所要求的水平。而战争则扫除了一切政治障碍,使国防开支急剧增加。^④

国内考虑在形成战后初期美国军事能力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对大战略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美国的军事需求主要不是由国际威胁或考虑支配的;相反,国内制约因素起着突出的作用:希望让士兵们回到家里,恢复和平时期的军事规模,减少军事开支带来的负担,保持联邦预算的平衡。实际上,国家正在承受着盘算风险。它做出并维持着一系列战略承诺,而又不提供履行这些承诺的手段。这种失败的后果是极其深远的。

实际上,国家防务责任与实际提供给军队的资源之间的缺口使战后美国的战略规划者们经常感到为难。参谋长联席会议面临着一位分析家所说的“持续不断的困境”:发明种种战略,使军队能够“以

^② Pool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1950—1952, p. 15.

^③ Ross, *American War Plans*, 1945—1950, p. 139. 军事节俭不光是朝鲜战争的惟一牺牲品。1951年9月,总统要求并接受了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的辞职,因为约翰逊主要是一个经济活动人物。Pool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1950—1952, pp. 60—62.

^④ 有关朝鲜战争影响的讨论,见 Rearden, *Formative Years*, 1947—1950, p. 536; Ross, *American War Plans*, 1945—1950, p. 139; and Robert Jervis, “The Impact of the Korean War upon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4 (December 1980): pp. 563—592. 一位学者对朝鲜战争爆发前在规划1952财政年度预算时试探性提出增加部队规模的请求与该年底战争爆发后批准大幅度增加部队投入做了比较,这一对比支持了上面提出的结论。见 Poole,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1950—1952, p. 71.

静止和不足的力量去完成不断扩大的承诺”。^⑤ 战略家们探讨种种办法来应付强加到他们头上的预算制约,结果他们只能放弃和修改战争规划。

经费不足的结果之一是军队希望国家减少其承诺。财政压力加速了美国结束对德国和韩国的军事占领。实际上,军方希望摆脱捍卫韩国的承诺。^⑥

战略能力的不足意味着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原子武器。起初,由于原子武器在质量上的粗糙和数量上的不足,所以在战后军事规划中只能发挥很小的作用。但是,作为一场潜在战争(军事规划者们假定这场战争是针对苏联的全球性大规模战争。这一假定并没有外交政策的指导意义)中常规力量不足的补偿方式,原子弹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

然而,尽管增加了原子武器的作用,对美国常规力量的制约还有着特殊的含义:规划者们在起初预计,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美国将不得不把欧亚大陆的大片地区拱手让与苏联。

简而言之,美国的战略承诺与能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使得战后史的某些因素受到了质疑。学者们起初对行政决策的智慧普遍持认可态度。这一浪潮之后,冷战史学家们倾向于对美国的决策者们持批评态度。早期的修正主义者只注重美国的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强调美国行动的全球性和帝国主义特征。然而,这些作品即便不是完全忽略了,至少也是贬低了战略问题的作用。与此同时,早期的修正主义者或者是把国内因素看做是经济上的迫不得已,或者是对这些因素视而不见。后来,后修正主义者(postrevisionists)接受了对侧重点的修正,强调美国要奉行一种主动的,而不仅仅是反应式的外交政策。他们特别强调国内因素在解释美国行为中的作用。最近,学者们又开始关注美国战略上的主动是如何威吓苏联进而对冷战造成影响的。

比较之下,我在这里的观点是,美国形成全球性作用的扩展性视

^⑤ Ross, *American War Plans, 1945—1950*, p. 79.

^⑥ 有越来越多的文献探讨了朝鲜战争的起源和美国减少在朝鲜半岛安全承诺的含义。这里首先推荐 Bruce Cumings, "Introduction: The Course of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 1943—1953," in *Child of Conflict: The Korean-American Relationship, 1943—1953*, ed. Bruce Cuming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3), pp. 3—55.

野是基于战略考虑。此外,国内因素并不是助长了而是实际上在起初制约了对这一视野的全面实施。国内因素要求迅速复员、紧缩财政和限制重新武装。尽管苏联会对美国扩展海外承诺以及向其他国家提供军事援助产生忧虑,但据美国军方自己的估计,直到朝鲜战争结束之前,美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并不足以抗衡苏联在欧洲或地中海的力量。

尽管美国的决策者们把苏联看做是战后对美国构成挑战的主要威胁,但他们在最初并不认为这一挑战就是一种直接的军事威胁。然而,军方对美国在任何一场战争中的短期前景的评估相当悲观。美国战略家们预计中的战争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阶段,被从欧洲和中东驱逐出来之后,国家和盟友只能依赖于战略轰炸来重申自己的立场。

鉴于这些战略考虑,美国采用了一种前卫的防卫立场,它要求对苏联周边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尽管在战后初期的几年中军方常常认为对其他国家提供的援助不够,但对美国遏制政策的起源不能像一些学者所表明的那样,被理解成是由政治和经济上迫不得已的因素决定的。^⑦ 国内因素并不支持遏制,而是限制了它。美国采取了一种安全姿态,但并未对其提供足够的资金。

尽管经费不足,但对欧洲和地中海的战略视野并没有改变。资金不足并没有使战略家们改变美国的战争规划。国家只是在亚洲一个地区按照自己的钱口袋重新修整了承诺。比如,由于经费不足,还由于朝鲜在一场大规模战争中的军事作用并不突出,所以国家在战后从朝鲜(半岛)撤出了占领军。

虽说对苏联威胁认识的变化使经费逐步增加,但总体上看国家还是在冒险。起初,分析家们认定与苏联爆发战争的危险还很遥远,所以这一风险是能够承受的。随着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出台,这一看法发生了变化。

毫无疑问,20世纪40年代末,苏联的威胁有所增加。正如其在柏林的行动所验证的,苏联更加武断。随着苏联原子力量的发展,其

^⑦ 乔治·坎南宣称,他被人们所误解,遏制战略没有得到足够的军事手段保障。这些辩解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是不坦诚的,因为遏制政策包含着对其他国家的明确的安全承诺。最初,这些承诺没能获得必要的能力与之相匹配。然而,当面临挑战时,国家或者是必须履行其承诺,或者是放弃承诺。

能力也在扩大。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对此做出的反应是发展新的安全安排,美国则是扩大其安全承诺。但挑战和国家承诺的双向增长并未导致更大的军事努力。

然而,直到朝鲜战争之前,为建设与承诺相符的能力提供资金在政治上仍然是不可能的。朝鲜战争不但带来了资金的增加,而且还扩大了美国的承诺。在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对南朝鲜遭到攻击做出反应的同一天,他还宣布了美国在亚洲的新的安全承诺,其中包括对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海峡进行巡视。在此之前,政府一直避免做出这样的承诺,随后,美国的国防开支迅速增加。一年之内,美国又承诺派地面部队防卫西欧。过去一直被北约排斥在外的土耳其也被吸收为新成员。^④

在其作为一个大国的形成年代,美国的军事政策既反映出国内的制约,也反映出国际上的强制因素。尤其是在一个民主国家,政治因素能够造成承诺与能力之间的脱节。由于不存在对二者的整合机制,所以便出现了持续性的不协调对国家安全政策的损害。

在20世纪30年代末,国内的政治制约排除了对欧洲民主国家的承诺。尽管随着欧洲局势的恶化建立一支能够进行海外参与的大规模军事力量已不是不可能,但政府的公共姿态决定了美国只能在西半球使用武力。因此,尽管罗斯福要求军方开始为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一场战争而进行规划,但他只能就军事能力发表看法,而不能保证美国会在何时与何种条件下参战。欧洲战争爆发后,制约有所放松。但直到美国遭到攻击之前,罗斯福总统仍不能使国家卷入战争。

在20世纪40年代末,战争结束后的环境使国际承诺再次浮现出来。但不愿意为这些承诺提供资金的程度不亚于早先的不愿意扩大承诺。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美国没有明确表达承诺,所以美国经济能够轻而易举地支撑其重新武装。在40年代,美国经济能够支持遏制战略,但国会和政府都不愿意花钱。在这两个时期,国内政治制约都造成了政治方向上的失当,从而妨碍了军事规划。规划者们需

^④ Melvyn P. Leffler, "Strategy, Diplomacy, and the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Turkey, and NATO, 1945—1952,"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1 (March 1985): pp. 807—825.

要将其战略建立在对国家利益承诺和期待有坚定的理解基础之上。^④

国内政治既能使一个国家过度扩展,也能使其扩展不足。^⑤ 过度扩展反映出的问题与其说是缺乏履行承诺的真实能力,不如说是不愿意承担其费用。当美国以一个大国姿态展现于世界时,问题的关键不是国家能做什么,而是要选择做什么。

123

^④ 国内政治制约以何种方式造成国家安全政策的不协调? 在这一问题上,我的观点与系统性的强制因素看法并不一致。这一观点的比较可参见 Barry R. 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France, Britain, and Germany between the World Wa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我认为,战争为这两个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带来了协调一致。日本对珍珠港的进攻和德国对美国的宣战使国家投入了战斗,并进一步推动了为自己和其盟友提供必要的战争物质的国内生产。北朝鲜对南朝鲜的进攻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其作用不在于迫使国家投入战争,而在于验证了美国意欲在战后全球秩序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它提出的问题是,国家向其他国家提供承诺的价值何在,美国是否真正愿意奉行一种前卫的防御战略。尽管南朝鲜并不属于美国官方划定的防卫圈组成部分,但对其边境的进犯使美国不得不为其做出的承诺提供适当的资金,从而承担了这种承诺带来的军事负担。

^⑤ 请将这一观点与 Jack Snyder 提出的观点加以比较,他认为,相互支持是形成帝国主义过度扩展的基础。见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第六章

英国大战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扎拉·斯坦纳

我们都知道,现实主义理论是一套变化无常和转瞬即逝的学说。现实主义能够用于支持绥靖政策,也可用于诋毁这一政策;能够赞扬干预政策,也可以赞扬孤立主义。它也不一定非要把自己局限在(国际)系统的决定因素范围,国内的和经济上的挖掘也可以在现实主义的框架内得到理解。^① 各式各样的内部共识建构,包括政治上相互捧场,或者是由一种等级制的领导制度强加单方决策,也可以通过现实主义的概念视角得到阐释。^② 然而,现实主义至少在成本—效益框架内(既包括国内的压力和制约因素,也包括国际的)必定还是站得住脚的。

然而,几乎没有哪项研究试图从这一框架中剥离出真正重要的独立变量,并且,评估在制定国家政策方面,国内和经济压力在何时或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优先于国际考虑。在我们手头分析的案例中,我们试图表明,国内变量基本上超过了国际变量;在国内范畴内,政治压力在决定英国政策方面比经济制约因素更为重要。这一结果与阿瑟·斯坦(Arthur Stein)在其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大战略的书中所描述的结果形成了对照。斯坦发现美国并不缺少经济能力克服1937年至1939年的国际危机,只是国内的政治愿望不允许这样

124

* Rosecrance 感谢受到皮尤纪念信托基金(Pew Memorial Trust)资助的国际关系中心经济与安全项目以及洛杉矶加州大学学术评议会所提供的帮助。感谢 Deborah Larson、Barbara Rosecrance 和 Arthur Stein 所做的有益评论。Zara Steiner 感谢约翰·D 和凯瑟琳·T. 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对国际安全研究提供的支持。

① 见 Alan Lamborn, *The Price of Power: Risk and Foreign Policy in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y* (New York: Unwin Hyman, 1991)。

② 详见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aps. 1 and 2。

去做。战后初期,尽管政治因素和国际紧迫感要求实行强硬的冷战立场,但美国的经济制约因素不允许实行一种昂贵的外交与国际政策。英国的案例与这些发现截然相反,因为最终导致对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做出强烈国际反应的是国内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这一案例也不同于1985年及其后来俄罗斯对美国挑战的反应(见本书中伊万杰里斯塔的讨论)。

根据伊万杰里斯塔的说法(见表6.1),苏联国内温和派与强硬派之间的分歧最终认可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做出的和解反应。在英国,国内和官方压力的综合因素,包括政府与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绥靖政策之间的分歧,最终决定了对纳粹德国的强烈反应,尽管当时的经济因素使得这种政策极难维持。衰落的苏俄和两战之间时期的英国都面临着来自对手的高度威胁,而且在这种形势下,现实主义提供的是不确定的反应。实际上,英国和俄罗斯做出的反应是非常不同的。在类似的条件下,俄罗斯对美国做出了让步,而英国采取了针对德国的强硬路线(尽管不是先发制人的战争)。^③

125

表 6.1 威胁感受、经济运行与大战略

经济条件		
外部威胁	经济衰退	经济强劲
高威胁	绥靖或先发制人的战争	竞争
低威胁	合作	扩张

英国政策变化的原因与其内部政治结构也毫无关系。与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论述帝国主义过度扩张的著作相反,我们发现,英国在1939年春夏之季任性而固执地挑战德国的愿望并非源自英国宪法或政治制度中特殊利益集团的某种特定平衡。它不是像斯奈德所说的源自于一种带有倾向性的决策方式,也不是政治卡特尔化和

^③ 当然,人们应当注意,在俄罗斯的案例中,美国的政策迅速转向了低威胁,从而助长了苏联的温和反应;而纳粹德国的政策是对被围困的英国加大了压力。这些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英国是强硬分子最终取得了控制权,而在苏联是温和派掌权。

然而按照成本—收益的术语人们还可以争论说,英国应当设法延长它的绥靖政策。因为英国经济和英国武装部队都还没做好准备来承受一场针对德国的长期战争。实际上,苏联在1939年至1941年间对德国奉行的就是这样的政策。英国没有推迟做出反应进一步表明非现实主义因素在决定英国政策时发挥了主导作用。

相互捧场的产物。

相反,政策的变化源自于逐渐抛弃了当时流行的认识信念:即希特勒的要求可以得到满足而不会发动战争,以及他的基本兴趣与欧洲其他领袖们没有什么不同。^④ 1939年3月15日(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英国精英(甚至是英国公众)发现他们流行的看法是错误的,于是他们做出反应,奉行一种几乎是完全相反的立场。这一反应并不是马上发生的。假如德国改变其政策,和解的大门为其保留到了最后一分钟。这种政策转变不是仓卒的,而是累进性的。然而其最后的结果是,英国一步步做好了准备,甘冒大的风险做出了意义深远的阻止德国高压的承诺。

英国的反应有些太绕弯子。认知理论典型地解释了精英们为什么会在事实已不支持他们的时候仍坚持站不住脚的信念。^⑤ 在手头的案例中,尽管张伯伦企图保留他早先的看法,认为能让希特勒恢复理性,但重要的官员和英国公众越来越要求要为希特勒划出一条不允许其逾越的界线。他们彻底抛弃了先前的认知倾向。^⑥ 随着1939年3月31日英国对波兰做出保证,伦敦实际上是给出了他的态度。此后,官员和英国公众坚持英国要履行这一诺言,尽管国际军事因素和经济制约因素并没有预兆要奉行抵制德国的短期政策。

126

用现实主义的术语能理解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吗?如果严格按照成本—收益计算,它无法解释。要推敲(在不同的国际和政治环境下)英国怎样做才能实现现实主义的描述已经超出了本章的探讨范

④ 斯奈德的论述见 Snyder, "Cognitive Approach," *Myths of Empire*, pp. 26—31。

⑤ 见 John Steinbruner, *The Cybernetic Theory of Decis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R. Ned Lebow, *Between Peace and Wa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and Leon Festinger,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所有这些作品都解释了为什么行为者在冲突的信息面前还经常坚持他们的信念。

⑥ 归属理论 (Attribution theory) 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和决策者会改变他们的看法和态度。这一理论假定,人们试图对他人的行为做出因果性解释,这种解释支配着他们的反应。见 H. H. Kelley, "Attribution theory in Social Psychology," in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7): pp. 192—238; Susan Fiske and Shelley Taylor, *Social Cogni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84), chaps. 2—4。与英国抵制希特勒的决策最相关的是归属理论中的性情论变种 (dispositional variant)。见 E. E. Jones and Edward Nisbett, "The Actor and the Observer: Divergent Perceptions of the Causes of Behavior," in *Attribution: Perceiving the Causes of Behavior*, ed. Edward Jones et al. (Morristown, N. J.: General Learning Press, 1971), pp. 79—94。

围,但选择之一是在英国向波兰和罗马尼亚做出保证之前和之后更有力地与苏俄结盟。^⑦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伦敦还可以拖延反对德国的行动,以便把俄罗斯(甚至违背其意愿)拉入到遏制行动中来。^⑧ 希特勒在东欧的目标是以波兰和罗马尼亚为代价获取经济和军事上的好处。他需要多纳茨(Donets)的煤,乌克兰的谷物和巴库的石油。这些目标将不可避免地使他与苏联发生冲突。在英国方面,它本应该在中欧和西欧公开与法国、低地国家,也许还有瑞士结成稳定的军事联盟以抵御德国,让苏联去捍卫东欧,因为不可避免地它将被迫这样做。但从现实主义的成本—效益观点考虑,英国不应当把自己摆在前面去捍卫波兰和东欧其他部分。因为(1)英国和法国在军事上都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2)英国为打败德国而重新武装的成本靠其自身是无法承受的。

127

这样一种探讨方法或许会被看做是与现实主义的系统理论信条不相符,或者会被看做是一种呼吁在现实主义基本原则当中明确包括国内政治因素的观点。很显然,统治者企图保护他们国家的国际地位;在国内,他们也企图呆在台上。在1938年至1939年的英国大战略中我们发现,国内的政治压力决定了英国对纳粹德国所采取的最后决策。这或许有些自相矛盾,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本来不同意那一选择,而是希望继续推行绥靖政策,直到在政治上成为不可能。1939年又明确选择就波兰问题而与德国交恶。这无法通过经济的和军事的因素,或者是通过大量的外部支持来加以说明。因此,从真正意义上说,英国两个最重要的现实主义变量(国际制约因素和经济能力)不足以影响一个主要是根据国内(官方和民众)背景所做出的决策。

诚然,1939年夏天,那些想要相信英国有足够的力量履行其所做出的承诺的官员们发现了令人放心的证据证明德国原比他们想像的要弱,而英国的力量在与日俱增。^⑨ 渐渐地,英国人又回到了他们那

^⑦ 对丧失与苏联结成“大联盟”机会所作的分析见 R. A. C. Parker, *Chamberlain and Appeasement* (London: Macmillan, forthcoming)。

^⑧ 实际上,人们甚至还可以说,苏联遵循了英国本应当选择的政策:短期内延长对德国的绥靖政策。

^⑨ Wesley K. Wark, *The Ultimate Enemy: British Intelligence and Nazi Germany, 1933—193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chap. 8.

固执的信念上,认为英国依然是一个大国,能够捍卫自己不受任何其他大国的攻击。到1940年3月,随着派出远征军支援芬兰反抗苏联的进攻,英国甚至准备除了对付希特勒德国之外,还要对付约瑟夫·斯大林的俄罗斯。待希特勒表明了其敌意,英国的自豪又为它打足气,努力挫败独裁者。

说到底,英国只有在获得了必要的政治共识之后才有可能针对德国采取行动。不幸的是,当英国自身的能力最接近匹敌德国时却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关于英国对德国做出反应的时间问题存在着很多争论,^⑩但人们完全可以说是现实主义铸就了英国在1938年做出的反应。然而,意欲已决的首相在强有力的政治支持下推迟到1939年才采取行动。因此,很难说英国的行动与典型的现实主义(系统)观念相一致。这样的结论与先前对二战前英国大战略的分析有很大的不同。

对导致英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策,现实主义理论提供了两个版本的解释。根据其中的一个观点(由Barry Posen提出,被Williamson Murray所修正),英国除了与阿道夫·希特勒相“抗衡”之外,没有其他选择。错只错在行动太迟。^⑪

128

根据由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阐明,由科雷利·巴尼特(Coreli Barnett)和莫里斯·考林(Maurice Cowling)做了最系统论述的第二个(修订的标准)版本,英国或许根本就不应当参加战斗。^⑫坚持这第二个观点,现实主义者找到了大量理由来解释英国为什么犹豫不决,迟迟不做出针对纳粹德国的军事承诺。历史性的和分析性的问题完全被颠倒了。现在的问题是:“英国怎么会停止了对德国的绥靖政策?”如果是从现实主义和国际因素的角度看,现在应

^⑩ Williamson Murray, *The Change in the European Balance of Power, 1938—1939: The Path to Rui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⑪ 见 Barry 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France, Britain and Germany between the World Wa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and Murray, *The Change in the European Balance of Power*. Wesley Wark 补充说,“在抓住机会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和俄罗斯以构筑一条令人生畏的东部防线方面整整晚了一年,而在期盼改善英法防务方面至少又早了一年。” Wark, *The Ultimate Enemy*.

^⑫ John Mearsheimer,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Maurice Cowling, *The Impact of Hitler: British Politics and British Policy, 1933—19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Corelli Barnett, *the Collapse of British Power* (London: Eyre Methuen, 1972).

当是倾向于让(甚至是迫使)英国放弃对希特勒的遏制。

无论从哪个观点看,英国的政策都是不可思议的。^⑬ 然而,很少有人承认,大战略与其说是由对自己和敌人的能力进行理性评估所形成的,不如说经常是由国内的政治压力所决定,再依据对国际形势剧烈变化的评估而采取行动的。这些力量笼罩着决策者,迫使领袖们反复考虑,重新阐释,甚至是放弃那些曾在前一次危机中决定其行为的算计。

1938年10月慕尼黑事件之后,英国面临的尴尬情况是:纳粹德国要用军事手段统治关键的东欧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这构成了明显的威胁;德国对荷兰、比利时、法国的明显威胁将破坏大陆的政治稳定,因此似乎需要英国做出军事承诺以防止权势平衡发生这种不利的变化。英国单凭自己的资源无法做出承诺阻止德国惊人的军事和政治收益,以此来挽回军事平衡。它也无法通过与法国的联盟以及大英帝国的支持来做到这一点。英国需要一个更强大的盟友的支持,比如说苏联或美国。

英国曾希望通过一种(实际上是)“弱”威慑的政策来避免与德国开战。英国人相信,如果让希特勒清楚地看到发动战争进程的困难,

^⑬ 详见 A. J. P. Taylor,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Greenwich, Conn.: Fawcett, 1961); Esmonde Robertson, ed.,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71); Barnett, *The Collapse of British Power*; D. C. Watt, *How War Came: The Immediat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8—1939* (London: Heinemann, 1989); Murray, *The Change in the European Balance of Power*; Keith Middlemas, *Diplomacy of Illusion: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Germany, 1937—1939*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2); Cowling, *Impact of Hitler*; Micheal Howard, *The Continental Commitment: The Dilemma of British Defense Policy in the era of Two World War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 Martin Gilbert, *Churchill*, 5 vol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7), vol. 5; Brian Bond, *British Military Policy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0); Jon Kimche, *The Unfought Battle* (New York: Stain and Day, 1968); Telford Taylor, *Munich: The Price of Peace*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79); Sidney Aster, *1939: The Mak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Andre Deutsch, 1973); Klaus Hildebrand,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Third Reich* (London: Batsford, 1973); Mearsheimer,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Tim Mason, "DEBATE: Germany, 'Domestic Crisis' and War in 1939; Comment 2," *Past and Present*, no. 122 (February 1989): pp. 205—221 and response by Richard Overy, "DEBATE, Reply," same issue, pp. 221—240; B. H. Liddell Hart, *A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Cassell, 1970); 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Simon Newman, *March 1939: The British Guarantee to Po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J. L. Richardson, "New Perspectives on Appeasement: Some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40 (April 1988): pp. 289—316; Parker, *Chamberlain and Appeasement*.

他将会作罢。^⑭ 这一“弱”威慑很有可能不足以奏效。^⑮ 然而要建立一个抵消德国压力的联盟(首先是法国,然后是苏联,最后是美国),就可以把“弱”威慑变成“强”威慑。如果这一努力不能奏效,英国或许还可以继续姑息德国,直到这种联盟建立成功。^⑯

然而到头来,英国哪个也没做。它向波兰做出的保证是承担有条件地对德国采取军事行动。这是一个英国即使与法国结盟也显然无法支撑的立场。因此,它并没能阻止德国针对波兰的行动,实际上或许是助长了德国近期的挑战。

当然,有很多方法可以摆脱这种困境。英国可以寻求用一种“吓唬”的政策震慑德国。既然是吓唬,它就只能是简单地终止游戏而不诉诸战争。或许还可以像乔治·邦尼特(Georges Bonnet)在1939年9月所实际建议的那样,用一次新的慕尼黑会议掩盖失败;或者,英国还可以寻求单独捍卫法国(或法国与比利时)。但那将会让德国放手去夺取东欧和南欧的资源,这将使平衡进一步不利于英国和法国;或英国接受这一平衡变化,认定德国和苏联最终将会相互交恶,耗尽双方的力量,留下英国再次成为欧洲的平衡者。

还有其他代替方案,但都完全不是现实主义的。鉴于财政部的

^⑭ 我们将会看到,即使没有俄罗斯或美国的援助,英国起初也希望通过与德国打一场持久战而取胜。希特勒将会输掉,因为英国实行18个月左右的封锁之后他将耗尽资源,也许德国人民会推翻他。这一分析的困难之处在于,英国的防卫立场不可能断绝德国从东欧获得谷物、煤和化学品,以及从罗马尼亚获取石油,也无法阻断瑞典铁矿的供应。如果德国成功地威胁到苏联,形势将会更糟。1939年1至2月间,上层官员开始担心,如果希特勒获得东欧,他将使长期的平衡倾向他的一边。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没有能力捍卫东欧,使得它的长期威慑战略变得无效。

^⑮ 戴维·雷诺用下列话语描述道:“目的是形成一个震慑希特勒进一步自我扩张的和平阵线,而不是形成一个发动战争的联盟网络。英国没向东欧任何国家(甚至是那些受保护的国家)做出特别的军事承诺。”见 David Reynolds, “1940: Fulcrum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Affairs* 66, no. 2 (1990): p. 336.

^⑯ 考林争辩说:“如果希特勒的目标是将东欧变成殖民地,那就可以认为……英国没有兴趣去阻止他。如果有必要必须阻止他(因为支配了东方就会引起对西方的支配),也并不一定不做选择,因为斯大林不会信任希特勒,甚至怀疑俄德条约是否真正存在。” *Impact of Hitler*, p. 396. 这样,英国继续奉行绥靖政策就会被证明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选择。

这一观点在1940年变得更加强烈。1940年5月,劳德·哈利法克斯(Lord Halifax)极力推销“谈判和平”(negotiated peace)这一观念,只是由于丘吉尔的强烈反对才遭到失败。9月份,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质疑在欧洲没有另一场血腥的陆战是否能打败德国。他还怀疑,美国是否能够提供足够量的援助来打赢这场战争。见 David Reynolds, “Churchill and the British ‘Decision’ to Fight on in 1940: Right Policy, Wrong Reasons,” in *Diplomacy and Intelligenc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Essays in Honour of F. H. Hinsley*, ed. Richard Langhor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55.

估算,英国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赢得一场长期的战争,因此英国可以选择对德国发动速战取胜。^①但这将要求英国从法国领土上发动一场针对德国的闪电战。对此,英法完全都没有做好准备。战前的思想家们曾得出结论,要想成功地发动一场针对另一个大国的陆地攻击,一个国家需要有至少三对一的绝对优势。^②英法合计起来并没有这么大的优势。既然这些代替方案都不合胃口或无效,所以英国只能继续姑息希特勒,积蓄自己的力量,以便成功面对德国未来的进攻。但它没有这样做。

131 针对这些看法人们将会说,德国也没有做好发动一场长期战争的准备。1939年7月,英国产业情报中心(IIC)、首相以及一些有影响的内阁成员都认为,德国在其民用经济中的制约因素限制了它的生产量。^③人们还认为,英国的封锁在战争开始后约18个月会发挥作用,因此,德国将不得不迅速而果断地推进战争以克服这一封锁。^④那么,当德国的战略无法确保胜利时,它又怎么会开战呢?对这一问题有两个可能的回答。首先,希特勒或许会希望在其短期的侵略计划中夺取资源,以使德国即使在长期的冲突中也能取胜。^⑤这当然是希特勒在其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大战计划中的意图所在。^⑥东欧和南欧的资源就在他的脚下。征服俄罗斯将会提供重要的矿物和谷物资源以增加德国的实力(此外他还意图使日耳曼人定居于俄罗斯部分地区)。获取苏台德地区的煤,普洛耶什蒂的石油以及瑞典的钢材,这些资源储备极大地刺激了对中欧的控制。

然而这些估计的困难在于,它们牵涉到太多无法估量的因素。希特勒或许会现实地计划去夺取东欧的小国家。出于马上就会清楚

^① 1939年7月末财政部通过一个很有说服力的量化分析说明了这一观点。

^② Taylor,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③ 《内阁报告》第170(39)号:“德国飞机工业”。1939年7月28日由IIC和帝国防务委员会(CID)呈递的这份有影响的报告指出了飞机工业中的劳动力短缺,提出德国的生产将限制在每月1500架飞机。然而有些相反的是,报告还观察到,德国飞机工业中每天只倒班一次。

^④ 见 T. W. Mason 与 Richard Overy 之间的争论,“DEBATE: Germany,” and “DEBATE: Reply.” 另见 Parker, *Chamberlain and Appeasement*.

^⑤ CID 对这一可能性相当清楚。国防部长 Leslie Hore Belisha 在 1939 年 4 月 6 日对他的同僚说,德国的政策是窃取其他国家的资源。

^⑥ Richard J. Overy, “Hitler’s War and the German Economy: A Reinterpretat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5 (May 1982): pp. 272—291.

的原因,他可能还没有打算成功地对俄罗斯发起攻击(尽管他确信布尔什维克制度妨碍了俄罗斯人发动一场有力的防卫)。打败俄罗斯的希望寄托在事先征服法国上(尽管它于1940年实际发生了,但在事发之前看上去似乎是不可能的)。即便那样,鉴于拿破仑的先例,对俄罗斯的胜利难以被认为是确定的。^②

其次,也许更重要的是,德国和英国都应当理性地阻止相互发动战争。造成军事僵局的原因在于,要成功地发动一场进攻与保持有效的防卫以免遭到另一大国的攻击这两种要求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希特勒拥有对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以及希腊这类弱小国家发动攻击的大量优势,但对法国和英国,德国则没有这种能力。在1939年,希特勒如同他的将军们曾经告诉他的那样,应当预见到入侵法国会遭到失败或陷入僵局。^③不存在进攻和占领英国的可能性。希特勒还没有能够用来严重破坏英国的轰炸机编队;远胜于德国海军的皇家海军阻断着从海上的人侵。假如针对波兰的交战招致德国与法英两国的战斗,德国将会撤回。但是,能够遏制德国并不意味着英国有条件针对它采取军事行动。在1939年,英国和德国实际上都不应当采取强硬的和进攻性的立场。即使有法国的援助,英国也不能承兑1939年3月31日的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应当在9月3日以对德宣战来履行诺言。同样地,希特勒在事先不知道英法是否会袖手旁观的情况下不应当在9月1日进攻波兰。在当时,这一决定并没有使他在德国更得人心。实际上,居民们似乎是主张并期待着和平,相信希特勒不发动战争也会得到他想从波兰得到的东西。^④德国和英法联盟都有自我防卫的能力;但从理论上讲,双方都没有发

^② 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德国和英国都不可能在1939年9月发起战争。见 A. Alexandroff and R. Rosecrance, "Deterrence in 1939," *World Politics* 29 (April 1977): pp. 404—424。这里聚焦于英国的大战略算计。英国或许会期待德国认识到它不可能在一场大陆战争中击败英国和法国。从这个特定意义上说,德国应当受到“震慑”,不敢采取会触发更大规模战争的行动。但如果英国不能防止对波兰的进攻(没有俄罗斯的帮助它不可能防止),在没有美国或苏联援助的情况下它也不可能打败德国。因此,尽管英国会避免自己被“击败”,但没有来自另一个重要盟友的援助它既不会取得“胜利”,也无法防止德国对东欧和中欧的控制(这是交战的原因)。简而言之,它不可能打败德国。仅有法国的帮助,英国能够(或者应当能够)阻止德国在西欧的进一步侵略,但无法取得对德国的胜利。

^③ Mearsheimer 与《传统威慑》中相反的观点是不能让人信服的,因为希特勒直到二战已经开始后相当一段时间才发现了能够实际击败法国的计划。

^④ *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ed. 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 vol. 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p. 1.

动进攻击败对方的能力。

133 但两国都走向了战争。这表明并不是新现实主义的成本—收益
 算计决定了1939年的结果。在英国的例子中,我们将强调大战略中的
 国内政治决定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理解英国政策的关键似乎是
 官方和公众对当时德国动机估计的变化。一旦独裁者的侵略意图
 昭然若揭(在1939年3月15日,随后是4月份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
 亚),英国的政策显然强硬起来,^②尽管大规模的重新武装和战争准备
 降低了英国赢得接下来发生的那场长期的消耗战的能力。鉴于对希
 特勒意图的这一理解,实际发生的情况便是:英国的精英们开始感觉
 他们的防御地位正在改善。他们看到,短期内被击败的危险正在扭
 转。^③与此同时,部分地由于情报分析的错误,他们不仅得出结论认
 为德国的重新武装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经济限制,而且还认为德国
 不可能成功地坚持一场长期战争。^④英国公众和后座议员们的态度
 是鼓起劲反对侵略者。他们鼓励,甚至是要英国对希特勒采取更
 加强硬的路线。^⑤尽管张伯伦踌躇不前,劳德·哈利法克斯常常也是
 优柔寡断,但政府最终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一位重要的外交官亚历
 山大·卡多根(Alexander Cadogan)在他的日记当中描述了当时整个
 国家的情绪。他吐露道:“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在问,‘你们要做什么?’
 如果我们说白了,我们正在冒险唆使希特勒进攻我们。但这是

^② 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已经放弃了调和政策。如果英国地位的明显改善能够让希特勒住手,战争仍然可以避免。见下面的论述。

^③ 心理学家们把此时发生的这种希望性的思维称之为“含有动机的偏见”(motivated bias)。

^④ Wark, *Ultimate Enemy*.

^⑤ 在1938年慕尼黑讨论结束时,政府赢得了222席的多数。然而,补缺选举表明,公众支持已转向强硬路线。1938年9月1日至1939年9月3日间共有25次补缺选举,其中13次是希特勒进军布拉格之后举行的。有4次是由工党取胜。布里奇沃特(Bridgewater)被弗农·巴特莱特(Vernon Bartlett)所取代。他是一个反绥靖政策的候选人。当他以独立进步人士参加竞选时,工党和自由党候选人退出。有趣的是,最近发表的由英国记者罗伯特·西尔弗(Robert Silver)撰写的著作提出,1939年春夏竞选中参与率低于1938年底的参与率。因为在外交政策问题上,保守党和工党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选择。只是后来保守党似乎才采取了选民们所主张的对德更强硬路线。必须牢记,在宣布保证承诺之后,大多数人认为政府正在采取一条更强硬的路线,因此继续支持张伯伦(见1939年4月3日众议院的讨论。当时所有发言的人都向首相表示祝贺)。只是5、6月间在苏联问题上张伯伦才开始感到某种程度的政治孤立,尽管这并没有动摇他对联盟的反对。见Parker, *Chamberlain and Appeasement*。

一个必须承担的风险……我们当然还没有做好准备,将来也不会。”^①简单地说,这就是英国的困境:由于官员和普通公众看法的变化,它不得不采取行动阻止希特勒。但是,如果它的“弱”威慑不成功,英国将无法承受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②

英国的经济:未能决定政策 的现实主义制约因素

财政部承认,英国的财政能力不足以赢得一场长期战争。1938年,英国仅拥有世界制造业生产的9.2%,而德国有13%。法国可另外提供4.5%。为了使重新武装维持在战前水平上^③,国家在1939年已经严重压缩了它的战争拨款,用以支付必要的进口。这样,法国和英国未能积累起资助和支撑一场对德决定性进攻所需的绝对优势。英国的工业力量也许足以捍卫法国和英国(尽管1940年德国生产的钢材是英国的4倍),但不能希望支撑一场跨越德国边界的进攻,以及确保消耗战。鉴于英国的重新武装依赖于进口,政府不得不从海外(主要是从美国)购买原材料和机电产品。英国的战争物质至少有六分之一是进口的,这需要英国有高出口来平衡。^④1931年之后,贸易平衡和支付平衡除了1935年之外几乎都是连年赤字。^⑤随着美国的萧条,英国的出口市场萎缩,而进口账单还在上升。在外汇市场上,英国货币币值下降。由于美国采取中立的立场,以及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未能偿还它欠美国的战争债务,所以英国无法从美国借债。政府可以向本国人民借债,但这将引起通货膨胀,英国货物

^① David Dilks, ed., *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 O. M. 1939—1945* (London: Cassell, 1971).

^② 在英国的政策中,存在着一个难以得到圆满解决的“鸡与蛋”的困境:一方面,如果战争不是不可避免,那么英国就用不着以强大的力量为后盾做出强硬的承诺以避免战争;另一方面,如果英国没有做出强硬的震慑反应,战争就很有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英国无法决定它应当把砝码放在这一困境的哪一边。

^③ 财政制约在1939年初被消除。

^④ 有些人估计英国战争物质对外部的依赖程度高达25%—30%。

^⑤ George C. Peden, *British Rearmament and the Treasury, 1932—1939* (Edinburgh: Scottish Academic Press, 1979), pp. 62—63, 208.

的价格上涨将被排挤出世界市场。控制非紧要物品的进口也不会弥补英国支付平衡中越来越大的缺口。政府也不能对英镑实行贬值。因为并不同情英镑价值过低的美国将会采取竞争性的美元贬值来对付英镑贬值。贬值还会增加所需国防进口产品的价格,而对这部分产品的需求则是没有弹性的。此外,英国无法通过增加出口来弥补其必要的高水平国防进口,因为到1938年底,重新武装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机械工具和机电工业。尽管在1938年至1939年间存在着大量失业,但这些失业者不是高技术重新武装工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人员。

英国或许可以增加税收,从本国现有经济中多挤出一些油水。但这将危害经济恢复,使英国的经济增长相对慢于德国,^⑤英国的军事开支会增加,抵消这一效果。但没有战时控制,这将会刺激进口以及通货膨胀。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英国可以提高利率。但在刚从“萧条”中恢复过来的脆弱经济条件下,这将会导致通货紧缩和危害生产。简言之,英国真正需要的,恰恰是无法给予的:来自国外的大笔贷款或赠款。

随着全力重新武装成本的积累,财政部感到惊愕,并于1939年7月告诉内阁说,没有美国的援助,“一场长期战争的前景是极其可怕的”。^⑥与1914年相比,英国不但储备更少,而且从美国借款的机会也更少。^⑦一般估计认为,一场“长期战争”至少会持续3年。实际上,正如所发生的那样,英国在1941年3月就耗尽了钱财。当美国《租借法》出台时,英国的黄金库存已几乎化为乌有。但英国无法提前两年就能预见到可以按时按量获得美国的援助。^⑧

^⑤ 甚至财政部也承认,英国应当提高税收以资助重新武装,但这不会达到理想结果。见下文。

^⑥ CP 149 (39), “Note on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July 1939.

^⑦ 面对美国坚持要维护英国货币的币值,除了运输黄金之外别无他法。见 R. A. C. Parker, “The Pound Sterling, the American Treasury, and British Preparations for War, 1938—1939,”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98 (April 1983): pp. 261—279.

^⑧ G. C. Peden 认为,问题在于“时间的选择”。也就是说,英国必须找准其重新武装的时间,使得在美国的经济援助到来之前不至于耗尽英国的储备。的确如此,但没有办法知道美国是否会最终干预以及何时干预。尽管英国做了三年的战争计划,但单靠其自己的资源它只能战斗到1941年3月。美国没有“按时”进行干预以拯救法国,如果不是希特勒在1941年12月11日向美国宣战,罗斯福或许会被迫只将其注意力局限于日本。更早一些,美国总统并不理解英国实际上是多么紧迫,还以为他们并不太需要帮助。1939年3月25日至26日,罗斯福告诉西尔·A. 威勒特(Sir A. Willert)说,他确信,美国先前只适用于和平贸易的“现购自运”(cash and carry)规则最终将会延用于军火。威勒特报道说,“总统认为这对我们来说足够了”。

认识到英国的长期经济问题,政府在财政部的压力下,或许会策划展开一场全面的速战动员,首先,由英国对目前的以色列防线(Israeli lines)发起一场闪电战,同时从法国发起对德攻击。在当时,没人做这样的考虑。不管怎样,一场速战只能通过轰炸,通过法国发起攻击战役来进行。而法国对此则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只是到了2月22日才批准了这样的建议,即确保在开战后两周内向法国派送6个师。尽管英国远征军能够帮助捍卫法国,但陆军在1941年之前不会做好进攻行动的准备。^③然而,这样一种军事战役尽管在1938年(当时齐格菲防线尚未完成,英国公众舆论仍然是通过绥靖政策来寻求和平)或许还可以取得成功,但到1939年它已无法扭转潮流了。^④不管在哪个时间,它都代表着英国优先次序的革命性变革:英国陆军优先于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人力和坦克优先于轰炸机和战斗机。无论怎样,在当时是无法发起这样的行动的,因为1939年春天之后才准备好了训练有素的人力。^⑤直到1939年,由于担心法国会倒向德国,内阁才开始召集和装备远征军。甚至是布拉格事件之后采取的行动也只代表着未来给予大量援助的一种承诺。一个进攻性战略与1919年之后汲取的防卫优先的总体教训是完全冲突的,也背离了公众中存在的“被当场击倒”的担心,他们害怕如果英国冒险从事进攻战略,会遭致德国轰炸机对英国城市的狂轰滥炸。

总之,通过聪明的操控和对现有军事资源进行更多的挖掘无法克服英国经济的紧张制约。在1944年7月之前,其经济尚没有得到完全动员的德国总是能够以同样的手段做出回应。^⑥英国所需要的是军事上或经济上的外部援助。首先,它需要与法国联盟,因为法国军队和马其诺防线是英国的第一道防线;接下来是需要苏联和美国的支持。没有这两个大国之一的支持,不可能期望英国针对希特勒

^③ Kimche 在《没有打响的战斗》一书中讨论了这一可能性。向法国派遣远征军的可能性直到1939年春才得到考虑。

^④ 这是 Murray 在《欧洲权势平衡的变迁》中得出的重要结论。

^⑤ 1939年5月,政府承诺要征集32个步兵师(34万人),比起1939年9月德国准备到位的120个师来,这一数字还少得可怜。见 N. H. Gibbs, *GRAND STRATEGY: Vol. 1, Rearmament Policy*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Service, 1976), p. 759。但直到1940年5月,英国也只能派出10个师和一个坦克旅赴法国作战。

^⑥ 英国依赖法国军队的防卫力量来缓冲德国的攻击,以便为英国全面的重新武装和动员帝国资源提供时间。我们现在知道,它所需要的援助已经超过了法国和帝国所能提供的程度。

采取坚定而可靠的立场。^③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使得国防参谋部在1939年春季改变了立场,并使得内阁推动极不情愿的张伯伦开始与苏联谈判。甚至到1939年5月4日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Maxim Litvinov)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取代之后,苏联是否愿意与英国联盟还仍然摆在谈判桌上。对于张伯伦的反对,内阁于5月24日投票决定打开与莫斯科进行联盟谈判的大门。这既是出于积极的原因,也是出于消极的原因。英国一贯以为他们能够与莫斯科达成某种交易,因为他们相信德俄之间不可能达成妥协。在英国一边,并没有紧迫感。张伯伦非常厌恶其同僚、后座议员和工党对手逼迫他谈判。他认为,这样会使与希特勒的谈判成为不可能。甚至到了他们快崩溃之际,他仍继续反对谈判。当然,随着1939年8月23日纳粹—苏联条约的签订,这些谈判便终止了。英国与美国的关系也没什么结果。^④在美国,罗斯福无法答应美国提供军事或经济援助。随着罗斯福修改中立法法的努力遭到失败,英国只能严格地自己运作,尽管它并不缺少美国的鼓励。^⑤

138

英国政府和政治体制:切实决定 政策的制约因素

内阁与官员

英国人出于两种压力而向波兰提供了保证并且对德宣战:第一

^③ 然而内阁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仍然认为它能够与德国的消耗战中取胜。在做这一考虑时,它没有考虑到德国在东欧的胜利所带来的经济影响。

^④ 存在着在远东地区进行海军合作的努力。为了创造更好的舆论气氛,张伯伦极尽全力要使贸易协定谈判取得成功。1939年春夏,外交部积极讨好美国人,尽管他们始终清楚美国公众不愿意干预欧洲事务所带来的限制。英国人的主要关注非常现实,那就是财政和经济支持。但他们也希望美国对柏林进行强烈的谴责,尽管不是对那里采取实际的外交干涉。

^⑤ 上年秋天,罗斯福曾秘密与劳德·阿瑟·默里(Lord Arthur Murray,一位苏格兰铁路大王,后来成为埃利班克子爵三世)说要建立一条与张伯伦沟通的直接渠道。罗斯福告诉默里说,“一旦与独裁者发生战争,他将以美国的工业资源支持他。”(引自D. C. Watt, *How War Came*)。现在如同过去一样,这一承诺无法公开,因为它立即会遭到国会和美国公众的唾弃。然而英国会在多大程度上将此承诺当真,尤其是罗斯福在其他场合要谨言慎行得多?

是开始认识到希特勒的野心永无止境,以及国际潮流正朝着不利于他们的方向转化。如果说维护欧洲的均势还有什么含义的话,那就是要求英国对纳粹德国实行遏制。英国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应当有足够坚定的反对纳粹政策的立场。具体来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单凭英国或英法自身的行动是无法实现可靠遏制的。英国可以“吓唬”,但如果真的如其所说是吓唬的话,就不可能采取行动击败德国。

迫使最终采取行动的第二个因素是英国政府和公众舆论的变化。尽管这一变化是渐进的,而且在1939年春夏之前并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在1938年9月22至24日,亦即为对付希特勒针对捷克斯洛伐克所提出的专横要求而开始动员舰队之后,就已经在哥德斯堡开始了。9月29日在慕尼黑的妥协协定并没有平息英国人的愤怒感。后来,11月9年至10日发生的克里斯多纳赫(Kristallnacht)大屠杀震惊了张伯伦,并使哈利法克斯在内阁采取了更加反纳粹的立场。希特勒现在还仅仅被看做是一股野蛮势力,尚未被看做是敢于在欧洲大陆轻率发动战争的人。

尽管德国在1939年初将会东进的担心没有依据,但英国官员们已取得一致的看法,即如果德国人进攻荷兰或瑞士,那将意味着战争的爆发。与法国参谋部的谈判应当开始,重新武装应当加速。新的重点应是为参加陆战做好准备。为让法国留在盟国阵营内,国防参谋部同意了这一承诺,声称“干预失败造成的道德和其他方面的影响将严重损害我们在自治领以及整个世界眼中的地位。这样会剥夺在接下来的斗争中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的看法是,如果不能应对这一挑战,将会使德国在欧洲占据支配地位,降低我们在整个世界中的威望。”^⑥这样说绝不是一种夸张。对法国的任何威胁,都应立即得到英国的支持。然而这些威胁并没有马上出现,首相带头重新唱起了乐观主义的高调。

1939年3月15日德国进军布拉格使希特勒的侵略意图暴露无遗。他撕毁了慕尼黑协议,第一次占领了非德国领土。墨索里尼随后在阿尔巴尼亚的行动使内阁大部分成员确信,对哪个独裁者都不能再抱以信任。哈利法克斯比张伯伦更加决意要用威胁来制止德国。尽管他也希望能够避免战争,但他更加热衷于备战。正如他自

^⑥ 参谋长联席会议,引自 Taylor, *Munich*, p. 946。

己所承认的,首相的地位因德国和意大利的行动而受到严重损害。政府对德国占领布拉格和意大利夺取阿尔巴尼亚做出的反应是向波兰、罗马尼亚和希腊提供保证,并对中欧和东南欧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攻势,意在警告德国,英国将不会容忍进一步的敌意行动。针对德国意图夺取但泽或入侵波兰(提前三周预见到希特勒的决定)的传言,以及担心波兰领导人科洛内尔·约瑟夫·贝克(Colonel Joseph Beck)与希特勒缔结协议,内阁同意向波兰提供保证。而此年之前,英国不曾考虑向捷克提供这样的保证。

然而新的保证更多的只是某种形式的政治威慑,仅仅是出于眼前的目的,并没有对其军事效果做出评估,也没有与有关国家的参谋部门进行任何协商。实际上,国防参谋部曾反对提供这样的保证。没有新的强大盟友,在军事上不可能加以实施。内阁毫无疑问是希望英国的“威慑”奏效。但这理所当然不可能挫败德国的政策。而实际上,德国夺取捷克斯洛伐克后又为其不断增多的权势账单添加了一笔新的进账。随着获得苏台德的煤和世界上最大的斯科达(Skoda)军火产品,德国的战争潜力有了极大的提高。据英国空军情报部门战前所做的最后一次力量比较,德国一线飞机据信是皇家空军的两倍多(4210架对1998架),远程轰炸机也是两倍多(1750架对832架)。

140

尽管向波兰、希腊以及罗马尼亚做出了保证,但英国政府仍然倾向于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当6月份日本封锁了英国在中国天津的租界时,英国鉴于欧洲冲突的危险和缺少美国的援助而并没有做出反应。英国驻东京大使只得以自己的方式摆脱僵局。内阁得出的结论是,在远东报复日本是不可行的,英国在欧洲的问题更加重要。当然,这最终意味着英国无法再继续维持其在新加坡、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帝国义务,意味着英国在远东将依赖于美国。

然而在欧洲,重新武装被看做是当务之急。1939年至1940年间,英国国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比例超过了德国。^⑦ 英国的巨大努力反应在战斗机指挥系统的建造上。新的雷达预警系统和增

^⑦ 1939年英国的军事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1.4%,德国是23%。然而到1940年,英国的这一比例翻了一番还多,用于国防的开支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1.7%,而德国是38%。资料来源于G. C. Peden, "A Matter of Timing: The Economic Background to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37—1939," *History* 69 (February 1984): p. 25。

添喷火式(Spitfires)与飓风式(Hurricanes)飞机倍增了对英国各岛的保护。皇家空军的战斗机中队从1938年9月的6个增加到战争爆发时的26个。皇家海军重新武装较慢,但在战舰和潜艇方面仍领先于德国。然而,即使是有最大规模的舰队,但如果没有援助,英国的力量也不足以同时控制远东和东地中海。

陆军曾是最弱,也是最受忽视的部门。但在1939年2月,英国为了稳住法国而决定向大陆派出一支军队。为此,陆军设备生产也被排到首位。起初是5个常规力量师,另有4个本土师作为后盾。这一数字被陆续增加到15个师,19个师;到1939年5月,最终达到32个师。这一计划对英国本已过度紧张的工厂和劳动力供应又增添了巨大的负担。

到战争爆发时,英国在飞机和坦克方面的军事生产已经赶上和超过德国。这一努力已经导致英国的国际购买力下降。其黄金储备下滑,到1939年初失去了近40%的价值。战争开始时,只剩下4.5亿英镑。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声称:“就欧洲而言,财政和经济形势近乎于悲剧。英国现在是要破产了。”

德国也在感受着压力。1939年初哈利法克斯得出结论说,希特勒将不得不放慢军事生产的速度和削减民用消费,或者只能是走向战争。不足为奇,英国做出的实际反应是全力以赴,在1939年赶上或超过德国的战争生产。尽管领袖们依旧希望“威慑”能发挥作用,但哈利法克斯认为,如果德国要发动战争的话,那就是在不久的将来,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④

然而正如财政部所估计的那样,既然“英国对于长期战争的准备不如德国”,那么英国应当尽速取得战争的胜利。^⑤ 面对持续不断的

^④ 我们知道,希特勒没有因英国向波兰提供保证以及英国的战争准备而受到震慑。既然英国不可能构成对德国的进攻性威胁,所以对其可能的宣战可以不予理会。希特勒完全清楚英国的立场。他于1939年8月22日告诉他的将军们说,“我在慕尼黑领教过达拉第(Daladier)和张伯伦那些可怜虫,他们胆小如鼠,不敢发动进攻。他们最多也只是封锁。我们可以自给自足,还有俄罗斯的原料物质。”引自 Richard Lamb, *The Ghosts of Peace, 1935—1945* (Salisbury, Wiltshire: Michael Russell, 1987), p. 109。

^⑤ 当时英国占主流的观点当然是短期内防卫,长期则采取进攻战略。但从财政条件看,首选方案应当是反过来。如果爆发短期战争,英国应当参与法国的防卫,并派轰炸机到德国上空,以此来对付德国的进攻。如果此举不奏效而演变成长期战争(实际上的一场消耗战),英国希望靠封锁造成德国耗尽供给来取胜。然而在一场持久战中英国的财政也会短缺。

各种财政预兆,哈利法克斯争辩说,如果战争持续下去,“美国的态度将会对我们有利,足以使我们赢得战争”^④。但英国要等多久才会得到美国的援助?7月份财政部指出,英国的储备仅能维持三年,按当时重新武装的速度不久便会耗尽。^⑤帕克(R. A. C. Parker)指出,“备战将会削弱战争能力,如果要冒战争风险的话,也许要尽快。在1939年,英国正处在这一临界点上。”^⑥

142

如果真是这样,英国或许应当修改其军事战略,目标定在速战取胜。但它不能这样做。英国除非发起决定性的轰炸战役,否则无法赢得速战。但它没有足够的重型轰炸机实施这一任务。^⑦英国的计划是,由法国吸收纳粹最初的打击,然后法英联手加入到一场消耗战中,由英国舰队实施经济封锁助阵。在这样一场持久战中,胜利显然取决于美国的帮助,但无论是罗斯福还是任何其他美国人都不会保证提供这种援助。

1939年,国防参谋部报告和产业情报中心报告都指向德国日益严重的短缺。2月末,国防参谋部声称,德国重新武装的耗费“使德国人民对税收的忍受程度和经济体系的稳定程度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任何进一步的努力都要冒整个结构崩溃的风险。”产业情报中心也表达出同样的感觉。它认定德国的战争动员已经达到了最充分的程度,因而得出结论认为,战争开始后12个月到18个月之内英国的封锁将全面奏效,届时纳粹经济将陷入严重的供应困境当中。尽管情报部门的报告承认德国将会通过征服东南欧的资源来摆脱封锁,

^④ R. A. C. Parker, “Economics, Rearmament, and Foreign Policy: The United Kingdom before 1939—A Preliminary Stud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0 (October 1975): p. 645.

^⑤ 财政大臣西尔·约翰·西蒙(Sir John Simon)于5月18日在分析重新武装计划对英国财政形势的影响时甚至更加悲观,他告诉其内阁同僚们说:“我们筹集钱的速度有一个限度,按照我最乐观的判断,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一限度。如果不进一步增加或加速,我们还可坚持半年到9个月,此后,目前的比率将无法维持,除非发生不可预见的非常有利的事件。”“Memorandum of th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on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May 1939, CAB 24/287 (1939)], pp. 1—2.

^⑥ Parker, “Economics, Rearmament, and Foreign Policy,” p. 644.

^⑦ 1941至1942年,英国企图轰炸德国城市的工业设施。鉴于德国未能在1940年夏季的不列颠战役中取胜,所以英国知道,轰炸敌人人口并不奏效。但它还是想要向本国人民表明,英国有能力把战争转向对方的领土上。

但他们认为德国从中的获益不足以赢得一场持久战。^④ 德国的大后方看上去也给人一种薄弱的假象。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总是要在好战的希特勒和主张和平的德国人民之间做出判断。他们执着地牢记着1938年9月德国公众给予张伯伦的友好款待。^⑤

在产业情报中心报告的支持下,英国内阁成员和官员接受了德国面临着经济紧张的观点。英国的战争物质正从矿山和工厂源源而来。如果战争到来,官员们仍抱着一线希望,指望德国人从内部遭到削弱,或许在封锁奏效之后会将希特勒赶下台。据认为,像赫尔曼·格林(Hermann Goering)这样的“温和派”是不喜欢战争的。但英国对德国的“威慑”是相当不够的。要想支撑下去,他们需要帮助。问题是俄罗斯或美国会按时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吗?^⑥

提供保证之后,议会和公众强烈支持与俄罗斯结盟。1939年4月18日,英国和法国收到了俄罗斯建立三方联盟和缔结军事协议的提议,这种联盟遭到了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和芬兰的强烈反对。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曾报告说,俄罗斯军队在其本国领土内将会顽强战斗,但在保卫其他国家时作用不会太大。张伯伦依然是坚定地反对这一计划。然而哈利法克斯和外交部却不想断然拒绝苏联的建议,他们企图让俄罗斯人对波兰、罗马尼亚和希腊提供同样的保证。但莫洛托夫说这样的保证不符合苏联的意愿。如果德国通过芬兰发动进攻怎么办?如果这些国家像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屈从于德国的压力怎么办?保证将被废弃,苏联将独自面对德国。因此,莫洛托夫能够接受的最低条件是法国、英国和苏联三方军事联盟。在苏联遭到进攻时英国不得不选择宣战。哈利法克斯非常不情愿地得出

^④ 英国总体战略中的这一认识存在着问题。如果德国征服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以及希腊并不能改变针对英国的长期平衡,那么英国为什么要如此忧心地去阻止它的发生呢?如果德国拥有了东欧之后仍会在一场长期的斗争中输掉,那么英国为什么要如此焦虑地阻止希特勒去获取那里?按照这样的假设,权势的平衡不会被打破。然而实际上,国防参谋部确曾担心,1939年2月至3月希特勒对罗马尼亚的威胁呈现出来之后,长期的平衡真的会改变。东欧因此成了英国战略的关键,绝不允许它落入希特勒之手。这一要求从此决定了英国的大战略。

^⑤ 1939年战争开始之后,张伯伦对其妹妹希尔达(Hilda)写道,英国的政策依旧:“紧紧咬住,继续经济施压,竭尽全力推动军火生产和军事准备,在希特勒发动战争之前不发动进攻”。引自 David Reynolds, *The Creation of the Anglo-American Alliance, 1937—1941: A Study in Competitive Cooperation*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s, 1981), p. 74。

^⑥ 这当然是乔治·佩登(George Peden)在《时间问题》一文中的疑问。

结论说,英国应当接受与莫斯科的军事联盟。

尽管张伯伦在5月24日的内阁表决中遭到失败,但他却成功地提出将与俄罗斯联盟的建议和国际联盟第XVI条规定下的保证捆绑到一起。出于多方面原因,包括国际联盟的弱点和很多成员国不履行其公约规定下的义务,俄罗斯想在主要各方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盟承诺。莫洛托夫知道英国的保留,拒不考虑与国际联盟公约条款的任何挂钩,坚持缔造一个常规的军事条约。

144

回过头来看,我们不清楚英国是否与苏联缔结过这个联盟。但大量因素汇聚一起,正促进着莫斯科与柏林之间的联系。起初,希特勒企图把日本拉入到全面的军事联盟当中。这将对俄罗斯造成压力,确保德国东进波兰时俄保持中立。当这些谈判得不出结果时,德国外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打出了意大利牌,于5月22日签署了“钢铁条约”。这似乎表明德国转向了西方,结果是疏远了日本军队(本来可以计划吸收他们对俄罗斯造成共同压力)。⑤随后,日本宣布中立。这一回绝清楚表明不可能包围苏联,于是,希特勒开始谋求莫斯科的好感,以便德国能在东欧放手行动。德国的示意与苏联一拍即合。日本的中立为莫斯科提供了东部地区的保障。英国和波兰在西部犹豫不决。莫斯科解决困境的答案是与德国短期结盟。里宾特洛甫发现,通向俄罗斯的大门已经打开。英国能否扭转对其非常不利的势态发展尚不清楚,尽管与苏联的谈判一直持续至8月22日。

然而这当中可以确定的是,英国没有勤勉地、有效地或者是宽宏大量地赢得苏联的信任和好感。起初,在3月,英国对俄罗斯不予理睬,担心会疏远墨索里尼。接下来是遇到了来自大英联邦的麻烦,它们反对英国领导一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反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联盟。甚至在8月22日纳粹—苏联条约签署后,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也拒不承认他们的失败。张伯伦一如既往始终反对与俄结盟;哈利法克斯也是持深深的保留态度。他们寻求缔约,部分地迫于同僚、军队(他们的立场已发生了转变)以及法国的压力,部分是为了应付绝

⑤ 希特勒于5月23日对其将军们的讲话表明,德国完全清楚这些复杂问题。他说:“不排除俄罗斯对消灭波兰不感兴趣。如果俄罗斯在谈判中继续反对我们,与日本的关系就会变得更紧密。”引自 Watt, *How War Came*, p. 253。

大多数议会成员和公众要求结盟的压力(正如将要说明的那样)。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的犹豫不决部分是出自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仇恨以及对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政治清洗的厌恶。他们并不相信俄罗斯能强大和坚定到足以成为一支抗衡纳粹的力量。^⑤然而事实是,不管英国是否与莫斯科缔结了协议,它都没有将此作为首要任务。张伯伦的政策恰恰是两年后丘吉尔政策的反面。丘吉尔欣然地把斯大林看做是反对希特勒的盟友。^⑥

未能与苏联缔结协议使得与美国的联系更加紧要。不幸的是,与美国的军事联系更加令人难解。英国非常渺茫的希望就取决于美国放弃中立立场,允许罗斯福参与欧洲的平衡。5月份,罗斯福将这一任务委托给来自内华达州的参议员基·皮特曼(Key Pittman)和纽约的众议员索尔·布卢姆(Sol Bloom)。他二人都不适合于承担这一任务。皮特曼提出的议案如同1920年遭到否决的批准美国加入修订后的《国际联盟公约》议案一样不受欢迎。赞成美国进一步卷入欧洲事务的人和像参议员威廉·博拉(William Borah)这样顽固的孤立主义分子都不满意。回味一下1939年3月罗斯福告诉英国使节的话,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承诺,即允许交战各方在“现金购物自行运送”的基础上从美国购买武器。^⑦《租借法》没有任何征兆。支持率减少之后,该议案不得不撤销。当一个修改版被最终通过时,已经没有了任何修改美国中立的规定。如果说1938年9月美国不可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支持英国的话,那么到了1939年8月它就更加不可能了。在最后的危机当中,英国人有大量信息表明,如果在欧洲爆发战争,他们和法国人就只有单独作战。

议会与国家

莫里斯·考林(Maurice Cowling)认为,英国是由于国内的政治形

^⑤ 能反映出英国对莫斯科态度谨慎甚至是冷漠的是哈里法克斯于7月19日向内阁做出的评论:“如果谈判最终失败,外交大臣说这不会使他有太多的忧虑,因为他认为,不管签署了什么样的正式协议,一旦战争爆发,苏联政府可能只会采取最适合于他们的行动。”([2][CAB 23/100 (1939)] Public Records Office, London)尽管存在着这种看法,但作为观察者不免会注意到,英国一旦来到法国,它最为关注的是要防止法国遭到削弱或背叛到德国一方。它认为,英国采取何种行动直接关系到这一结果。

^⑥ 丘吉尔说,即使是魔王受到了希特勒的攻击,他也会在众议院中为其“说好话”。

^⑦ 罗斯福于3月25—26日向西尔·A·威勒特(Sir A. Willert)讲了此事。

势而匆忙做出了抑制德国的早熟承诺。为获得支持,保守党向他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哈利法克斯企图塑造一个更加现代化的保守党。^①考林的看法或许夸大了外交大臣纯粹的政治动机,低估了英国所遭受的外交和国际压力。很多影响因素正企图迫使英国决策者们对希特勒采取一条强硬的路线。3月份,各种各样的消息来源都告诉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德国即将采取针对罗马尼亚,然后是针对波兰的行动。在这样一种热化的气氛下,纯粹的误读在决定英国政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②成熟的德国军事方案实际上确实包括针对波兰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尽管并没有设定时间表。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公众的压力使得张伯伦难以再继续奉行对德绥靖政策。慕尼黑事件和3月15日夺取捷克斯洛伐克之后,英国公众对独裁者的舆论变得更加强硬。^③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得出结论说,“院外集团的感情是:张伯伦或者走开,或者彻底改变其政策。”他的这句话反映了后座议员们的观点。在哈利法克斯的敦促下,首相开始改变其公共立场。3月17日,张伯伦在伯明翰的讲话中表明,英国将坚如磐石。“所犯的最大错误是,由于相信战争是件无情的和残忍的事情,所以就假定这个国家已经丧失了勇气,不会竭尽全力迎接这一挑战来抵制战争爆发。”^④他的这番话(主要是由哈利法克斯加进去的)博得了喝彩。讲话不到两星期,张伯伦在举国上下的支持下向波兰提供了保证。在这一行动的背后是哈利法克斯的不断施压。他要组织起来抵制“德国统治整个世界的企图”。与此同时,尽管这位外交大臣依然忠诚于首相,但哈利法克斯是以主张扩大内阁和称道无党派政府而著称的。众议院对向波兰提供保证普遍持热情的支持态度。与之相伴随的是,它还要求与俄罗斯达成谅解。《新闻纪事报》(News Chronicle)于1939年5月19日鼓动说,“鉴于公众舆论几乎是一致

① Cowling, *Impact of Hitler*,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② 罗马尼亚大使弗吉尔·蒂利(Virgil Tilea)和记者伊恩·科尔文(Ian Colvin)对这一结论的得出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③ 详见 Richard Crockett, *Twilight of Truth: Chamberlain, Appeasement,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Pres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9); and Franklin Reid Gannon, *The British Press and Germany, 1936—193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④ 引自 Cowling, *Impact of Hitler*, p. 296。

地赞成与俄罗斯结盟的感情……我们应当督促政府抓紧时间完成与那个国家的谈判。”^⑤“由《大众观察》(Mass Observation)和英国公共舆论研究所(British Institution of Public Opinion)所进行的初步民意测验表明,此时绝大多数公共舆论(1939年6月是84%)都主张与苏联结盟。”^⑥在哈利法克斯的提议下,征募陆军防空兵计划变成了一项主张实行义务兵役制措施的决定。发誓决不在和平时期征兵的首相接受了这一决定。超乎想象的是,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之后,工党也被迫接受了征兵措施,尽管他们在议会中投了反对票。

在所有这一切当中,首相和哈利法克斯之间的观点有着明显的不同。两人都清楚,外交政策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中将是主要问题。然而张伯伦从不主张与俄罗斯联合,而哈利法克斯却认为这是缓解国内政治压力所必须的。张伯伦在国内之所以能依旧得人心,仅仅是因为这个国家看到他采取了一种稳健的政策。而当哈利法克斯于6月29日在其查塔姆宫(Chatham House)的讲话中强调政府打定主意要与俄罗斯进行成功的谈判时,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到春末夏初,任何拒绝向波兰提供保证的政府都不可能再长期呆在台上。军事冲突日益逼近的感觉(尽管不是大灾难的感觉)笼罩了整个英国。唐纳德·瓦特(Donald Watt)甚至过于强烈地认为,“从德国进军布拉格开始,欧洲发生的任何事情似乎都无法动摇英国人民的信念,即那个夏天战争已不可避免。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希特勒德国不可救药和不可逆转地决意要用武力征服欧洲,是因为要不惜任何代价去阻止它。”^⑦很多英国人并不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希特勒也许还能够被震慑住。但所有爱国主义的英国人都坚信,不管是有没有战争,英国都不能再做让步。1938年至1939年间英国在这方面的舆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⑧卡多根(Cadogan)抓住了这一转变的要旨,“从某个方面看,不像去年那么糟糕了。当时存在着一个可怕的

^⑤ 引自 Crockett, *Twilight of Truth*, p. 116。

^⑥ Watt, *How War Came*, p. 245.

^⑦ Ibid., p. 387.

^⑧ 就在哥德斯堡希特勒迫使张伯伦做出进一步让步之前,英国公众还踌躇不前。“实际上,《大众观察》于9月22日所做的民意测验显示,只有22%的人支持张伯伦,40%的人反对他的政策。”Lam, *Ghosts of Peace*, p. 81. 慕尼黑会议之后,绝大多数英国人赞成这个协议。到1939年3月,这种多数有了相当程度的下降。C. Madge and T. Harrison, *Britain by Mass Observation* (London: Cresset, 1986).

问题：我们是应当战，还是不应当战？现在已毫无疑问，在特定场合下我们必须参战，只是取决于（我们无法控制的）这些场合是否出现。”^⑨

在1939年夏季的大部分时间里，代表官方的报纸继续赞扬张伯伦。部分是由于他的鼓动，这些报纸仍继续否认战争的可能性。然而到了8月的第三周，形势发生了变化。《泰晤士报》在支持绥靖政策多年之后，又采取了好战立场。只有劳德·比弗布鲁克(Lord Beaverbrook)的《每日快报》继续高谈阔论张伯伦路线：不会有战争；谈判能够解决波兰问题。在议会和内阁，反叛与日俱增。9月1日，德国部队击溃波兰防线向华沙挺进。一天之后，英国首相仍不能向下议院宣布已向希特勒发出了最后通牒。工党一位领导人阿瑟·格林伍德(Arthur Greenwood)告诉张伯伦说，除非在次日(9月3日)11时之前发出最后通牒，否则，无论是你，是我，还是世上的其他什么人都无法控制下议院。”一伙持不同政见的内阁成员聚集在下议院西尔·约翰·西蒙(Sir John Simon)的房间内，决心要等到宣战才肯离开。最后，张伯伦同意发出最后通牒的最后期限定在9月3日上午11点。他被迫采取行动而没有等待巴黎。下议院反映了整个国家的情绪。大家都为等待时期的结束而松了一口气，张伯伦早期的批评者之一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在8月24日对其妻子写信说，“我因恐惧而感到不舒服，但我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变得勇敢起来。”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评论道：“观看大多数人津津乐道地在那里吵来吵去，为我们还没有宣战而义愤填膺，”这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啊。

当决定最终做出后，军事形势并没有好转。实际上，自1938年9月慕尼黑事件以来更加恶化了。法国对向波兰提供保证思前想后；俄罗斯现在站到了德国一边；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现在被看做是一个优柔寡断的国家，人们对其所抱的最大希望也就是保持中立。美国仍然是一个旁观者。然而英国走向了战争。

^⑨ Dikes, *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 August 24, 1939, entry.

政治与大战略

值得质疑的是,1938年英国公众舆论是否愿意为捍卫爱德华·贝奈斯(Eduard Benes)总统在捷克斯洛伐克日耳曼人地区的统治而让英国接受一场战争。不错,哥德斯堡会议以最直接的方式提出了希特勒的方法问题。但慕尼黑会议又部分修复了损害:英国人仍然可以认为,希特勒只不过是把日耳曼人送还到他们的故乡,英国人对此又怎能反对呢?

不到一年,这一情绪完全变了。希特勒占领了非日耳曼人的疆土。出于国际和国内的综合压力,英国向波兰提供了保证。但强硬的英国公众情绪对新的外交政策的影响也并非不重要。从1月份到进军布拉格期间的各种威胁造成了英国战略的变化。尽管公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但英国领袖们仍然认为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奉行了一条弱威慑战略。^⑩ 首相张伯伦对与俄罗斯结盟谈判和希特勒—斯大林条约做出的反应表明英国大战略完全背离了现实主义成本与收益的常规算计。因为张伯伦从不支持与俄罗斯结盟的努力,不愿意批准一个两翼联盟。他甚至不想让俄罗斯帮助波兰,而只是和哈利法克斯一道使俄罗斯不落入德国人的笼络。但他观望和延误的时间太久,致使俄罗斯倒向了德国。当纳粹—苏联条约签署后,张伯伦漠然视之,完全不顾先前国防参谋部要求谋求莫斯科的支持,以便英法两国能够以两翼战争对抗德国的压力。且不说对英国战略利益的蔑视,新条约还确认了张伯伦对待苏联的消极态度。利德尔·哈特的看法是,直到1939年8月23日之后英国的“斗牛犬”(bulldog)精神才表现出来,但正如他后来所指出的,这也不能证明走向战争是符合理性的。

据我们的判断,1939年的英国大战略证明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国家有时会决定致力于它们不可能实现的军事目标。国内的和经济的

^⑩ 我们再一次遇到了“鸡和蛋”的问题。如果战争不是不可避免,“弱威慑”战略就足够了。但如果战争可能性较大,只有“强威慑”战略(指德国会明显输掉战争)才有可能成功。

因素常常是决定大战略的主要决定因子。然而在战争前夕的英国,政治因素高于经济因素,国内压力高于国际制约因素。^①不言而喻的大战略道理是:英国是一个大国,应当像大国一样行事。但它还必须节俭地使用并精心核算自己的资源,使其能够为己所用,并保持自己的大国地位。在眼下的案例中,有两种立场可以选择:(1)根据第一种观点,英国在东欧的利益是短暂的,因为德国无论在那里获得什么好处,都不可能获得足够的资源来打赢一场与英国的长期战争。(2)第二种观点认为,德国在东欧的获益至关重要,英国必须加以反对。然而要这样做,英国必须以让德国在东线战争遭到失败来威胁协德国。没有俄罗斯或美国的帮助,英国不可能做到第二种选择。

要实现第一个战略概念目标,英国只有采取防卫立场,呆在莱茵和马其诺防线背后;要实现第二个概念目标,英国必须能够以击败德国来对其构成威胁。这要通过两线战争或发动进攻跨过德国西墙防线(Westwall)来实现。没有苏联的援助,第一选择不可能;没有美国帮助,第二选择也不可能。至于规划,英国应当采取模糊的防卫立场。英法应当耐心地在其防线以内等待希特勒对其发动进攻。^②

自相矛盾的是,英国采纳了第二种选择的目标,但却只用了适合于第一种选择的手段。它为什么这样做呢?英国之所以对东欧采取极端的行动是因为德国暴露出敌对的意图。面对这种认识危机以及整个国家的感情,不得不采取这种路线以预防德国的下一个挑战。英国在东欧正是采取了这种路线。但是对这一长远政策所提供的支持并不足。各国必须在手段与目的之间最终找到一种合适的对应关系,而大战略正是找到合适手段实现政策目标的卓越工具。在这一案例中它没能做到这一点。1938年英国在慕尼黑采取的政策中,对目标的界定方式相当有限。它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希特勒的目的是有限的,英国可以承认它们的这些目标,而不削弱自己的独立或大国地位。对于一个资源分布过远,经济脆弱,又面临着一个经济力量优越,且由一个尚无法识破其未来的贪得无厌目标的独裁者领导的

^① 夸大大战略预期现象的另外一个例证出现于1939—1940年芬兰与俄罗斯的冬季战争期间,当时英国决定要帮助芬兰。如果英法远征军出发再早一些(赶在芬兰人投降之前),英国很有可能会使自己处于与纳粹德国和苏联同时交战的状态。

^② 英国军事和政治领袖们认为,马其诺防线能够守住。他们与财政部的代表们观点不同,认为英国能够在消耗战中取胜。这是一种错误的假设。

对手这样一个国家来说,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绥靖政策都被说成是合适的。1939年,面对德国新的挑战,英国又制定了更加广泛的目标。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写道:“按照任何理性的算计,英法在1939年面临的所有种类的经济压力和政治冲突都会说服他们放弃9月之前的斗争。”^③按照这一观点,内维尔·张伯伦竟成了十足的新现实主义者。

那他们为什么继续?我们的观点是,国内(政府的和公共的)因素大于经济因素。因此,大战略是内部因素决定的。英国继续从事着一种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行动进程,而不问或不知道它是否能承担得起。做出这种选择不应该是基于现实主义的成本—收益计算。但在这一案例中,这些抉择是基于这一标准做出的。

英国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吗?从纯粹国际的和现实主义的角度看,人们可能会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最好是寻求让苏俄反对纳粹德国。^④根据这一观点,3月份英国的保证不应当做出,应当让斯大林自己去保卫波兰和乌克兰。依此观点看来,俄罗斯人和德国人迟早会相互冲突起来,因为希特勒的野心总是要夺取苏联西部的领土。

然而事实上不存在这样的选择。英国面临的形势日益恶化,纳粹德国不断在东部受益,英国不可能保持其大国的尊严。英国的官员也好,它的人民也好,都不会让自己蒙受这样的耻辱。即使在经济上它无法承受,但在政治上,英国不得不抵抗。为此,与现实主义标准相反,英国给苏联提供了两年的喘息时间,而这正是它自己所急需的。

最后一点有趣的是,英国颠倒了军事和政治的优先秩序,至少是没能让二者结合到一起发挥支持战争的作用。1938年9月,军事力量对比比一年之后更有利于英法:^⑤德国的西墙防线只是一个建设工地;捷克的防御工事,30个师的捷克军队,以及什科达工厂(Skoda works)仍然掌握在友方手里;德国尚未做好战斗准备;至少存在着获得苏联支持的可能性。然而英国国内政治会使做出战争的决策非常困难。没人想要战争。大部分政府成员不相信战争是必要的。公众

^③ Overy, "DEBATE: Reply," p. 238.

^④ 过去有人曾提出过这样的看法,详见 Geotge F. Kennan, *The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⑤ Murray, *Change in the European Balance of Power*.

也没做好这类行动的准备。

与之相反,1939年9月的军事形势已经恶化了。胜利取决于法国军队的力量和马其诺防线,取决于或者是苏联参战,或者是美国支持和干预。纳粹—苏联条约似乎是排除了俄罗斯人;美国人在1939年夏天的行动也不会让人在那方面抱有幻想。发生变化的只是国内共识。希特勒粉碎了英国人以为他只是企图让日耳曼人返回到旧日帝国领土上的希望。面对新的认知形势,政治家们及其所代表的公众现在做好了投入战争的准备。与现实主义的假设截然不同,英国的案例表明,大战略中军事和经济算计的重要性不如国内的和政治的决定因素。

第七章

对大战略的内外制约：苏联案例*

马修·伊万杰里斯塔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苏联外交政策的剧变在美国引起了相互矛盾的反应。大部分观察家认为经济衰退是造成苏联内外政策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很多人提出,不管莫斯科谁掌权,只要苏联经济持续停滞,苏联大战略的变化^①(在所有战线上进行实质性的收缩)就不会停止。同样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尽管经济衰退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但如果没有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领导,苏联将不会发生变化,没有他,也不会继续下去。每一观点依次又都为美国的政策开出了一个特定的药方。一方面,如果是经济衰退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苏联的温和化,那么美国的努力方向就应当是加速其衰退,比如通过昂贵的军备竞赛。另一方面,如果是苏联的温和化取决于戈尔巴乔夫的地位上升,并能抑制住国内强硬派对手,那么美国就不应当从事那些会损害其战略收缩政策声望的行为,比如军备竞赛。

154

这两种竞争性的观点支配了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政策讨论。实际上,这一时期的两位美国总统心里都(显然是先后地,但也可能是同时地)持有这两种看法。可以认为,甚至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罗纳德·里根就预见到了苏联的退缩。他还确信,苏联的经济和

* 我感谢 Marc Bennett 提供的研究帮助,感谢密歇根大学校长创议基金会和麦克阿瑟基金会提供的财政资助。此外,我还感谢下列人员对本章初稿提出的评论: Robert Axelrod、Michael Doyle、Charles Glaser、Chaim Karfmann、Robert Pate、Judith Reppy、J. David Singer、Arthur Stein、Jack Snyder 和 William Zimmerman。

^① 我接受了 Barry R Posen 对大战略所做的定义。他将大战略称之为“一个政治—军事上的手段—目的链条,一个国家关于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为自己带来安全的理论……一个大战略必须区分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种威胁,必须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其他领域上设计出消除这些威胁的对策。”见 Barry R. 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France, Britain, and Germany between the World Wa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3。

意识形态也将破产。在他的任期即将结束时,他在多个场合会见了戈尔巴乔夫,并把戈尔巴乔夫继续掌权看做是苏联发生变革的保障条件。乔治·布什上台后,对里根与戈尔巴乔夫之间形成的紧密关系深表疑虑,意图使自己与其前任的政策划清界线。他和他的顾问们明确表示,他们认为谁领导苏联无关紧要,美国没有必要做出任何让步帮助戈尔巴乔夫保住位置。然而几年之后,布什就开始用最动人的词句来称颂戈尔巴乔夫:“我们不要忘记,是戈尔巴乔夫总统勇敢的公开性(glasnost)和民主化(perestroika)政策才是使我们能够结束冷战并使欧洲能够获得统一和自由的关键因素。”^②

在20世纪80年代末,与冷战如何结束,是否能尽快结束的历史性讨论相伴随的,是关于美国对苏政策的讨论。一方认为,美国“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迫使苏联参与军备竞赛,这加速了苏联经济的衰退,使得扩张主义外交政策代价过高而无法承受。另一方则认为,正如布什总统所做的,虽说结束冷战的主要功绩应归功于戈尔巴乔夫本人,但正是由于美国愿意做出(不管是象征性的,还是规模不大的)让步才使得他能够顶住国内反对者的压力而实施其政策。^③ 这一观点的一个重要喻意是,如果美国支持早先的苏联改革者(最显著的是

155

^② Maureen Dowd, “Bush Meets and Commends Yeltsin but Cites Support for Gorbachev,” *New York Times*, June 21, 1991.

^③ 对这一讨论的早期贡献见 Thomas Risse-Kappen, “Did ‘Peace Through Strength’ End the Cold War? Lessons from IN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6 (Summer 1991); Fred Chernoff, “Ending the Cold War: The Soviet Retreat and the U. S. Military Buildup,” *International Affairs* 67 (1991): pp. 111—126; Matthew Evangelista, “Sources of Moderation in Soviet Security Policy,” in *Behavior, Society, and Nuclear War*, ed. Philip Tetlock et al., vol. 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Fred Halliday, “A Singular Collapse: The Soviet Union, Market Pressure, and Inter-State Competition,” *Contention* 1 (Winter 1992): pp. 121—142; Henry S. Rowen and Charles Wolf, Jr., “Introduction,” in their *The Impoverished Superpower: Perestroika and the Soviet Military Burden* (San Francisco: ICS Press, 1990); David S. Meyer, “How We Helped End the Cold War (and Let Someone Else Take All the Credit),” *Nuclear Times*, Winter 1990—1991: pp. 9—14.

尼基塔·赫鲁晓夫), 冷战或许会提前几十年就已结束了。^④

这一讨论不仅只是与历史相关。有关苏联温和化外交路线如何出现的两种观点还折射出国际关系研究当中两种理论流派的竞争。现实主义流派认为, 国家采取的行动是受国际体系的力量影响和支配的, 要解释外交政策, 通常没有必要去看国内层次的政治。按照这一流派的观点, 国家可以被想像成为一种单一的行为体。^⑤ 国家的主要目标是维护自身的安全, 其手段常常是将自身的权势最大化。将国家看做是一个追求权势最大化的单一主体是很多(但不是全部)现实主义学者所持有的概念。

相反的一派并不否认外部力量的作用, 但却(像一些现实主义者一样)提出, 外部力量不是决定性因素。国内政治行为体以不同的方式解读外部事件, 以为他们所主张的政策建构支持材料。其他国家所采取的某些行动支持国内某些特定力量的立场, 而不利于其他力量的立场。但是很多其他国家的行动含义并不清楚, 因为这些含义取决于国内的不同解读。这一学派的支持者们认为, 像美国这样的大国能够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而这些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则完全取决于国内的讨论。对这种讨论的性质完全值得去解读。^⑥ 我将这一派称之为“后现实主义”。

20世纪80年苏联政治局的档案记录公布之前, 我们将无法完全理解经济衰退、美国政策和国内政治竞争对于引发苏联外交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相对重要意义。然而同时, 我们可以对现实主义和后

④ Alexander Yanov, "In the Grip of the Adversarial Paradigm: The Case of Nikita Sergeevich Khrushchev in Retrospect," in *Reform in Russia and the U. S. S. R.*, ed. Robert O. Crummey (Urbana: University Illinois Press, 1989), pp. 156—181; George F. Minde II and Michael Hennessey, "Reform of the Soviet Military Under Khrushchev and the Role of America's Strategic Modernization," in *ibid.*, pp. 182—206; James Richter, "Action and Reaction in Khrushchev's Foreign Policy: How Leadership Politics Affect Soviet Responses to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9; Jutta Tiedtke, *Abrüstung in der Sowjetunion: Wirtschaftliche Bedingungen und soziale Folgen der Truppenreduzierung von 1960* (Frankfurt/Main: Campus Verlag, 1985).

⑤ 然而也有些学者试图将单元层次的诸多因素纳入现实主义框架当中, 见 Micheal Mastanduno, David A. Lake, and G. John Ikenberry, "Toward a Realist Theory of State Ac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3 (December 1989): pp. 457—474。

⑥ Jack Snyder, "International Leverage on Soviet Domestic Change," *World Politics* 42 (October 1989): pp. 1—30;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现实主义的解释逻辑加以探讨,看一下它们是如何解释苏联变化的。我们首先对苏联战略收缩最简单的解释(即直接源自于经济衰退,国内政治因素的作用无足轻重)进行评估。找出这一解释的不足,我们再转向另外一种解释,即保留单一行为体的假设,只是改变外部环境,并且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各种不同的经济条件下,国家如何对外部威胁的变化做出反应?这一框架与现实主义方法是吻合的,它提供了非常不确定的国家行为预期。然后我们评估后现实主义学派的假设,即不仅外部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变化产生作用,国内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的争论也发挥作用。

现实主义的阐释

能力衰退与战略收缩

1990年,杰出的现实主义者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解释说当时苏联政策发生的变化印证了他的理论对国际性和系统性因素的强调。他强调能力问题,从而对苏联外交(以及国内)政策的革命做出了最明了的解释:“能力的衰落是对苏联新近的激进政策的最好解释,因为衰落先于内部改革。苏联所发生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外部原因……国家经济重组以及减轻帝国负担都是出于国际环境的无奈。它反过来又要求内部政治改革。”

简言之,根据沃尔兹的看法,“由于苏联的能力衰落了,它的外部行为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①苏联采纳了某种和解性的话语,在军备谈判中做出了种种让步,做出了种种单边约束举动,从某些具有边缘性战略利益甚至是核心战略利益(如东欧)的地区撤出军队。在沃尔兹这样的现实主义者看来,苏联大战略的这些重大变化是外部压力加剧了其能力衰落的结果。

这一阐释存在三方面的问题,首先,沃尔兹看来似乎是苏联绝对能力的衰落成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创意的源泉。但事实上,如果我们

^① Kenneth N. Waltz, “On the Nature of States and Their Recourse to Violenc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Journal* 3 (June 1990): pp. 6—7.

指的是传统的军事和经济权力手段的话，苏联的绝对能力是在戈尔巴乔夫开始实施其改革之后才衰落的。^⑧也许沃尔兹指的是苏联在国际体系中相对于其他大国的相对地位下降了。是这一相对衰落激发了改革和苏联对外部承诺的缩减。然而，尽管有里根的建设，苏联相对于美国的军事能力并没有明显的下降。^⑨从美国政府的视角看，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之前，苏联的军事能力一直不断增长，只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才开始衰落。^⑩实际上，仅仅在几年之前，公众对于苏联军事增长和扩张势头的讨论还相当悲观，甚至是恐慌。^⑪

如表7.1所示，苏联真正的衰落在于经济运行。从长远看，经济运行状况则是军事实力的源泉。鉴于沃尔兹提出经济权势与军事权势可以相互转换的假定，他或许是想将苏联大战略的变化归之于停滞的经济。然而，这里就出现了第二个问题，即时间性。将苏联大战略的变化解释为与经济条件的变化直接相关的观点找到的支持数据只能说明一半的问题。从最直接的外表层面我们可以观察到，苏联最大程度的战略收缩与最低的经济增长率正好吻合。这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戈尔巴乔夫的缓和行为与长期的经济持续衰落趋势存在着巧合。然而，如果我们要考虑苏联从何时开始关注其经济衰落，那么看一下逐年的百分比变化会更有意义。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苏联官方的估计（见表7.1），最急剧的增长率下降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中央情报局的估计显示，从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到第九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下降了38%。苏联的数据显示下降27%。相比之下，从那时起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开始，经济下滑并不十分剧烈。这些数据可以说明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时期苏联采取缓和政策的经济动机（尤其是军备控

⑧ 有些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确实下降了。

⑨ Coral Bell, *The Reagan Paradox: U. S.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80s*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 chaps. 2 and 4.

⑩ 比如见各年版本的美国政府发行物《苏联军事实力》(Washington, D. C.: (1981—1989)). 甚至在苏联撤出阿富汗之后发表的1989年版本中，也表现出不愿意承认苏联发生的巨大变化。

⑪ 比如，见 Norman Podhoretz, *The Present Dang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0); Fred Charles Iklé, "What It Means to Be Number Two," *Fortune*, (November 20, 1978)。

制和外贸),但却无法说明苏联领导层为什么长期未能控制军事和帝国承诺。^⑫ 只有考虑国内政治的影响,才能对这一差异做出解释。^⑬

表 7.1 苏联的经济增长,1961—1987 年

	GNP 增长百分比 ^a	国民收入增长百分比 ^b
1961—1965	4.8	6.5
1966—1970	5.0	7.8
1971—1975	3.1	5.7
1976—1980	2.2	4.3
1981—1985	1.8	3.6
1986—1987	2.2	3.2

资料来源:“Revisiting Soviet Economic Performance under Glasnost: Implications for CIA Estimates,” CIA report SOV 88-10068, September 1988, p. 9.

^a 为了与苏联的做法保持一致,中央情报局对国民生产总值(GNP)的估计排除了不直接增加物质产量的服务业。

^b 苏联的国民收入数字排除了贬值因素和不直接增加物质产量的服务业,但却包括批发商之间相互交易的重复统计。

第三,与沃尔兹的主张相反,即使在现实主义框架下(至少像沃尔兹在过去所设想的那样),能力衰退是否必然导致战略收缩也并不清楚。比如在 1981 年,他并不是用苏联相对于西方的经济和军事弱势来解释收缩,而是解释苏联的军事建构和扩张:“苏联虽然并不是没有力量,但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它的经济放缓,它的技术落后……不得不在经济上和军事上与美国以及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展开竞争,而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一半,不到美国、西欧和日本合计国民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这种竞争并不是个令人羡慕的差事。如果我们处于苏联那样的境况,会考虑我们是否应当减少一些军备,我们的行为的温和程度也可能会超过苏联。”^⑭

他得出的结论是:“苏联的行为是任何一个大国处在不利位置时都会去做的。”^⑮ 仅仅不到 10 年之后,面对类似的经济困窘,苏联却做

^⑫ Robert Pape 提出,在和解时期相对缓和的国际气候下,苏联领导层没有必要过多地关注经济。

^⑬ Snyder, *Myths of Empire*.

^⑭ Kenneth N. Waltz, “Another Gap?” a commentary on Robert E. Osgood, “Containment, Soviet Behavior, and Grand Strategy,” *Policy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 16 (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81): pp. 79—80.

^⑮ Ibid.

出了不同的举动。然而沃尔兹仍然把苏联的行为归因于同样的因素：外部的和系统的压力再加上能力的不足。

最后，认为苏联的战略收缩是出于国际竞争的需要迫不得已而为之的观点错误之处还在于单一行为体的假定。它假定，苏联领导层内部对于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都有着某种程度的共识。这种解释将苏联的收缩归因于获取一段时间来重建经济。按照这一假定，作为对维护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安全负有最重要责任的苏联军方将会支持这一政策。很多分析家从现实主义的前提出发，认为苏联军方会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他们希望重振的经济将会为未来高科技军事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苏联军方就表现出对苏联经济大规模停滞的关注，尤其担忧的是缺乏未来大规模武器生产体系中必不可少的生产技术和程序。军方完全了解，未来的军事技术发展需要有工业基础……它需要从经济改革中获益。”^{①⑥}

为了接受喘息空间的观点，人们必须假定在军方和发起改革的党的领导层之间对改革的长期目的有着某种程度的共识。但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对于国家安全的讨论观点迥异。^{①⑦}在军队内部，支持改革，尤其是支持大规模削减军队和军事开支的人并不像争取喘息空间观点所假定的那样普遍。正像1991年8月未遂政变所揭示的那样，高层指挥者们的态度是明确反对的。

对于文职改革者们来说，问题不在于将来如何与美国在高科技军备竞赛中展开竞争，而在于如何用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新的关系

160

^{①⑥} Phillip A. Petersen and Notra Trulock III, "A 'New'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 Origins and Implications," *Strategic Review* (Summer 1988): pp. 9—24, 18, 20; 一种类似的观点见 Jacques Sapir and Thierry Malleret, "La politique militaire Soviétique: de la restructuration à la réform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Fourth World Congress for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Harrogate, England, July 21—26, 1990; and in Dale R. Herspring, *The Soviet High Command, 1967—1989: Personalities and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①⑦} 对内部讨论的深入分析见 Bruce Parrott, "Soviet National Security under Gorbachev," *Problems of Communism* 37, no. 6 (1988): pp. 1—36。以大量引用材料所做的卓越的总体观察见 Andrei Melville and Gail W. Lapidus, eds., *The Glasnost Papers: Voices on Reform from Moscow* (Boulder, Col.: Westview, 1990), chap. 7。

以取代旧的冲突关系。^⑮ 鉴于这些不同的看法,难怪苏联的战略收缩(沃尔兹将其描述成是它对20世纪80年代末所处的国际地位做出的必要反应)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争议。看到苏联权势撤出东欧,德国按照西方的条件实现了统一以及苏联从第三世界退却,人们指责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奉行绥靖政策,出卖了苏联的利益,是新的“慕尼黑阴谋”。当他的上司戈尔巴乔夫(他是人们批评的隐含目标)不站出来为他说话时,谢瓦尔德纳泽于1990年12月辞去了职务,并有先见之明地警告人们对即将来临的独裁保持警惕。^⑯ 那些认为在相对能力或经济运作的衰落面前苏联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的人含蓄地假定,面对20世纪80年代的事件,任何苏联领导或国内政治力量的任何结构都会以与戈尔巴乔夫领导班子大致同样的方式做出反应。鉴于当时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争论程度和此后的大量批评,单一行为体的假设和“国际必然性”的观点似乎是站不住脚的。

经济衰退,外部威胁与大战略

尽管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的一段时期美国相对于苏联的军事能力并没有明显增加,但苏联却毫无疑问地感受到了美国的威胁。正如斯蒂芬·瓦尔特(Stephen Walt)所指出的那样,与其说是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势均衡”观点不如说是“威胁均衡”(对意图的感受再加上能力)才能更好地解释国家的行为。^⑰ 本节探讨的是,在各种不同

^⑮ Matthew Evangelista, "Economic Reform and Military Technology in Soviet Security Policy," *Harriman Institute Forum* 2 (January 1989); A. Dobrynin, "Za bez" iadernyi mir, navstrechu XXI veku, *Kommunist*, no. 9 (June 1986): pp. 18—31; and L. Feoktistov, "Gonka vooruzhenii, voina i nauchno-tekhnicheskii progress nesovmestimy!" *Kommunist*, no. 15 (October 1986): pp. 97—106; Eduard Shevardnadze, *The Future Belongs to Freedo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⑯ Egor Ligachev 将此事比作“慕尼黑阴谋”,见 *Pravda*, February 7, 1990。有关讨论见 John Van Oudenaren, "The Role of Shevardnadze and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n the Making of Soviet Defense and Arms Control Policy," RAND Report R-3898-USDP (Santa Monica: RAND Corp., July 1990); and Maxim Sokolov, "An Escape for the Desert Rat?" *Commerçant* (Moscow), English edition, November 5, 1990, p. 11。最后一篇文章在谢瓦尔德纳泽宣布辞职前一个多月就预见到了他的辞职,说他遭到了“所谓爱国者和军工企业界”越来越多的批评,“甚至可能会下台。”

^⑰ Stephen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1—26, 263—266.

的外部威胁和经济运作条件下这一修正的现实主义方法对于一个国家的大战略将预示着什么。

所有现实主义传统的分析家都认为,处在无政府国际环境中的国家首要的目标是要设法提高自身的安全。更具体地说,一些杰出的现实主义理论家坚持认为,“在无政府条件下,国家通过追求自身相对于其他国家权势的最大化来求得生存。”^①按照沃尔兹的看法,这一权势最大化的假设“在现实主义者当中相当广泛”^②。它与美国对苏联动机的传统感受(遏制学说和“以实力求和平”的观念)正相吻合。^③按照这一观点,苏联领导人在某种消费和投资制约条件允许的范围内追求军事权势的最大化。这些制约的实质含义是,对消费的压制不能超过限度,以免引起民众动乱;对投资的限制不要影响到经济的长期增长,因为经济的长期增长是军事进一步增长的前提条件。^④下面,我采纳这一假设来分析经济条件是如何影响苏联大战略的。即便是采纳这样一种限制性的假设,现实主义理论对苏联行为的预测也是不确定的。

162

表 7.2 按照现实主义和单一行为体假设方法说明了外部威胁与经济运作之间的关系。人们很容易便能看出与某些著名的历史案例相关的状况。在经济下滑状况下高度的外部威胁(左上栏)造成了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对苏联威胁的高度感受和足以能够支撑大规模军备竞赛的强大经济(右上栏)似乎印证了战后大部分时期美国的军事政策,印证了美国对于军备开支有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所存在的矛盾心理;在经济强劲和外部低威胁状况下预

^①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 (Summer 1990): 5—56, at p. 12.

^② 他自己并不同意这一假设。见 Kenneth N. Waltz,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in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ed. Robert O. Keoha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34。在沃尔兹看来,“国家的首要关注的不是权势最大化,而是维护它们在系统中的地位。”见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 126。

^③ 有关美国对苏联目标的传统解释见 Osgood, “Containment, Soviet Behavior, and Grand Strategy”的归纳。

^④ Alan Alexandroff 和 Richard Rosecrance 在英国案例中详细阐述了这一观点,见 “Deterrence in 1939,” *World Politics* 29 (April 1977): pp. 404—424。Myron Rush 将这一观点应用于苏联案例的分析,见 Myron Rush, “Guans over Growth in Soviet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7 (Winter 1982/1983): pp. 167—179。

示的结果是扩张(右下栏)。^⑤ 它印证了对 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政策的某些解释:此时还没有看到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同时认为美国受到了“越南战争综合症”的困扰,因而不会对苏联扩张构成威胁;剩下的一栏(左下栏)所代表的状况在很多人看来会增进美苏之间在下个世纪的合作:威胁减少,强调减少国防开支,对资源重新进行分配。然而,鉴于很多有着现实主义传统的学者假定国家会最大限度地追求权势和相对收益,因而他们预计这样的合作结果不会持久。^⑥

表 7.2 威胁感受、经济运作与大战略

外部威胁	经济状况	
	经济衰退	经济强劲
高威胁	绥靖或预防性战争	竞争
低威胁	合作	扩张

这一方法的一个明显缺陷是难以解释经济衰退和高威胁(左上栏)状况下绥靖政策的转换。同样的状况可以预示一场预防性的战争,以便在不可避免的冲突发生之前防止进一步的相对衰落。^⑦ 因此,建立在普遍的现实主义假设基础上的这一框架无法解释 1939 年英国从绥靖政策转变成抗衡行为(大规模的重新武装和联盟承诺)。^⑧ 一种算是能说得上去的回应认为,在外部威胁极高和战争迫在眉睫的状况下,按照正常抗衡行为运转的制约因素会失去作用。^⑨ 所以,在英国的案例中,随着大量威胁的突显,造成绥靖政策的种种制约因素——民众对战争的反感,对支付平衡问题的关注,限制大量税收和保留社会福利政策的愿望——都变得无足轻重了。这里的问题是,对于很多观察者来说,纳粹的威胁在英国政府放弃绥靖政策很早以

^⑤ 这一结果假定了两点:(1) 扩张确能带来国家相对权势的最大化;(2) “低威胁”不仅意味着对国家安全的低威胁,而且还特别意味着对国家扩张的反对程度低和风险低。感谢 Charles Glaser 帮助我澄清了这一点。

^⑥ 最耸人听闻的预测认为苏联会重振权势,东西方之间会重新出现冲突。见 Mark Helprin, “The Power of Russia Alon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7, 1991。

^⑦ Jack S. Levy, “Declining Power and the Preventive Motivation for War,” *World Politics* 40 (October 1987): pp. 82—107.

^⑧ 一位现实主义的支持者提出,与“流行的绥靖政策神话”相反,这一理论恰恰解释了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的行为,即国家既从事内部的抗衡行为,也从事外部的抗衡行为。见 Posen,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pp. 169—171。

^⑨ Arthur A. Stein, *The Nation at Wa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前就已明显了。要理解政策变化的时间以及看上去如此紧要的制约因素为什么会失去作用,似乎还需要超越权势平衡或威胁平衡的结构理论,尤其是需要区分外部威胁的性质及程度与经济状况制约两种看法之间的不同。

对于苏联案例来说,单一行为体的假设也是成问题的。受戈尔巴乔夫时期戏剧性变化的影响,很多西方分析家将苏联的收缩归结于经济衰退以及美国奉行的“以实力求和平”政策。按照这一分析,我们会提出,在高威胁和经济衰退状况下(左上栏)苏联将奉行绥靖政策。苏联国家对经济能力的相对衰落(增长率停滞,生产率系数下降等)做出的反应是收缩其军事承诺。

这里分析的侧重点是能力。然而这一方法存在的问题是,人们不清楚应当在何种程度的衰退点上才能预示收缩。那种认为在美国新的武断面前所出现的苏联经济衰退导致了绥靖政策的观点可以适用于20世纪80年代的前半期,但随着罗纳德·里根以强烈的反苏纲领当选,这一观点也适用于80年代的后半期。然而实际上,苏联对里根政府的强烈措辞和竞争性政策(在欧洲部署新导弹、北约战略的进攻性定向以及以战略防御计划为代表的技术挑战)做出的最初反应决不是和解性的。^① 苏联做出了更加强硬的决策。继1983年底部署潘星II型和巡航导弹之后,莫斯科中断了武器谈判,采取了“抗衡措施”,还加速了其他几个军事计划的实施。^② 尽管苏联经济状况不佳,但一些重要的苏联军官提出更严厉的要求动用更多的资源,以在技术性军备竞赛中展开竞争,并将20世纪30年代同目前暗中做了对比。^③

以威胁为基础的现实主义方法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它在一个关键维度上的不确定性。面对一个敌对的外部环境和严重的内部经济制约,国家并不总是选择绥靖政策,有时也会选择战争。正如杰克列维(Jack Levy)所指出的,战争产生于“一个国家感受到其相对于一个崛起中的对手的军事实力和潜在能力正在衰落,产生于对这一衰落

^① Parrott, "Soviet National Security under Gorbachev."

^② Michael McGwire, *Perestroika and Soviet 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1), esp. chaps. 5, 10.

^③ 比如,见苏联前总参谋长 Nikolai Ogarkov 元帅所著的小册子 *Istoriia uchit bditel'nosti* (Moscow: Voenizdat, 1985)。另见 Parrott, "Soviet National Security," 中的讨论。

后果的担心。”^③在这样的背景下,领袖们可能会寻找机会在条件进一步恶化之前发起战争。一些苏联官员毫无疑问地认为他们国家的形势正处于这样一种惊人状况,尤其是在1983年至1984年期间。尽管没有哪位苏联官员公开主张发动预防性战争,但一些西方分析家在预测苏联行为时并不那么小心慎重。比如,爱德华·鲁特瓦克(Edward Luttwak)在1983年发表了一本关于苏联大战略的书。他在书中表示,苏联实际上有可能会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最有可能是针对中国。他认为,“政权长期的悲观情绪和目前的军事乐观情绪相结合是更容易蓄意发动战争的典型条件。”^④他的分析得到了最近辞职的美国国务卿和一位前国家安全顾问的赞赏。^⑤面对很多人事后认为必定引起收缩的条件,预测苏联会采取更加果断的行为的分析家不只鲁特瓦克一人。一位苏联学家表达了当时的一种普遍看法。他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以经济为代价换取了暂时的军事优势。这使它会以先前被认为是容易触怒美国的不恰当的方式更加轻率地利用战略机遇,更大胆地运用各种军事手段。”^⑥

要说明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领导人在内外压力交加的形势下为什么没有主张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原因并不难,核武器的存在就是一个很好的原因。如果他们对自己的核力量报复能力怀有一定的信心,苏联领导人就不大可能认为与美国或中国交战是不可避免的。正如迈克尔·麦格威尔(Michael MccGwire)所指出的,即使美国“不可能内在地产生蓄意发动核打击的想法,但是美国的行为造成了里根政府意图的不确定性,这足以让苏联采取特别措施来为攻击苏联的计划提供战略性的早期预警”^⑦。在里根发表“邪恶帝国”和“星球大战”演说数月之后的1983年秋季,紧张达到了顶峰。美国部署新式“欧洲导弹”与北约年度军事演习以及一次意图在于练习北约发射核武器程序的指挥所特别演习碰巧重合到一起。苏联领导人“呼吁其在外国首都的情报机构立即报告战争指数,据说苏联军方做出了

^③ Levy, “Declining Power,” p. 87.

^④ Edward N. Luttwak,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3), p. 40.

^⑤ 同上。Alexander M. Haig, Jr., 和 Zbigniew Brzezinski 的评论见封底背面。

^⑥ Rush, “Guns over Growth,” p. 178.

^⑦ MccGwire, *Perestroika*, p. 390.

特别积极的回应。”^⑧就这样,常被认为是诱使苏联走向温和的美国行动却有可能不不经意地引发一场战争。

现实主义的解释即使能够成功地说明为什么苏联会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采取绥靖战略,但它却无法指明苏联奉行这一战略的时间会持续多长。在这里,人们可以用类推的办法考虑一下英国和苏联在 20 世纪 30 年代面对德国侵略威胁的情况。如果外部高度威胁的气氛持续长久,人们会认为绥靖可以成为一种临时的战略,目的在于获取一个“喘息空间”,直到经济强大到足以支撑起重新武装。苏联在 1939 年至 1941 年之所以对纳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显然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如果外部侵略的威胁迫在眉睫,排除了喘息空间的可能性,那么限制挖掘国防资源的常规制约因素就会松弛,国家就能够投入到大规模军备竞赛当中,并最终有可能投入到战争当中(1939 年英国做出了这样的选择,1941 年苏联也被迫这样做)。如果外部威胁减少,苏联经济复苏,现实主义方法就会像表 7.2 所描述的那样,预示新一轮扩张。^⑨ 鉴于这些假设,毫不奇怪,很多持现实主义见解的分析家并不愿意把戈尔巴乔夫的变革看做是一个新的和平纪元的到来。

后现实主义的分析

现实主义的捍卫者或许会说,这一理论的意图是盖然性的,而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不能指望它指明具体的外交政策结果。然而,当可能的结果范围非常广泛,既可以是绥靖政策,也可以是预防性战争时,人们就完全有理由问其他的方法是否会更好些。下面几个部分(分为两个阶段)将不考虑上面所讨论的现实主义解释中单一行为体假设。首先,我假定政策制定者们对外部威胁程度的高低和国家经济运行的好坏有一致的看法,但对于军事开支、消费和投资三者之间的优先秩序选择存在着分歧。其他方面相等:一组(“持强硬路线

^⑧ MccGwire, *Perestroika*, p. 390.

^⑨ 我们应当再次注意到,沃尔兹的现实主义版本并不假定会出现扩张。“不管我们发现国家仅仅追求安全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权势,还是发现某些国家立图要统治世界,他的均势体系都可发挥作用。”Waltz, “Reflections,” in *Neorealism*, ed. Keohane, p. 334.

的人”)主张军事开支最大化,但以不激起社会动乱或加速经济衰落为限度;另一组(“温和派分子”)主张改善消费福利和投资民用工业及农业优先。这一方法的预示结果并不比现实主义方法预测的结果好到哪去。在第二阶段,我不考虑两组对于外部威胁的感受是否一致,我只考虑不同的美国政策对于苏联国内有关外部环境和内部优先秩序的讨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特定的条件下,美国的政策能够通过歪曲其对手的观点而支持某些特定的集团。这一分析揭示了美国政策的某种潜在手段,在现实主义对大战略决定因素的阐释中,这些手段并未受到关注。

国内优先秩序的冲突

如果对威胁的程度和经济能力不存在歧义,我们就会看到表 7.3 所描述的局势范围。在苏联背景中,我们感兴趣的是什么样的条件有利于强硬派的政策选择,什么样的条件有利于温和派,什么样的条件具有不确定性。

表 7.3 美国的威胁、经济运作和苏联的政策讨论

美国威胁	苏联经济状况	
	经济衰退	经济强劲
高威胁	不明确	有利于强硬派
低威胁	有利于温和派	不确定

在威胁和经济运行的组合中,只有两组组合似乎是明确的:在高威胁和强劲经济状况下(右上栏),强硬派可以毫不费力地要求到另外的国防资源。^④ 当外部威胁和经济都下降时(左下栏),温和派就能够要求将资源转向民用部门。在其他两种场合,是军事优先还是民用优先的相对分量更有可能取决于政治斗争的结果。经济衰退与高度威胁(左上栏)造成的问题与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的状况相同:它们会产生各种不同的结果,可以是绥靖政策,也可以是军备竞赛,形成联盟和战争。在低威胁和强劲经济状况下(右下栏),强硬派将选择利用形势奉行扩张政策。而温和派仍希望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消费

^④ 然而即便是这里,温和派也有可能提出,尽管经济强劲,但也有让人不得不信的理由显示克制。比如,如果他们确信军备竞赛将削弱危机稳定,进而会危害安全,那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温和派分子对这类忧虑比强硬派分子更加敏感。

和民用投资。单独对经济状况或外部威胁的程度进行客观的分析无法决定结果。

对美国行为的不同感受

正像前面对现实主义假设的讨论所表明的，依赖对威胁程度和经济状况的组合不能对大战略进行可靠的预测。将这一方法应用于战后苏联的案例存在着一系列其他问题。首先，如何测量苏联领导人感受到的来自美国的威胁程度？这一点并不清楚。诸如军事开支的水平这类的总体指标并不能说明特定的问题：除了朝鲜和越南战争期间的增加之外，美国自冷战开始以来的军务开支并没有急剧的变化。^①其次，核武器的存在，尤其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基本均势改变了威胁的观念。苏联拥有一个有把握的第二次打击能力，这为防止遭受1941年发生的对国土的毁灭性入侵提供了强大的震慑。对威胁的感受和对“多少才是足矣”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总是主观性的。核威慑出现之后就更是如此。^②

同样原因，对经济状况的感受也显然不同。但对某些特定指标的意义还是有着更多的一致感受。这些指标，尤其是增长率，再加上计划的完成情况，一直是苏联经济关注的焦点。^③

对现实主义的挑战强调了国内政治的重要性。它们侧重的不仅仅只是对权势平衡或威胁平衡的不同感受，而且还包括具体的外交政策行为。后现实主义方法坚持认为，一个国家（比如美国）的领导人了解一个敌对国家（比如前苏联）内部外交政策讨论的性质，他们可以剪裁自己的外交政策，试图去影响敌对国家的讨论结果，并进而

169

^① Bell, *Reagan Paradox*, pp. 63—67.

^② 有关苏联内部对核武器意义的讨论有着丰富的著述，见 David Holloway,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rms Ra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and Raymond L. Garthoff, *Deterrence and the Revolution in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0)。

^③ 苏联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无法计算出军事开支对于苏联经济造成的负担，这方面的证据见 Stephen M. Meyer, “Economic Constraints in Soviet Military Decision-Making,” in *Impoverished Superpower*, ed. Rowen and Wolf, pp. 201—219。这一缺陷造成了民用部门与军事部门之间对于军事开支的冲突，见 Robert Campbell, “Resource Stringency and Civil-Military Resource Allocation,” in *Soldiers and the Soviet State: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from Brezhnev to Gorbachev*, ed. Timothy J. Colton and Thane Gustafs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26—163。

影响对手的行为。因此,要考虑后现实主义分析家是如何使外部环境与苏联的经济制约相关联,我们就应当超越简单的高威胁与低威胁的两分法感受,而去考虑苏联内部对于美国行为的看法分歧。

对苏联的讨论做出的老练的分析至少区分出了四种相互竞争的美国“形象”,这些形象与特定的苏联外交政策偏好或“趋势”相关联。^④然而在这里,我保留了简化的只有两种竞争者——强硬派与温和派——的假设。强硬和温和两种趋势对美国行为所持的假设,如果没有特定的美国行动很多都无法证伪。温和派认为,美国的敌对行为至少部分地依苏联的行为而定。而强硬派则相反,认为“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好战的,苏联的行为充其量只能被用于为他们无论怎样都必然会奉行的敌对政策提供合理的借口。^⑤对于范围广泛的苏美互动,这两种形象都难以证伪。

下面几个部分探讨了在苏联经济强劲和衰退条件下竞争、克制和相互作用三种类型的美国政策是如何假定地影响苏联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的讨论的。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根据实证证据来考虑这些假定关系。表 7.4 表明了美国的政策范围以及它们会怎样地与苏联的讨论发生互动。

表 7.4 美国的行为、苏联的经济运作以及苏联的政策讨论

美国政策	苏联经济状况	
	经济衰退	经济强劲
竞争	不明确	有利于强硬派
克制	有利于温和派	不确定
互应	有利于温和派	有利于温和派

关于竞争:如果美国维持强硬的竞争政策来回应经济上强劲的苏联的竞争(右上栏),那么温和派就会认为,是苏联的行为刺激了美国做出敌意反应,苏联应当表现出更多的克制来促使美国合作。然

^④ Franklyn Griffiths, “The Sources of American Conduct: Soviet Perspectives and Their Policy Im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9 (Fall 1984): pp. 3—50; Jack Snyder, “The Gorbachev Revolution: A Waning of Soviet Expansion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2 (Winter 1987/1988): pp. 93—131.

^⑤ 对美国行为与苏联内部关于核政策讨论之间的关系所做的卓越分析,见 Charles Glaser, *Analyzing Strategic Nuclear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ap. 3.

而,除非苏联的克制接下来确实引发美国的对应反应,否则,他们将无法证明自己的观点。而苏联的强硬派则不会由于美国对其选择的竞争性政策做出敌意反应而遭到唾弃,因为他们可以否认这是一种反应,他们可以将美国的行为归咎于具有内在侵略性的国内力量。由于经济的强劲使得竞争性的苏联政策能够持续下去,所以强硬派可以保持有利地位,不会让他们的信念遭受考验。

在苏联经济衰退和战略收缩(左上栏)面前,如果美国继续奉行竞争性政策,就会支持强硬派的观点,认为美国的意图具有内在的侵略性。试图支持美国政策具有反应性本质的温和派会主张进一步奉行绥靖政策,他们会认为,在经济形势的制约下别无他择。然而,如果面对美国持续性的不妥协政策,强硬派就会认为,由于威胁的严重程度,对国内动员和重新武装的常规制约应当解除。如果他们担心战争不可避免,苏联的相对地位只能进一步恶化,那么他们甚至就会主张发动预防性战争。结果是不确定的。

在苏联经济衰退条件下,温和派将会把美国的克制(左上栏)看做是愿意合作的证据,看做是对他们观点的印证,即美国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苏联强硬政策的反应,如果没有这些强硬政策,美国的竞争会减弱。相信美国天生具有侵略性的苏联强硬派将难以解释这样的事实:美国没有利用苏联的衰退(除非他们能够指出,在美国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制约)。这些环境有利于温和派。

如果美国面对有着强劲经济支撑的苏联(右上栏)而表现出克制,苏联强硬派就会认为美国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这是对他们政策的最好证明。苏联温和派会认为,美国的克制显示了“现实主义力量”在美国政治中的统治地位,这意味着苏美合作是可能的。然而,他们不会对竞争性的苏联政策与美国的克制之间的联系产生质疑,除非他们能够将苏联的政策改变成克制性的,并使美国随之做出相应的互动。不然的话,结果是不确定的。

171

在经济强劲和经济衰退两种条件下都最有可能支持温和派的美国政策是那种支持把美国看做是反应式行为的温和派观点的政策。在经济衰退条件下(左下栏),一种互应式的战略最明显地具有这种效果。温和派和强硬派都会支持收缩战略。前者确信,它将会减少威胁;后者为的是获取一个喘息空间。如果美国以克制做出回应,温和派就会宣称他们的信念得到了证实,他们的地位就会加强。如果

在喘息空间之后经济条件得到了改善,苏联强硬派企图转向竞争性政策,那么温和派就会预测一种敌意的美国反应,他们的观点也会由于美国互应式战略而得到支持。如果美国对苏联的行为采取持续性的互应战略,温和派就会在经济衰退时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如果我们从一种强劲的苏联经济以及苏联奉行竞争性政策的假设出发,那么美国的互应战略(右下栏)将与持续的敌对政策没有区别。这样,温和派也将无法展示其关于苏联政策对美国行为影响的信念的正确性,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然而从长期看,一个竞争性的苏联政策需要高额的军事开支和昂贵的海外承诺,这样就无法保障中央计划经济下的强劲运行。^⑥ 长期奉行强硬路线优先将最终损害经济。此时,温和派就会有必要进行收缩。如果美国奉行一种互应式战略,他们将最终占据优势。

172

对互应式假说的评估

上述讨论表明,互应式战略对于美国的行为来说是影响苏联的讨论,使之有利于温和派的最有效的方式。它意味着,如果美国长期奉行强硬路线,而不是采取互应式战略以回报苏联的让步,那么苏联的大战略就不会发生剧变。这一假说不仅与冷战结束的历史问题有关,而且还关系到当前与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关系的政策讨论。不幸的是,这一假说难以证明。正如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所指出的,在那些紧要关头,当温和派不顾强硬派的抵制而在苏联外交政策中做出温和姿态时,美国总是拒绝互应式反应。因此,实际上“这项试验从未被实施过”^⑦。

尽管美国对苏联过去的克制缺乏互应性,但仍然能够通过反向事实的分析来“测试”美国政策的效果。其含义是区分出一些事件来证明苏联的温和派对美国的行为做出了可以证伪的预期(意图支持一种更加温和的对手形象),随后美国的确证伪了这些预期,从而削弱了温和派的地位。这样,人们就能够建立一个反向事实,说明这是一个错失的机会。如果美国采取互应战略,就本可以支持温和派获

^⑥ Gur Ofer, *Soviet Economic Growth: 1928—1985* (Santa Monica: RAND/UCL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viet International Behavior, 1988).

^⑦ Snyder, “International Leverage,” p. 15.

得成功的前景。

在苏美军备竞争历史上,有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表明,由于美国拒绝对苏联的克制倡议采取互应,因而被认为是削弱了苏联温和派的地位。一个案例是1955年5月的“希望时刻”。当时苏联接受了西方裁军计划的实质内容,但却发现美国撤销了先前对该计划的支持。^④ 尼基塔·赫鲁晓夫随后命令单边裁减约一半的苏联军队。但是,没有美国方面的互应,他无法将温和化趋势继续下去。他的继任者又做了大幅度的反向调整。^⑤ 一份新近得到的苏联档案材料显示,赫鲁晓夫的确指望西方国家做出某种互应举动,并把这一预期作为内部说服军方实行单边裁军的理由之一。^⑥ 他的错误预期招致了政治和军事反对派们对其政策越来越多的公开批评。^⑦ 即使是他最亲密的同事也表示出对缺少美国互应的关注。^⑧

在赫鲁晓夫时期,美国错过的可以用互应来支持苏联温和派立场的另外一个机遇是未能与之达成一个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到1962年双方在一个重要分歧点上(对可能违反条约的涉嫌事件进行现场勘查)似乎已接近达成妥协。1962年,赫鲁晓夫耗费了相当大的政治资本来向他领导层的同事证明,如果苏联允许每年三次现场勘查,约翰·肯尼迪政府将会同意全面禁止试验。赫鲁晓夫是从苏美之间的官员接触(包括政府内部两名狂热支持禁止试验的人)

^④ Matthew Evangelista, "Cooperation Theory and Disarmament Negotiations in the 1950s," *World Politics* 42 (July 1990): pp. 502—528.

^⑤ Minde and Hennessey, "Reform of the Soviet Military under Khrushchev," in *Reform in Russia and the USSR*, ed. Crummey, pp. 182—206; 在同书中还可见 Yanov, "In the Grip of the Adversarial Paradigm," pp. 156—181; 不同的观点见 William Taubman, "Khrushchev and Détente: Reform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pp. 144—155.

^⑥ "Zakrytoe pis'mo Tsk KPSS Voinam doblestnykh Vooruzhennykh Sil SSSR",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勇敢的苏联武装力量士兵们的秘密信,1960年1月18日。见中央委员会第20届会议材料:书记处会议记录第132号,1960年1月16日:当代文献库中心(前中央委员会档案),莫斯科。

^⑦ Matthew Gallagher, "Military Manpower: A Case Study," *Problems of Communism* 13 (May—June 1964): pp. 53—62; Thomas W. Wolfe, *Soviet Strategy at the Crossroad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238—242; Tiedtke, *Abrüstung in der Sowjetunion*, pp. 54—62; Herbert Ritvo, "International Divisions on Disarmament in the USSR," in *Disarmament: Its Politics and Economics*, ed. Seymour Melman (Boston: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1962), pp. 212—237.

^⑧ 见苏联国防部长在1956年第一次重大削减之后与西方记者的谈话中所做的评论。引自 V. S. Golubovich, *Marshal Malinovskii* (Kiev: Izdatel'stvo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 Ukrainy, 1988), pp. 212—213.

当中知道肯尼迪的“底线”的(后来证明这一信息是不正确的)。他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谈的全是禁止试验问题。他在信中提出每年“两到三次”勘查,并提出了安装地震监视装置的具体地址。肯尼迪提出每年八到十次勘查的抗衡要求。正像赫鲁晓夫后来向诺曼·卡曾斯(Norman Cousins)抱怨的那样,这一要求使得他在其强硬派同事面前看上去愚不可及,并且扼杀了全面禁止试验的前景。^③赫鲁晓夫显然预期肯尼迪会认识到苏联让步的意义,应当表现出对禁止试验的浓厚兴趣,接受苏联的妥协立场。与他的预期相反,肯尼迪以反报价证伪了这一预期,向赫鲁晓夫的反对者证明,肯尼迪并不认真。

另一个例子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当时,很多温和的苏联学院派学者(institutchiki)对美国是否愿意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表示出乐观的看法。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时期卓越的苏联发言人的政治分析家根纳季·格拉西莫夫(Gennadii Gerasimov)在1966年写道,“核武器的破坏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一定的和相对较少的导弹数量就足以满足任何战略性的军事需要。”他认为,这样一种看法越来越支配着美国的思维。^④根里克·特罗菲缅科(Genrikh Trofimenko)在1971年同样提出,美国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核军备竞赛的无休无止以及随之而来的无望”^⑤。对他和其他一些和解支持者来说非常不幸的是,这样的预测不久就被美国发起的新一轮军备竞赛而打破。多弹头单独瞄准重返式运载器(MIRV)的配备使美国的核弹头武器库在70年代末增加了四倍多。我们有很多证据记录了这些年温和派与强硬派立场之间,军队内部与科学界以及政治领导人之间的讨论。^⑥美国的行动极大地削弱了温和派,达成的军备协议根本无助于遏制军备竞赛(除1972年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之外)。

^③ Norman Cousins, “Notes on a 1963 Visit with Khrushchev,” *Saturday Review*, November 7, 1964, p. 21. 其他的有关讨论见 Glenn T. Seaborg with Benjamin S. Loeb, *Kennedy, Khrushchev, and the Test B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pp. 178—181.

^④ G. Gerasimov, “Pentagonia, 1966,”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 5 (May 1966): p. 28.

^⑤ G. Trofimenko, “Politicheskii realism i strategiiia ‘realisticheskogo sderzhivaniia’”, *SShA*, December 1971, pp. 5, 6.

^⑥ E. P. Velikhov, “Nauka rabotaet na bez” iardernyi mir, *Mezhdunarodnaia zhizn*, no. 10 (October 1988): pp. 49—53; Samuel B. Payne, Jr., *The Soviet Union and SALT* (Cambridge: MIT Press, 1980); G. A. Arbatov, *Zatianuvsheesia vyzdorovlenie (1953—1985 gg.)*; *Svidetel’stvo sovremennika* (Moscow: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ia, 1991).

最后一个例子的结局要好一些。它涉及到诸如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Georgii Arbatov)这样的苏联分析家。他廉价出售了“里根的威胁”，预测他将是“另外一个尼克松”，打上了坚定反苏的标志，到头来却不得不抱现实主义的态度与苏联合作。在1983年至1984年间，这些分析家经受了一段黑暗的日子。那一时期里根政府的行为无法支持苏联温和派所说的和解不可避免，核武器的存在要求美国 and 苏联进行合作等等预言。然而最终，苏联温和派对罗纳德·里根的预言得到了证实(或者他们认为是这样)，美国总统同意在1985年秋天的一次首脑会议上会见新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会晤中，两位领导人都发誓说，一场核战争不会有赢家，决不能打这样的战争。这明确放弃了里根军事政策的承诺：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取得胜利。苏联温和派抓住这一声明来迎接一个新的“日内瓦精神”。先前一个敌对的美政府现在愿意以平等的身份与苏联会晤，这一事实使一系列在一个不同的国际气候下不可能进行的苏联倡议成为可能。因此，美国的行动实际上是允许戈尔巴乔夫继续推行他的外交政策改革。这些行动是和解性的，反映出对戈尔巴乔夫打着“政治新思维”旗号所倡导的一系列温和化姿态的互应(如果不是从物质上的话，至少是从精神上)。

后现实主义视角的政策方案

按照定义，反向事实例证不能提供结论性的证据证明是美国的互应式政策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大战略的温和化，也不能证明早先这样做会产生这样的效果。然而，上面罗列观点的逻辑表明，互应战略应当比毫无变化的克制或竞争取得更好的结果。^⑦ 这一结论与“冷战如何结束”的传统看法截然相反。传统看法强调苏联经济的不景气和美国“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而我在上面提出，根据现

^⑦ 按照正式的博弈论方法也可以得出这样的政策方案，见 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然而 Axelrod 提出，对对手的消极行动做出的互应反应应当不如起初的行动那样严厉，以便补偿可能出现的将“谣传”(noise) 错误地解读为消极行动。

实主义的假设,在苏联经济衰退条件下美国的强硬政策对于苏联大战略的结果预测是不明确的。苏联做出的反应可以是绥靖,也可以是预防性战争。

与现实主义单一行为体的方法不同,后现实主义对相互竞争的国内派别的分析为理解长期持续性经济衰退条件下美国的互应政策是如何加强了苏联温和派的预期提供了一种逻辑框架。此外,关注国内政治讨论的方法比忽视这些讨论的方法具有更强的说服力。1991年8月的流产政变毫无疑问地揭示出了苏联领导层内部所存在的尖锐而严重的外交政策分歧。单一行为体方法和华盛顿的大量官员都看不到这些分歧。政变领导人当中包括最高层的共产党官员、武装部队官员和军工部门官员。他们曾经是苏联收缩战略(尤其是撤出东欧和德国重新统一)最严厉的批评者。他们无疑会奉行一种与西方更加冲突的政策。幸运的是,在叶利钦的推动下,乔治·布什起初对政变阴谋者的含糊其辞让位于对改革力量的支持,然而从政变中吸取了多少教训尚不清楚。

随着苏联威胁的消除,苏联自身的解体以及继任国家经济的严重衰退,很多分析家又再次认为美国的行为与后苏联的俄罗斯所发生的事件无关。分析家认为,经济的制约如此严重,以至于俄罗斯在大战略上只能采取合作,迁就和绥靖政策。然而,这种阐释忽视了俄罗斯政策所存在的尖锐的内部争论,忽视了旧的苏联军事机构和共产党机构(即使已正式解散)仍能产生的影响。美国支持温和派和防止强硬情绪复苏的最好方式仍然是采取一种互应式战略。

俄罗斯或许很弱,但它仍然拥有数千颗核武器,部署着数百万军队士兵。如果强硬派领导人夺取政权就能够将合作性和迁就性的近似盟友转变成一个威胁性的对手。俄罗斯改革派领导人对国家经济和外交政策进行军事化的努力应当得到美国的互应式回应(如果我们希望他们将这一努力继续下去的话)。

从上面的分析中得出了互应式的战略方案。它侧重于不同经济条件下美国的行为是如何影响苏联温和派与强硬派之间的内部争论的。通过否定学术讨论和民众讨论中人们熟悉的单一行为体假设,我们辨别出一个互应式的美国政策。它将会在加强俄罗斯温和派地

位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带来美国努力的温和化。^⑧这一对国内政治争论保持敏感的方法提供了促进俄罗斯大战略朝着积极的趋势不断发展的最可靠的手段。对于那些认为美国社会因冷战付出的代价并非轻微的人来说,这一方法也应当具有吸引力。^⑨

178

^⑧ 一个富有思想的美国改革建议见 Randall Forsberg, "Defense Cuts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Boston Review* 17 (May—July 1992)。

^⑨ 对这一效果的强烈表达见 Eugene Rochberg-Halton, "Cold War's Victims Deserve a Memorial," *New York Times*, March 10, 1990; and Christopher Lasch, "The Costs of Our Cold War Victory," *New York Times*, July 13, 1990。

第八章

新的民族主义:现实主义的阐释及其超越

杰克·斯奈德

继苏联崩溃之后民族主义浪潮的崛起对大战略学者和实践者提出了艰难的分析挑战。是什么因素致使采纳了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政治战略?国际社会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来遏制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轰炸、经济制裁或武断性的维和是抑制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侵略行为还是助长了这一行为?俄罗斯激进的市场化改革是削弱了民族主义政策的选民基础还是刺激了民族主义?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是影响甚微,还是使西方陷入到了代价昂贵的东方泥潭当中?

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学者们正在积极参与民族主义兴起对于西方战略含义的讨论。一如既往,这些现实主义分析的起点是无政府形势造成的不安全和冲突。在这种无政府形势下,国家和其他社会集团必须依靠自己的谋略来保护自己,以防止其他方可能的劫掠。因此,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提出,苏联解体后多极化的出现将使欧洲国家变得更加不安全,它带来的副产品是刺激了可怕的和竞争性的民族主义。^① 巴里·波森(Barry Posen)将现实主义的解释加以延伸,用以说明民族集团的侵略行为,不管它们是否已组织成为羽翼丰满的国家。他说,在像苏联和南斯拉夫这样的地方,中央政权崩溃之后,面对总体上的安全困境,民族体便作为一种形成自我保护集团的逻辑基础而走向前台。依赖于地理、居住方式及其他因素,这类集团出于自卫的考虑而有着很强的动机相互发起先发制

179

^① John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 (Summer 1990): pp. 5—56, abridged as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The Atlantic*, August 1990: pp. 35—50.

人的攻击。^②

在这些现实主义的分析当中,尽管认为这种集团在一个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中的位置是首要的因果决定力量,但他们的观点并不是单一向度的。米尔斯海默和波森担心,编造神话的人、政治家或者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却有着个人目的的其他人可能会利用无政府竞争带来的不安全来进一步恶化局势中与生俱来的潜在冲突。在他们看来,民族主义观念尽管因无政府形势而得到助长,但却有着独立决定因素的分量。^③

现实主义分析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政策视野。首先,现实主义对任何政策方案都趋向于悲观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由于无政府状态是导致民族主义侵略的根本性原因,所以,如果不改变安全局势的根本结构而只是一些小的措施很可能会失败。^④ 由于广泛的“国际社会”其自身是由一批自助的国家所组成,所以要由外部国家采取行动来强加一种秩序,惟一的可能性是一个大国认为强加一种霸权秩序符合自身的安全利益,就像1945年之后的苏联那样。

如果没有这种霸权秩序,现实主义者倾向于主张在竞争各方之间形成军事威慑对峙,包括大国之间的核对峙和其他情况下的常规军事对峙。^⑤ 然而波森警告说,在民族集团交错而居而又军事化的环境中要设计出稳定的均势是极其困难的。最后,现实主义者有时也建议同极端民族主义观念的传播者展开智力斗争,尽管现实主义观点的总体逻辑意味着根本性的权势结构将总体决定哪一种知识流派会取得胜利。^⑥

现实主义的这些观点尽管珍贵,但不完全。对民族主义的学术研究辨别出了现实主义所忽视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

180

^② Barry R. Posen,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Survival* 35 (Spring 1993).

^③ 在评估民族主义及其侵略行为的原因时,现实主义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允许把社会和理性变量看做是具有更重要的独立作用。见 Stephen Van Evera, "Primed for Peace: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 (Winter 1990—1991); reprinted in *The Cold War and After*, ed. Sean Lynn-Jones (Cambridge: MIT Press, 1991), pp. 193—243.

^④ Van Evera 对这一规则的证明是个例外。他比米尔斯海默更加乐观,更倾向于用其他因素来补充结构现实主义变量。然而,他之所以更加乐观,部分地是因为他对多极体系不如两极体系稳定的看法抱质疑态度。

^⑤ 米尔斯海默和波森都认为,至少在一些大国之间的核扩散有好处。

^⑥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p. 20.

的民族主义根源。一个狭隘的现实主义视野有可能会忽视铸成侵略性民族主义的社会经济进程,同时还会忽视能够防止强烈安全恐惧形成的政策工具。实际上,可以认为,现实主义的出发点——受恐惧支配的所有人针对所有人的战争——有时并不是民族主义的根源,而是其他社会进程症状首先刺激了民族主义意识。在本章,我想将现实主义观点置于论述民族主义和集团冲突的更广泛的社会科学文献视角上。

这将不仅要扩充现实主义有限的假设和工具清单,而且还要突出相互作用效果。在那里,一些变量因其他条件而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比如,在一个已经有着内聚力的国家中,国际军事压力会促进民族主义。但在一个有着更多分裂倾向的国家中,国际军事压力会打破民族凝聚力。^⑦ 威慑压力有助于遏制一个已经是超民族主义的国家发动侵略,但在一个有着更加不稳定特征的国家,威慑压力又会毫无用途地刺激民族主义。同样地,国际经济相互依存效果在其他背景因素下可能就是条件性的。将一个稳定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置于国际市场的竞争当中,就会因针对调整进程的强烈不满而激发民族主义。相反,与一个自由的“贸易国家”割断经济联系就会迫使它不得已而求其次,朝着自给自足、帝国主义和超民族主义的方向发展。^⑧ 甚至连对重商主义经济学有着传统兴趣的现实主义也要考虑军事和经济进程的相互作用。

最后,民族主义研究的现实主义方法可能会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将有时只是对国际层次分析与国内层次分析之间的任意区分具体化。^⑨ 现实主义者和本书的编辑者都坚持这一传统对变量的种类进行了划分。这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一方面,优点之一是它分散了对国际国内因果关系讨论的注意力。对民族主义原因的争论(这

181

^⑦ Lewis Coser,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 (Glencoe, Ill.: Free Press, 1956); Deborah Welch Larson, "The Bandwagon Imag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Dominoes and Bandwagons: Strategic Beliefs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Eurasian Rimland*, ed. Robert Jervis and Jack Sny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⑧ Jack Snyder, "International Leverage on Soviet Domestic Change," *World Politics* 52 (October 1989): pp. 1—30; 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⑨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chap. 1.

一争论主要是在社会学家之间进行的,幸运的是,他们忽略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层次分析问题。)造成了“原始主义者”(primordialists)与“现代主义者”(modernists)之间的分歧。前者强调文化,后者强调经济;前者强调非理性的神话,后者强调理性算计。^⑩ 这些争论的双方都是既考虑了国际因素,也考虑了国内因素。

另一方面,国际原因与国内原因之间的区分也有一个实用优点。通过对国际因素效果的区分,它将注意力放到了其他国家对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政策的效果上。这使得那些国家能够将其自身行动的后果与其他作用因素区分开来,从而便利了政策评估和政策选择。出于这一原因,最重要的互动评估效果包括一个国家内部本地的民族主义源泉和其他国家的政策。这实质上是证明了坚持对国内原因和国际原因进行分析性区分的合理性,因为分析家们对自然跨越国内国际边界的各种理论还是非常敏感的。

要解释什么? 民族主义与超民族主义

用民族主义理论理解未来国际冲突的潜在原因存在的一个缺陷是“民族主义”一词在不同的学科中有着不同的含义。在社会学家和比较政治学家心目中,民族主义学说的含义是指民族或族群差异是(和应当是)政治分歧的主要划线,是指一个国家自己的人民有权在其历史疆域上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一个民族集团的成员有时可以与语言、文化、宗教、身体特征等客观“标识”相互关联。但大部分学者认为,对民族成员的界定最好是以个人主观上是否感到他属于一个民族集团为标准。^⑪

182

按照这一定义,民族主义能够引起国际冲突,但并不必然如此。如果所有集团都是民族主义者,但各自都单独生活在各自历史疆域上的各自国家当中就不会引起冲突。冲突仅仅发生在不同民族的人

^⑩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86), chap. 1.

^⑪ Ibid., chap. 2. 另见 Eric J.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ps. 1—2.

民在地域上交错而居,或者是一个民族没有控制其历史疆域这样的地方。这种情况在东欧和苏联边缘地区尤其普遍,所以,这类民族主义成为国际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这类民族主义所造成的冲突其内在目的仅限于实现本国内民族集团的统一。实际上研究这类民族主义的学者其关注焦点主要地不在于它造成冲突的潜在危险,而是相反,倾向于把它看做是社会生活的有益力量,符合一个自然人人类集团要在深层共享价值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共同生活的合法愿望。^⑫

然而大部分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都把民族主义看做是更加恶性的东西。他们对这一话题的兴趣主要来自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集团用民族主义学说来证明或发动针对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大规模暴力。从这一高度看,民族主义与两次世界大战的起源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是应当被清除的邪恶力量。^⑬

一些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最近创造出“超民族主义”(hypernationalism)一词以将这种恶性的民族主义与上面所描述的较为良性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他们将超民族主义定义为是一种认为自己的国家、民族或族群优越于其他民族集团或受到其他民族集团威胁的信念。^⑭这一学说从战略和伦理角度上为征服和统治其他民族(至少是为以残忍的侵略方式进行民族自卫)提供了合理性。

大部分侵略国家视其对手为纸老虎,看上去非常吓人,但通过勇敢的进攻行动很容易将其击败。^⑮民族主义国家是侵略国家最常见的现代变种,他们把攻击目标民族的民族特点看做是纸老虎。比如希特勒把斯拉夫人看做是样子可怕,但实际上是下等民族。战前日本人把美国人看做是贪婪而又优柔寡断的民族。带有阶级意识形态的国家也会将其对手视为纸老虎,但他们是用阶级的词汇来解释:侵略性的资产阶级不断地将一个注定要灭亡而又空虚的制度推向战

^⑫ 至少部分赞成这一见解的作品见 Smith, *Ethnic Origins*;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and Joseph Rothschild, *Ethnopolitic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⑬ 论述民族主义的某些老的作品,如 Carlton Hay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odern Nationalism*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1931) 对这一方面的主题更加警觉。

^⑭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p. 21; 另见 Van Evera, "Primed for Peace," p. 209。

^⑮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ap. 1.

争。对于国际关系学者来说,超民族主义国家问题只是更广范围的各种侵略国家研究中的一部分。^{①⑥}

民族主义与超民族主义之间的重叠给政治家和学者们的分析带来了问题。超民族主义可以装扮成民族主义,造成政治家们的混淆,致使他们做出错误决策。比如希特勒最初就是把他的目的描绘成是民族主义的:将日耳曼民族聚拢到一起,形成一个覆盖日耳曼人历史家园的统一国家。其目标仅局限于这些有限目的的可能性成了英国采取绥靖政策的一个理由。

国际关系学者在区分民族主义和超民族主义时必须审慎,尤其是当他们试图用民族主义理论来解释和控制超民族主义时更是如此。这一领域的大部分理论都是由那些关注前者而非后者的社会学家所构建的。^{①⑦}因此,他们的一些理论很可能没有揭示出多少国际关系学者所最关心的问题。然而还存在着这样的可能,导致民族主义的变量也是超民族主义的前提条件,但只有在存在着其他的加剧形势恶化的因素时,才会出现较为恶劣的局面。比如,在后苏联时代缺乏合法的统一权威的条件下,充满自信的民族集团交错混杂,这在俄罗斯人当中引起了民族(或民族主义)意识的高涨。这种民族意识是否会激发起俄罗斯超民族主义,包括对外国和其他民族总体上怀有一种侵略性立场,这取决于与其他变量的互动,比如俄罗斯市场改革的命运,俄罗斯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联盟的组成成分以及它致力促进的政治意识形态。

民族主义和超民族主义理论

民族主义常被看做是一种非理性的原始性力量,深深地植根于一种几乎是本能性的民族仇恨文化之中。照此看来,民族主义能够被强制力所压制,就像苏联帝国时那样。但这类盲目的本能特征不大可能屈从于较为温和的政治管理形式。如果这样,则意味着当前

184

^{①⑥} 比如,见 Sti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Ph. D. dissertation, 1984)。

^{①⑦} 比如 Ernest Gellner 和 Anthony Smith 提出的理论,见上面引证。

形势的不妙。因为东欧和后苏联沸腾的民族主义大锅已经打开了锅盖,但却看不到其他的抑制手段。

但是,当代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争辩说,民族主义并不简单地是一种神秘的非理性力量。^⑮相反,这些理论认为,当代民族主义是由现代社会的特定环境,尤其是对公众进行军事和工业任务动员造成的。^⑯此外,当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其他途径受到阻碍时,就会求助于民族主义活动。^⑰这些理论的含义是,要消除超民族主义就应当铲除其产生的根源,就应当影响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成本—收益算计。^⑱

原始主义的集团意识

一些民族主义理论家认为,在大部分时间和大部分场合下,将个人的身份认归于一个民族集团都是组织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个主要原则。他们提出,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各个集团就以相互区别的名字称呼自己,在共同的文化、历史记忆和共同祖先的传说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内聚意识。这样的集团通常把这种内聚感情与一个特定的地域(或者是他们目前居住的家园,或者是其集团发源地)联系在一起。^⑳

按照原始主义的理论,族群意识的起源最初是出自一系列心理的和实践性的原因。亲属纽带是理解社会关系和一个人自身在一个社会背景中的身份的最自然和最普遍的方式。而族群意识则赋予了一个有着某种独特地方文化模式的较广泛的社会集团以一种准亲属性的关系。这不仅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而且它还具有实用性的好处。它有助于鼓舞或指导一个共同体的集体行动,增进联合行动中成功合作的前景,其中包括捍卫自身免遭外部的威胁。^㉑

185

⑮ Rothschild, *Ethnopolitics*, pp. 25—30.

⑯ 有关现代社会和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见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chap. 3; and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⑰ Rothschild, *Ethnopolitics*, chaps. 4 and 5;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chap. 6.

⑱ Rothschild, *Ethnopolitics*, p. 249.

⑳ Smith, *Ethnic Origins*, p. 32.

㉑ Ibid., pp. 24—25. 另见 Michael Hechter, "Nationalism as Group Solidarity,"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0 (October 1987): pp. 415—426。

按照原始主义理论,代代相传的关于本集团共同的过去和独特特征的神话强化了这些集团意识的客观基础,这是最关键的步骤。通常,这些神话讲的是诸如古代光荣的战斗、过去的黄金年代、回归希望之乡、神圣的上帝选民这样一些主题。实际发生的历史事件其作用通常不如围绕这些事件所创造的神话。平常的战斗如果被用作充当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的核心就会对社会的内聚力产生大的影响。甚至在共同的语言、宗教和疆域这些客观的民族特征变得不明显之后,这种神话仍能保持一个集团的民族意识。^④

原始主义者认为,很多当代的民族主义有着古代民族集团做其内核。这些民族的民族意识因从远古流传下来的神话而根深蒂固。他们承认,随后的现代化和国家建构进程通过对大众居民的政治化而对民族主义行为产生了影响。但他们认为,当代的身份认同感和民族主义态度受到了传统神话的强烈影响。^⑤

原始的民族性对西欧的民族主义影响不大。在西欧,现代国家形成于大众居民政治化动员之前。形成英吉利和法兰西民族主义的共同经历和神话主要是按照地域形态形成的,而不是按照原始性的族群集团神话形成的。其结果是,民族主义与一个地域内的公民观念而不是民族认同观念有着更多的联系。在某些例子中,对于巴斯克人、苏格兰人、布列塔尼人或者是其他族群的民族主义来说,原始性纽带依然如故,或者是作为对更加广泛的国家文化渗透和剥削的反作用而被重新发明出来。但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中这是次要性的因素。^⑥

东欧则相反,现代国家形成于民众动员之后,民族意识更多地是由原始神话形成的。^⑦ 由于居民的杂居,族群界线与国家界线并不一

186

^④ Smith, *Ethnic Origins*, p. 28.

^⑤ Ibid., chaps. 6—9. 在对当前后苏联形势的分析中表达了这一看法的论述见 Anthony Smith、Hohn Armstrong, 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 Donald Horowitz 所著各章, 见 Alexander Motyl ed. *Thinking Theoretically about Soviet Nationalit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⑥ Michael Hechter,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1536—1966*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⑦ Smith, *Ethnic Origins*, pp. 135—137, 引自 Hans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2d ed. (New York: Collier-Macmillan, 1967), chap. 5。

致。此外,由于在国家还很弱时原始性的族群集团就已经被赋予了政治上的意义,所以常常再无法形成一种新的民族国家意识来取代原始性的忠诚感。两次世界大战之前东欧政治中的某些超民族主义是由于长期的民族神话与(政治上)动员起来而又相互杂居的居民致命性地并列存在而造成的。也就是说,这—问题是原始性力量与现代性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居民的大变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但却很难消除)这一地区国家边界与民族意识之间的不相匹配。

在共产主义废墟上崛起的某些最恶性的民族主义部分地具有原始性特点。比如,点燃塞尔维亚人和亚美尼亚人与其民族敌人之间战火的是占领科索沃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祖先家园的愿望,是古代战斗、屠杀和黄金岁月帝国的神话。同样,阿塞拜疆人的知识分子更感兴趣的是详细描述过去千年中所谓的不公正,而不是为解决今天的问题而探讨可行的冲突管理战略。

与此同时,这些冲突的原始性质不应当被夸大。通常,这类冲突处于休眠状态,直到环境发生变化,它们才会被激发出来,如中央国家的抑制力量削弱,零和性的经济竞争处于艰难时期,或者是政治精英们利用了民族主义。淡化这些现代性的复杂因素会削弱原始性文化差异的影响。

此外,这类冲突本身对于破坏欧洲更广泛的安全只具有有限的潜在影响。原始性的民族主义其目的天生是有限的:夺回失去的家园,容纳流离失所的兄弟。除非与其他因素搀和到一起,否则它不会成为公开征服的理由。何况,前苏联帝国中绝大部分有活动能量的原始性民族主义都是相对较小的集团,缺少大的地缘政治意义或权势潜能。他们造成大范围麻烦的能力将取决于大国是否干预其争吵。化解之策可能不在于解决这些争议,而在于从更广泛的政治关系上铅封这些争议的影响。

187

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等较大的民族国家到目前还没有强烈的不满能引发出针对其他集团的原始性民族仇恨。然而,俄罗斯的少数民族问题在肢解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过程中能够形成这样的问题。幸运的是,在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交错而居的乌克兰东部地区原始

性的族群意识不是特别强。^② 强调现代性而非原始性变量的民族主义理论似乎更适合于这些非常重大案例的研究。

战争与军事竞争

战争会在一个民族中塑造强烈的民族主义纽带。经历一场共同的外部威胁常常能够让生活在一个国家之内的人民确信,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他们不再用一个社会内部的分歧来界定自己的主要利益和忠诚,而是用不同社会之间的敌对来界定他们。引发民族主义的条件不仅包括战争本身,而且还包括国际危机、敌意的包围、对过去冷酷无情的战争的记忆。^③

一些理论家不仅认为军事威胁会激发民族主义,而且还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系统性影响还形成了一个共鸣箱,它把民族主义情绪放大成超民族主义。^④ 照此看来,来自一个国家的潜在威胁能够刺激另外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反应。这些反应又反过来加剧了第一个国家的威胁感,进而增进其民族主义情绪,在双方触发出一种难以控制的走向超民族主义的螺旋上升趋势。波森揭示说,这种现象不仅会发生于国家之间,而且还会发生于族群集团之间,如最近南斯拉夫的情况。

从这一现实主义视角看,民族主义最强的国家是那些在国际体系中居于最容易遭到攻击位置的国家。现实主义者认为,德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尤为突出,因为德国在中欧的地理位置最容易受到攻击,因为德国的活力必然引起其邻国的恐惧和敌意。^⑤ 这样,德国在1914年之前的侵略性外交所激发起的包围联盟证实了民族主义政治

188

^② 有关背景见 Rasma Karklins,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USSR* (Boston: Allen and Unwin, 1986); Alexander Motyl, *Sovietology, Rationality, National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John Armstrong, *Ukrainian Nationalism*, 3d ed. (Littleton, Colo.: Ukrainian Academic Press, 1990)。

^③ 有关一般性的讨论见 Rothschild, *Ethnopolitics*, chap. 6; and Smith, *Ethnic Origins*, pp. 37—41。一些案例见 Boyd C. Shafer, *Faces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2), chap. 5, on the Napoleonic period; Kingsley Martin, *The Triumph of Lord Palmerston: A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in England before the Crimean War*, rev. ed. (London: Hutchinson, 1963); and W. G. Beasley, *The Meiji Restor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④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p. 21 简要地涉及了这一问题。

^⑤ Ibid., p. 25.

家和思想家提出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外部世界对德国的民族目标实际上持敌对态度，每一个德意志人的命运取决于是否团结起来，共同抗击这些死敌。德国在战争中的失败及其后来的惩罚只是再次确认了这一教训，因为多数德国人仍然不相信是他们首先发动了战争。相反，他们“被告知”，他们的失败是由于非民族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背后捅刀子”。^② 简而言之，高度的国际冲突会刺激民族主义的敌人形象，除非在少数情况下一个民族非常精明，完全懂得自己在引发冲突中的作用。^③

这些所谓的国际体系共鸣效应应在与其他层次的分析变量相互作用中受到影响。国家是否认识到要摆脱超民族主义合围恐惧这一自我实现的预言的影响，部分地取决于国内政治体制是否有能力容忍批评性的自我评估。德国和日本超民族主义之所以如此极端，是因为他们各自的军事精英和保守派精英利用其政治和宣传资源禁止了这样的自我批评。^④

然而，今天的大国竞争不大容易引起民族主义。莫斯科新一代思想家们懂得，苏联在过去的好战政策刺激了敌意的周边环境。尽管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收缩，但他们认为其他大国对俄罗斯安全构成的威胁相当低。

其他旧派思想家的看法不那么乐观。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共产党政治局和军队中的一些成员提出了一个新版本的背后捅刀子神话：戈尔巴乔夫的自由主义分子背叛性地放弃了苏联在欧洲的安全缓冲区，让德国在与美国这个帝国主义魁首相互勾结中重新恢复了权势。^⑤ 在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时期，军队和重工业代言人以及俄罗斯民族主义支持者对于为达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的标准而让渡主权、不平等的军备控制协议、在波罗的海国家侵犯

189

^② 见 Geoff Eley, *Reshaping the German Right: Radical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after Bismarc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Woodruff Smith,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Nazi Imperi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Holger Herwig, "Clio Deceived: Patriotic Self-Censorship in Germany after the Great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2 (Fall 1987): pp. 5—44.

^③ 这一总体规则的另一种例外或许是极其弱小的分裂国家只能迁就于国际压力。见 Larson, "The Bandwagon Image."

^④ 见上面已引用的作品 Herwig、Van Evera、Eley 以及 Woodruff Smith。

^⑤ 例如见叶戈尔·利加乔夫和其他人在共产党会议上的讲话，引自 Bill Keller, "Soviet Hardliner Assails Gorbachev on His Leadership," *New York Times*, July 4, 1991, p. 6.

俄罗斯人的公民权、与乌克兰分割武装力量、提议将俄罗斯岛屿归还日本等行为都提出了抱怨。^⑥

不过,到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对大国安全竞争的恐惧(不管是真实的还是编造的)本身会引发出俄罗斯超民族主义的反应。部分的原因是由于西方采取了小心翼翼的措施来减少苏联对于地缘政治变化(如德国的重新统一)的恐惧。《伦敦宣言》强调了北约对苏联的良好意图。这是一个有意的举动,目的是帮助戈尔巴乔夫对付那些“背后捅刀子”的批评。^⑦

现代化与经济变革

按照厄奈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现代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在前工业社会中,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运行不需要语言和文化的同质性。^⑧ 有着世界主义文化观的精英们统治一切,从常常是充满五花八门的地方方言和文化的农业民族当中榨取剩余经济价值。这种文化的异质性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很小,因为地方生产和榨取资源的效率与文化没有紧密的联系,公众的族群意识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相对较小。

然而,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在一个存在着广泛的劳动分工的社会中,经济活动的协调需要更多的语言和文化同质性。专业化的生产者要想能顺利地相互配合,对包括共同语言在内(但并不局限于此)的文化信号的共同理解就成了至关重要的。在一个既定的政治单位中,哪种文化能够成为通用语,这对于工业化社会中个体成员的“生活机遇”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盖尔纳提出,凡是在那些发生了工业化的地方,族群集团就会为提供能够促进经济活动顺利发展的主导性文化而竞争,民族主义就会得到强化。^⑨

190

^⑥ 比如见独立国家联合体军队司令鲍里士·沙波什尼科夫对千岛群岛的评论。见 Stephen Foye, "Military and Security Notes,"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Research Report 1* (July 10, 1992): pp. 63—64。

^⑦ *New York Times*, July 6, 1990, p. 1.

^⑧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chap. 2. 史密斯承认,对于前现代化的东欧国家来说,盖尔纳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对于古代和其他案例来说,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见 Smith, *Ethnic Origins*, pp. 72—73。

^⑨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chaps. 3—6. 有关的观点见 Rothschild, *Ethnopolitics*, chaps. 4 and 5;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chap. 5; and Karl Deutsch,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53), chap. 4。

这一理论的表面含义是,只要工业社会存在,民族主义就会持续下去。然而,只要仔细琢磨一下盖尔纳的观点就会发现,或许存在着某种方式能够打破民族主义和工业社会之间所假定的这种联系。工业主义据说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但在一个国家疆域之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未必是民族语言和文化,可以用一种能够便于劳动分工而又不影响不同民族集团生活机会的跨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来代替它们。^⑩ 正如可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铁幕的打破和欧共体内朝着单一市场方向的发展表明,已经出现了一个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泛欧洲跨民族文化,英语是其跨民族的语言。

这一发展是否能够成为民族主义问题的解决方案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察。可以想像,它可能会刺激国家内部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分化。前者是对跨民族文化感到特别惬意和受雇于跨国经济部门的世界主义者,而后者则相反,他们站在一种更加狭隘的立场上。这类分歧通常是作为对日益加剧的来自外部市场的竞争和文化渗透的反应而发生。^⑪ 在匈牙利,民主论坛和民主联盟之间的分歧就具有某些这样的特征;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间的分裂也是如此。如果说跨民族主义(transnationalism)刺激了民族主义的反应,而民族主义者又取得了胜利的话,那么它的负面影响就是能够刺激国际冲突。但如果是跨民族主义力量取得了胜利,假设中的工业社会与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就不存在了。

191 如果说工业社会在总体上是民族主义的一个导因的话,那么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就会是引发民族主义的一个特别强烈的原因。市场的引进通常会造不成不平等的急剧增加,很可能不会对不同族群集团的命运造成不同的影响。只要经济现代化还在加重语言和文化的经济意义,民族冲突在这样的转轨过程中就特别强烈。^⑫ 市场改革进程中的失败者(如德国威廉时期境况日下的工匠们)容易加入到民间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去,要求找回黄金岁月时调控良好的经济和所谓

^⑩ 盖尔纳对这一可能性提出了质疑性的讨论,见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chaps. 8。

^⑪ Smith, *Ethnic Origins*, p. 56; John Breuilly,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33; 另见 Ronald Rogowski, *Commerce and Coali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⑫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pp. 73—74, 111。

的社会团结。^③ 转轨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紧张最终会得到克服,不平等通常也会减弱,少数民族常常会被同化到主流文化当中,或者是得到它的补偿。民族情绪和冲突依然存在,但通常不会像引进现代市场初期那样强烈。^④

整个前东方集团现在正濒临向市场经济转轨。在一些国家,这会增加不同族群之间的不平等。它们在技术天赋、股本以及文化特征上的差异会赋予它们以不同的利用市场机会的能力。最显著的是,捷克的西方市场取向和斯洛伐克面向军事的重工业遗产之间的差异加剧了其民族差异中的政治经济不平等。在前苏联,能源和原材料世界市场价格的引进使俄罗斯受益,但却让其他继承国遭受损失。

要减少民族主义爆发的机率,就应当降低市场引进造成的冲击。可以通过扩大经济蛋糕的总体规模和进行更加公平的分配来实现这一目标。外国资本的流入能够减轻所有集团向市场体制转轨的压力。然而在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地方,这一处方还面临着巨大的障碍。除了难以设计出一个有效的市场改革方案和西方不愿意为此出资之外,还存在着俄罗斯过时的工业部门与民族主义者和军方力量联手抵制有可能获取西方支持的经济改革的问题。^⑤

192

精英战略和神话编造

军事竞争和经济变革不但为民族主义政治行为提供了理性动机,而且还增加了精英分子创造民族主义神话的动机。军事和经济压力增加了对国家的要求,使得统治更加困难。弱国、处于困境中的国家或新出现的国家会试图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增强自己应付这些挑战的能力。作为一种副产品,他们可能会将民族主义转变成超民族主义。同样,在这样的条件下,非国家知识分子可能会抓住机会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以建立一个他们能够进行统治的国家。

现代国家具有很强的动机利用民族主义要求来完成其国内外的

^③ Woodruff Smith, *Ideological Origins of Nazi Imperialism*; Eley, *Reshaping the German Right*; Hans-Ulrich Wehler, *The German Empire, 1871—1918* (Leamington Spa: Berg, 1985).

^④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pp. 40, 121.

^⑤ Alexander Rahr, "Winners and Losers of the Russian Congress,"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Research Report 1* (May 1, 1992): p. 7.

任务。国家可以利用民族主义来集结民众对它的支持,提高自己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竞争能力。出于国际竞争,现代国家必须动员其国民接受高税收负担用于国防和征兵。这常常意味着不仅准确地描述威胁,而且还会夸大威胁。比如,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美国政治家们为了确保民众对军事和经济援助计划开支的支持而极力煽动救世主般的民族主义火焰,将对苏联权势的遏制描述成是两种对立的生活方式之间在全球的斗争。正如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在描述冷战初期时所说的,“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观点说得比真相还清楚,那我们与大部分其他教育家就没有什么不同了。我们很难不这样做。”^{④6}

军事官僚机构尤其具有夸大外部威胁来刺激民族主义情感的动机,因为这有助于从社会当中榨取资源用于军事目的。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大国超民族主义的极端例子一定程度上就是由军事鼓吹手们的威胁煽动和神话编造点燃的。^{④7}

193

现代国家还有着夸大外部威胁来为其国内的高压统治提供合法性的动机。国家各个机构通过将世界描绘成充满了敌人就能够找到理由从其社会中榨取更多的资源,就能够将国内的批评者置于不爱国的境地。来自其他社会的威胁看上去越大,国内集团在更加广泛的国家利益面前能够牺牲其狭隘关注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经济变化使社会难以统治时,夸大外部威胁战略对国家就更具有诱惑力。^{④8}

此外,当像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自由化政权放弃威胁煽动战略而开始奉行和平外交路线时,其国内的竞争者就有可能捡起这一策略为己所用,指责当局在国际威胁面前削弱国家的防卫能力。当同时出现国内经济动荡的威胁时,这种情况就极有可能发生。比如,在1991年8月苏联政变企图之前,苏联军事思想家们就呼吁军队要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因为俄罗斯军队在过去上千年的历史中就一直支撑俄罗斯帝国免遭国内外威胁的核心机构。这样,军队就

^{④6} 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New York: Norton, 1969), pp. 374—375.

^{④7} 除了上面引述的 Van Evera 的作品外,另见 Saburo Ienaga, *The Pacific War, 1931—1945* (New York: Pantheon, 1978), chaps. 2 and 3.

^{④8} 有关的理论性讨论,见 Jack Levy, “The Diversionary Theory of War: a Critique,” in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ed. Manus Midlarsky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pp. 258—286; 案例研究见 Wehler, *The German Empire*.

维护了要在危机时期发挥更加积极的社会作用以维护国家统一的责任。^④ 在另外一个例子中,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更加成功地利用了民族主义煽动手法来捍卫一个旧的统治精英集团。他通过要求塞尔维亚人相对于南斯拉夫其他民族的权利而使自己从一个共产主义老板转换成为一个民族主义铁腕人物。^⑤

这种煽动超民族主义的政权一旦扎根立足,国际社会对它就可能毫无办法,除非付出极大的代价。但作为一种预防性措施,国际社会可以采取一些步骤降低民族主义煽动战略的吸引力。首先,在动乱开始降低威胁煽动说辞的说服力之前,国际社会可以采取军备控制、泛欧洲安全措施和预防性的维和行动。其次,国际社会可以提供各种动机和资源来促进非民族主义的统治战略。如果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国能够从与欧共体实行经济一体化中得到大量好处,其政府就能够用国际主义的诱惑力来取代民族主义的花言巧语,动员国内力量支持自己的计划。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进程有可能作为经济激励这个“看不见之手”的自然政治结果而自动地出现。然而一方面,西方国家还可以利用明确链接这只“看得见的手”,将贷款和贸易优惠与公平对待少数民族、尊重个人权利、民主改革制度化、抑制民族主义煽动宣传和禁止在公立学校使用民族主义的历史教科书相挂钩。^⑥ 比如当罗马尼亚政府利用工兵镇压了合法的政治表达之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推迟了罗马尼亚的资格认可。欧共体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决定扩大与东欧国家的联系时,都把少数民族的待遇和个人权利作为明确的标准。^⑦

194

^④ Mikhail Tsypkin, "Karem Rash: An Ideologue of Military Power," *Radio Liberty, Report on the USSR* 2 (August 1990): pp. 8—10.

^⑤ Celestine Bohlen, "Ruling Party Wins Serbian Election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1, 1990, p. 7; V. P. Gagnon, Jr., "Yugoslavia: Prospects for Stability," *Foreign Affairs* 70 (Summer 1991): pp. 17—35.

^⑥ 坚持这种条件化机制会带来好处的观点见 Ted Hopf, "Managing Soviet Disintegration: A Demand for Behavior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 (Summer 1992): pp. 44—75; and Stephen Van Evera, "Managing the Eastern Crisis: Preventing War in the Former Soviet Empire," *Security Studies* 1 (Spring 1992): pp. 361—382.

^⑦ 关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见 *New York Times*, May 30, 1990, p. 14. 值得回忆的是,1919年的《保护少数条约》由于国联缺少适当的执行权力以及德国、匈牙利把它当作向波兰和罗马尼亚提出收复领土要求的进攻武器而遭到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试图通过签署尊重个人权利协议来间接地确保少数集团的权利。见 Rothschild, *Ethnopolitics*, pp. 176—177.

另一方面,粗暴的、强迫性的条件化机制有时会助长唯恐失去主权的年轻国家的民族主义反弹。比如,乌克兰人对核武器、克里米亚半岛和黑海舰队的处置等问题的高度敏感部分地是由于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总统所采取的先发制人的战略,通过有力地表达乌克兰人的地位象征要求而压制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潜在反对。^⑤ 对于像克拉夫丘克和叶利钦这样的政治家而言,他们必须巧妙地与国内民族主义者周旋,国际压力只能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某些当代理论家争辩说,知识分子、宗教精英和文化人物通常所起的一个关键性作用是创造了一种神话意识。他们认为,这种神话意识是构成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的关键成分。^⑥ 然而其他一些人认为,知识分子的神话编造只是民族主义的次要原因,是更加根本的社会和经济力量的派生因素。^⑦ 然而即便是民族主义的神话传播仅仅有着某种微不足道的独立影响,也值得探讨如何来消除它。

195

作为工业化进程的组成部分,新崛起的中间阶级和知识分子为了建立和控制以自己的民族集团为中心的国家组织,通常会传播民族主义观念。知识分子希望统治这个国家,中间阶级希望从本民族集团在国家中的文化霸权来获得好处。知识分子正在销售的是他们独特的产品——特定文化的技术。通过出售这一产品,他们发明和传播着关于身份认同、民族集团特征和有倾向性的与其他民族集团关系历史的种种观点。^⑧

今天,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的发展中正发挥着多重作用。在波罗的海和高加索,他们是民族主义的开路先锋。一方面,阿塞拜疆知识分子形成了一套关于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的精细理论,认为亚美尼亚知识分子为了煽动亚美尼亚舆论和在随之而来的大规模民族主义浪潮中驾驭权力而正在歪曲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关系历史。这些阿塞拜疆知识分子没有意识到,他们恰恰正在有意或无意地做着同样

^⑤ Roman Solchanyk, "Ukraine: Political Reform and Political Change,"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Research Report* 1 (May 22, 1992), p. 4.

^⑥ Smith, *Ethnic Origins*, p. 157.

^⑦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chap. 9.

^⑧ 某些例子见 Roger Chickering, *We Men Who Feel Most German: A Cultural Study of the Pan-German League, 1886—1914* (Boston: Allen and Unwin, 1984), pp. 114, 145—146; and Myron Weiner, "The Macedonian Syndrome: An Historical Mode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World Politics* 23 (July 1971): pp. 665—683.

的事情。⁵⁷

另一方面,苏联、捷克和波兰知识分子已成为自由、民主、国际主义和和平思想的开路先锋。⁵⁸此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展了“历史学家的争论”(Historikerstreit),反击了民族主义历史学家要减轻德国对于纳粹恐怖行径的责任的企图。⁵⁹

对付自我提升的知识分子编造民族主义神话的主要办法是必须消除他们赖以生长的社会条件。然而,缩小战略目标或许也有某种作用。一种方法是将那些可能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吸引到较为良性的事业当中。欧共体或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应当设立国际研究项目、会议以及机构,为阿泽里人、亚美尼亚人、罗马尼亚人以及保加利亚人知识分子提供充足的资金鼓励他们研究促进族际合作的战略。还可以向西方国家那些致力于“协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理论或其他民族冲突化解战略研究的人提供有吸引力的奖学金。⁶⁰要想继续成为待遇优厚的泛欧洲学术团体的声誉良好的成员,学者们就必须服从国际质量标准控制。个人学者以及他们在巴库、布加勒斯特、索非亚和任何其他地方的国内机构只有达到了西方标准的学术准确性、客观性和文献引证规范性才能保留他们的合格认证。

196

除了拉拢本地知识分子之外,西方学者应当直接介入神话纠正进程,对东欧各地区的民族关系历史和现状进行详细的研究。就像西方政府将经济援助与民主化相挂钩一样,他们也应当将这种援助与为赫尔辛基观察(Helsinki Watch)这样的组织从事研究提供地方档案和合作相挂钩。一旦有了准确的族际关系史版本,国际社会就应

⁵⁷ 1988年10月在巴库对阿塞拜疆科学院的采访。另见 Bill Keller, "The Making of a Post-Communist Disorder,"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1, 1990, p. E3.

⁵⁸ Vladimir Shlapentokh, *Soviet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al Power: The Post-Stalin Er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⁵⁹ Richard J. Evans, *In Hitler's Shadow: West German Historians and the Attempt to Escape from the Nazi Past* (New York: Pantheon, 1989).

⁶⁰ 见 Arend Lijphart, *The Politics of Accommodation: Pluralism and Democrac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其他著作见 Snyder, "Averting Anarchy," p. 34. Rothschild 列出了精英们能够用来抑制族际冲突的一些策略的清单,见 *Ethnopolitics*, pp. 162—164。

当监督在公立学校中是否教授了这些版本。^①中国和朝鲜经常就确保在日本学校当中教授准确的历史而进行疏通。西方学者和私营组织也应当促使巴尔干和高加索的教科书作者和发行商们证明他们的历史观点是正确的。

互动效应和分析层次

如果说这些理论见解是对的,那么恶性的民族主义在东欧和前苏联的加速传播似乎就是可能的,但不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稳定的两极地缘政治僵局的打破,民众政治参与的兴盛,市场改革的痛苦引进以及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兢兢业业,使得一个超民族主义结局的出现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欧洲大国紧张关系的缓和,经济机遇和自由主义价值的跨国传播,以及很多国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责任的立场有助于防止民族主义的泛滥。在两个方向的发展都有可能的形势下,西方国家和非政府组织有意识的政策导向能够影响结果。

要判断如何控制新欧洲的民族主义,仅仅遵奉一种理论并单独信守它所开出的药方是错误的。原则上讲,简约是理论建构的一个强有力工具,它能直切政策问题的要害。然而现存的作品表明,存在着一系列独立而又相互作用的民族主义和超民族主义导因,这些导因在不同的分析层次上发挥作用。同样地,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方法都要考虑。

不同的理论包含着不同的政策方案,更适合于不同的情况。比如,对于难对付的原始性仇恨来说,防止争议进一步发展成为更加广泛的国际问题或许是最好的政策。反之,高度的国际一体化或许能够阻止已经从事市场改革的自由化国家民族主义的反弹。多层面的民族主义理论表明,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来说是对的,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就未必是对的。过分致力于一种理论或一个层次的分析不应当视这一常识性的结论而不见。

^① 关于这一问题,见 Celestine Bohlen, "In Transylvania, the Battle for the Past Continues," *New York Times*, March 18, 1990, p. 16。提出将良好的学术行为作为经济援助条件的有 Hopf 和 Van Evera。

全范围考虑起因的另一个理由是,这些起因所造成的效果(以及它们的解决方案)是累加性的。通过瞄准所有的导因和所有的症状,就会增加处理这些问题的综合效果。例如,在20世纪转换之际超民族主义猖獗的原因之一是它的所有导因都同时发作:军事的专业化超过了控制它的文职制度的发展;在此之际出现了无规则的安全竞争;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急速的现代化和经济变革。为超民族主义建立了可行条件的军事和经济建构力量被原始返祖现象、精英们的神话编造、冲突形势下评估责任的双重标准同时加剧。这些因素中的某一个因素也许是造成所有其他问题的主要根源。但即便是如此,也难以确定哪一个才是主根。^② 要想控制住超民族主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对策都应当对准它的所有导因,既包括首要的建构性力量,也包括次要的神话编造。

最后,从一个多维的视角来看民族主义,最重要的原因是各种因果因素具有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效果,取决于出现哪些另外的条件。为预测任一单一变量的效果,必须考虑互动效应。从决策的视角看,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产生条件效果的变量之一是一个民族集团与广泛的外围社会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有时候,这种暴露会引发超民族主义的反弹;有时又会相反,一体化打破了狭隘的民族意识,代之以更具世界主义或公民化的心理。外部的刺激因素与现行的内部条件相互作用,决定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哪一个更可能发生。

198

现存的文献提供了一系列关于这些条件性效果的假设。当大众居民经历了政治动员之后,对外经济和文化交往的增加更容易引起民族主义反弹。^③ 此时,随之而来的经济变革加剧了民族集团之间的不平等;^④ 相对于社会来说,国家和精英还处于较弱的位置;^⑤ 国际经济关系也不稳定。^⑥ 这里的方法论观点在于,正确的政策处方(不管是否将鼓励经济一体化作为超民族主义的解药)取决于对国内和国际两个不同分析层次上的民族主义导因相互作用的理解。单独瞄准

^② 在“National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post-Soviet State,” *Survival* 35 (Spring 1993) 一文中,我提出这样一种观点:支撑所有这些因素的主根是力量薄弱的国家无力管理现代化带来的社会挑战。

^③ Smith, *Ethnic Origins*, pp. 135—137.

^④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⑤ Rothschild, *Ethnopolitics*, pp. 116—121.

^⑥ *Ibid.*, chap. 5.

一个层次造成的结果就是脱靶。

本章所探讨的理论没有经过完全的检验,它们无法提供一个医治未来欧洲恶性民族主义的保险药方。然而,这些理论确实提供了一个可以为之一试的措施清单。大部分这些措施都以坚实的理论 and 证据告诉我们,只要考虑一下它们可能的互动效应就会发现,这些措施带来的大多是坏处而不是好处。^⑥很可能是,这些措施中没有任何一个足以防止某些超民族主义的爆发。高加索和巴尔干的某些原始性民族主义或许已经超出了外部力量巧妙操纵的范围。

199 虽然如此,这些理论还是提供了一个需要牢记的制定应对欧洲民族主义政策的手段清单。(1) 消除对国家安全的军事威胁;(2) 提供经济资源,以便国家能够通过经济增长将其统治合法化;(3) 鼓励与那些已经采取了不可逆转的步骤进行自由主义市场改革的国家发展深层、稳定和跨国的经济文化联系;(4) 向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集团提供援助以减少市场改革的影响;(5) 拉拢知识分子。如果遵循这些措施,本世纪上半期欧洲超民族主义的蔓延很有可能就不会重演。

200 通常,现实主义限制民族主义和民族冲突的基本方法是在国际层次上运用均势或威慑来制约。在将来,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冲突的可能性和现状要求一种多层面的解决方案,包括采取国内和国际的治理措施,努力改造现代民族主义的观念和看法。只有这种多样化的战略才能应付不断上升的超民族主义威胁。

^⑥ Snyder, "International Leverage," pp. 6—8. 然而,正如我上面所注意到的,相互依存和跨国联系效应需要进一步检验。

第九章

国家和日本大战略

查默斯·约翰逊

如果说“结构现实主义”的意图并不在于让美国政治科学家向学生教授国际关系理论,也就是说,如果它的意图在于解释全球政治的基本问题,那么大约从越南战争结束以来,日美关系则向结构现实主义提出了某些难解之谜。日本是否有一个大战略?日本政府是否有能力制定一个大战略?目前有着巨大的经济和财政手段可以利用的日本想要做什么?

反之,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为什么会在大量政府财政、军民两用技术的关键部件、高增加值制造业投资等方面让自己依赖于一个纯粹的经济大国?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派出的与日本谈判的代表是不是愚不可及,或者是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还是被收买?美国是否具有一个目的在于抗衡不断增长的日本权势的秘密政策?这是美国姑息北京列宁主义政权的原因吗?巴格达闪击战的真正目标是不是并非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而是耶鲁的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教授——这一切都是做给日本人看的?当日本和美国走向“交易场”(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的书名使用了这一词汇)时,这些只是想起来的一部分问题。^① 让我们对这一谜团的范围做一些补充探讨。

目前日本的人口规模是德国的一倍半,但缺少德国那样有效的政党制度,也无法像德国那样植根于欧共体当中。就人均收入而言,

201

^① Clyde V. Prestowitz, Jr., *Trading Places: How We Are Giving Our Future to Japan and How to Reclaim I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

日本是最富有的大国。^②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是世界其他地区最主要的储蓄和长期资本源泉,尤其是里根时期财政和贸易赤字的主要根源。尽管日本在形式上是解除武装国家,不允许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装力量,但它的国防开支在世界上占第二位。日本正致力于向东南亚和美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在很多情况下,这相当于开拓金融和产业殖民地,甚至无须寻找借口说这是互惠性的,外国人也在日本获得了资产。简直无法想像,在日本人口最稠密的县中,25% 的银行是由外国人拥有的(就像他们在加利福尼亚一样);无法想像,外国人可以把房地产的价格炒到当地人无法承受的高度(就像夏威夷那样);无法想像,外国人可以获得合法审查电影电视节目的权利(就像日本人在好莱坞购买的片子那样)。

这些都是能很好地说明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劳工部长、情报机构和科学基金会为什么应当把他们的分析人员派往日本工作的原因。日本在当今世界上非常重要。对日本感兴趣与所谓的对日种族歧视毫不相干;也不是像西方人所说的,既然冷战结束了,就需要找出一个新的对手;与石原慎太郎(Shintaro Ishihara)、盛田昭夫(Akio Morita)、乔治·帕克德(George Packard)以及三好将夫(Masao Miyoshi)这些作者所说的所谓妒忌、技术上的歇斯底里或文化霸权更是毫不相干。

日本与现实主义理论

对于现实主义理论家来说,日本长期以来就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问题。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关系体系本身将国家置于强有力的制约之下。这些制约因素优先于国内和历史因素而影响国家对外部世界做出的反应。它们还形成相应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现实主义根本不考虑国内对外交政策的反应和制约,或者是认为所有的

202

^② 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 1988 年是 23 382 美元,美国是 19 813 美元,德国是 19 741 美元,法国是 16 962 美元,英国是 14 658 美元,瑞典是 21 541 美元。只有瑞士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明显高于日本,即 28 213 美元。Keizai Koho Center, *Japan, 1991: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Tokyo, 1991), p. 12.

国家面对同样的国际压力时都会做出同样的反应。然而,战前和战后的日本情况都直接向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挑战。而在60年以前,日本对一个“其发动战争的能力并不怕遭到先发制人的攻击的敌人发动了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当我们正接近这个世纪的终点时,日本成了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和政治上的矮子。它对国际事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现实主义理论所能揭示的程度。^③

战前的日本在现实主义范式中是一个重要的异例,也是国际关系体系化学者们的一个头痛的谜团。问题在于,对日本绝对不利的国际制约因素为什么没能防止日本在1941年12月与美国交战,而且正当其企图征服苏联的德国盟友被挡在了莫斯科大门外之际又与英国交战。并不是学者们不知道所发生的这些事件,也不是研究日本史的史学家们忽视了战争爆发的这段时期。而是国际关系理论家们难以相信日本学的种种解释,因为这些解释对这些理论家们所赖以生为的理论具有非常大的破坏作用。

标准的日本学解释来自于日本最重要的战后政治哲学家丸山真男(Masao Maruyama):

战争期间,日本军队采用了大量独裁或专制措施。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将作为事实或社会结果的专制主义与作为概念的专制主义混淆起来。后者总是与责任感相关。日本军官和文职官员都不具有这种责任感。这引发出了发动战争的责任问题。不管1939年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什么,纳粹德国领导人当然是有意识地做出了发动战争的决定。而日本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尽管是我们的国家使世界陷入到太平洋战争的可怕战火当中,但却一直无法找到是哪一个人或集团有意识地发动了这场战争……对美国宣战并不是出于对世界局势的认真分析,或出于对生产能力和内部条件的比较分析。相反,致命的决策竟是由那些对国际事务(甚至像《慕尼黑协定》和集中营这样的事件)一无所知到惊人程度的人做出的,由那些心理错乱的人做出的。正像东条英机(Hideki Tojo)的话所揭示的那样,“有时候人们不得

203

^③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13.

不闭上眼睛跳下去”。^④

丸山真男最后一句引语是指东条英机于1941年秋天对近卫王子(Prince Konoe)讲的臭名昭著的话：“在人生的某一点上，他会感到必须闭上眼睛从清水寺(Kiyomizu-Dera)的门廊上跳到下面的溪流中去。”^⑤清水寺是坐落于京都东部依山而建的一个著名的佛教寺院。不管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当中会冒怎样的风险，作为一个上亿人口国家首相的东条英机带领所有人所冒的风险构成了现实主义思想的对立面(不管是从实证角度来理解，还是从规范角度来理解)。

杰克·施奈德(Jack Snyder)是最近一个声称发现了解释日本做出战争决定的理论方案的人。他认为，日本是“通过扩张来寻求安全”，这些扩张主义者把周边不堪一击的地区看做是“埃尔多拉多(El Dorados——传说中定义模糊而又充满大量黄金珠宝的宝山)，容易征服，又富有大量资源。它们是必须征服的地方，免得落入对手的手中”；他还认为，美国只是一个“纸老虎”，受着自己所宣传的“搭便车效应”(bandwagon effect)的影响；认为“日本不同于英国”，当发现自己在日本扩张过度之后，“它没有满足或收缩”；日本不懂得“最具侵略性的国家树敌最多”的道理。^⑥对这些看法没有过多的争议，实际上如同相当好的现实主义理论一样还非常受听。这些理论并不认为国家从不犯错误，只是认为(国际)体系决定了这些国家必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后悔。

但是，施奈德并不满足于现实主义的解释。如同丸山真男一样，他想要发现“大战略的国内决定因素”。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他们二人都超越了现实主义。然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施奈德认为，他能使这些国内决定因素适合于对所有帝国主义过度扩张案例做出普遍解释。而丸山真男则用心证明，日本国家的性质本身决定了无法形成一个大战略，无论这一大战略是灾难性的还是其他什么样的。我们将会看到，丸山真男对日本国家的看法在今日依然存在。在我看

^④ Masao Maruyama, *Thought and Behavior in Modern Japanese Politics*, ed. And trans. Ivan Morri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6, 84—85. 原书见：《现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动》，未来社1964、1985に124刷。

^⑤ Robert J. C. Butow, *Tojo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267.

^⑥ Snyder, *Myths of Empire*, p. 115.

来,施奈德的分析揭示出,美国人通常不可能把国家想像成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行为体,甚至只要一关注于国家就必定把它贬低成其他什么东西。在日本国家研究领域(它的起源、它的目的以及它针对社会影响所故意制造的障碍),施奈德提出了一套他所说的“联盟政治理论”。这使他得出了一个精确的结论。但从现代日本政治发展的角度看,这一结论是无法持续的。

施奈德的结论是无懈可击的:“与近期的发展相联系的各种国内症状将日本推上了一条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道路,这一轨迹又被国际环境和其他大国的政策所加强(虽说不是被其所强制)。”^⑦但施奈德走得更远,试图告诉我们为什么日本的决策错误发生于20世纪的40和50年代,而不是第一、第二或第三个10年。他写道:“当日本的政治体制卡特尔化程度越高时,它越倾向于过度扩张。而当其政治体制更单一化或更民主化时,这种倾向性就越小。起初,作为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革命’创建之父的元老寡头们起到了一个相对单一精英群体的作用。他们有着宽泛的民族视角,以日本国家的长期利益制约着过度扩张。在20世纪20年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出现部分地取代了作为对军方的帝国主义倾向起抑制作用的日益衰落的元老寡头。然而到30年代,日本新兴的民主体制崩溃,由军方卡特尔主宰了政策的制定。卡特尔内的各派相互支持,为追求幻想中的自给自足目标而走向公开的扩张道路。”^⑧

施奈德所说的“与近期的发展相联系的各种国内症状”是日本问题的真正肇事者。但是他把这些症状初次发作的时间弄错了(不是说它们造成最大危害的时间)。他对卡特尔化的政治体制与单一的或者是民主化的政治体制的区分根本站不住脚。这些症状发生于明治时代的鼎盛期,也就是明治宪法生效的1889年和对俄战争胜利以及夺取朝鲜的1905年。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只是这些早期发展的最后阶段。以20年代的民主体制为例,大正天皇时期(Taisho Emperor 1912—1926)与其说是一个民主时期,不如说是一个皇权衰弱的时期。独裁力量分化,被迫与他们的现代化计划创造出来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分享权力。正如赫伯特·比克斯(Her-

^⑦ Snyder, *Myths of Empire*, p. 152.

^⑧ Ibid., pp. 113—114.

bert Bix)所揭示的,大正天皇嘉仁(Yoshihito)“从1912年一开始就对他的统治感到厌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他的心智衰弱已众所周知。这一形势造成了皇族权力和权威的逐渐衰落,为‘大正民主’的成长以及开始于1918年原敬(Hara Kei)内阁的政党内阁的兴起搭建了舞台。”^⑨然而,随着1926年12月裕仁(Hirohito)登上皇位,形势发生了变化。明治模式的独裁皇帝的回归对30年代政治发展造成的影响不亚于施奈德所说的被一个帝国主义的卡特尔联盟劫持了国家。

施奈德还提出,“随着1931年占领满洲里,也就朝着帝国主义过度扩张的道路迈出了关键性的步骤。”从东京胜利者的公判角度看,这一观点非常正统。但历史并非如此。^⑩很多经历了这一时代的日本人都认为,关键的步骤是明治时代末期占领朝鲜。作为英国忠实代言人的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导致了关东军的创立和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Ishiwara Kanji)的极大忧虑。这一胜利对于施奈德关于国民党中国和苏俄对日本影响范围的威胁分析是至关重要的。前首相吉田(Yoshida,他本人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中国通)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得出结论说,朝鲜是日本的致命错误。正像威尔费尔德(Welfield)所指出的,“对战前时期的历史反思使(吉田首相)将(朝鲜)半岛与其看做是刺向日本心脏的匕首,不如看做是通向灾难性的大陆泥潭的单行道。”^⑪这是朝鲜战争期间为什么吉田如此极力反对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呼吁日本重新武装,并坚持将日本军队维持在11万的最初水平,而不是杜勒斯希望的30万水平的原因。如果日本在1950年至1951年间建立一支30万人的部队,美国就会迫使日本至少派出10万人到朝鲜参战。

施奈德不是以历史的本来面目来看待历史,而是试图让历史适合于他的“联盟政治理论”,这使他对日本所发生的事件进行了严重的歪曲,对一些日本领导人的作用给予了错误的评价,尤其是过度夸大了近卫王子的影响。但施奈德的练习却有助于指导我们超越现实主义,而回到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的“第二意象”(second

^⑨ Herbert P. Bix, "The Showa Emperor's 'Monologue' and the Problem of War Responsibility," *The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18 (Summer 1992): p. 336.

^⑩ Snyder, *Myths of Empire*, p. 115.

^⑪ John Welfield, *An Empire in Eclipse: Japan in the Postwar American Alliance System* (London: Athlone Press, 1988), p. 92.

image) 和日本国家本来的性质状态上去。正像丸山真男对战前国家的处理那样,今天日本国家的概念也充满了争论。这是因为日本国家的性质不明显,因为强有力的国外和国内利益集团总是在调查研究之前就做出了判断。他们坚持认为日本国家必定是资本主义的、民主的和多元主义的,因为如果得出其他结论势必太尴尬,代价太大。

所有的学术估计都是基于三种资料:过去的行为,当前的能力和未来的意向。这些学术活动都企图故意避开各种形式的理论化,因为这些理论形式有可能会歪曲资料。在日本案例中,过去的行为和当前的能力如此之大和如此恐怖,以至于造成任何其他国家或民族对其未来意图的密切关注。但是,当问到“日本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战略意图是什么”这一关键问题时,没有人能做出回答。日本人自己似乎也不知道。他们的行为常常会削弱人们所能做出的任何逻辑推论。比如在1990年下半年,在支持联合国有关波斯湾危机决议案方面,日本未能做出任何连贯性的贡献,尽管日本是一个高度依赖波斯湾石油作为其能源供应的国家。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它也未能提供任何形式的领导作用,尽管日本从开放性国际贸易中得到的好处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在这两个问题上(这一清单还可以进一步包括对俄罗斯的援助、环境保护、对共产党中国和共产党北朝鲜政策、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公民权利等等),日本领导人似乎患了麻痹症,既不能看清国家利益,也不能采取行动捍卫这些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似乎没有国家意图,尽管在产业和金融层次上日本受到了强有力的长期战略和激烈竞争的驱动。

日本的学术挑战

因此,日本不仅向我们提出了经济或技术上的挑战,而且首先是向我们提出了概念上或学术上的挑战。日本取得非凡的经济成就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西方(指说英语的国家)社会科学未能预测到这些成就?为什么日本仍然像宫泽喜一(Kiichi Miyazawa)首相曾经说过的那样是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和政治上的矮子?日本在哪一点上适

相处需要什么？这些问题使日本成了社会科学学术研究议程的核心。这些问题是英语国家的学术机构或智力机构所难以应付的。因为答案或许会揭示出我们自身在政治学 and 经济学领域所得到的智慧和已有的学说实际上有很多只是意识形态。冷战的结束使日本在这一方面的学术挑战成了关注的焦点。

在冷战期间，我们为反对苏联式的指令性中央计划经济而斗争，极力吹捧西方放任自由和自主经营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这种意识形态较量中，我们用西方阵营中源自于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作品的所谓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经济学。我们嘲弄共产主义经济学观点为幻想和谬误，而将我们自己的制度说成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因此，当冷战结束和柏林墙倒塌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学术上也遭到了唾弃。在其诺贝尔奖的双重尊捧下，西方经济学家为自己的胜利而欢呼雀跃：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们寿终正寝了。

但这一胜利也存在着问题。非共产党世界中讲英语的权力中心将日本及它在东亚的模仿者（尤其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济成功说成是由于（并进而证明了）放任自由和自主经营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甚至在冷战正酣之际，一些分析家就已意识到这是一场意识形态上的操练。要想维护西方理论的完整性，就必须压制或篡改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证据。必须扩展西方的理论范畴，以将亚洲的制度和实践包括进来。冷战的结束将这些内在的矛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尤其是，经济学在将其自身改造成一种战斗的意识形态时，为了将自己提出的公理变成数学公式，为了获取数学公式化所提供的科学意味而放弃了对规制（institutions）的研究。如果规制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变量，经济学就无法替西方扮演冷战的角。对于放任自由的经济理论来说，资本主义的正统规制于是就成了在美国支配一切的那些东西：资本市场、对立的劳资关系、作为经济规则源泉的法律和法律诉讼、国家除了在国家安全领域之外仅限于扮演受到严重游说干扰的调节者的角色。这些假设使那些讲英语的国家不可能注意到，为了创造美国所无法匹敌的增长率和新产品，日本正在以实际行动疯狂地发明着现代资本主义的规制。作为回应，美国的思想家们

开始自问,日本社会经济创造力的源泉是什么,它的优势和弱点是什么?

目前存在着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思索的几种不同流派。然而没有任何一个流派脱颖而出,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概念范式。这些流派都遭到了那些反对对日本进行比较研究,并持民族主义态度的日本人和外交代言人的攻击。有三种主要的方法(如果称它们为流派或许会言过其实)试图解释为什么日本在经济上取得了非凡的发展,而在政治上则显然是欠发达:我将第一种方法称之为普遍民主框架内的滞后理论;第二种为贸易国理论;第三种为后起经济发展的明治—俾斯麦模式。

滞后性民主发展理论

第一种方法的领头人是日本卓越的政治学家和编年史家升味准之辅(Junnosuke Masumi)。他著有从19世纪中叶到目前的15卷本的日本政治发展史。^⑫在他最近的(第16卷)研究中,升味准之辅对日本政党制度的演变和现状与英国、法国和德国做了比较。^⑬他特意避开了与美国的比较。因为他认为美国是一个真正的例外。在我看来,他的看法是有说服力的。

实质上,升味准之辅认为日本是紧紧追随着欧洲大陆的政治发展模式,但在时间上滞后了30年。战后经占领改革,日本迅速赶上了西欧。但在1960年,随着安保条约危机之后自民党执政地位的巩固,日本不再发展,从此卡在了死胡同当中。此前,自民党是一个由反动分子与范围狭窄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为疯狂排挤劳工组织的发展而组成的联盟。1960年之后,该党发明了一种新战略,通过控制经济增

209

^⑫ Junnosuke Masumi, *Nihon seito shiron* 《日本政党史》(Tokyo: Tokyo Daigaku Shuppankai, 1965—1980), 7 vols; Masumi, *Sengo seiji* 《战后政治》(Tokyo: Tokyo Daigaku Shuppankai, 1983), 2 vols. 英文版译为 *Postwar politics in Japan, 1945—1955*, by Lonny E. Carlil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5); Masumi, *Gendai seiji* 《当代政治》(Tokyo: Tokyo Daigaku Shuppankai, 1985), 2 vols; Masumi, *Nihon seiji shi* 《日本政治史》(Tokyo: Tokyo Daigaku Shuppankai, 1988), 4 vols.

^⑬ Masumi, *Hikaku seiji: Seio to Nihon* 《比较政治:西欧和日本》(Tokyo: Tokyo Daigaku Shuppankai, 1990), 详见 pp. 3—66, 460—471。

长收益的分配来拉拢社会上所有主要集团。后来,它还吸收了那些容易发动身体政治的问题,如污染、地方政府缺乏回应、家庭男性户主在大公司的工作保障等。在1960年之后,自民党在这些方面的努力还得到了左翼政党放弃认真发挥实际作用的帮助。结果是,日本的政治反对派只是成了意识形态上的强硬派。它们最终被拉入到了自民党无所不包的金钱权力政治体系(kinken seiji)当中。

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自民党对权力的垄断才开始遭到侵蚀。党内分裂出很多派别,几乎彻底搞垮了党。党的领导人将他们的政治领地传给自己的儿子和孙子。主要的问题是社会党是否能够针对劳工组织的衰落(按照升味准之辅的说法)这一发达民主国家的普遍现象在意识形态上做出调整,学会如何迎合“对媒体敏感”的“浮动”选民集团。在升味准之辅看来,从1960年到1990年的政治僵化使日本的政治发展再次落后于西欧30年。但是,自民党统治的结束将再次使日本回到议会民主的道路上,并克服日本政治中的很多反常现象,如官僚机构对决策的控制。

其他理论家们也通过大量叙述支持了升味准之辅的观点,尽管没有人明确承认他的思想概念。肯特·考尔德(Kent Calder)和猪口孝(Takashi Inoguchi)试图将日本在奉行冷战政策进程中搭美国所提供的国际公共物品便车的行为合理化。考尔德用“反应式国家”(reactive state)这个词汇来解释日本在美国霸权体系中的被动作用。而猪口孝则认为,日本政治与其说是被动的和寄生性的不如说是致力于“相互依存”。^④

210 卡雷尔·范沃尔弗伦(Karel van Wolferen)在《日本权力之谜》一书中以不太同情的语调描述了自民党的统治时期。与升味准之辅不同的是,他对是否能将政党和政府的责任性重新引进到日本提出了质疑。在范沃尔弗伦看来,日本是一个“削掉了尖顶的金字塔”,或者是一只“无头的鸡”,或者是没有确定运动方向的经济雪崩,依赖美国时期所形成的各个利益集团都为其助了一臂之力。然而,范沃尔弗伦和升味准之辅在学术上又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从普遍的民

^④ Kent E. Calder, "Japanese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Formulation: Explaining the Reactive State," *World Politics* 40 (July 1988): pp. 517—541; Takashi Inoguchi, "Japan's Politics of Interdependence,"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5 (Autumn 1990): pp. 419—437.

主标准角度来批评日本。

从历史的角度看,升味准之辅的看法很说明问题。日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声名狼藉的健忘以及它作为“半国家”(hangokka)和“商业国家”(chonin kokka)的地位都是源自于1947年美国人帮助制定的宪法。占领时期的和平主义和经济主义随后得到了1951年《日美安保条约》的认可。在该条约中,美国同意防卫日本,作为回报,日本允许美国在日本国土上驻军。所有这些发展的背后逻辑是冷战。随着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和日本极尽一切可能忘掉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力投身于日本的经济重建。

美国的目的是防止左翼政党在日本的胜利,将日本作为一种代替性的发展模式,防止中国和其他亚洲共产党国家的发展模式蔓延。在1945年之后的第一个15年中,日本人试图消极地抵制、耍花招逃脱、改进或以其他方式修改美国人强加给他们的反共角色。这一时期的日本是民主化猛烈发展的时期。它还见证了很多其他文化成就,包括日本电影的黄金年代。后来几十年这些成就的缺乏就更显其珍贵。

但是到1960年,随着日本人对安保条约的流产反叛(有时被称作美国的“匈牙利革命”)和接下来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抵达东京出任美国大使,日本的首要议程被改变了。赖肖尔的学说是把日本塑造成民主现代化的榜样。在他的支持呵护下,日本被重新塑造为一个与冷战时期美国的意识形态套路相一致的国家。池田勇人(Hayato Ikeda)首相对宪法发展进行了控制,任命的经济部门领导人领受的任务就是策划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在1960年避免了一场险些爆发的内战(如果反动分子继续主导政治的话)。人民对繁荣承诺做出的回报是努力工作和勤勉创新。就他们而言,美国人开始相信他们自己的宣传,以为日本真的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美国的复制品,美国人在30年前所经历的东西现在又重现了。

211

正像升味准之辅所说的,这一切所带来的代价主要是日本政治的发展。政治体制萎缩,基本决策转到了官僚机构和大企业手中。在政治家们执政的同时,实际统治的是官僚政客。无所事事却又重新当选,然后按照官僚机构的愿望投票(当然,在遇到外部压力的干预时会除外,如1971年的“尼克松震荡”)。政治家们只埋头于自民党内部的派别斗争。其结果是结构性的腐败,就像佐佐木毅(Sasaki

Takeshi)所说的,是近些年日本政治体制“长期的结构性失灵”。^⑮

冷战使日本和美国在修订了的安保条约(1960—1990)纽带下共枕了30年。美国对日本的界定是战略意义难以想像,经济意义极小或全无。在越南战争、中国实验原子弹和氢弹、美中苏形成战略大三角势态时,这种说法或许不错。冷战时期,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发展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保证它参加了战后重要的国际组织,开放自己的市场允许从日本进口,向日本提供了很多高端技术而没有保留这些技术的所有权,允许日本保护本国市场比任何欧洲盟国都长得多。日本充分利用了这些条件。与此同时,他们实际上是将其外交关系的走向交给了美国。甚至在它被允许加入到世界上七个主要的工业民主国家行列之后,日本除了关注自己的经济好处之外,对其他任何问题都没有明显的兴趣。与此同时,日本的政治家们完全忘了他们应当做什么。

1990年11月8日,这一天与美国和日本从其40年的冷战中所学到东西大为不同。布什总统在这一天命令倍增美国驻中东地区的部队人数,以便为伊拉克战争做准备。海部俊树(Toshiki Kaifu)首相决定不再对他的政党提出的《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做进一步考虑,因为议会过于分裂,无法使其通过。在美国方面,从“沙漠盾牌”到“沙漠风暴”的转变源自于一位观察家所称之为的“过度军事化的国家安全概念”^⑯。美国投入到所谓的军事凯恩斯主义当中,每年拨出3000亿美元的财政预算用于支付给军工联合企业的订单。这是造成其各种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财政赤字、资本成本过高、工程技术人员和高技术产业从商业活动中流失、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

在海湾战争之前,日本人正确地感受到美国正在经受经济衰退,以为这种经济衰退彻底削弱了美国的军事能力。船桥洋一(Funabashi Yoichi)所称的美国“大男子单边主义”(macho unilateralism)如同一切形式的大男子主义一样,也只是一种懦弱的掩饰。^⑰此时,摆在美国冷战之后日程上的最重要任务是将经济重新调整到以经济为

^⑮ Sasaki Takeshi, "Postwar Japanese Politics at a Turning Point," *Japan Foundation Newsletter* 18 (May 1991): pp. 1—7.

^⑯ Richard J. Barnet, "Reflections: The Use of Force," *New Yorker*, April 29, 1991, p. 94.

^⑰ Funabashi Yoichi, *Reisengo* 《冷战之后》(Tokyo: Iwanami Shinsho, 1991), p. 96.

本,不再依靠日本的储蓄和投资过日子,形成一个应付欧洲和亚太地区主义的经济战略。美国人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很小。在这个关键时刻的海湾战争似乎像一条黄色丝带一样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国内社会经济现实引开。

然而,1990年11月8日日本决定除了提供资金之外放弃采取任何行动支持联合国决议,这里反映的似乎不仅仅只是其政治体制的萎缩,自以为是和平主义的日本宪法第9条(放弃交战权)和所谓“吉田主义”(1952年重新获得主权后日本政治和经济的分离)的长期影响或许也发挥了作用。但第9条也好,安保条约也好,在今天都只是无作为的借口,而不是原因。它们成了既得利益的意识形态护罩。毫无疑问,很多公民和政治家真诚地主张维护过去的和平主义方针,而不向内阁赋予在政治上不可靠的军事使命。但是,这与政治上的和平主义主张不是同一回事。

1947年宪法和安保条约都是冷战的产儿。第9条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为了获取他想要的更多东西(宪法第1条,即天皇应当成为国家和人民团结的象征)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麦克阿瑟认为,为了实现《波茨坦公告》中提出的对日本实行民主化方向改革的任务,他必须以保留天皇来为其努力提供合法性。为了保留二战期间作为国家首脑的天皇,盟军需要以第9条的形式来提供某种保证。如果仅仅以征服者的姿态而没有任何其他权威来支持,战后改革将不会维持长久。也许在日本战败之后美国不应当试图改造日本,但一旦决定这样做了,保留天皇和加入第9条就成了这一目标的逻辑手段。 213

尽管是在外国占领时期实施的,但1947年宪法在日本保留了很大的合法性。据日本最大的国家报纸《读卖新闻》于1991年5月2日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约83%的人喜欢宪法的总体框架;希望对其进行修改的人(占33%)说,他们只想澄清国家自卫的权利,将自卫队合法化。^⑩修正似乎是合理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改写。

如同宪法一样,《安保条约》无论是作为第9条在制度上的引申结果,还是作为保护日本免遭国际共产主义威胁的盾牌,它都已成为时代的错误。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和美国有必要终止联盟。需要一

^⑩ *Yomiuri shimbun*, May 2, 1991, pp. 1, 15.

个新的条约来直接表达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在政治和制度上的需求。问题在于,日本和美国似乎都没有认识到整个冷战期间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安排已经失去了意义,似乎都没有承担起为两国关系奠定良好基础所需的政治领导责任。因为两国都没有或似乎不可能制定出一个与另一方打交道的大战略,也没有对似乎正在形成的临头灾难做出诊断。当然,这只是对日本政治体制和意图的一种构想。

贸易国家理论

214 对这些问题所持的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在日本的政治发展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滞后性或失衡性问题,日本政府仅仅是根据人们所不熟悉的原则来形成政策。这种观点认为,日本是一个“贸易国家”,它对世界的看法与主要以军事和疆域条件来界定自己的民族国家截然不同。日本在伊拉克—科威特危机中没有向联合国授权的部队提供军事人员并不是一个国内政治混乱的象征,而是对局势和如何应对局势不同看法的产物。据《纽约时报》报道,“日本商人说,‘知道吗,萨达姆·侯赛因占领了油田之后会干什么?他必须把石油卖到什么地方……难道你不知道,阿拉伯人最终会在他们内部达成一种交易?’”^①这听起来倒很像一个商业国家的根本性原则。它恰巧还印证了一个古老的日本格言:跟着强者(nagai mono ni makareyo)。^②

现代日本和它的态度使很多人回想起了三十年战争之后在以军事力量捍卫领土的体制产生之前所繁盛起来的古老贸易国体制。认为国家从事国际经济活动是为了提高其自身的财富和权势,而不是像经济学家们所让我们相信的是为了提高全球效率的看法似乎是有道理的。威尼斯、热那亚和阿姆斯特丹这些历史案例提供了成功的证明。今天对这一观点的主要支持者是理查德·罗斯科兰斯(Richard Rosecrance)在1986年出版的《贸易国家的兴起》。但是日本通商产业大臣(Naohiro Amaya)和我本人关注的是十五、六世纪威尼斯战

^① Steven R. Weisman, “Japanese Leaders See Support for U. S. Stand in Gulf Ebbing,”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1, 1990.

^② 见 Welfield, *An Empire in Eclipse*, p. 2.

略和1952年后日本战略的相似之处。^②正如罗斯科兰斯所指出的：“海洋或贸易体系……是以那些意识到自给自足是不可能的国家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日本和欧洲国家（尤其是西德）居于这一体系的核心。今天，西德和日本利用国际贸易来获取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武力征服才能得到的原材料和石油。”根据欧洲、北美和太平洋各贸易集团的发展（这些发展主要是为了应对日本经济活力而采取的战略），这一评论也许值得修正，但其原理依然存在。正像1990年美国和日本所展示的那样，军事—疆土国家和贸易国家对诸如伊拉克占领科威特这样的局势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

215

很多证据表明，日本作为一个重商主义的贸易国家并不是毫无头脑的。从这一视角看，自民党并不是无能和腐败到沦为真正权力部门的伪善外表，也不是用来让日本普通民众和外国人相信日本是议会民主制国家的欺骗工具。按照这一观点，日本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官僚统制，名义上是自民党执政，而实际上是国家官僚精英统治。对日本很多生活部门的实证调查都倾向于支持这一看法。与日本谈判的外国人时刻都应当懂得，该国外表上的政治领导人如首相和部长并不像其他体制下的这些人那样重要，真正行使权力的是站在他们身后的那些官僚。照此看来，日本无疑有着自己的大战略，只是外国人不知道它是什么。日本在做好实施准备之前不会暴露自己的这一大战略。

这一战略的实质是在亚太地区建造一个二战时期就已提出的新版的“大东亚共荣圈”。但这一次是建立在真正繁荣基础上的。为了这一战略，日本在政治上安抚中国，而在经济上使中国更加依赖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形成真正的劳动分工；利用其大量的经济外援作为战略手段，与目标国家建立长期的联系；让新立的天皇出访国外，以消除二战期间军事掠夺造成的不利影响；将人员和贸易公司派驻到条件成熟的经济发展滞后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缅甸、俄罗斯亚洲地区以及北朝鲜。对这一战略存在着很多无法估量的因素，如这一新的共荣圈是否包括美国，还是只允许其观察员身份？如果是后

^② Naohiro Amaya, "Japan's Survival As a Trading Nation: Learning from Medieval Venice," *Journal of Japanese Trade and Industry* (September—October 1983): pp. 32—39; and Johnson, "La Srenissima of the East,"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Journal of the Israel Oriental Society* 18 (March 1984): pp. 57—73.

者,那日本在北美的巨大投资该怎么办?

216

日本人目前还不足以采取任何有可能使自己隔离于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市场和创造天赋之外的行动。但它的大战略已摆在那里,并由大藏省和通商产业省精明能干的官员来管理,由外务省施放烟幕弹,以各种其他杂事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这一大战略没有在议会讨论过,首相对此可能也一无所知。这一事实与战后日本政治特点和贸易国大战略完全相符。断言这一大战略根本不存在或根本行不通,或超出了日本政府的能力范围,就像查理斯·戴高乐把池田勇人(Ikeda Hayato)贬作仅仅是一个晶体管商人一样目光短浅。那些看不到日本政府在战后所取得的产业发展成就的人,以及那些不了解日本经济活动背后的政治意图的人是带着西方的标准和期待来看日本,而不是用实证和归纳的方法研究日本。^②

明治—俾斯麦发展模式

理解日本国家的第三种探讨方法在阿尔伯特·赫胥曼(Albert Hirschman)的一句话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达:“不发达国家作为一个集团通过所具有的一系列共同特征而与发达工业国家相隔离。因此,那些只专注于工业社会的传统经济分析必须经过改造才能用来分析不发达国家。”^③赫胥曼想说的是类似于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以及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henkron)等思想家所提出的滞后经济发展理论。今天对这一理论的最好体现也许是最近由艾丽斯·阿姆斯登(Alice

^② 见 Chalmers Johnson, “The Future of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Seeking a New Balanc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and Soviet Research Analysis* (Seattle), no. 2 (1990): pp. 21—27; and Johnson, “Where Does China Fit in a World Organized into Pacific, North American, and European Regions?” *Issues and Studies* (Taipei) 27 (August 1991): pp. 1—16.

^③ Albert O. Hirschman, *Essays in Trespassing: From Economics to Politics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

Amsden)所写的关于韩国和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关于台湾的书。^④

这些理论家所说的后发展是指跟随工业革命首批受益者之后或对其做出回应的经济发展。在韩国和台湾案例中,是指响应日本工业化而后来出现的发展。后发展国家与最早发展国家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作为动力源泉的资产阶级兴起、私人投资、企业家精神、甚至是韦伯的新教观念(或目前的儒家观念)对于有意识的工业化政治决策已不再重要。对于新后发展国家(late late-developers)来说就更是如此。

格申克龙概括说,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发展的时间越晚,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就越大。尽管这一点对于列宁主义国家来说很明显,但古典经济学家通常不承认它对于其他成功的后发展国家的适用性,因为他们把英美的经验过于普遍化,因为他们对德国和日本知道得太少。赫胥曼所指的后发展理论首先是针对两个非列宁主义的后发展大国——1868年之后的日本和1870年之后的德国而提出来的。

在诸如日本和德国这样的第二轮后发展国家,具有动员力的政权将其经济的优先发展强加于社会。这个社会并不一定是不顺从,而是还没有形成自下而上强烈要求工业化的资产阶级道德。这种动员性政权或发展国家有两个最基本的类型:列宁—斯大林的集权主义模式(totalitarian model)和明治—俾斯麦的权威主义模式(authoritarian model)。这两种模式都包含着社会目标确定、强制储蓄、重商主义和官僚主义。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列宁—斯大林战略依赖于用社会主义取代市场来建立自己的目标。而明治—俾斯麦模式是建立在市场确认基础上的,用市场方法确立其社会目标,用市场实现其目标。共产主义式的指令性经济特征是保留全部所有制,将它们控制

^④ Thorstein Veblen, *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915; rp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6);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43; Alexander Gers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and *Bread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1943; rp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Alice H. Amsden,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and Robert Wade,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在国家手中。而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 (capit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s) 是建立在财产所有制的私人占有基础上的, 国家只是间接性地控制经济决策。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在效率上比它的共产主义对手胜出百倍, 但不如有着完全竞争的理想的市场经济那样有效率。但与此同时, 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在实现其社会目标方面比纯粹市场经济社会更有效率。

218

所有高速增长存在的共同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是它造成了尖锐的社会和政治不稳定。在后发展国家, 这种不稳定还会增加, 因为工业化发生于社会进步之前, 而不是对社会进步的响应。工业革命的最初受益者即使是发展速度较慢, 并在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上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但工业化仍然导致了严重的不稳定, 正像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描述和分析的那样。在这些早期的例子中, 国家不是领导工业化本身的机构, 而是干预和减轻工业化带来的关系紧张和不平等。凡是在那些干预成功的地方, 国家就扼杀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示的革命, 并渐渐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调节国家”。这类国家的主要案例是英国和美国。其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是调节, 在社会方面的作用是改良。

列宁主义政权和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政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处理工业化所造成的被迫受害和政治不稳定。列宁主义的方法粗暴而简单, 并像 1989 年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 最终是缺乏效率。列宁主义国家依赖渗透性集权性的武器控制, 共产党来预防、疏导和压制不希望看到的社会发展。相比之下, 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的精英们则面临着相当不同的问题。他们必须使其国家的目标与现代化的、动员起来的和非传统社会所固有的大众政治协调一致。这样的社会有着高度发达的市场、财产私有制和大城市 (或者说, 高度自我管理、消费者主权和自治是其惟一可行的社会组织形式的部门和场所)。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政权能够在其主要的国家官僚机构中形成符合这种社会的目标。但为了实施这些目标, 精英们必须进入市场并对其进行操控和结构把握, 以便让私人公民对真实的激励和抑制因素做出反应。我提出用“软权威主义”一词来指导

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的精英们试图实施其目标的政治安排。^⑤

19世纪末日本和德国精英们提出的政治方案大致可归纳为下列四种模式：首先，其核心有一个隐蔽的团体，它通过最低必要数量的利益集团之间的保守联盟而维持自己的长期存在；其次，精英们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来防止干预其目标的民众运动的形成，尤其是统一的劳工运动的出现；第三，精英们形成和传播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让公众相信，他们国家的条件并不是政治安排的结果，而是其他什么因素的结果，如文化、历史、封建制度、与世隔绝、民族性格、气候条件等等；第四，精英们采取各种行动来增进民族自豪感，但却转移对宪法发展的注意力。从明治寡头们和俾斯麦那里可以看到，最具共性的这类视线转移是帝国主义扩张。但在当代，能够取代这一作用的还可以是奥林匹克运动、皇室婚礼、反美情绪和复仇心理（冲绳群岛和北方岛屿）。到目前，战后时期对帝国扩张最重要的代替政策是促进出口、竞争市场份额和海外投资。

这一模式的核心是一个能够使精英团体控制政权的隐蔽的保守联盟。在俾斯麦和威廉时期的德国，这包括该国两个最强大的经济利益部门：谷物生产部门和重工业部门。如同1955年日本自民党的形成一样，德国联盟的意图是对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发动一场全面的攻击，并得到了国家津贴、关说和保护主义的支持。这一安排的主要消极后果是妨碍民主政治的发展，它依次又为后来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德国和日本的经济产生出经济上能干但政治上怯懦的资产阶级，使社会在遇到危机时容易遭到极端主义政治运动的破坏。在德国案例中，戈登·克雷格（Gordon Craig）指的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整个悲惨历史。资产阶级不得不默认1848年和1866年两次失败而带来的软弱无力。弥补这一损失的是对民族主义的袒护和对私人价值和（内向性）文化价值的理想化。它们被资产阶级用来当作缺少政治责任感的借口”^⑥。前纳粹

^⑤ Chalmers Johnso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ed. Frederic C. Deyo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43.

^⑥ Gordon A. Craig, "Introduction," in Eckart Kehr, *Economic Interest, Militarism, and Foreign Policy: Essays in German History*, trans. Grete Heinz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 xi.

德国史的重要史学家埃卡特·凯尔(Eckart Kehr)将由此而形成的体制称之为“资产阶级—贵族新封建主义”。这一词汇同样适用于战前的日本。^②

在颁布《明治宪法》之后的明治晚期,日本保守联盟由皇室、明治寡头、地主和原始财阀构成;在占领满洲之后的军国主义时期,保守联盟由皇室、军官、经济官僚机构和新财阀构成;在美国占领之后的高速增长时期,保守联盟是由经济官僚机构、自民党和大企业领导人构成。既然新宪法使得选举不可避免,那么这一最后的精英集团就以保护农民和小零售商的狭隘利益神圣不可侵犯来确保他们对自民党的支持票。如同奥托·冯·俾斯麦著名的“钢铁黑麦”联盟一样,当代日本依赖于大米与汽车的联盟。或者用一个制度性的术语来表达,依赖于用投票支持执政党的“全日农协联盟”(Nokyo)和用金钱支持执政党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Keidanren)之间的联盟。日本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从未在政治当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为防止它万一会发挥作用,保守联盟还建立了一种不利于都市选民的选举制度。

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日本人称之为“建前”(tatemae)的形式上的权威与日本人称之为“本因”(honne)的具体的统治权之间的区别。软权威主义的核心是在一个形式上的法律和普遍权利制度内秘密发挥作用的精英集团所行使的具体统治权。正像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最近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这样一个精英集团的效率是极高的。但与之相伴的政治欠发达在遇到危机时的代价也是非常高的。

发展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s)的弱点是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严重失衡。在列宁主义模式中,民主遭到了压制,这最终或者是导致警察国家,或者是导致合法性丧失。在明治—俾斯麦模式中,由于采取秘密措施来维护保守联盟对政权的控制,所以只能存在着软弱无力和遭到削弱的民主。因此,明治—俾斯麦模式非常容易遭到

^② Gordon A. Craig, "Introduction," in Eckart Kehr *Economic Interest, Militarism, and Foreign Policy: Essays in German History*, trans. Grete Heinz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p. 118—119. 凯尔还写道,“俾斯麦帝国的特征和独特之处在于国家与民族之间关系安排的特殊方式,在于联邦各州之间关系调节方式,在于立法权归属联邦参议院,而真正的统治权保留在皇帝和普鲁士手中。”战前日本保守联盟的性质是本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讨论议题之一。见 Germaine A. Hoston, *Marxism and the Crisis of Development in Prewar Jap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政治激进主义和直接行动的破坏。相比之下,调节性国家有着更加健全的民主制度,在大萧条时期能够抵制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但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效率不是很高。

应当提及一下最后一个,也是声名狼藉的国家类型:只专注于自我利益的国家。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称这些国家为“利己国家”^②。其例子可以包括费迪南德·马科斯统治下的菲律宾、吴奈温将军领导下的缅甸。国家显然还有其他形式和作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日本的起源和功能不同于美国。这有助于解释当我们从美国的视角看问题时现代日本历史和行为所呈现出的反常。同样地,如果美国要想与日本和平相处,就必须学会效仿或适应日本国家的某些发展型功能,就如同过去美国不得不适应列宁主义发展型国家的很多功能一样。

我所提出的对当代日本的三种分析方法(即日本是最近的民主发展相当滞后的产物,或贸易国家的产物,或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的产物)可能不是相互排斥的。每一种方法都揭示出日本政治和社会组织的某些方面,每一种方法都比强迫日本适应根据占领时期形成的美国幻想而强加的框架更准确。此外,这些方法都是比较性的,避免了美国学术圈内相当时髦但毫无实际效果的定义简化法,比如解构主义、某种形式的女权主义、“理性选择理论”、实证研究中总体上朝着形式主义和推论方法以及人文研究中朝着归纳方法发展的趋势。

与此同时必须强调,研究日本的这三种方法相互之间是不同的。这些不同的方法提醒我们,并不是各种形式的国家都是同样的,它们在效率上并不相同,其对于不同环境的可行性也是不同的。某些类型的国家对处理危机并不完全适应,而其他一些国家只有在做出某些重大调整之后才走向繁荣。列宁主义国家由于过度的帝国扩张和国内失败似乎正走向灭亡(至少是不会再使用这个名字)。鉴于冷战的结束和两极格局终结而带来的国际体系结构变化,美国和日本都面临着巨大的调整的压力。就日本而言,这些压力似乎很可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向我们揭示出这三种方法当中哪一种更加适合,或者,

^② Peter Eva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redatory, Developmental, and Other Apparatus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hird World state," unpublished paper, August 1989.

是否正在形成一种代替性的理论。

222

日本对于美国学术界来说之所以必定重要,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问题,而且还因为它提醒我们错把意识形态当作理论。结构现实主义碰巧支持美国军工联合体的利益,对于理解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竞争是非常在理的。但对于理解日本的崛起,理解日本人的学习进程以及从50年前与美国进行军事竞争当中获得的战略洞察力来说似乎就无效了。尽管某些人为自己壮胆说美国注定要起领导作用,但美国没有战略迹象表明要这样做,反倒有着大量迹象表明,日本在从冷战体系中尽一切可能捞足了油水之后现在正考虑面向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世界做出调整。从事这一大战略研究的价值或许正是要把过于自负的美国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一切战略的本质上去——正如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所说的“间接的方法和意图的掩盖”。值得深思的是,日本人如同他们前面的威尼斯人一样,或许是杰出的战略家。即使他们不是,美国人也要把他们当作是,这才是聪明的做法。或者,如果说结构现实主义教会了我们什么的话,那么这至少正是这一理论所教给我们的。

223

因此,日本历史案例的关键之点是日本传统的继续,尤其是国家实质性作用的继续。20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扩张的根源在于明治时期。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只不过是1931年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作的先兆。1945年之后日本政策的惟一重大变化是手段的变化,从军事手段转变成经济手段。

索引*

- Acheson, Dean(迪安·艾奇逊) 118, 193
- Afghanistan(阿富汗) 54, 158
- aggression(侵略) 33, 39, 43—44, 102—104, 114, 116, 132, 167, 180—181
- Amaya, Naohiro, 215
- anarchy(无政府,无政府状态) 4, 7—8, 11, 13, 20, 24—25, 34, 48, 56, 61—62, 98, 162, 179—180, 188, 197
- Andreski, Stanislav(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烈斯基) 34
- appeasement(绥靖,绥靖政策) 19, 101—103, 106—107, 124—125, 127—132, 134, 137, 147, 149, 151, 161, 163, 164—168, 171, 176—177, 184, 204
- Arbatov, Georgii(格奥尔吉·阿尔巴托夫) 175
- Armenia(亚美尼亚) 187, 196
- arms control(军备控制) 159, 161, 190, 194
- arms race(军备竞赛) 45, 52, 58, 83, 87, 91—92, 154—155, 161, 163, 165, 167—169, 173, 175
- Art, Robert J.(罗伯特·阿特) 159—160, 162
- atomic weapons(原子武器) 117, 120. 另见 nuclear weapons(核武器)
- attribution theory(归属理论) 126
- Austria(奥地利) 41—43, 144
- autarky(自给自足) 33, 79—80, 142, 205
- authoritarianism(集权主义) 15, 219, 221
- Axelrod, Robert(罗伯特·阿克赛罗德) 7, 97, 176
- Azerbaijan(阿塞拜疆) 187, 196
-
- Babst, Dean(迪安·巴布斯特) 34
- balance of power(均势,权势平衡) 4, 6—8, 10—12, 17—19, 23—25, 27, 31, 35, 46—48, 97—100, 112, 128—130, 139, 143, 152, 162, 164, 170, 200

* 注:索引所列页码为原著中所在页码。

- balance of threat(威胁平衡) 162, 164, 170
- balancing(抗衡,平衡) 4, 9, 11, 15, 19, 25
- Balkans(巴尔干,巴尔干国家) 16, 40, 43, 46, 197, 199
- bandwagoning(搭便车) 24, 27—28, 181, 189, 204
- battleship(战舰,战船) 69, 70, 88
- Ballin, Albert(阿尔伯特·巴林) 80
- Barnett, Corelli(科雷利·巴尼特) 129
- Beach, Michael Hicks(迈克尔·希克斯·比奇) 84
- Beck, Joseph(科洛内尔·约瑟夫·贝克) 140
- Belgium(比利时) 41—43, 104, 115, 129, 131
- Belisha, Leslie Hore(莱斯利·霍尔·贝利沙) 132
- Bethmann-Hollweg, Theobald von(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赫尔维希) 82
- bipolarity(两极,两极体制) 7—8, 10—11, 49, 51—52, 54, 57—59, 180, 197, 222
- Bismarck, Otto von(奥托·冯·俾斯麦) 66, 74, 76—77, 94, 189, 220—221
- blitzkrieg(闪电战) 16, 131, 137, 201
- Boer War(布尔战争) 39, 84—86, 92
- Böhm, Ekkehard(艾克哈德·伯姆) 77—80
- Bolshevik(布尔什维克) 35, 44—45, 132, 145
- Borgia, Cesare(切萨雷·博尔亚) 26, 28
- bourgeois(资产阶级,中产阶级) 35—37, 39—40, 42, 44—45, 94, 205, 210, 218, 220
- breathing space(喘息空间) 11, 160, 167, 172
- Bueno de Mesquita, Bruce(布鲁斯·布埃诺·德梅斯基塔) 8, 57
- Bulow, Bernhard von(伯恩哈德·冯·比洛公爵) 76, 82
- Bundesrat(德国联邦参议院) 74—76, 220
- Burckhardt, Jacob(雅各布·伯克哈特) 31
- Bush, George(乔治·布什) 14, 23, 55, 155, 177, 201, 212
- Byrnes, James(詹姆斯·贝尔纳) 115
- Cadogan, Alexander(亚历山大·卡多根) 134, 148—149
- Calder, Kent(肯特·考尔德) 210
- Canada(加拿大) 13, 78, 106
- capitalism(资本主义) 28, 36, 38, 45, 49—50, 53, 55—56, 191, 208—209
- Caprivi, Leo von(莱奥·冯·卡普里维) 76
- Carter, Jimmy(吉米·卡特) 23

- Catholics, German(德国天主教会) 74—76, 82, 94
- Central Europe(中欧) 132, 189
- Chamberlain, Austen(奥斯汀·张伯伦) 86—87, 92
- Chamberlain, Joseph(约瑟夫·张伯伦) 78, 86—87
- Chamberlain, Neville(内维尔·张伯伦) 102, 125—127, 129, 132, 134, 138—140, 142—150, 152
- China(中国) 14, 52, 55—57, 118, 122, 165—166, 197, 204, 206—7, 211—212, 216—217, 222
- Churchill, Winston(温斯顿·丘吉尔) 14, 52, 83, 89, 106, 129—130, 146
- Clausewitz, Karl von(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3, 22
- Cold War(冷战) 6, 19, 23, 48—56, 58, 60, 62, 101, 112—113, 117—120, 122, 155—156, 162, 169, 173, 176, 178—180, 183, 193, 202, 208, 210—214, 222—223
- collaboration(勾结,卖国求荣) 27—28, 47, 104
- commitments(承诺) 18, 33, 39, 96—101, 103—106, 110, 112—123, 126, 128, 130, 141, 144, 151, 158—159, 164—165, 172
- communism(共产主义) 14—16, 38, 49—51, 53, 161, 174, 187, 214
- competition(竞争) 14, 38, 66, 125, 155, 157, 160, 163, 170—173, 176, 180—181, 187—190, 193, 198, 218, 220, 223
- congress(国会) 97, 102—109, 111—112, 114—115, 117, 123, 138, 160, 190, 192
- conquest(征服) 9—10, 27, 30—31, 132, 143, 148, 183, 187
- conscription(征兵) 111, 148, 193
- Conservatives: British(英国保守党) 84, 86—88, 90—93, 134, 146;
German(德国保守派) 75—76, 82, 92—95
- constitutional fitness(宪法适应性) 14, 65, 93
- containment(遏制) 4, 18, 23, 34, 50, 54—55, 112—113, 121, 123, 127, 129, 160, 162, 193
- cooperation(合作) 5—7, 10, 14, 32, 38, 47, 55, 57, 111, 125, 138, 161, 163, 172—173, 176—177, 186, 197, 213
- Cowling, Maurice(莫里斯·考林) 129—130, 146—147
- Cox, Robert W.(罗伯特·考克斯) 25
- Craig, Gordon(戈登·克雷格) 220
- cultural hegemony(文化霸权) 196, 202
- Czechoslovakia(捷克斯洛伐克) 126, 129, 139—140, 143—144, 147, 150, 198
- Czechs(捷克) 191—192

- Dahl, Robert(罗伯特·达尔) 48
- defense spending(国防开支) 34, 88, 90, 103, 108—110, 112, 114—115, 117—119, 122, 202. 另见 military spending(军事开支)
- demobilization(复员,遣散军队) 112, 114—115, 117, 120, 173
- democracy(民主) 11, 15—16, 33—34, 36—37, 38—42, 44, 74, 93—94, 122, 191, 195, 197, 205—207, 209—211, 214, 216—217, 220—221
- detente(缓和,和解) 159, 173, 175—176
- deterrence(威慑,震慑) 3—4, 14—16, 19, 96, 97, 99—100, 112, 129—130, 132—134, 139—140, 142, 144, 162, 169, 200
- Diet(议会) 213, 216
- distribution of capabilities(能力分配) 48, 51, 53, 56—57. 另见 balance of power(均势)
- distribution of power(权势分配) 7—8, 57, 62, 98. 另见 balance of power(均势)
- domestic constraints(国内制约,国内制约因素) 6, 15—17, 19—20, 31, 96, 98—100, 122. 另见 economic constraints(经济制约); political constraints(政治制约)
- Dominions(自治领) 78, 85—86, 139
- Doyle, Michael W.(迈克尔·W.多伊尔) 13, 22, 25, 28, 34, 38
- Dreadnoughts(无畏战舰) 70—71, 82, 88—89
- Dulles, John Foster(约翰·F·杜勒斯) 50, 206
- Duma(杜马) 44
- Eastern Europe(东欧) 6, 16, 54, 127, 130, 132, 138, 140, 143, 145, 151, 157, 161, 177, 183, 186, 190, 197, 200
- economic change(经济变革) 83, 101, 111, 190, 193—194, 198—199
- economic constraints(经济制约,经济制约因素) 5, 13, 17, 125, 127, 134, 137, 165, 169—171, 177. 另见 domestic constraints(国内制约); political constraints(政治制约)
- economic decline(经济衰退,经济滑坡) 16, 23, 101, 104, 125, 154—155, 157, 162—165, 167—168, 171—172, 176—177, 213
- economic performance(经济运行) 125, 158—159, 161—163, 167—168, 171—172, 219
- economic sanctions(经济制裁) 102, 179
- Egypt(埃及) 28
- Eley, Geoff(若弗·埃利) 77, 79—80, 189, 192

- empires(帝国) 28, 187
- encirclement(包围) 12. 另见 self-encirclement(自我包围)
- Engels, Friedrich(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36—38, 40, 219
- Entente Powers(协约国) 44, 82
- ethnicity(民族性, 族群) 180, 182—183, 185—186, 188, 190, 195—196, 199
- European Community (EC)(欧洲共同体, 欧共体) 11, 191, 195—196, 202, 204, 216
- Evangelista, Matthew(马修·伊万杰里斯塔) 16, 18, 55, 125, 154—155, 161, 173
- evil empire(邪恶帝国) 55, 166
- exports(出口) 73—74, 78, 135—136
- extraction(榨取) 13, 65, 124, 167, 190, 193
- Ferdinand of Aragon(阿拉贡的斐迪南) 26, 29—31, 47
- feudalism(封建主义, 封建制度) 36, 220
- Finland(芬兰) 128, 144, 150
- Fisher, John(约翰·菲舍尔) 88
- Forrestal, James(詹姆斯·福雷斯特尔) 117
- France(法国) 5—6, 14, 28, 37, 41—42, 44—45, 66, 74, 77, 81, 83—85, 88, 102, 104—105, 115, 123—124, 127—133, 135—146, 149—154, 186, 202, 209
- Friedberg, Aaron(阿龙·弗里德贝格) 22, 84—87, 101
- Fukuyama, Francis(弗朗西斯·福山) 23, 53
- Gaddis, John Lewis(约翰·L. 加迪斯) 50, 112
- game theory(博弈论) 7
- Geiss, Immanuel(伊曼纽尔·盖斯) 70, 79
- Gellner, Ernest(厄奈斯特·盖尔纳) 183—185, 190—192, 195, 199
- Geopolitical(地缘政治的) 99, 187, 189—190, 197
- Gerasimov, Gennadii(根纳季·格拉西莫夫) 175
- Germany(德国, 德意志, 日耳曼) 5, 17, 20, 57, 60—61, 154, 161, 163, 177, 184, 188—190, 192—196, 202—203, 215; Bismarckian(俾斯麦时期的德国) 15, 74, 94, 209, 217—221; Imperial(德意志帝国) 6, 18, 217; Nazi(纳粹德国) 97, 101—112, 116, 120, 123—153, 163—164, 167, 189, 192, 196, 203, 220—221; politics on eve of World War I(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政治) 35, 37—46; Wilhelmine(威廉时期的德国) 65—66, 70,

- 72—74, 76—83, 85, 87—89, 92—95, 192. 另见 West Germany(西德)
- Gerschenkron, Alexander(亚历山大·格申克龙) 70, 74, 217—218
- Gilpin, Robert(罗伯特·吉尔平) 6—8, 22, 57—58
- Glasnost(公开性) 155, 159, 161
- Godesberg(哥德斯堡) 139, 148, 150
- Gorbachev, Mikhail(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52—56, 58, 125, 154—155, 158—162, 164—165, 167, 169—170, 175—176, 189—190, 194
- government spending(政府开支) 72, 83, 86, 108
- grand strategy(大战略) 3—6, 8, 12—25, 46—50, 52, 54—55, 58, 61, 65—66, 96—97, 99—101, 112—114, 124—125, 127—129, 132—133, 137, 143, 150—154, 157—158, 160, 162—166, 168—169, 173, 176—179, 201, 204, 214, 216, 223
- Great Britain(英国,大不列颠) 5—6, 13, 15, 18, 20, 28, 37, 39, 41—42, 44—45, 52, 59, 154, 160, 164, 167—168, 184, 188, 202—204, 206, 209, 219; pre-World War I(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 65—66, 70, 72—73, 78—79, 82—88, 91—94; pre-World War II(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 101—107, 115, 123—153
- Greece(希腊) 115, 133, 140, 143—144
- Greenwood, Arthur(阿瑟·格林伍德) 149
- Gulf War(海湾战争) 14, 213
- Halifax, Lord(罗德·哈利法克斯) 130, 134, 139—148, 150
- Hamilton, Edward(爱德华·汉密尔顿) 83—84, 86
- hard-liners(强硬派人物) 16, 125, 154, 157, 167—172, 174, 177
- hegemonic stability(霸权稳定) 7—8
- Hirohito(裕仁) 206
- Hirschman, Albert(阿尔伯特·赫胥曼) 217
- Hitler, Adolf(阿道夫·希特勒) 102—103, 107—108, 125—134, 136, 138—153, 184, 196
- Hohenlohe, Chlodwig(克洛德维希·霍恩洛厄) 76—77, 81
- Holland(荷兰) 129, 139
- Howard, Michael(迈克尔·霍华德) 3—4, 22, 129
- Hungary(匈牙利) 41, 43, 191, 194—195, 198
- Hypernationalism(超民族主义) 16, 181—185, 187—190, 193—194, 197—200

- ideas(观念) 5, 12—14, 16, 34, 36, 48—49, 51—53, 55—58, 62, 196
- ideology(意识形态) 7, 14—16, 50—58, 120, 155, 183—184, 196, 208, 223
- Ikeda, Hayato(池田勇人) 211, 217
- imperialism(帝国主义, 帝制) 27, 36, 39—40, 42—43, 46, 49, 66, 95, 170, 189, 192, 205, 217, 220, 223
- industrial society(工业社会) 190—191
- Inoguchi, Takashi(猪口孝) 210
- insecurity(不安全) 26, 27, 34, 179—180
- intellectuals(知识分子) 23, 187, 193, 195—197, 200
- interdependence(相互依存) 5, 8, 10, 12—13, 33, 99, 181, 199, 210, 214
- internationalism(国际主义) 31, 35—36, 38, 45, 102
- Iran(伊朗) 50
- Iraq(伊拉克) 94, 99, 201, 212, 215
- Ishihara, Shintaro(石原慎太郎) 202
- isolationism(孤立主义) 102, 112
- Italy(意大利) 31, 41—43, 66, 133, 140, 145, 148
- Japan(日本) 6, 9, 15, 17—18, 53, 59—61, 85, 88, 97, 102, 107—111, 136, 140—141, 145, 190, 193, 201—223
- Jervis, Robert(罗伯特·杰维斯) 5, 8, 14, 52, 55, 97, 119, 181
- Johnson, Chalmers(查默斯·约翰逊) 215, 217, 219
- Johnson, Louis(路易斯·约翰逊) 117, 119
- Joint Chiefs of Staff(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 112—119
- Junker(容克) 35, 74, 76, 79—80
- Kaifu, Toshiaki(海部俊树) 212—213
- Kant, Immanuel(伊曼纽尔·康德) 31—32, 34—35
- Kaplan, Morton(莫顿·卡普兰) 58
- Kaysen, Carl(卡尔·凯森) 52
- Kehr, Eckart(埃卡特·凯尔) 77—80, 220
- Kennan, George(乔治·坎南) 113, 121, 152
- Kennedy, Paul(保罗·肯尼迪) 4—5, 14, 22, 70, 72—74, 76—77, 79, 81—83, 101, 111, 201
- Kennedy, John F.(约翰·肯尼迪) 174—175
- Kerensky, Alexander(亚历山大·克伦斯基) 44, 52
- Keynes, John Maynard(约翰·M. 凯恩斯) 13—14

- Khrushchev, Nikita(尼基塔·赫鲁晓夫) 49—50, 156, 173—175
 Kolakowski, Leszek(克拉科夫斯基·莱谢克) 36, 38
 Konoe, Prince(近卫王子) 204, 206
 Korea(朝鲜) 120—123, 205—208, 216. 另见 South Korea(韩国)
 Korean War(朝鲜战争) 18, 97, 118—122, 169, 206, 211
 Kosovo(科索沃) 187
 Krasner, Stephen(斯蒂芬·克拉斯纳) 6, 8
 Kravchuk, Leonid(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 195
 Kruger, Paul(保罗·克鲁格) 39
 Kugler, Jacek(亚采克·库格勒) 57
 Kulturkampf(文化斗争) 76, 94
- Landes, David S.(戴维·S. 兰德斯) 72—73, 81
 League of Nations(国联) 144, 146, 195
 legitimacy(合法性) 193, 214, 221
 Lend-Lease(租界法案) 106, 108—109, 146
 Lenin, V. I.(弗·伊·列宁) 35, 38, 45, 49, 208
 Leninist state(列宁主义国家) 218—222
 levels of analysis(分析层次) 5, 181—182, 189, 197—199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LDP) (Japan)(日本自民党) 209—210, 216, 220
 liberalism(自由主义) 6, 35, 56
 liberal states(自由国家) 31—35. 另见 republics(共和国)
 Liddell Hart, B. H.(巴兹尔·利德尔·哈特) 3—5, 129, 149—150, 223
 Lindsay, Ronald(罗纳德·林赛) 102
 logrolling(相互捧场) 5, 123—124, 126, 205
 Luttwak, Edward N.(爱德华·鲁特瓦克) 4, 165—166
 Luxembourg(卢森堡) 104, 115
 Luxemburg, Rosa(罗莎·卢森堡) 38
- MacDonald, C. A.(C. A. 麦克唐纳) 101—103, 107
 Machiavelli, Niccolo(尼科洛·马基雅弗利) 26—27, 29—30
 Maginot line(马其诺防线) 138, 151, 153
 Mahan, Alfred Thayer(阿尔弗雷德·T. 马汉) 14, 81, 83
 Maruyama, Masao(丸山真男) 203—204, 207
 Marx, Karl(卡尔·马克思) 36—38, 40, 44, 208, 219
 Marxism(马克思主义) 35—38, 42, 45—46, 208, 220

- Masumi, Junnosuke(升味准之辅) 209—212
- Mearsheimer, John(约翰·米尔斯海默) 6, 14, 16, 62, 129, 133, 162, 179—181, 183, 188—189
- Mediterranean(地中海) 30, 115, 121, 141
- Meiji era(明治时代) 15, 188, 205—206, 209, 217—218, 220—221, 223
- mercantilism(重商主义) 15, 181, 216, 218
- Middle East(中东) 115—116, 121, 212
- militarism(军国主义, 黩武) 34, 37, 39—40, 45, 205, 220—221
- military commitments(军事承诺) 18, 97, 101, 103—105, 112—113, 115—116, 118, 130, 165. 另见 commitments(承诺)
- military competition(军事竞争) 160, 188, 193. 另见 competition(竞争)
- military spending(军事开支) 34, 70, 82, 89, 91, 93, 96, 103, 108, 114, 117, 119, 136, 141, 161, 163, 167, 169, 172, 213. 另见 defense spending(国防开支)
- Miyazawa, Kiichi(宫泽喜一) 207
- mobilization(动员) 4, 13
- moderates(温和派分子) 16, 125, 144, 157, 167—178
- modernization(现代化) 93, 95, 156, 173, 186, 190, 192, 198—199, 205, 211
- modern states(现代国家) 186, 193
- Morgenthau, Hans J.(汉斯·摩根索) 10, 58—59, 103
- multipolarity(多极, 多极体制) 8—9, 57, 179—180
- Munich(慕尼黑, 慕尼黑阴谋) 15, 74, 129, 131, 134, 139—140, 142, 147—151, 161, 203
- Murray, Williamson(威廉森·默里) 18, 128—129, 137, 152
- Mussolini, Benito(贝尼托·墨索里尼) 140, 145, 149
- Nagorno-Karabakh(纳戈尔诺—卡拉巴赫) 187, 198
- nationalism(民族主义) 16, 39, 45—46, 77, 179—193, 195—199, 220
-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 116, 118—119
- NATO(北约) 18, 55, 116, 122, 165—166, 190
- naval race(海军竞赛) 14—15, 65—66, 82, 87
- naval tonnage(海军吨位) 66—68, 109—110
- Nazi-Soviet Pact(《纳粹—苏联条约》) 138, 145, 150, 153
- neorealism(新现实主义) 6, 9, 24—25, 35, 46, 51, 65, 162. 另见 realism(现实主义)
- Netherlands(荷兰) 104, 115

- neutrality(中立) 27, 41, 43, 101, 108, 145, 149
neutrality laws(中立法) 102—105, 107, 135, 138, 146
Nixon, Richard(理查德·尼克松) 175, 212
Norman, Montagu(蒙塔古·诺曼) 141
nuclear proliferation(核扩散) 10, 180
nuclear weapons(核武器) 9—10, 59, 166, 169, 175—177, 195. 另见 atomic weapons(原子武器)
- Okinawa(冲绳) 61, 220
Organski, A. F. K.(肯尼思·奥干斯基) 57
overbalancing(失衡) 21. 另见 balancing(平衡)
overexpansion(过度扩张, 扩展过度) 12, 126, 204—206
overextension(过度扩展) 5, 99—101, 112—113, 115, 123, 204
overstretch(过度延伸) 5, 222
- Pape, Robert(罗伯特·佩普) 159
paper tiger(纸老虎) 183—184, 204
Parker, R. A. C.(帕克) 127, 129, 132, 134, 136, 142
parliament(议会) 40—41, 74, 76, 83, 146, 148—149
Pearl Harbor(珍珠港) 107, 110, 123
Peden, George C.(乔治·佩登) 135—136, 141, 144
perestroika(改革) 155, 158, 160—161, 165—166, 187
Plekhanov, G. V.(普列汉诺夫) 44
Poland(波兰) 99, 126—129, 131—133, 139—140, 142—145, 147, 150, 152, 188, 195
Politburo(政治局) 156
political constraints(政治制约, 政治制约因素) 4, 20, 96, 99—101, 112—113, 116, 119, 122—123. 另见 domestic constraints(国内制约); economic constraints(经济制约)
Portugal(葡萄牙) 51, 55
Posen, Barry(巴里·波森) 6, 14, 34, 123, 128—129, 154, 164, 179—180, 188
postrealism(后现实主义) 156—157, 167, 170, 176—177. 另见 realism(现实主义)
Prague(布拉格) 134, 137, 140, 148, 150
Prestowitz, Clyde(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 201

- primordial(原生的,原始的) 182, 184—188, 198—199
 princes(王子,君主,诸侯) 26—27, 30
 protectionism(保护主义) 73, 78, 220
 Prussia(普鲁士) 35, 37, 43, 57, 74—76, 78, 82, 93—94, 220

 Rathenau, Emil(埃米尔·拉特瑙) 78, 80
 rational choice(理性选择) 7, 222
 Reagan, Ronald(罗纳德·里根) 23, 34, 54—55, 102, 155, 158, 165—166, 169, 175—176, 201—202
 realism(现实主义) 3—14, 16—21, 23—26, 29, 31, 46, 49, 51—52, 56, 61—62, 98—100, 124—125, 127—129, 135, 150, 152—153, 156—157, 159—160, 162—170, 176—177, 179—181, 188, 200—204, 206, 223. 另见 neo-realism(新现实主义); post-realism(后现实主义); structural realism(结构现实主义)
 rearmament(重新武装) 18, 103—105, 110, 112, 114, 116—117, 121—122, 127, 133—137, 139, 141—143, 164, 167, 171, 206
 reciprocity(相互性,互惠) 170—174, 176—178, 202
 Reichstag(德意志帝国议会) 37, 44, 74—77, 81, 94
 republics(共和制,共和国) 26—27, 31—32, 188. 另见 liberal states(自由国家)
 restraint(克制) 19, 35, 79, 93, 155, 157, 160, 168, 170—173, 176
 retrenchment(收缩) 19, 154—155, 157—161, 164—166, 171—172, 177
 Reynolds, David(戴维·雷诺兹) 14, 101—102, 106—107, 130
 Ribbentrop, Joachim von(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 145
 Ritchie, Charles(查尔斯·里奇) 86
 Romania(罗马尼亚) 127, 129—130, 133, 140, 143—144, 147, 194—195
 Roosevelt, Franklin D.(弗兰克林·罗斯福) 16, 97, 101—108, 110, 112, 122, 136, 138, 143, 146
 Rosecrance, Richard(理查德·罗斯克兰斯) 8—10, 25, 61—62, 101, 132, 162, 181, 215
 Royal Navy(皇家海军) 83, 88, 92, 133, 137, 141
 Ruggie, John Gerard(约翰·G. 鲁杰) 25
 Russia(俄罗斯) 11, 19, 37—38, 66, 84—85, 88, 179, 205, 216; socialists in (俄罗斯社会党人), 41—45

- Schumpeter, Joseph(约瑟夫·熊彼特) 95, 217
- second image(第二意象) 5, 8, 13, 65, 206
- Second International(第二国际) 35, 38—39
- security competition(安全竞争) 190, 198
- security dilemma(安全困境) 8, 14, 180
- Security Treaty (U. S. -Japan)(美日《安保条约》) 210—214
- Selborne,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英国海军部大臣劳德·塞尔伯恩) 84, 85, 87—88
- Selective Service Act(《义务兵役制法案》) 111, 114
- self-encirclement(自我包围) 99. 另见 encirclement(包围); overexpansion(过度扩张)
- self-help(自助,自救) 11. 另见 realism(现实主义)
- Serbia(塞尔维亚) 40—42, 46, 179, 187, 194
- Shevardnadze, Eduard(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 161
- Silver, Robert(罗伯特·西尔弗) 134
- Simon, Sir John(西尔·约翰·西蒙) 142, 149
- Slovaks(斯洛伐克人) 191—192
- Snyder, Jack(杰克·斯奈德) 5, 14, 58, 77, 123—124, 126, 156, 159, 170, 173, 181, 183, 197—199, 203—206
-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PD) (Germany)(德国社会民主党) 35, 38, 40, 43—44, 46
- socialists(社会党人) 23, 34—42, 44—47, 49, 53, 76, 79, 82, 210, 218, 220
- Southeast Asia(东南亚) 202
- South Korea(韩国,南朝鲜) 97, 120, 122—123, 208, 217, 219
- Spain(西班牙) 26, 29—30, 51
- Sparta(斯巴达) 26, 78
- Stalin, Josef(约瑟夫·斯大林) 49, 52, 128, 130, 138, 145—146, 150, 152, 196, 208
- Stein, Arthur A.(阿瑟·A. 斯坦) 3, 6, 10, 25, 125, 164
- stickiness(棘手性) 13, 99
- Streit, Clarence(克拉伦斯·斯特赖特) 34
- structural realism(结构现实主义) 6—8, 13, 24—25, 29, 46, 51, 201, 223. 另见 realism(现实主义)
- Sudetenland(苏台德地区) 132, 140
- survival(生存) 7, 12—13, 24, 83, 96, 98, 105, 155, 180, 198, 215
- Switzerland(瑞士) 127, 139, 202
- system transformation(系统改造,系统转换) 10, 48, 56—57

- tariff reform(关税改革) 86—87
- tariffs(关税) 74, 76, 78—80, 86, 90, 220
- taxation(征税) 15, 70, 75, 86—87, 90, 92, 136, 164, 193
- taxes(税收) 30, 70, 74, 81—84, 86—87, 90—93, 118, 136
- Tewfik(杜霏克总督) 28—29, 31, 47
- third image(第三意象) 5, 65
- threat(威胁) 4—5, 11, 15, 18, 21, 27—28, 42, 44—45, 50, 55, 57—58, 61, 79, 84, 87, 89, 92, 94, 97, 116, 118, 121, 125, 129, 139, 142—143, 157, 162—165, 167—172, 175, 177, 188—189, 193—194, 200
- Tirpitz, Alfred von(阿乐费雷德·冯·蒂尔皮茨) 66, 78, 80—81, 83
- Tolstoy, Leo(利奥·托尔斯泰) 60
- trading state(贸易国) 9—10, 13, 61, 181, 209, 214—215, 222
- Treasury(财政部) 82—83, 86, 131, 135—137, 142, 151
- Trofimenko, Genrikh(根里克·特罗菲缅科) 175
- Truman, Harry S.(哈里·杜鲁门) 16, 50, 97, 115, 117—119, 122
- Turkey(土耳其) 115, 122
-
- Ukraine(乌克兰) 127, 152, 188, 190, 195
- uncertainty(不确定性) 27, 56, 99, 166
- underbalancing(平衡不足, 抗衡不足) 21. 另见 balancing(平衡)
- underextension(延伸不足) 99, 101, 112
- unitary actor(单一行为体) 36, 156
- United Nations(联合国) 52, 54, 195, 207, 212
- United States(美国) 4, 6, 13—16, 18—19, 22—23, 34, 37, 49, 51—54, 56—59, 60—61, 78, 85, 96—97, 99—100, 123, 193; and early Cold War(美国与冷战初期) 112—122; and Japan(美国与日本) 201—204, 206, 208—216, 219, 222, 223; and the Soviet Union(美国与苏联) 154—158, 161—166, 168—178; pre-World War II(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 101—112, 125, 130, 132, 135—136, 138, 141—143, 146, 149, 151
- USSR(苏联) 4, 6, 11, 14, 16—19, 23—24, 37, 179—181, 183—190, 192—197, 206, 223; and the Cold War(苏联与冷战) 49—59, 99, 113—118, 120—121; grand strategy of(苏联大战略) 154—177; pre-World War II(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 125, 127—128, 130—132, 134, 138, 144—153
-
- Van Evera, Stephen(斯蒂芬·V. 埃弗拉) 8, 14, 34, 180, 183—184, 189, 193, 195, 198

van Wolferen, Karel(卡雷尔·范沃尔弗伦) 210—211

Vietnam syndrome(越南综合征) 163

Vietnam War(越南战争) 201, 212

Virtù(美德) 27—29, 31

Walt, Stephen M.(斯蒂芬·瓦尔特) 6, 28, 162

Waltz, Kenneth(肯尼思·沃尔兹) 5, 6, 9—11, 24, 27, 36, 49, 51, 53, 56—57, 59—60, 62, 98, 157—162, 167, 206

War(战争) 3, 12, 16, 19, 21, 39, 43, 101, 165, 168, 188—190; of attrition(消耗战), 16, 134—135, 138, 142—143, 151; hegemonic(霸权战争) 57—58; long-term(长期战争,持久战) 134, 136, 151; preventive(预防性战争) 125, 163—167, 171, 176. 另见 Boer War(布尔战争); Gulf War(海湾战争); Korean War(朝鲜战争); Vietnam War(越南战争); World War I(第一次世界大战); World War II(第二次世界大战)

Watt, Donald Cameron(唐纳德·C. 瓦特) 101, 129, 138, 145, 148

Western Europe(西欧) 12, 38, 44, 72, 116, 122, 127, 186, 209—210

West Germany(西德) 117, 196. 另见 Germany(德国)

Wilhelm II(威廉二世) 14, 37, 43—44, 66, 70, 74, 76—82, 93—94

Willkie, Wendell(温德尔·威尔基) 105—106

World War I(第一次世界大战) 3, 14, 35, 39, 41—42, 60, 74, 205

World War II(第二次世界大战) 4, 14, 49, 54, 59, 97, 107, 100—111, 114, 116—117, 121, 128, 187, 195, 211, 214, 216

Yeltsin, Boris(鲍里士·叶利钦) 56, 155, 190, 194—195

Yoshihito(大正天皇嘉仁) 205—206

Yugoslavia(南斯拉夫) 16, 55, 57, 133, 143, 180, 194

zero-sum(零和,零和博弈) 58, 187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大战略的国内基础

作者 =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 阿瑟·斯坦主编 刘东国译

页数 = 226

石头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